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刊

区域经济评论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6年第4期,总第82期)

双月刊

学术顾问 范恒山 程必定 洪银兴

编委会主任 秦保强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任重	王一鸣	王承哲	王玲杰	史育龙
宁越敏	任晓莉	阮金泉	安虎森	孙久文
李国平	李海舰	李曦辉	杨开忠	杨继瑞
肖金成	谷建全	张可云	张占仓	张世贤
张军扩	张其仔	陈耀	金碚	周金堂
赵弘	郝寿义	贺灿飞	秦尊文	高国力
崔民选	覃成林	喻新安	魏后凯	

主编 王玲杰 陈耀

副社长 安晓明 刘昱洋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经济评论

(双月刊)

区域经济理论

5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进阶

李鹏飞 叶云岭

15 虚拟邻近: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重塑的新机制

孙祥栋 李欣凝 石鸿旭

区域高质量发展

26 中国式现代化中生产力布局优化与区域政策优化研究

彭芳梅 周建华 夏 添

39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的“内卷式”竞争及其制度根源

张 翱 冀保峰

51 促进沿边沿海地区联动发展的“双弓弦”空间格局初探

周贤能 滕祥河 文传浩

东西部协作研究专题

64 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战略意义与推进路径

席强敏 李 甜

71 东西部协作促进受援县共同富裕研究——基于西南地区县域层面的

经验证据

何雄浪 卢 玲

区域
经济韧性
与安全专题

85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李鑫岩 任晓猛 史晋川

102 农村数字化驱动农村经济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郭 凯 张艳艳 李文洁

区域
开放发展

1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特征与政策展望 李沛霖

128 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出口空间格局: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研究 蒋 晟 穆恩怡 贺灿飞

区域
经济研究
综述

142 区域创新视域下社会过滤理论的发展方向探讨 任建辉 杜中巧 刘维奇

153 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展望——第九届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综述 池武城 李光辉 林一玲

主 管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 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区域经济评论杂志社
地 址 郑州市恭秀路16号
邮 编 451464
电 话 0371-61086232
投稿邮箱 qyjpl@163.com
网 址 www.qyjpl.cn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1425/F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5766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郑州市邮政局 邮发代号 36-44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BM5690
定 价 16元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6.4 *Bimonthly*

Promoting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Li Pengfei Ye Yunling(5)
Virtual Proximity: A New Mechanism for Reshaping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un Xiangdong Li Xinning Shi Hongxu(15)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Policies within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Peng Fangmei Zhou Jianhua Xia Tian(26)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nd its Institutional Roots	Zhang Ao Ji Baofeng(39)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Double–Bow–and–String” Spatial Pattern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s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Zhou Xianneng Teng Xianghe Wen Chuanhao(51)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 Path of Normalizing East–West Collaboration	Xi Qiangmin Li Tian(64)
Research on East–West Collaborati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ided Coun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Southwest China	He Xionglang Lu Ling(71)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Li Xinyan Ren Xiaomeng Shi Jinchuan(85)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Driving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Guo Kai Zhang Yanyan Li Wenjie(102)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Prospects of China’s Regional Opening–up Patter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Peilin(111)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Reshapes Export Spatial Patterns: The Co–Agglomeration of Trading Companies and Manufacturing Firms	Jiang Sheng Mu Enyi He Canfei(128)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cial Filte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Ren Jianhui Du Zhongqiao Liu Weiqi(142)
Consensus and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9th China Forum on Frontier Economic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Chi Wucheng Li Guanghui Lin Yiling(153)

【区域经济理论】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 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李鹏飞 叶云岭

摘要:流域作为兼具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复合空间单元,是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共同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资源约束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空间组织塑造“节点—通道”空间格局,要素配置提升跨区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制度协同强化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然而拓展流域经济模式仍面临流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之间矛盾突出、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上游保护与下游受益尚未形成稳定利益调节机制、流域整体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偏离、流域整体治理尚未形成闭环等制约。为此,应以资源承载边界为前提,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底图,优化流域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促进互联互通与要素畅通流动;以制度协同为抓手,强化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贯通规划、政策与评估,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

关键词:流域经济模式;区域联动发展;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制度协同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05-10 **收稿日期:**2026-05-24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研究”(2026YZD007)。

作者简介:李鹏飞,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6)。

叶云岭,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一、引言

在新发展阶段,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是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为流域经济发展和跨区域协同治理提供了政策支撑,凸显了流域在经济发展、生态安全与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作为典型的大河流域经济体,拥有长江、

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和辽河等七大流域。这些流域水系具有支撑经济联系和要素流动的天然条件,是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七大流域覆盖全国47.3%的国土面积、承载82.7%的人口并贡献约82.6%的国内生产总值(宋建军,2023)。流域长期承载人口、产业、城镇和基础设施集聚,是国家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带状空间。流域是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嵌套的复合地域系统:自然属性表现为水系连通、生态联系紧密和资源环境承载边界相对完整;经济属性表现为产业联系、要素流动和基础设施网络沿流域展开;社会属性表现为跨越多个行政单元,涉及公共治理、利益协调和流域事务管理等多重关系。流域内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之间在资源环境、产业布局、基

基础设施、城镇体系和公共治理等方面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流域经济系统是具有外部开放边界和内部复杂相互作用的经济地域系统(陈才等,1999)。因此,区域联动发展难以在单一行政区尺度内得到有效回应,需要在流域尺度上统筹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流域经济内涵的演进

流域经济属于亚区域和跨区域经济系统,是国民经济活动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敏等,2023),其内涵经历了从地理空间属性向综合发展范式的演进。张思平(1987)较早提出流域经济学问题,早期研究多将流域视为经济活动的地理载体,侧重水资源利用与开发。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流域是自然、经济、社会相互嵌套的复合系统。刘世庆等(2018)进一步指出,流域经济并非政区经济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水系联系形成的跨行政区域经济关联。

近年来,流域经济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拓展。宋敏等(2023)认为,流域经济是以流域空间为载体、以水资源为核心,通过要素流动与产业关联形成的特殊经济类型。易森等(2025)从分工与发展的视角指出,流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在流域空间上的深化与拓展。从政策层面看,流域经济模式是以自然流域为空间组织尺度、以流域共同资源禀赋为基础,推动沿线地区围绕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形成跨行政区联动的发展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2025)。

典型流域研究也表明,长江经济带、淮河流域和汾河流域等虽在经济联系、空间分异和治理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均体现出流域内部经济活动的关联性、差异性与整体性(吴传清等,2020;孔丹丹等,2021;史利江等,2020)。流域经济的内涵逐步由沿河资源开发和产业布局,拓展为兼具资源约束、空间组织、产业联系和制度协同属性的综合性区域发展范式。

(二)流域经济模式与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流域经济模式的研究大体可归纳为三

支。第一支关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表明生态约束已成为理解流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Chen等,2018;赵敏等,2022;孙久文等,2022;任保平等,2023;姚石等,2023;张改清等,2023)。第二支关注流域产业布局与空间结构,主要从经济格局、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差异、空间集聚和产业转移等方面展开,说明流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节点功能和交通通道条件密切相关(曾浩等,2015;冯兴华等,2016;张予川等,2017;王林梅等,2015;张跃等,2021;田野等,2020;王良虎等,2020;彭继增等,2017;胡森林等,2020)。第三支关注流域治理与制度协调,强调应理顺政区与流域边界、政府与市场、开发与保护等关系,并从绿色发展、国际比较和理论体系等角度讨论流域经济的治理机制与推进方向(刘世庆等,2018;贾若祥等,2019;宋敏等,2023;易森等,2024;易森等,2025)。

区域联动发展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跨区域联系、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协同治理等。相关研究表明,区域联动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格局演变并促进要素流动与循环(邓创等,2023),也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张虹鸥等,2018)。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已拓展到比较优势发挥、分工协作、要素自由流动与生态共治等方面(陈耀,2018),区域联动发展日益依赖跨尺度空间组织与制度协调(毛熙彦等,2021;郝宪印等,2024;叶振宇,2024)。

从两类文献的交汇点看,已有研究为理解流域经济与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二者之间仍存在衔接不足:流域经济研究多聚焦于流域内部的资源、空间与治理问题,区域联动发展研究则多围绕城市群、都市圈和行政区合作展开,对流域这一兼具自然整体性、空间连续性与跨行政性的复合单元关注不足;同时,现有研究虽分别涉及资源环境约束、空间组织、要素流动和制度协调等内容,但尚未形成解释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统一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将流域经济模式界定为以自然流域为空间载体,依托流域共同资源,在资源环境承载边界约束下,通过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统筹生态环境共治、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共建与区域联动的组织化区域发展方式。

围绕上述不足,本文重点回应三个问题:区域联动发展为何需要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流域经济模式通过何种机理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拓展流域

经济模式又面临哪些现实约束及其实践进阶?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流域经济模式置于区域联动发展视野中,围绕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四个维度解释其作用机制,并将理论逻辑、现实约束与实践进阶贯通起来,为流域尺度下区域联动发展的政策设计与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三、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

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是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和制度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四者构成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内在机理(见图1)。

(一)资源约束逻辑: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

资源约束逻辑首先体现为共同承载边界对开发秩序的限定。流域经济模式需要在流域尺度上识别水资源供给能力、水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承受阈值,并据此协调不同区段的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将资源环境约束转化为区域联动的前置条件。

流域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促

进区域联动。其一,限定不同区段的发展强度。水资源供给能力、水环境容量和生态系统的承受阈值决定了不同地区能够承载的发展类型和规模。若各地区脱离流域承载能力,仅从本地增长目标出发争夺水资源、布局高耗水高排放项目、提高开发强度,就会导致资源超载、环境压力累积和生态风险上升,削弱流域协同性。其二,划定不同区段的功能边界。流域内不同区段在水源涵养、生态屏障、农业生产、工业承载、港航运输和城镇集聚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将资源环境差异转化为开发和保护的边界依据,有助于避免功能错配和无序开发。可见,资源环境承载边界既构成开发约束,也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基本依据,有助于强化流域治理秩序(刘曙光等,2020)。与主要依托市场联系、产业协作或政策协调的一般区域发展模式不同,流域经济模式首先受共同水系和资源环境边界约束,资源环境约束构成拓展流域经济模式的逻辑起点。

(二)空间组织逻辑:塑造“节点—通道”空间格局

空间组织逻辑体现为流域自然连续性向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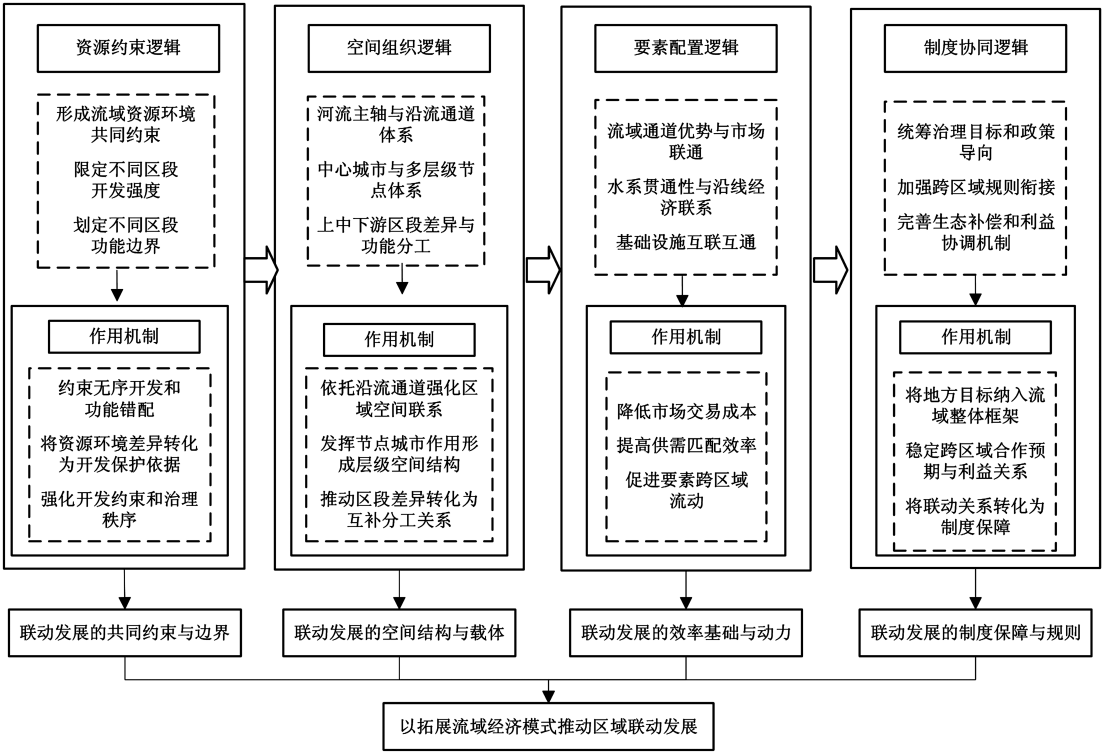


图1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联系的转化。河流主轴、沿线交通通道、节点城市和产业布局在长期演进中相互嵌合,形成具有轴带特征的空间结构。这一结构与“点—轴系统”理论强调的节点集聚、轴线联结和带状扩展相契合(陆大道,2002;韩增林等,2005)。在流域经济模式中,节点城市和沿流通道共同构成区域联动的空间骨架,区段分异则为不同地区之间形成互补分工提供基础。

流域空间组织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影响区域联动。第一,沿流通道强化区域空间联系。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通常与交通干线、产业廊道和城镇带相互耦合,这使沿线地区在同一轴带上形成联系,推动区域空间联系由局部邻近转向沿流域轴线展开。第二,节点城市形成层级化空间结构。流域联动不是各区段之间的均质联系,而是依托不同层级城市节点展开。中心城市承担综合服务和组织协调职能,区域性节点城市承担区段衔接和区域服务职能,一般城镇嵌入相邻区段的生产生活空间。通过层级化节点体系,流域内部的地理联系得以转化为有组织的空间联系。第三,区段分异构成流域空间格局的差异化基础。流域上中下游在资源禀赋、地形条件、生态功能、产业基础和市场区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空间组织将其转化为互补关系(覃成林,2011)。对于长江、黄河等流域而言,上游地区多承担生态涵养、水源保护和初级资源供给功能,中游地区多承担能源转化、制造支撑和通道组织功能,下游地区依托平原腹地、港口条件和市场优势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开放型经济。沿流通道、节点城市和区段分异分别从联系方向、层级结构和差异基础三个方面,共同塑造区域联动的空间格局。

(三)要素配置逻辑:提升跨区域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要素配置逻辑体现为通道优势和市场联通对配置效率的提升。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因素在于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否突破行政区分割,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流域水系的贯通性和沿线经济联系,有利于形成跨区段要素流动体系和市场联系体系。

要素配置逻辑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市场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市场准入、标准要求、公共服务和监管要求逐步一致后,要素价格和供需信号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调节作用。其二,要素市

场发育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匹配,提升配置效率并优化要素结构。其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交通、物流、信息等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有助于提高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流动效率。

市场联通、要素市场发育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作用,推动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匹配和配置,提升区域联动效率。市场一体化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要素流动加快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促进区域发展(生延超等,2024)。流域开放通道越完善,越有利于带动流域内部和流域内外经济联系深化(刘曙光等,2020)。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市场联通和要素流动程度越高,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衔接越紧密,区域联动效率基础越稳固。

(四)制度协同逻辑:强化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

制度协同逻辑体现为跨行政区共同目标向一致行动的转化。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事项超出单一行政区治理边界,需要通过规则衔接、政策协调和利益调节加以统筹。将流域共同目标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区域联动发展就会更具有持续性。

制度协同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其一,统筹治理目标。围绕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基础设施联通等事项形成一致的政策导向,减少目标设定和执行标准差异。其二,推进规则衔接。围绕规划要求、环境标准、项目审批、监管执法和责任落实等环节加强衔接,降低跨区域协作成本。其三,完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生态补偿、责任分担和收益共享,把保护责任、治理成本和受益关系纳入同一制度框架,增强合作的持续性。

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流域边界与行政区边界、开发与保护等关系的协调问题(刘世庆等,2018)。从实践看,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长江流域协同治理、永定河流域平台化运作,均体现了跨区域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的制度探索(李忠等,2025)。田纳西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治理能力的形成,也有赖于统一管理机构、跨区域规则体系和持续协调机制的支撑(刘曙光等,2020)。因此,制度协同的逻辑在于以共同治理目

标约束属地行为,以规则衔接降低协作成本,以利益协调稳定责任分担和收益关系,从而为区域联动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现实约束

尽管流域经济模式具有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和逻辑,但仍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分工不充分、利益调节不健全、目标协同不足和治理闭环不畅等制约。这些制约相互交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制约产业布局,引致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削弱上下游协作基础,目标偏离导致政策取向分化;治理闭环不畅则使规划、政策、实施、评估和反馈难以及时衔接,削弱贯通与纠偏能力。五类约束共同构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制约因素(见图2)。

(一)流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之间矛盾突出

部分流域在城镇扩张、产业集聚和岸线利用过程中,开发利用强度与水资源、水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等承载边界不相适应,资源消耗、污染排放和空

间开发对承载边界造成较大压力。尤其是在生态脆弱、水资源约束较强的流域,水资源刚性约束、生态保护要求与产业发展需求交织叠加,开发强度与承载边界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集中。

具体而言,一方面,部分流域仍存在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资源利用强度偏高的问题。以黄河流域为例,水资源相对短缺、生态本底较为脆弱,部分地区开发利用强度较高,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仍然较为突出(易森等,2024)。另一方面,一些流域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水环境容量、生态敏感性和岸线开发强度重视不足,高耗水、高排放、高环境负荷产业沿流空间集聚,进一步加大了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和岸线管控压力。以长江流域为例,中下游部分地区曾较为集中地出现“化工围江”问题,沿江化工布局偏密、岸线开发强度偏高,局部区段生态环境压力和流域治理压力同步加重(吴传清等,2020)。

(二)流域功能梯度导向的产业分工体系尚未健全

流域不同区段在资源禀赋、生态敏感性、交通区位、市场腹地和产业基础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应据此形成差异化功能定位和上下游产业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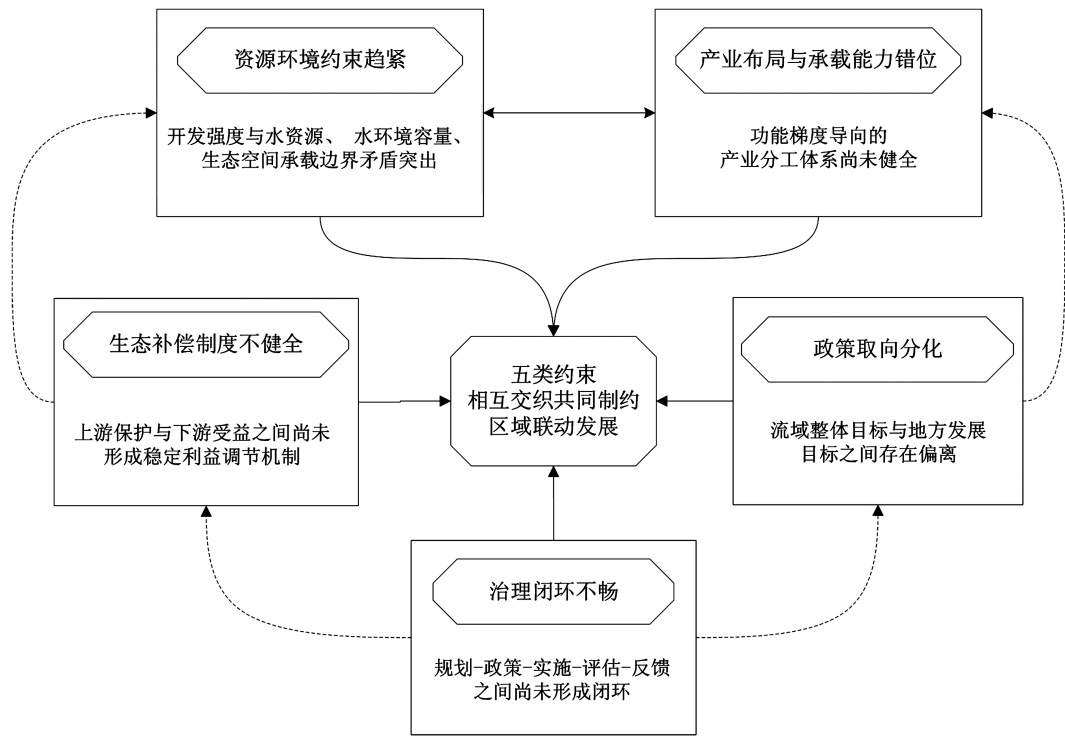


图2 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主要现实约束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工,但现实中,一些区段的产业选择与功能定位、比较优势之间仍存在偏差,同质化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依然存在,致使流域内部比较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分工优势,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区域联动发展的产业基础也因此受到制约。

具体来看,部分生态功能突出的区段仍集聚了较多高耗水、高排放产业,产业发展与区段功能不协调;具备承接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区段则因产业配套、平台支撑和跨区域协作不足,难以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流域内部既存在产业同构化竞争和重复建设,也存在上下游之间衔接不紧、区段之间协作不足的问题,产业体系能级与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长江、黄河等流域不同区段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层次偏低、重工业化特征较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上中下游之间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分工合作网络;即便经济空间分布已呈现一定梯度,这种梯度差异也未能充分转化为清晰稳定的产业分工关系(杨丹等,2020;高煜等,2020)。

产业布局与承载能力错位,源于承载能力评价、主体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优化衔接不足。部分流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边界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准入和退出的明确约束,区段功能差异也未充分落实到产业链分工和生产力布局之中。同时,流域内部重大生产力布局统筹、产业链组织和跨区域要素配置能力仍然不足,比较优势难以持续转化为上下游产业协作和区段联动关系。

(三)上游保护与下游受益尚未形成稳定的利益调节机制

永定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表明,健全价值核算、经营转化和利益分配机制,有助于把生态保护责任转化为可持续的区域协同收益(李忠等,2025)。然而,七大流域上下游地区保护投入、发展约束和生态受益有待形成稳定的利益调节机制。上游地区承担水源涵养、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等任务,需要限制部分开发活动并持续投入治理成本;中下游地区则通过水质改善、水量保障和生态环境改善获得收益,但相应的成本共担和责任分担机制仍不健全。保护投入与收益获得在空间上存在错位,既不利于激发上游地区持续保护的积极性,也影响流域协同治理的稳定性。

当前,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充分化解这一矛盾。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资金来源和补偿方式仍

有待完善,部分补偿实践的长效机制仍有待健全。横向生态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衔接不够紧密,生态贡献核算、责任分担和收益补偿之间尚未建立清晰关系。新安江、汀江—韩江、九龙江等流域虽已开展生态补偿探索,但相关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仍然有限。

(四)流域整体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偏离

流域发展要求不同区段在资源利用、产业布局、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形成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但现实中这一要求尚未在各地区充分落实。涉水治理、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产业发展和交通建设等事项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策目标、规制标准和实施节奏之间仍存在分割,跨部门、跨区域统筹不足。同时,地方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税源培育等现实压力下,对本地发展与流域整体发展的统筹协调不够充分,容易出现产业布局趋同、低标准竞争和决策短期化等现象。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流域层面的总体目标在进入地方规划和政策执行后,常被分解为行政区内部任务,统一要求难以及时转化为协同行动,区域联动效应也受到削弱。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协同发展,需处理好流域边界与行政区边界、开发与保护等关系(刘世庆等,2018)。

政策取向分化的深层原因在于流域治理要求与行政区治理方式之间协调不足。政策制定、项目管理、财政约束和绩效评价仍主要依托行政边界和部门职责展开,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容易围绕各自目标分头推进,流域整体目标难以转化为持续一致的政策合力。政策取向分化实质上反映了局部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张力,也制约了流域经济模式对区域联动发展的支撑作用。

(五)流域整体治理尚未形成闭环

流域总体规划在专项政策、跨区域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中的细化落实不足,会影响规划目标落实、政策工具配套和实施责任分工,进而削弱区域联动推进效果。现阶段,部分流域总体规划在专项政策、实施标准和项目清单中的细化落实尚不充分;部分专项政策虽已出台,但与资金配置、项目管理、责任分工和平台支撑之间配套不足,跨区域重点任务的协同推进仍需加强。

部分流域监测评估更多关注单项任务完成情况,对流域治理效能、区段协同效果和长期治理成效缺乏持续跟踪评价;评估结果在后续政策优化、项目调整和资源配置中的运用也不够充分。流域经济系统具有开放性和跨行政区特征,其治理效能取决于规划、政策、实施和评估反馈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衔接。因而,规划引导、政策落实、跨区域实施和评估反馈之间仍存在断点,影响流域治理闭环运行,从而制约了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成效。

五、以拓展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实践进阶

拓展流域经济模式进而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应围绕资源承载边界、流域空间结构、要素跨区流动、跨行政区制度协同以及治理闭环构建等方面,将流域整体性转化为发展边界、功能分工、市场联通和协同治理的模式,形成与流域整体性相适应的实践进阶。

(一)以资源承载边界为前提,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

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以资源环境承载边界为基本前提,将其作为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空间管控的重要依据。流域经济不同于一般区域经济,水资源、水环境和生态承载力构成开发利用必须遵循的发展边界。应在流域尺度上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逐步降低产业发展对于水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依赖,并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转化为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空间管控标准。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和黄河流域“四水四定”要求表明,应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落实到流域开发、产业准入和项目布局全过程。

将水资源承载力作为产业布局和项目准入的重要依据。对于资源环境约束较强的区段,应控制高耗水、高排放和高环境负荷项目布局,推动存量产业节水改造、清洁生产和集约利用;对于仍具备承载潜力但生态约束较强的区域,应通过节水提效、污染减排和空间优化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对新增资源投入的依赖。同时,结合流域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推动流域产业链错位发展、有

机衔接,引导不同区段围绕优势环节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承担水源涵养、生态屏障和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段,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农业、生态旅游和康养服务等领域培育增长点;资源条件较好、工业基础较强的区段,应通过绿色技术改造、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和产业链延伸,降低单位产值的水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

(二)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底图,优化流域空间结构和整体布局

以流域经济模式更好发挥区域联动作用,需将流域内部既有的空间联系进一步转化为分工明确、协同有序的功能联系。应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依据,统筹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适宜性和区段功能定位,依托流域主轴和城市节点,推动流域内部由分散开发走向整体布局,由局部联系走向系统协同。

以干流和主要支流为依托,优化“点—轴—面”空间结构。以中心城市和区域性节点城市为主要节点,形成层级清晰、联系紧密的节点体系;以流域主轴及沿线综合通道为支撑,增强不同区段之间的空间联系;统筹开发区、园区等产业承载空间布局,推动不同区段形成分工清晰、功能互补的流域空间结构。

流域空间结构优化还要体现区段差异。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生态功能突出、开发约束较强的区段,应突出生态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功能;对于具备资源转化和制造基础的区段,应提高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水平;对于区位条件较好、城镇和产业基础较强的区段,应增强综合服务和区域带动能力。

(三)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促进互联互通与要素畅通流动

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在于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能够跨区域顺畅流动,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依托沿流通道和既有经济联系,加强市场规则衔接和基础设施联通,提升流域要素配置与市场整合能力。需将市场联通、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统筹起来,以更高水平的流域市场一体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着力推动流域内部市场规则和制度衔接,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标准规则、检验检测、监管执法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提高一致性,降低企业跨区域布

局和经营的制度性成本,促进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完善与流域经济模式相适配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结合流域沿线区位条件与发展需求,优化水运、陆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网络,统筹布局信息通信系统、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畅通跨区域、跨流域通道,增强流域内部市场整合能力。在此基础上,围绕重点产业链和关键环节深化上下游协作,加快跨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促进不同区段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分工协作优势。

(四)以制度协同为抓手,强化规则衔接和利益协调

流域整体性要转化为稳定的区域联动关系,需要把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基础设施联通等跨区域公共事务纳入统一协调框架,统筹不同区段之间的目标关系、责任关系和利益关系。拓展流域经济模式,应在流域总体目标引领下,推进政策协调、规则衔接、生态补偿和利益调节,明确保护责任、治理成本和发展收益的分担关系,增强流域联动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健全流域尺度的政策协调和行动协同机制。以流域总体目标为统领,围绕生态保护、水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联通等重点领域,建立跨行政区常态化协商机制和联合行动机制,将流域总体目标落实到地方规划、专项政策、重大项目和年度任务之中,促进流域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相协调。把理顺行政区边界和流域边界关系作为完善流域治理的重要内容。

完善横向生态补偿和利益协调机制。健全流域内部横向生态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保护修复流域生态环境的地区获得合理补偿,破坏流域生态环境的主体承担相应责任。重视上游地区、资源输出地区的发展利益诉求,引导下游地区、资源输入地区对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供给承担相应补偿责任,推动上游保护责任与下游受益关系制度化,并在流域尺度上统筹保护责任、补偿标准、收益共享和成本共担。

推进规则衔接和标准协调。围绕规划要求、环境标准、产业准入、项目审批和监管执法等方面,加强跨区域规则衔接和标准协调,减少制度摩擦,降低合作成本。通过健全收益共享、成本共担和责任分担机制,统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增强流域内

部利益联结和协同发展基础。

(五)贯通规划、政策与评估,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

以流域总体规划为统领,推动规划要求、政策落实、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相衔接,健全流域治理长效机制。流域总体规划应明确生态安全格局、开发强度边界、水资源利用上限、功能定位分工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并落实到地方规划、专项政策和项目安排之中。推动流域重大任务由分头推进转向协同推进,对跨区域重点任务,应在流域尺度上明确责任分工、实施顺序和资金安排,推动各地区围绕流域总体目标共同落实。

同时,强化流域尺度的动态监测评估。围绕水资源利用效率、水环境质量、生态保护成效、空间布局优化和区域联动效果等指标,开展覆盖相关区段的监测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用于后续政策调整、资金安排和项目优化。通过规划统领、政策落实、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相衔接,推动流域治理由分散推进转向闭环运行。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资源约束、空间组织、要素配置与制度协同四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对以流域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联动发展的理论逻辑、主要现实约束与实践进路进行了系统分析。资源环境承载边界通过限定开发强度和功能边界,构成区域联动的前置条件;节点城市、通道体系和区段分异共同塑造区域联动的空间格局;市场一体化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要素流动,提升区域联动发展效率;跨区域规则衔接与利益协调构成区域联动发展的制度保障。然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产业布局与承载能力错位、生态补偿制度不健全、政策取向分化以及规划—政策—实施—评估衔接不畅,反映出流域整体性尚未充分转化为有效的开发约束、空间组织、市场联通和协同治理安排。相应地,应从资源承载边界管控、主体功能区划引导、统一大市场建设、跨行政区制度协同和闭环治理完善等方面发力,夯实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条件与治理支撑。

围绕流域经济模式的研究仍有深化空间。不同类型流域在资源禀赋、空间结构、产业基础和治理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区域联动的形成条件、

治理重点和推进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提出的理论逻辑框架仍需结合不同流域实践加以检验;不同类型流域比较、流域联动效应量化识别,以及相关制度工具实施效果跟踪评估,有待后续研究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 [1] 宋建军.我国七大流域经济、人口发展比较及展望[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3,36(6):14-20.
- [2] 陈才,刘曙光.区域地理学方法论建设初探[J].地理研究,1999(1):2-7.
- [3] 宋敏,蔡婧瑜,任保平.新时代中国流域经济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展望[J].中国软科学,2023(3):96-107.
- [4] 张思平.流域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 [5] 刘世庆,巨栋.困境与破局:我国流域经济与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4):66-73.
- [6] 易森,赵磊,刘晗.新发展理念视角下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分工—发展”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研究,2025(7):5-15.
- [7]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5.
- [8] 吴传清,叶云岭.破解“化工围江”难题的“湖北样本”和“江苏样本”[J].西部论坛,2020,30(6):71-83.
- [9] 孔丹丹,刘峥.科技创新、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基于淮河流域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37(19):133-137.
- [10] 史利江,刘敏,李艳萍,等.汾河流域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J].地理研究,2020,39(10):2361-2378.
- [11] Chen Z, Kahn M E, Liu Y, 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wate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88: 468-485.
- [12] 赵敏,夏同水,马宗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31(9):2096-2107.
- [13] 孙久文,崔雅琪,张皓.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空格局与机制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7):1673-1690.
- [14] 任保平,李培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J].人民黄河,2023,45(9):4-11.
- [15] 姚石,刘盼,位贺杰.粮食安全视域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机制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8):10-20.
- [16] 张改清,刘铄.黄河流域农业现代化水平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解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3,44(4):624-634.
- [17] 曾浩,余瑞祥,左桢菲,等.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5,35(5):25-31.
- [18] 冯兴华,钟业喜,陈琳,等.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6):18-25.
- [19] 张予川,戴承,张金鑫.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基于微笑曲线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7,31(6):24-29.
- [20] 王林梅,邓玲.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J].经济问题,2015(5):39-43.
- [21] 张跃,刘莉.绿色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地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J].世界地理研究,2021,30(5):991-1004.
- [22] 田野,陈洁,董莹,等.长江经济带主导产业的类型与格局演化:以省级以上开发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12):100-108.
- [23] 王良虎,王钊.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20(5):99-106.
- [24] 彭继增,邓梨红,曾荣平.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1):129-133+141.
- [25] 胡森林,曾刚,滕堂伟,等.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J].地理研究,2020,39(3):611-626.
- [26] 贾若祥,张燕,王继源,等.促进我国流域经济绿色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9(4):48-52+59.
- [27] 易森,张宁,赵磊.“四水四定”视域下中国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探析[J].经济纵横,2024(1):110-118.
- [28] 邓创,曹子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及其转化机制研究[J].统计研究,2023,40(4):34-45.
- [29] 张虹鸥,王洋,叶玉瑶,等.粤港澳区域联动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与重点议题[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12):1587-1596.
- [30] 陈耀.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若干思考[J].企业经济,2018,37(2):11-19+2.
- [31] 毛熙彦,栾心晨,蒋一菲.长江经济带产业跨区域关联路径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21(5):27-35.
- [32] 郝宪印,钱进.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实现路径研究[J].理论学刊,2024(2):112-120.
- [33] 叶振宇.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成效与难题应对[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7):30-38.
- [34] 刘曙光,许玉洁,王嘉奕.江河流域经济系统开放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国际经典案例及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启示[J].资源科学,2020,42(3):433-445.
- [35] 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2002(1):1-6.

[36]韩增林,刘伟,王利.“点—轴系统”理论在中小尺度区域交通经济带规划中的应用:以大连旅顺北路产业规划为例[J].经济地理,2005(5):662-666+676.

[37]覃成林.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与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38]生延超,李金婧,徐珊,等.市场一体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资源科学,2024,46(3):462-474.

[39]李忠,刘峥延,金田林.健全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基于永定河流域的实践探索[J].宏观经济管理,2025(10):44-50.

[40]杨丹,常歌,赵建吉.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难题与推进路径[J].中州学刊,2020(7):28-33.

[41]高煜,许钊.超越流域经济:黄河流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与路径[J].经济问题,2020(10):1-9+52.

Promoting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Li Pengfei Ye Yunling

Abstract: As a composite spatial unit with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 river basin serv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aints, spatial organization,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jointly constitu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promotes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aints delimit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functional boundaries; spatial organization shapes the “node–corridor” spatial configuration; factor allocation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ross–regional resource and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strengthens cross–regional rule alignment and interest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the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still faces sever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basin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capacity boundaries, the underdeveloped industrial division system guided by basin functional gradients, the absence of a stable interest adjustment mechanism between upstream protection and downstream benefits, the deviation between basin–wide overall objectiv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objectives, and the lack of closed–loop basin–wide governance. Accordingly, policy efforts should take resource carrying–capacity boundaries as the premise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us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ing as the spatial basis for optimizing basin spatial structure and overall layout;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connectivity and facilitating factor flows; use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to strengthen rule alignment and interes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e plann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basin governance.

Key Words: River–Basin Economic Model;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Spatial Organization; Factor Allocatio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经济理论】

虚拟邻近：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重塑的新机制*

孙祥栋 李欣凝 石鸿旭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基于地理邻近假设的区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经济活动空间组织跨越地理边界发生变革重塑的新现象。注意力配置视角下的“虚拟邻近”概念可有效揭示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实现注意力跨地域配置,进而催生虚拟集聚并形成新型空间关系的内在机制。虚拟邻近通过改变要素流动成本、重构集聚经济实现形式,驱动城市体系由等级制向扁平化功能网络演进,形成区域极化与扩散的新平衡机制,并为中小城市远程承接知识型服务、实现功能跃升以及城乡融合发展开辟新路径。虚拟邻近这一理论概念拓展了邻近性理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边界,为优化区域空间规划提供了学理支撑。

关键词:虚拟邻近;区域空间组织;注意力配置;技术赋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15-11 **收稿日期:**2026-04-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虚拟集聚视角下我国劳动力空间配置优化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25CJY119)。

作者简介:孙祥栋,男,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 100029)。

李欣凝,女,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北京 100029)。

石鸿旭,男,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通信作者(北京 100029)。

一、引言

数字技术正嵌入区域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重构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逻辑。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更重构了要素流动的时空格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央强调“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要求区域发展模式与本地条件动态适配。这迫切要求我们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的变革规律。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跨地域协作,知识工作

者借助远程办公工具参与全球分工,消费者与生产者通过网络高频互动——这些现象被概括为“虚拟集聚”(王如玉等,2018)。虚拟集聚突破了传统地理集聚对物理空间的依赖,使经济活动能够在网络空间形成新的集聚形态,并显著影响实体空间的产业布局与城市发展格局(孙祥栋等,2024)。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虚拟集聚对企业行为、产业链重构及产业集群转型的影响方面(陈小勇,2017;白新华等,2023),较少从区域空间组织层面系统讨论数字技术如何改变城市体系、区域联系及城乡关系。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空间组织变迁的宏观理论解释仍显不足。数字经济催生了跨越地理边界的空间组织新现象,而区域经济学传统理论多基于地理邻近

假设,难以有效解释城市网络扁平化、区域协同数字化等新趋势,急需一个整合虚拟维度的理论框架。

围绕上述研究不足,本文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虚拟邻近的概念内涵与理论边界是什么,其与虚拟集聚、地理邻近等既有概念如何区分与衔接;第二,虚拟邻近通过何种微观机制影响经济主体的互动与协作;第三,虚拟邻近如何在城市体系、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三个层面重塑区域空间组织。在理论层面,本文在邻近性理论框架基础上,引入注意力配置视角,提出“虚拟邻近”理论概念,并构建“技术赋能—注意力配置—空间重塑”的分析框架,尝试从微观机制出发解释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的重构过程。在实践层面,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结构调整提供了分析视角,也为区域空间规划与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理论溯源与文献综述

为分析数字经济条件下区域空间组织重塑机制,有必要立足经典区域经济理论,结合相关前沿研究开展系统梳理。本部分首先回顾区域空间结构、集聚扩散与城镇化三大核心理论,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其次综述邻近性理论的演进、数字技术驱动下的虚拟集聚现象以及数字技术对区域空间组织影响的既有研究;最后进行文献评述,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明确本文的研究定位与理论拓展方向。

(一)核心理论梳理

经典区域空间理论为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组织提供了坚实的逻辑起点,但其分析范式均隐含着地理邻近性这一共同前提。中心地理论(Christaller, 1933; Lösch, 1954)揭示了城市等级体系的构建逻辑:城市作为中心地,其规模、功能层级与服务范围严格遵循地理距离衰减规律,形成由大到小、层层嵌套的等级体系,经济互动的效率直接受制于物理空间的可达性。核心—边缘理论(Friedmann, 1966)及其后续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化(Krugman, 1991)进一步阐释了区域极化与扩散的地理机制:核心区凭借信息优势与要素集聚强化自身地位,边缘区则面临资源外流,这种“中心—外

围”格局的形成与维持根植于地理空间中的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与累积循环因果关系(藤田昌久等, 2005)。集聚经济理论(Marshall, 1890)更是直接将地理邻近视为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与中间投入品共享的物理基础,认为空间集聚产生的外部规模经济高度依赖于经济主体在物理空间上的接近(Malmberg & Maskell, 2002)。

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些理论的解释力正在遭遇结构性挑战。近年来,集聚经济理论在数字时代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相关研究持续验证了传统集聚外部性的地理衰减特征,发现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等核心外部性的空间影响范围极为有限,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Rosenthal & Strange, 2020; Moretti, 2021);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虚拟集聚对集聚经济实现形式的影响,指出线上集聚在集聚机制与集聚效应方面与传统地理集聚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谭洪波等, 2022; 田霖等, 2021),且数字经济正在显著重塑企业集聚的空间格局(邢丁等, 2024),大数据要素集聚亦在重构生产率区域差距的形成机制(张国胜等, 2024)。更具突破性的是,远程工作的大规模普及使劳动力市场共享与知识溢出开始跨越地理边界复现:相关研究发现,企业借助远程办公模式能够突破地理约束获取全球化高素质劳动力,实现劳动力池效应的跨地域配置(Emanuel & Harrington, 2024),而城市中心人口向郊区迁移的现象则表明,物理空间集中已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唯一组织逻辑(Ramani et al., 2024)。此外,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融合趋势日益显现,二者通过知识流动形成互动耦合,共同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李爱国等, 2024; 郭将等, 2024),数字产业的双重集聚形态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空间力量(赵放等, 2025)。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产业组织或企业层面,且聚焦于特定要素的集聚测度,尚未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高度系统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当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与中间投入品共享能够在虚拟空间中跨地域复现时(刘烨等, 2023),集聚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地理邻近是外部性必要前提”这一基本假设是否仍然成立? 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直接回应,也未能将虚拟集聚上升为解释城市体系、区域联系与城乡关系演化的宏观理论变量。

城市网络理论虽然关注到“流空间”的重要性

(Camagni & Capello, 2004),但其对城市间信息、资本、人才流动的分析仍基于物理网络基础设施,未能充分解释数字平台中介下虚拟集聚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区域空间组织的系统性重塑。当前研究已观察到城市网络扁平化、虚拟产业集群跨区协作、远程工作重塑城镇体系等新现象(孙祥栋等,2024;陈小勇,2017;Florida, 2019),但经典理论难以回答:在物理距离约束弱化的条件下,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逻辑遵循何种新的邻近性格局?要素流动与集聚经济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哪些根本性转变?因此,有必要在这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虚拟邻近”这一新概念,对其进行拓展和重构,以更好地解释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的新现象与新规律。

(二)文献综述

1.从地理邻近到多维邻近

经典区域空间理论长期以地理邻近作为解释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核心范式,产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等外部规模经济,高度依赖于经济主体在物理空间上的接近(Marshall, 1890; Malmberg & Maskell, 2002)。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地理邻近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过度的地理邻近可能导致技术锁定,而认知邻近、组织邻近与社会邻近等多维邻近性通过降低沟通成本、建立信任关系同样能够促进知识交流与创新合作(Boschma, 2005)。地理邻近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而认知邻近则通过促进知识溢出与创新协同发挥作用,二者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差异化的传导机制(李琳等,2016)。这些理论进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地理邻近并非不可替代,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其他机制建立有效的互动与协作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传统基于地理邻近假设的区域经济学亟待理论重构,需要探索数字技术如何重塑空间组织的基本逻辑(董雪兵等,202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中介下形成的高频互动关系加以概念化,从而提出“虚拟邻近”这一扩展性概念。

2.数字技术驱动的虚拟集聚与注意力配置理论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超越地理空间的新型组织形式。“虚拟集聚”这一概念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使得生产要素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进行集聚,形成不同于传统地理集聚的新形态(王如玉等,

2018)。这种集聚以数据为关键要素,通过网络平台连接分布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企业、个人和机构,实现资源共享、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从产业集群的虚拟转型角度来看,虚拟产业集群通过缩短分工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来降低协作成本,推动分工深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可通过促进虚拟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陈小勇,2017;赵超等,2025)。同时,虚拟集聚能够打破地理限制,优化城市产业分工,更新城镇规模分布模式,对中国城镇发展格局起到了重塑作用(孙祥栋等,2024)。

然而,虚拟集聚的形成机理不能仅停留在技术描述层面,其本质在于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在数字空间中的跨地域集中与配置。互联网搜索作为注意力配置的技术载体,能够显著降低贸易信息成本并促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重塑国际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施炳展等,2019)。在区域发展领域,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配置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乡村振兴的注意力引导能够有效促进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驱动企业参与乡村建设(肖红军等,2025);环保注意力配置通过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决策,进而对其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异质性影响(胡浩然等,2023);政府环境注意力则通过财政支出结构和环境规制双重路径影响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张慧智等,2023)。这些研究共同表明,在信息过载的数字经济时代,注意力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其配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与组织形式。

注意力配置理论并非对集聚经济理论的简单替代,而是对其在数字时代解释盲区的补充与拓展。集聚经济理论以地理邻近为外部性前提,解释的是物理空间集中带来的效率,其核心逻辑在于经济主体通过空间接近降低交易成本、获取知识溢出(Marshall, 1890; Malmberg & Maskell, 2002; Krugman, 1991);注意力配置理论则以注意力获取为稀缺性前提,解释的是信息过载条件下跨地域选择性连接的效率,其核心逻辑在于经济主体通过数字平台突破地理约束、实现高频互动(施炳展等,2019)。当虚拟集聚使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与协同创新能够在数字空间中跨地域复现时,集聚经济理论所依赖的“地理邻近是外部性必要前提”假设已部分失效,而注意力配置理论恰好为解释这种非地理邻近的

外部性提供了微观行为基础。因此,引入注意力配置理论解释虚拟邻近,不是对集聚经济理论的否定,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其空间逻辑的拓展与重构。

3. 数字技术对区域空间组织的重塑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构区域空间组织的基本形态,这种重塑效应体现在城市体系、区域协调与城乡关系等多个维度。在城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重塑企业地理格局、激发创业活跃度显著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发展,且这种效应在中小城市表现得更为显著,这表明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的演化逻辑(于斌斌等,2026;赵涛等,2020)。虚拟集聚打破了地理限制,优化了城市产业分工,促使城镇发展格局从单中心等级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孙祥栋等,2024)。在区域协调层面,数字技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智能决策支持和跨区域协同治理,显著提升了城市群的经济、生态、工程和治理韧性(孙祥栋等,2025),并通过数实融合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白新华等,2023)。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的构想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时代多个增长极与空间经济网络的共生关系,其中虚拟维度与实体网络的交互成为区域组织的新特征(覃成林,2025)。在城乡关系层面,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创业活动,显示出数字技术推动包容性增长和城乡融合的潜力(张勋等,2019)。然而,地理距离的约束并未完全消解,知识溢出仍然存在显著的地理边界效应,地理邻近性依然是制约知识跨地域扩散的重要因素(刘修岩等,2022)。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对区域空间组织的重塑并非对地理邻近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构建虚拟邻近关系,形成与地理邻近互补共生的新型空间组织逻辑。

4. 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与不足。一是微观应用多,宏观理论少:现有研究大量集中于数字技术对企业运营、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等微观层面的影响,如虚拟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相比之下,将数字技术作为重塑区域空间组织的宏观变量,从城市体系、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等宏观尺度进行系统性理论构建的研究仍显不足。特别是现有注意力配置研究多聚焦于特定领域的微观效应,尚

未将其作为连接数字技术与区域空间组织的理论桥梁,从宏观层面系统阐释注意力去地理化配置如何重塑城市体系与区域联系。二是现象描述多,机制剖析少:许多研究已经观察到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出现的新现象,如城市网络扁平化、区域协同数字化等。然而,多数研究停留于现象描述,未能深入揭示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和作用逻辑。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些变化?其微观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学理阐释。三是邻近性框架亟待拓展,虚拟维度缺失:尽管邻近性理论已从单一的地理维度扩展到多维邻近,但对数字时代出现的“虚拟”维度关注仍然不足。“虚拟邻近”这一概念目前多局限于产业层面的虚拟集聚分析,现有研究尚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且与地理邻近并行的新型空间关系,纳入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体系中进行系统阐释。如何定义虚拟邻近?其特征是什么?它如何通过改变要素流动成本与集聚经济的实现形式,进而重塑区域空间组织?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以上三点由表及里,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理论缺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区域空间组织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既有研究尚未构建一个贯通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整合虚拟维度与地理维度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虚拟集聚由产业层面的组织现象上升为区域空间关系范畴,提出“虚拟邻近”概念,并引入注意力配置视角,构建“技术赋能—注意力配置—空间重塑”的分析框架,以系统解释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空间组织的重构机制。

三、虚拟邻近的概念界定、特征与理论分析框架

(一) 虚拟邻近的概念界定与核心特征

本文将虚拟邻近(Virtual Proximity)界定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借助信息通信技术与平台规则,在跨越物理距离的情况下形成的、能够持续降低互动成本并支持高频协作的非地理性空间关系。与一般性的网络连接或短期线上互动不同,虚拟邻近强调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其在信息交换、知识溢出与资源协同等方面能够产生类似于地理邻近的作用效果。虚拟邻近并非对地理邻近

的简单替代,而是在数字空间中对其功能的补充与重构。

虚拟邻近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超越地理约束,物理距离不再是信息流动的主要障碍,偏远地区亦可接入全球数字网络;二是网络关联强化,主体间的联系由线性的地理邻近转向复杂的、多节点的数字网络,互动密度与强度取决于数字平台的连接能力;三是时空节奏重塑,经济活动的时间同步性要求降低,异步协作成为可能,空间对时间的支配力被削弱。

(二)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

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注意力成为经济决策的核心约束。赫伯特·西蒙(1971)曾指出“信息消耗的是接收者的注意力”。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呈指数级增长,而个体的注意力总量有限,因此注意力的获取与分配成为决定信息传播、知识创造与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

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注意力的配置方式。传统上,注意力的流动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即人们更容易注意到身边的事物,信息传播随距离衰减。而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对信息流进行筛选与推送,使注意力能够跨越地理边界,实时聚焦于特定内容、主体或事件。这种注意力的去地理化配置为虚拟邻近提供了微观基础:当两个主体能够频繁地进入彼此的注意力视野,并在数字空间中进行实时或异步互动时,即便相距遥远,也能够形成具有稳定性的注意力联结。因此,虚拟邻近本质上体现为数字

空间中基于高频互动形成的协同关系,是数字经济时代空间关系重构的重要微观基础。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注意力配置与虚拟邻近之间并非简单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对象关系,而是从微观机制到宏观结果的转化关系。注意力配置理论揭示的是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在信息过载环境中,主体通过数字平台筛选信息、聚焦特定内容与对象,形成跨地域的注意力联结。当这种注意力联结达到足够频率与深度,并持续沉淀为相对稳定的互动模式时,便转化为虚拟邻近这一空间关系。换言之,虚拟邻近本质上是由注意力跨地域持续配置所凝结出的新型空间关系,是注意力配置在区域空间组织层面的理论投射。由此,虚拟邻近之“新”,不在于数字技术本身,而在于注意力这一稀缺资源在数字空间中的跨地域配置方式发生了质变,从而重构了空间关系的形成逻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引入注意力配置理论,构建了一个“技术赋能—注意力配置—空间重塑”的三阶段整合框架,用以阐释虚拟邻近如何系统性重塑区域空间组织(见图1)。技术赋能构成虚拟邻近得以形成的条件层,注意力配置构成虚拟邻近生成的核心机制层,空间重塑则是虚拟邻近作用于区域组织的结果呈现层。该框架的核心逻辑是:数字技术改变了注意力的配置机制,注意力在数字空间中的跨地域集中与交互催生了虚拟集聚,虚拟集聚的持续互动最终沉淀为虚拟邻近并驱动区域空间组织发生结构性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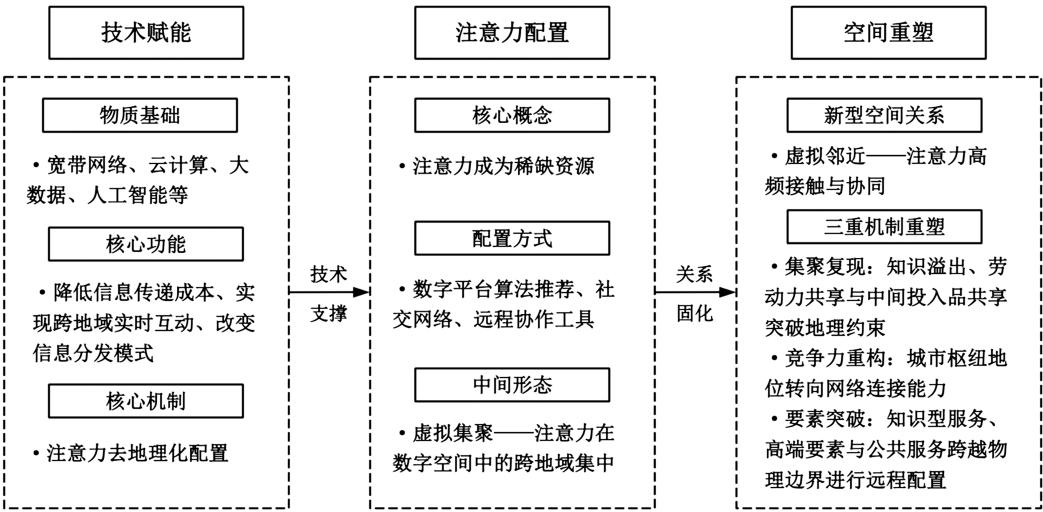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技术赋能层:数字经济重构注意力流动的基础设施

宽带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成了注意力流动的技术基础。一方面,高速通信网络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与时延,使跨地域实时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算法推荐系统、社交媒体平台与远程协作工具重塑了信息分发与接收方式,使注意力不再主要受限于地理范围,而是能够在数字平台的组织下跨地域流动并聚焦于特定主体、内容和事件。这一层回答了“虚拟邻近何以可能”的技术前提。

2.注意力配置层:虚拟集聚的形成机制

在技术赋能的基础上,经济主体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新的特征:注意力的集中不再依赖地理空间,而是在数字平台上实现跨地域的虚拟集聚。企业通过在线营销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知识工作者通过远程办公平台汇聚于虚拟项目组,创新主体通过开源社区实现跨区域协作。这种虚拟集聚的本质,是注意力在数字空间中的集中与交互,因此使得原本分散于不同地理空间的主体能够在同一注意力场中持续接触,并逐步形成高频互动与协作关系。虚拟集聚的程度取决于平台对注意力的吸引能力、算法的匹配效率以及主体间协作的深度。

3.空间重塑层:虚拟邻近驱动区域组织变革

虚拟集聚的持续互动,会逐步沉淀出主体间较为稳定的联系,即虚拟邻近。这种新型邻近关系深刻改变了要素流动成本与集聚经济的实现形式,并进一步作用于区域空间组织的演化。具体而言,虚拟邻近首先改变了传统集聚经济的空间逻辑:地理邻近带来的知识溢出、劳动力共享与中间投入品共享(Marshall, 1890),在虚拟空间中可通过远程协作平台、工业互联网与在线知识社区实现跨地域复现;其次,虚拟邻近重构了城市竞争力的来源,城市的枢纽地位不再单纯取决于综合规模与物理区位,而更多体现为在数据中心、创新网络与功能节点中的连接能力;最后,虚拟邻近打破了要素流动的单向地理梯度,使知识型服务、高端要素与公共服务能够跨越物理边界进行远程配置。

四、虚拟邻近对区域空间组织的重塑机制

基于上文构建的“技术赋能—注意力配置—空

间重塑”理论框架,本部分进一步分析虚拟邻近如何通过改变要素流动成本与集聚经济的实现形式,系统性重塑区域空间组织。具体而言,将从城市空间形态、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并结合中国实践案例进行理论分析。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城市体系、区域联系与城乡关系,能够从不同尺度呈现虚拟邻近对区域空间组织的影响。

(一)优化城市空间形态:驱动城市体系网络化演进

在传统地理邻近主导的空间组织逻辑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高度依赖于交通区位条件,港口、铁路枢纽、高速公路节点等决定了城市的区位优势和等级地位。企业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和获取集聚经济,倾向于向这些枢纽集聚,形成等级分明的城市体系。中心地理论深刻揭示了这一逻辑:城市规模与其服务范围和功能层级正相关,小城市服务于本地市场,大城市则作为更高层级的中心地,辐射更广阔的区域(Christaller, 1933)。

虚拟邻近的出现正在打破这一传统逻辑。注意力配置理论揭示:在数字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其配置方式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社交网络和远程协作工具,实现了注意力的跨地域配置,中小城市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以极低的成本进入全国乃至全球的注意力网络,获得原本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的市场曝光和协作机会。这意味着,对物理枢纽的依赖被对数字平台的接入能力所替代,中小城市因此获得了参与更大范围功能网络并实现功能跃升的新机会。

从集聚与扩散理论视角看,虚拟邻近改变了集聚经济的实现形式。传统集聚经济依赖于地理邻近带来的劳动力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Marshall, 1890)。虚拟邻近则使这些效应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实现:通过远程协作平台,企业可以共享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专业人才;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下游企业可以实现生产协同;通过在线社区和知识平台,知识溢出可以跨越地理边界实时发生。虚拟邻近正在部分替代地理邻近的功能。

由此可以推断,虚拟邻近将促使城市体系由严格的等级体系向扁平化、多中心的“功能网络”演进。在这一新型城市网络中,城市的竞争力不再主

要取决于其综合规模,而更多体现为在特定功能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中国城市的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趋势。以贵阳为例,这座地处西南地区的内陆城市,依托气候凉爽、电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大力发展数据中心产业,吸引了苹果、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设立大数据中心。截至2025年,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在贵安新区已建成投用,机架规模达1.4万架,服务器数量达12万台,出省带宽扩容至18T^①。贵阳并未依赖传统的地理区位优势,而是通过成为全国数据网络的重要节点,实现了城市功能的跃升。深圳的实践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趋势:据《人民日报》报道,深圳建设了覆盖全市的数字孪生城市平台,通过对物理城市进行数字映射和模拟,为城市管理、能源调度、交通治理等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这座虚拟城市已有超过4000项数据服务,涵盖城市管理、能源电力、民生服务等领域,服务近8亿次数据需求^②。深圳的经验表明,城市竞争力正在从物理空间的规模优势,转向虚拟空间的数据枢纽能力。

进一步分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也可能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由于生产办公功能选址更趋灵活,而消费与社交功能仍趋向于实体中心,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可能是功能分散化与生活集中化并存。研究发现,使用线上购物类虚拟设施强度越高的居民,越倾向于迁往城市外围区域;而使用生活服务类和公共服务类虚拟设施的居民,则仍倾向于居住在中心城区(Wu et al., 2024)。这一发现揭示:虚拟邻近对城市内部空间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能够被虚拟替代的功能促进了空间分散,而仍需实体交互的功能则维持着空间集聚。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也体现了这一趋势。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载体,北京城市副中心吸引了大量市级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入驻,同时通过完善的轨道交通与中心城区保持便捷联系,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远程办公技术与中心城区的合作伙伴保持高效沟通,展现了功能疏解与虚拟协同的结合。副中心配套建设的商业综合体、文化设施、公园绿地等,则为居民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体现了生活集中化的设计理念。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极化与扩散的平衡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空间经济学的核心议

题。增长极理论指出,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极上,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Perroux, 1950)。核心—边缘模型则揭示: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累积循环因果机制,核心区往往持续强化自身优势,而边缘区则面临要素流失的困境。传统上,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平衡,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政策干预等多种因素。

虚拟邻近的介入,使这一平衡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注意力配置视角看,虚拟邻近同时降低了两种成本:一是信息扩散成本,即信息从中心向边缘传递的成本;二是高端要素远程控制成本,即中心对边缘的生产、运营进行远程管理和协调的成本。前者有利于扩散效应,边缘地区可以更低成本获取来自中心的知识、技术、市场信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后者则可能强化极化效应,中心地区可以利用远程控制技术,将生产环节布局在成本更低的边缘地区,而将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保留在中心地区,由此形成高端功能集中于中心、生产执行环节布局于边缘的空间分工格局。

这种双重效应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区域制度协同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看,虚拟邻近降低了“冰山成本”中的信息成本部分,但制度成本、信任成本等仍然存在。如果区域间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协同机制,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了普惠化覆盖,那么虚拟邻近更可能促进扩散效应,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反之,如果制度壁垒高企、数字基础设施不均衡,则可能导致虚拟极化,即中心地区凭借先发优势进一步垄断高端要素,加剧区域不平衡。

因而,虚拟邻近究竟表现为扩散力量还是极化力量,并无单一答案,而是高度取决于区域制度协同程度与数字基础设施普惠水平。京津冀地区正在探索的人才科创虚拟产业园构想,体现了通过制度协同促进虚拟扩散的实践方向。该构想的核心举措包括:建设京津冀科创大数据平台,整合三地产业数据、专利信息、市场需求;推动三地职称互认、社保互通,鼓励“周末工程师”“云端专家”等柔性引才模式;争取跨区域税收优惠、人才绿卡互通等专项政策。这一探索如果落地,将有效降低京津冀三地间的制度壁垒,成为虚拟邻近促进区域协同的实践范例。与之相对,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杭州、深圳等互联网产业发达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数字

人才和资本,而中西部地区则面临人才外流压力。有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强,在高数据资源和高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更为明显(赵超等,2025),印证了数字要素可能加剧区域不平衡的风险。

同时,虚拟邻近还将催生基于产业链数字协作的虚拟产业集群,使跨行政区划的产业协作与创新网络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新形态。西安依托中欧班列构建了虚实协同产业集群。在实体空间层面,西安国际港站占地5600亩,已建成铁路作业线59条,其中18条为国际集装箱作业到发线,设计集装箱年吞吐量540万标箱、运力6600万吨,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在虚拟空间层面,依托“丝路电商”平台、数字通关与班列追踪系统,实现订单、报关、调度、配送全流程在线化,跨境结算平台支持多币种支付与供应链金融服务^③。这种“虚实协同”的产业集群模式,使跨行政区划的产业协作成为可能,不仅扩展了分工的深度与广度,也推动了分工体系向网络化、多样化、高适应性演进。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正在探索的虚拟开发区模式,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拟产业集群。该区于2025年9月启动“湾区智城”平台,将可信算力服务、可信AI智能体服务与可信数据空间融为一体,依托“黄埔1号”智算推理集群一期项目,可支撑大规模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并派发1000万元“算力券”为企业提供平价算力,激活区内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场景价值,形成AI产业发展新模式,使区内企业可以在虚拟空间实现跨行业的数字协作^④。

(三)赋能新型城镇化: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数字路径

传统城镇化路径往往伴随着被动承接产业转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承接大城市转移出的低端制造业,形成“打工经济”的依赖型发展模式。这种路径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产业结构固化、创新能力不足、生态环境压力等问题。

虚拟邻近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了新可能,也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注意力配置视角下,数字平台使知识型服务功能得以跨越空间远程提供,中小城市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远程办公平台,为大城市甚至全球客户提供设计、咨询、编程、内容创作等服务,这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灵活的用工选择,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在非中

心城市生活、工作的可能性(Florida, 2019);在线教育平台使优质教育资源可以触达偏远地区;远程医疗平台使优质医疗服务可以下沉到基层。这意味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必再被动承接产业转移,而可以主动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特色化、专业化经济。

从城乡融合视角看,中国式城乡融合经历了长期的政策演化与理论探索(孙祥栋等,2023),而虚拟邻近正在重塑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格局。传统上,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虚拟邻近通过促进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支持远程灵活就业,为就近城镇化和返乡入乡创业提供了强大支撑。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使农村居民可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公共服务;数字经济的发展,则为返乡人才提供了就地创业、远程就业的机会。

由此可见,虚拟邻近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提供了功能跃升的机会,使其能远程承接知识型服务功能,支持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改变被动承接产业转移的城镇化路径。浙江省德清县的实践是这一趋势的典型范例。德清县地处长三角腹地,依托毗邻杭州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地理信息产业,通过数字孪生、遥感测绘等技术,为城市规划、智慧农业、防灾减灾等领域提供服务。自2010年启动建设地理信息产业园以来,德清地理信息小镇已集聚地理信息相关企业430余家,年营业收入突破300亿元,涵盖北斗时空、测绘遥感、智慧城市、航空航天等领域,形成了从数据采集、处理到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并吸引了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⑤。这条基于数字技术的高端化发展道路,让德清实现了县域经济的功能跃升。

更进一步地,虚拟邻近通过促进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支持远程灵活就业,为就近城镇化和返乡入乡创业提供了强大支撑,成为推动以人为核心、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返乡入乡创业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潮流。以贵州省为例,近年来依托大数据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他们或开办电商企业,将当地农产品销往全国;或承接沿海地区的软件外包业务,在家乡组建团队远程服务;或利用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带动乡村旅游和特色产品销售。这些创业活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虚拟邻近降低了地理距离对市

场接入的约束,使地方主体能够借助数字网络面向更大范围的市场提供产品与服务。

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推动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互联网向农村和边远地区覆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持续推进远程医疗协作网建设,使基层群众可以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这些举措有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基础保障。

综上所述,虚拟邻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空间关系,正在通过改变注意力配置的机制,重塑城市空间形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赋能新型城镇化。其与传统的地理邻近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上述分析揭示了虚拟邻近重塑区域空间组织的内在逻辑:在城市层面推动等级体系向功能网络演进,在区域层面构建极化与扩散的新平衡机制,在城乡层面开辟以人为核心的融合发展新路径。这些发现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空间变革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制定面向数字时代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学理支撑。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框架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和理论深化,这也构成了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理论贡献与讨论

本文以注意力配置理论为核心分析工具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虚拟邻近重塑区域空间组织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虚拟邻近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空间力量,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实现注意力的跨地域配置,催生虚拟集聚并逐步沉淀为虚拟邻近关系,进而驱动区域空间组织发生结构性转变。具体而言:在城市层面,虚拟邻近推动城市体系从等级制向功能网络演进,城市竞争力取决于网络枢纽地位而非综合规模,内部空间呈现功能分散、生活集中格局;在区域层面,虚拟邻近对协调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最终效果取决于制度协同与数字普惠水平,同时催生跨行政区协作的虚拟产业集群;在城乡层面,虚拟邻近使中小城市得以远程承接知识型服务、实现功能跃升,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远程就业为就近城镇化注入新动能。

在理论贡献层面,本文将虚拟集聚这一产业组织层面的现象上升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新变量,构建了“技术赋能—注意力配置—空间重塑”的三阶段分析框架,揭示了虚拟邻近重塑区域空间组织的内在机制。这一工作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空间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透镜。同时需要指出,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有待后续实证研究的检验与修正;对制度、文化等调节因素的分析尚不够深入;对不同类型区域的差异化效应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对中国区域发展的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针对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规划层面,编制数字时代区域空间规划,识别和培育数字网络中的关键功能节点。在虚拟邻近驱动下,城市的竞争力日益取决于其在特定功能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因此,各地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或区域发展规划时,应系统评估本地在数字网络中的位置,明确功能定位,培育特色优势。对于已经形成一定数字节点优势的城市,应进一步强化优势,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功能枢纽;对于尚未形成明显优势的中小城市,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赛道,避免同质化竞争。

第二,在基础设施层面,推进区域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布局与互联互通,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新基建”。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虚拟邻近能否促进扩散效应、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化水平。因此,应加快实施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优化算力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推动算力资源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延伸。同时,推进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城乡覆盖与区域互联,确保所有地区都能平等接入数字网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重与本地产业需求相结合,避免重建设、轻应用的倾向。

第三,在制度创新层面,探索跨行政区的数据治理协同和虚拟产业集群扶持政策,破除虚拟要素流动的行政壁垒。制度协同是虚拟邻近发挥扩散效应的关键条件。当前,跨行政区数据共享难、监管标准不统一、产业政策各自为政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虚拟要素的自由流动。建议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跨区域数据治理协同机制,制定统一的数据采

集、存储、流通、交易标准,探索“一地认证、全国互认”的数据要素市场准入模式。在区域层面,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率先探索数据治理协同试验区,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同时,出台专门政策支持虚拟产业集群发展,对在虚拟空间形成实质性协作的跨区域企业集群给予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创新激励等政策扶持,推动虚拟开发区、人才科创虚拟产业园等新业态规范健康发展。

第四,在城镇化政策层面,实施数字赋能县城建设行动,支持利用虚拟邻近发展远程办公基地、数字微城等新模式。虚拟邻近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提供了功能跃升的机会,也为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建议在县城城镇化建设中,将数字赋能作为重要方向,支持有条件县城建设远程办公基地,吸引大城市人才异地办公、弹性工作;发展数字微城,打造集数字产业、智慧社区、品质生活于一体的新型城镇空间。同时,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让更多人才愿意回乡、留得下来、能够发展。此外,持续推进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优质资源通过互联网向县域和乡村延伸,让城乡居民都能享受数字时代的发展红利。

注释

① 数据来源: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8-28/doc-infnmzxsx8836289.shtml>。② 数据来源: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5/0123/c1004-40407303.html>。③ 数据来源: <http://www.xa.gov.cn/ztzl/ztzl/lwlbzt/tdwmbwtz/1748167491368009730.html>。④ 数据来源: https://www.hp.gov.cn/xwzx/zwyw/content/post_10444863.html。⑤ 数据来源: <http://www.zj.xinhuanet.com/20260523/e17ddafc7c014df89d9992131ffcfcd/c.html>。

参考文献

- [1] 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61-74.
- [2] Camagni R, Capello R. The city network paradigm: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M]//Capello R, Nijkamp P. *Urban Dynamics and Growth: Advances in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2004:135-158.
- [3] Christaller W. *Die zentralen Orte in Süddeutschland* [M]. Jena: Gustav Fischer, 1933.
- [4] Emanuel N, Harrington E. Working remotely? Selection,

- treatment, and the market for remote work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24, 16 (4) : 528-559.
- [5] Friedmann J.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6]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M]. Updated 2019 Paperback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9.
- [7]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483-499.
- [8] Lösch A. *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9] Malmberg A, Maskell P. The elusiv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economie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spatial clustering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3):429-449.
- [10]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London: Macmillan, 1890.
- [11] Moretti E. The effect of high-tech cluster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op invento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1, 111(10):3328-3375.
- [12] Perroux F. *Economic spa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0, 64(1):89-104.
- [13] Ramani A, Alcedo J, Bloom N. How working from home reshapes citie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4, 121(45):e2408930121.
- [14] Rosenthal S S, Strange W C. How close is close? The spatial reach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0, 34(3):27-49.
- [15] Simon H A.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M]//Greenberger M. *Computer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40-41.
- [16] Wu L, Niu Q, Liang X, et al. Impacts of virtual amenities on residential relo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megacity: An empirical study in Wuhan, China [J]. *Applied geography*, 2024, 167:103273.
- [17] 白新华, 李国英. 以数实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现实思考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6):63-68.
- [18] 陈小勇. 产业集群的虚拟转型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12):78-94.
- [19] 董雪兵, 李霁霞, 史晋川.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4(3):29-36.
- [20] 郭将, 张虹萌. 虚拟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虚实融合视角 [J]. *科技管理学报*, 2024, 26(3):74-83.
- [21] 胡浩然, 宋颜群. 环保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J]. *产业经济研究*, 2023(4):114-127.
- [22] 李爱国, 陈银忠, 杨柏. 工业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业虚拟集聚与区域创新 [J]. *科学学研究*, 2024, 42 (7) :

- 1536-1546.
- [23]李琳,曾巍.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对省际边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中三角、长三角省际边界区域的实证[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5):1-8+193.
- [24]刘修岩,王峻.知识溢出的边界效应:来自专利引用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2,57(11):84-101.
- [25]刘烨,王琦,班元浩.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J].财贸经济,2023,44(4):89-105.
- [26]覃成林.区域经济多极网络空间组织:概念、特征及研究价值[J].区域经济评论,2025(4):5-12.
- [27]孙祥栋,罗晟,程立燕.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群韧性提升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5(2):103-112.
- [28]孙祥栋,潘越,李金培.虚拟集聚视角下中国城镇发展格局重塑: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J].区域经济评论,2024(6):139-146.
- [29]孙祥栋,王红雨,刘锐剑.中国式城乡融合政策演化、理论框架及其突破进阶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1):43-53.
- [30]施炳展,金祥义.注意力配置、互联网搜索与国际贸易[J].经济研究,2019,54(11):71-86.
- [31]田霖,韩岩博.虚拟集聚理论与应用研究评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1):77-90.
- [32]藤田昌久,克鲁格曼 P,维纳布尔斯 A J.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33]谭洪波,夏杰长.数字贸易重塑产业集聚理论与模式:从地理集聚到线上集聚[J].财经问题研究,2022(6):43-52.
- [34]王如玉,梁琦,李广乾.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J].管理世界,2018(2):13-21.
- [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6]邢丁,徐康宁.中国数字经济与企业集聚空间格局重塑[J].科学学研究,2024,42(3):528-540.
- [37]肖红军,阳镇,凌鸿程.地方政府驱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机制:乡村振兴注意力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5(2):131-152.
- [38]于斌斌,刘晓佳.数字技术重塑企业地理格局:基于资本结构优化和技能结构重塑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6,61(2):167-189.
- [39]赵超,杨光.人工智能发展何以促进区域创新:基于虚拟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视角[J].区域经济评论,2025(4):71-83.
- [40]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41]赵放,张森.数字产业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融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1):27-35.
- [42]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J].共产党员,2025(21):4-7.
- [43]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8):71-86.
- [44]张慧智,孙茹峰.政府环境注意力如何影响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政府治理视角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7):12-22.
- [45]张国胜,严鹏,李欣珏,等.大数据要素集聚、技术能力缺口与生产率区域差距[J].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18-136.

Virtual Proximity: A New Mechanism for Reshaping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un Xiangdong Li Xinning Shi Hongxu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raditional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find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new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undergoes transformative reshaping across geographic boundaries. The concept of “virtual proxim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allocation can effectively reveal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gital platforms achieve cross-regional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via algorithms, thereby giving rise to virtual agglomeration and forming new spatial relationships. By altering the costs of factor mobility and reshaping the form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virtual proximity drives the urban system to evolve from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oward a flat functional network, establishing a new balancing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polarization and diffusion. It also opens new pathway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remotely undertake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achieve functional upgrading, and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 extends the explanatory boundaries of proximity theor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rovides scholarly support for optimizing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Key Words: Virtual Proximity; Regional Spatial Organization; Attention Allocation; 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中生产力布局优化与 区域政策优化研究*

彭芳梅 周建华 夏添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生产力的跃迁推动了区域发展范式的系统性转型。文章系统梳理了生产力从传统要素驱动向新质生产力引领的质态跃迁,并论证了与之适配的生产关系从行政主体向多元协同治理的深刻变革。研究指出,生产力布局的逻辑已从追求静态均衡与局部效率的“禀赋论”,转向强调创新、安全与协同的“能力说”,空间形态从“点—轴集聚”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在此进程中,中国区域政策体系实现了从“增长管理”到“发展治理”的范式跃迁,其核心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差异化布局,形成东部策源创新、中部承载产业、西部战略备份的功能互补格局。因此,未来区域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建立激励创新、包容风险的治理环境,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构建韧性、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范式。

关键词:生产力布局;中国式区域转型;生产关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26-13 **收稿日期:**2026-0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重塑经济地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发展与理论体系构建”(23FJLB010);深圳市社会科学项目“基于创新价值链的重塑深圳都市圈产业融合路径与策略研究”(SZ2024B015);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年度重大课题“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研究”(SFQND2502);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重大基础工程“揭榜挂帅”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芳梅,女,中共深圳市委党校教授(深圳 518034)。

周建华,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夏添,男,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副教授,通信作者(成都 611130)。

一、引言

“十五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全面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已成为城市群发展的重点,产业链延伸与升级带来的产业布局重构引发新的区域经济关联和经济空间。由静态的生产端分布向研发、销售延伸的动态再分布过程,突破了传统生产布局的原则和理论,对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具有良好的场景式

探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当前生产力的特征、水平和形态已从传统生产力转向先进生产力,具有新质生产力的属性,其相应的生产力布局也会发生变化。

同样,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市场关系的变革,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出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在空间配置上仍存在优化空间。传统生产布局原则是单一且静态的,只关注生产环节,其生产空间是粗放的,分工关系也比较固定,因此,市场关系也滞后于生产力。先进生产力具有动态、创新的特征,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环节放在一个框架中,其生产具有空间集约性和分工精细化,因此,其对应的市场关系更加灵活多变。若反映在生产力布局及政策上,传统的布局政策难以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和形态,必然推动政策向差异化、精准化、体系化方向转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见证了中国生产力发展、布局和生产关系转型的过程。

中国的区域经济学是由生产布局学与经济地理学结合演化而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为了推进落后农业国进行工业化而产生的学科,后来与经济地理学合并其研究范畴,突破生产布局学的工业化和工业布局,聚焦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和空间关系。生产布局学来自苏联,区域经济学概念源于西方,但内容被中国式现代化重新书写,传承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习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因此,比较生产布局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范式和政策体系能够窥见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转变的历史痕迹。

基于此,本文从生产力跃迁和布局的角度考察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区域经济的政策转变,梳理从生产布局学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脉络,并结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新要求、新形态来展望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范式。

二、生产力跃迁:从传统要素驱动到先进生产力引领

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三个方面,其发展既是量的积累,又是质的提升。审视生产力的发展,既要从生产力的特征、形态入手,还要关注其布局导向和发展趋势,从而判断生产力的水平,划分生产力所属阶段。本章从以上视角对生产力和生产布局做历史性回顾。

(一)历史的起点:传统生产力的特征和空间形态

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不断向前和提升的,但并非线性的。传统生产力受制于自然禀赋与初级生

产要素,其空间形态是静态且均衡的。在工业化早期,生产力水平受限于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的开发能力和布局水平,形成了以自然资源的直接开采、简单劳动和初级资本为组合的产品体系。进而,其交通运输由依赖人力、风力、水力等自然动能转变为依赖火力、电力等非自然动能,因此,运输成本在生产布局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①。在其发展机制和路径上,以马歇尔外部性、雅各布斯外部性为基本学说,因而强调劳动市场导向、原材料导向、产地导向的布局原则(安虎森等,2025)。因此,传统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有资源禀赋的依赖性、运输距离的敏感性、规模经济发展路径的锁定性。

传统生产力状态下,地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整个国家形成相对封闭的生产组织,即地域生产综合体。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相对独立,商品交换范围有限,生产分布呈现出一种基于本地资源与需求的、低水平均衡的分散状态。这种状态接近克鲁格曼提到的后院资本主义。但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区位和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初步的增长极,这种增长极并不是产业链分工的前端,只是生产要素的空间积累。因此,区域差距表现为地域之间资源禀赋和要素积累量的数量差距,这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一致。

因此,传统生产力形成的空间状态,一种是低水平的均匀分布,另一种是差异化的中心外围结构。该时期,全国层面出现极点式布局,即专业化的资源型城市、工业区和相应的生活综合体(白永秀等,2007)。“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的内地布局 and “三五”到“五五”的“三线建设”直接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培养和建设了一批工业城市。“东高西低”的工业布局是传统生产力的历史遗留,也是中国调整生产力布局的历史起点。

(二)科技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水平标准和发展模式

先进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的更高质态的生产力。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孙久文,2025)。

先进生产力在发展水平上超越了传统生产力,并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其一,高技术基础与高度

智能化。先进生产力的首要标准是其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运行。这不仅指生产过程中广泛采用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装备与系统,更意味着研发投入强度大,科技创新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源泉。生产力的先进性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不仅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其二,知识密集与创新驱动。先进生产力的核心生产要素从有形资源转向无形的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依赖于高素质的劳动力、持续的技术创新和高效的知识溢出。其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成为衡量生产力先进性的关键标尺。其三,网络化协同与柔性生产。先进生产力突破了传统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局限,转向基于信息网络的小批量、多品种、定制化的柔性生产模式。企业间、产业间、区域间通过复杂的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紧密连接,形成网络化协同生态。生产的空间组织更加灵活,对市场变化的响应速度极大加快。

进而,先进生产力探索出更深刻的空间逻辑,营造了新型经济空间。其一,产业集群与创新生态系统。先进生产力倾向于在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群,如硅谷的电子信息产业、波士顿的生物技术集群。这种聚集不再是简单的成本导向,而是为了获取知识溢出、专业化劳动力池、风险资本和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机会,从而构建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空间上的接近促进了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协同创新的发生。其二,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嵌入。先进生产力通过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进行组织,研发、设计、核心部件制造、组装、营销等不同价值环节根据其要素需求被配置到全球最具比较优势的地区。然而,控制核心技术与品牌的高附加值环节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全球城市或创新区域,体现了“地方嵌入”与“全球网络”的辩证统一。其三,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增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内在地要求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它通过清洁技术、循环经济、绿色制造等手段,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即“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最终目标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要求生产布局必须考虑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实现绿色发展。

因此,先进生产力的空间形态出现了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趋势。第一种是新质创新综合

体。传统工业区以工厂为核心,而新质创新综合体以高品质地方为依托,集创新研发、高端制造、品质生活、生态休闲于一体。这类空间形态的代表包括硅谷、中关村、深圳南山区等,其特征是“创新—生活一体化”,对高素质人才具有强吸引力。第二种是韧性网状网络。传统生产力布局呈现“点—轴—面”的等级扩散结构,而先进生产力布局更趋向于“网状”分布式结构。物联网、高速铁路、5G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不同节点之间的实时协同成为可能,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从“中心—外围”刚性结构转向“多节点—多连接”柔性网络。第三种是虚拟空间映射。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技术的应用,使得物理空间的生产活动与虚拟空间的数据流动相互映射,部分生产环节(如设计、仿真、远程运维)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完成,突破了物理距离的限制。这种“虚实交互”的空间形态,是传统生产力布局理论未曾涉及的新现象。第四种是生态化空间分区。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先进生产力的布局强调“生态优先”,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限制大规模工业化开发,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种空间形态体现了生产力布局从“经济单目标”向“经济—生态—社会多目标”的转变。

(三)生产力的布局:从“禀赋论”到“能力说”

从传统生产力到先进生产力的演进,不仅意味着生产力质态的变化,更意味着生产力布局逻辑的根本变革——从“要素禀赋决定论”走向“创新能力决定论”。

“禀赋论”的核心命题是“一个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发展由其先天赋予的、相对静态的生产要素禀赋(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初始资本)所决定”(朱富强,2020)。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研究了地租、距离与农作物布局的关系;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旨在寻找运费、劳动力和集聚因素作用下工业的最优区位。它们的共同点是将运输成本最小化,作为核心目标,隐含的前提是生产要素和市场需求是外生给定且相对固定的。这种布局思维是“生产布局中涉及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是通过生产过程的生产关系加以体现”的直观反映,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是主导性的。传统生产力布局的合理性在于就地取材,因

此,“禀赋论”在解释传统资源型产业布局时具有强大说服力,但它无法解释为何在资源禀赋相似或匮乏的地区能够发展出极具竞争力的先进产业。

“能力说”强调,区域的长期发展优势并非来自静态禀赋,而是来自其动态获取、创造和升级生产要素与产业的能力。随着生产布局学的发展,其研究重点从“社会生产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及其形成发展条件”,扩展到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在一定地域空间的组合方式”以及“各地区之间劳动分工、协作及其发展比例关系”。这标志着从关注单个企业的最优区位,转向关注区域整体的产业组织、集群网络和协同效率,即区域的内在“能力”。生产布局的任务也演进为

“提出从国民经济总体考察综合效益最优的布局方案”,“综合效益”在先进生产力时代,必然包含创新效益、结构效益和可持续效益,都依赖于区域的能力建设。

从“禀赋论”到“能力说”的转变呈现出三种发展逻辑的更新。其一,区位选择从“成本最小化”转向“机会最大化”。传统区位理论追求运输成本最小化、劳动力成本最小化;“能力说”则追求创新机会最大化、学习效应最大化。研发机构、高科技企业选址时,更看重接近知识源(大学、科研院所)、接近人才库、接近风险资本,而非仅降低当期生产成本。其二,从单一经济目标到综合系统优化。合理的生产布局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一国一地区

表1 传统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的对比

比较维度	传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
核心特征	依赖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力、初级资本等有形要素的投入。生产过程技术含量低,创新缓慢,规模经济效益有限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以知识、信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运行,并追求“不断完善”
驱动要素	要素驱动,对自然资源和区位具有强依附性	创新驱动与知识驱动,核心要素是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
空间形态	1.分散均质:自然经济下,区域同质化,联系薄弱 2.中心—外围:工业化初期,生产要素向优势地点简单堆砌,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	1.集群网络化:倾向于形成产业集群与创新生态系统,基于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进行空间聚集 2.全球—地方联结:通过全球生产网络组织,高附加值环节嵌入特定创新区域
布局目标	节约运输成本,追求生产成本(尤其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最小化	获取动态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最优”,最终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布局范式	由先天、静态的生产要素禀赋(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决定。理论代表为古典区位论,寻求给定条件下的最优区位	由区域动态获取、创造和升级生产要素与产业的能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实现“经济、政治、国防、社会和环境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目标(王得鼎等,1989)。在“能力说”框架下,这种“综合效益最优”的布局方案,必然要求区域具备统筹发展和安全、经济与生态、效率与公平的多元治理能力。其三,发展路径从“路径依赖”转向“路径突破”。“禀赋论”具有路径依赖性,区域发展被锁定在既有优势轨道上。“能力说”则强调路径突破,欠发达地区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引进也可以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产力布局经历了从禀赋驱动到开放驱动再到创新驱动的演进过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生产力布局主要遵循“禀赋论”逻辑。东部沿海地区凭借区位优势(靠近国

际市场)、劳动力优势(低成本)、政策优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东南沿海—内地”的梯度发展格局。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创新能力在生产力布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深圳等沿海城市,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创新之都”的跨越,合肥、贵阳等中西部城市,也依托科教资源培育了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未来产业,实现了“换道超车”。

三、生产关系转型: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区域治理体系

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矛盾共同

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演进。区域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则突出生产力布局中“空间”属性,可具化为区域间的权力结构、利益分配与制度安排,其本质是区域内主体在发展中的获益以及区域间发展收益的分配。本章将从生产力布局演变的视角分析空间生产关系转型和政策演变的特征。

(一) 生产力布局中生产关系转型

在生产力布局的演进过程中,生产关系的主体经历了从“单一行政主体”到“多元市场主体”再到“协同治理主体”的转变,其内涵也从单纯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拓展为包含“权力结构、利益分配与制度环境”的区域经济关系总和。生产关系的拓展分为主体多元化和内涵外延化。

封闭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简化了生产关系,塑造了单一化的生产互动内部关系,一方面是按劳分配扼杀了经济活动后续环节中主体联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构成了单向行政隶属的关系内涵。生产关系决定了布局的非经济性(国防、政治优先)和均衡导向,政策与生产关系高度重合,布局政策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直接执行工具。

市场经济机制的出现丰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关系的主体多元化和内涵外延化。生产组织空间上的开放催生生产布局和生产关系演化的新趋势,一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关系外延至人与人在商品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结成的劳动关系、劳资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李松龄,2026),生产关系“量”的扩张促使其内涵由生产内部外延到经济活动整体;二是布局空间的改变实现了行政的多层级,区域间权力结构改变,单向线性的行政指令演化为包含并存的关系网络。生产关系决定了布局的极化集聚和效率导向,政策成为生产关系变革的催化剂,降低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催化了市场化的生产关系形成,改变了局部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进而影响了布局的集聚形态。

高质量发展中的现实需要则进一步推动生产关系内涵转向兼具经济、社会治理的“发展综合网络”。混合所有制深化和数据要素的参与分配,催生了平台型、网络型关系出现,生产关系成为调配要素的重要方式。同时,生产力内涵的演化对外部环境提出多维度需求,要素流动、人才培养等布局

都需要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生产关系超越经济职能成为协调发展外部性的治理工具,生产布局中以权力结构为基础关系网络成为利益分配、要素流动调配的关键引导。这一阶段政策以修复生产关系的摩擦为主,旨在构建适应新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引导布局向创新、绿色、安全转型。

综上,生产关系的演进解释了区域发展布局原则从“禀赋论”到“能力说”转变的内在逻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自我调适,本质上是借助政策工具与制度体系所释放的行政力量进行主动引导。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政策自身的功能定位与作用特征亦会发生适应性蜕变,其更深层次是区域政策体系的演变。

(二) 关系转型中的政策体系演变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政策则是上层建筑的表达,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制度化表达。生产关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制度基础和边界约束,而政策则是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杠杆。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外延也进一步促使区域政策体系转变,其中,包括区域战略叠加、协调发展重构和治理体系转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是以战略叠加充分发挥各战略的正向效应。战略叠加可分为四种组合类型:一是“同一区域、不同战略”,统筹同一地理范围内多层次、多类型战略的并行实施;二是“不同区域、同一战略”,针对东中西部及大中小城市的不同尺度与层级,差异化落实协调城镇化等统一战略;三是“不同区域、不同战略”,协调不同战略间相互影响的空间效应,引导其形成合力;四是“同一区域、同一战略”,注重战略在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实现不同发展阶段间的深度衔接(蔡之兵,2026)。战略叠加构建了区域发展中独特的政策路径,突出了因地制宜的指导思想。战略叠加的最终目的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得到细化扩充。

政策体系以四大战略为基础,逐渐统领一系列政策,构建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支撑、城市群战略与都市圈战略为载体、主体功能区为依据的宏观框架,并以西部大开发等四大板块崛起战略、长

三角一体化等“19+2”城市群发展战略(高国力, 2024)和老少边穷等区域划分充实微观细节(蔡之兵, 2023)。政策框架中城市群主体地位的确定和特殊区域的细分都是政策逻辑从“增长管理”向“发展治理”的跃迁,这种转变重构了协调发展的特征。

首先,在区域权力结构上,政策推动治理主体从“地方竞争”转向“央地协同与多元共治”,强调权责重构,其中,中央强化在生态、安全等战略领域的统筹,地方则专注于执行落地。政策工具从制造“政策洼地”转向搭建“治理平台”,设立跨区域协调机构,并将企业、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纳入决策参与主体,打破了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构建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其次,在区域利益分配上,政策核心从“效率优先”转向“共享与补偿”,致力于在政策上建立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横向生态补偿、飞地经济合作以及GDP分计、税收分享等制度,将生态保护、对口支援等外部性行为内化为经济激励。政策不再单纯保护资本回报率,而是承认知识、技术、数据乃至生态产品的价值,并推动其参与分配,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先富带后富”的实质性共享;最后,在区域制度环境上,政策手段从“优惠政策”转向“规则治理”,致力于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规则体系。规则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准入与监管标准,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针对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确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和安全治理等新规则。政策的功能不再是降低显性要素成本,而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

区域政策范式的转型是区域间生产关系功能由单一经济发展到发展治理综合功能的具象化,这一转型将传统的行政管辖体系重塑为以跨界协同、网络治理为核心特征的区域治理体系,生产关系成为调配要素、修复外部性的制度化治理工具。

(三)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治理体系

生产关系须与生产力阶段、实际需求相适应,因而生产关系转型也进一步深入到区域多层次多主体的关系变革,包括央地、区域间、地方政府治理目标的转换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特别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属性的着重建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区域突破条块分割的传统治理格局时,常会出现信息迟滞、不对称和

局部误读等情况。当下,多层次多主体的区域关系网络倒逼治理方式变革,因而现代化建设中区域的角色既包括政府体系的行政主体,还包括市场语境下的发展主体(蔡之兵, 2021)。区域治理则需要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基础上形成适配区域新特征各主体关系。此外,生产力演化的长期性使得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表现出治理主体“下沉”和治理目标“上升”的特征。具体而言是治理体系的层级不断增加,主体的治理空间逐层缩小、责任趋于细化,以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格局为主的治理目标立足于省市发展的支撑。

一是央地关系转型背景下,在社会—市场—政府三个方面的平衡问题。社会方面是共同富裕的实践,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目标,区域协调发展是其实践路径。市场方面体现在双循环构建需要以全国统一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为供需匹配的动态平衡提供动力(黄群慧等, 2021)。政府方面则是央地关系经历了财政包干、分税制和统一大市场三个阶段,且仍处在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状态。分税制改革导致地方的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从而衍生了土地财政,并出现地方债务问题。央地矛盾从财权到财力的转换反映出地方政府主导在社会治理、经济发展、行政改革三个方面的权衡。多区域、差异化的沿海—内陆关系以及统一的货币体系、政策体系都使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精准施策,“一刀切”式的政策会恶化央地关系,形成转移支付依赖和发展陷阱。因此,掌握中国的跨区域人口、地理、经济活动特征是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精准施策需要治理主体进一步细化,将现代化治理体系落实到区域层面。

二是区域协调发展下区域分工合作的利益分配、补偿机制完善和竞争行为转变。多层次治理体系造成的信息传递、处理效率下降和多主体的利益争夺、责任逃避和恶性竞争较为普遍。区域作为强经济性的治理主体,在市场整合和行政协调上存在短板,且在区域尺度之下更难以明确支出责任和管理地方债务。因此,区域现代化治理主要体现为政府间的平衡,即协调发展。一方面,协调发展是多主体间利益共同体的组建,需要以产业承接、转移等方式缓解产业同质化,构建共同产业体系和市场供需关系嵌套消除分割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多级

主体协同治理的补充,区域间的利益分配、补偿机制也应下放,与省级、市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收入关系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三是在产业体系现代化目标下微观主体积极性与政府强权性需要动态均衡。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提升了经济规模,积累了发展要素,但产生的短期效率与长期质量失衡、劳动力和土地配置失衡等问题较为严重。人口、土地的错配纠正,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一方面,应对区域发展中的生产要素筛选和优化,并进行激励和补偿,从而激活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对政策环境优化,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法治环境建设、基层治理改善等系统措施,促使政府强权性向引导服务型过渡。同时,政策优化还会提升居民生活和社会法制,兼顾社会公平和民生的改善

四是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治理体系现代化并非只限于生产关系变革,更体现为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包括生产体系的健全和生产属性的外延。一方面,生产力是产业体系长期自主演化的结果。新兴产业是生产力突破的支撑,但庞大的下游产业是生产力的基础。生产力均衡需要新兴和传统产业融合,建立持续发展、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生产力体现为涵盖面提升。生产力发展包括传统的生产效率和产出质量的提升,生产网络的出现使其成为包含绿色发展、文化价值、共同富裕等可持续发展的迭代体系。

四、理论演进:从生产布局学到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发轫于宏观经济发展脉络,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服务于发展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学天然具有鲜明的“发展主义”特征(夏添等,2025)。这一特质促使其不断吸收和融合地理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乃至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一门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基础学科,演化为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核心导向的实践性、应用性、政策性的“工具性学科”。发展特性促使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重大改革相契合。

(一)范围扩大驱动的生产布局及学科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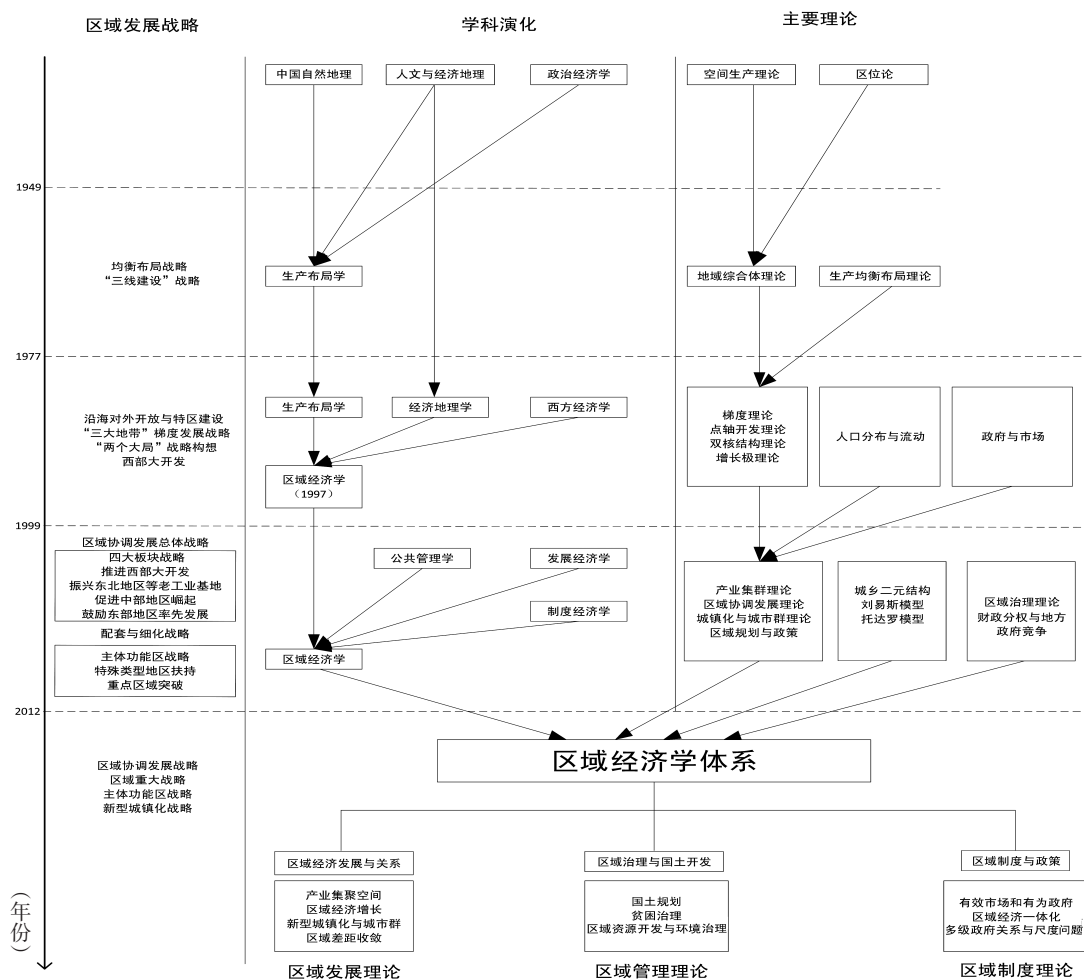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前瞻性地认识到对生产

力进行空间布局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系统性特征具有空间外溢性(谢地等,2026)。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产力认识不断深化,生产要素的外延在不断扩展。同时,生产力多种要素演变为系统的、复杂的、动态的多维组合,其存在、结合和运动必然会占据一定空间,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性。

生产力的空间扩大决定了生产活动的复杂化。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空间不断扩大,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的空间组合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孙久文,2019),进一步促进了各类部门、行业和企业间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的变异(刘再兴,1984)。一方面,空间变异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全域化、主体层级化,其内容由生产环节拓展到社会经济活动全环节,生产承载主体从单一生产组织裂变为涵盖地域管理机构、国家部门的综合治理网络;另一方面,则是布局动力机制的多元化与导向的综合化,影响布局的因素逐渐呈现出自然地理与经济发展等多重规律性叠加特征(马涛,2023),驱动布局的动力日益丰富,导向也分化为效率、公平、安全等多维目标的综合平衡。在发展实践中,生产力外溢推动生产布局学融合经济地理学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知识体系衍生出跨学科、跨领域的属性。其中,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外溢相关理论催生出专业研究实际生产布局中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的学科属性,布局影响因素的交互融合则增加了生产布局的实践内容,促使区域经济学吸收经济地理,解释经济活动与空间的互动。

区域经济理论与发展阶段的深度嵌入,本质是其对中国经济发展重大改革逻辑的空间响应与学理支撑。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归纳为4个阶段:1949—1977年引进和模仿苏联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1978—1999年吸收和运用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2000—2011年消化和实践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2012年至今融合多学科前沿、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刘秉镰等,2020)。区域经济理论演化,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学科属性的外延和体系扩张,更重要的是,其对现实中多样化、复杂化实践困境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见图1)。

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赋予区域协调发展超越纯粹经济维度的治理意蕴,使得区域经济学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管理的范畴显著拓展。管理并非对地理空间的直接支配,而是以生产力水平与布局特征为起点,逐步延伸至要素流动的协同、多元主体的共治、人地关系的调适等系统性治理领域,区域经済学能够更有效地回应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特点的治理需求。

(二)生产力布局的原则和形态转变

生产力的空间配置表面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技术范式、制度导向与现实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内在驱动是生产生活的空间扩大。生产空间的扩大是生产分布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是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的一般规律同特定的技术范式、制度导向和现实环境结合,构成了生产力布局的原则和形态。同时,生产规律自身的演化趋势又会推动布局的原则和形态转变。具体而言,生产的一般规律是指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的空间不断扩大,生产部门、生产要素、生产环节的空间组合日趋

复杂化和多样化。生产布局中发展趋势则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复杂化、主体多极化,影响因素的类型多元化、内涵外延化。两者与不同阶段特定的技术、制度和环境结合,构成了生产力布局的原则和形态。

1.传统生产力布局的原则:计划均衡与效率优先的交替

传统生产力布局,主要指工业革命至20世纪末,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在民族国家疆域内进行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空间资源配置活动。其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逻辑主线在“均衡”与“效率”两极间摆动,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细分为计划体制下的“均衡布局”和市场转型中的“效率优先”。

计划体制(20世纪50—70年代)下“均衡布局”的深层内核是政治安全与战略自立,其生产力布局呈现均衡的鲜明特征。

整体核心原则为计划指令性原则,即必须服从国家指令性计划,是“生产的再分布”。宏观层面为均衡与国防安全原则,核心是“调整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比例”,改变工业偏集沿海的状况,并隐含“靠山、分散、隐蔽”的备战思想,追求区域间的静态平衡与战略安全;中观层面为地域生产综合体原则,强调地区专门化与地区工业多样化发展相结合,在建立面向全国的专门化部门的同时,必须配套发展协作部门与地方自给性部门,形成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区域性生产循环;微观层面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原则,企业布置需兼顾协作效率与战略安全,防止过度集中或分散。此外,企业内部为技术经济指向性原则,具体项目选址需要根据企业的指向性选择最优区位,通过详细的生产布局的经济论证,实现原料、消费地、燃料动力等指向下的成本最小化。

空间形态上,宏观形态呈现分散化的块状格局,工业建设有计划地向内陆推进,形成多个散布全国的工业基地和“小三线”企业,呈现出相对均衡、分散的国土开发格局;中观形态则是地域生产综合体,围绕核心资源或重大项目,在特定地域内计划性地布局一系列关联企业,强调原材料与能源的内部循环,在空间上表现为功能板块集中,但地理分布相对孤立的工业区或工业城市;微观形态为集中成组的“单位大院”,具体工业区内企业按协作关系成组布局,配套建设全套生活服务设施,形成“企业办社会”的、功能混合但相对封闭的空间单元。

市场转型(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效率优先”空间布局的核心是经济发展。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生产力布局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核心目标从“安全与均衡”转向“增长与效率”,市场力量开始成为空间配置的基础性机制。

整体原则为效率优先于市场,布局决策的核心驱动力从国家计划转向投资回报和市场竞争力。宏观层面为非均衡发展原则,承认并利用地区差异,政策上鼓励生产要素向条件更优的地区集中,信奉“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以先富带动后富;中观层面为点—轴开发原则,以“点—轴系统”理论成为主导,强调优先发展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干线等优势区位,形成集聚效应;微观层面为强调企业区位选择遵循成本最小化(尤其是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最大化原则。此外,产业呈

现出开放原则与全球化嵌入,即布局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沿海地区凭借区位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成为面向全球的制造业基地。

在空间形态上,宏观形态为清晰的点—轴集聚结构,生产要素向“T”字形(沿海与长江)发展轴线高度集中,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密集的城市与产业集聚带,区域发展差距显著拉大;中观形态为区域内的开发区与产业集群,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产业集聚的主要载体。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围绕主导产业或龙头企业,在特定区域内形成自发性强、联系紧密的产业集群,如东莞的电子信息、温州的低压电器等;微观形态为专业化产业园区与城市新区。产业布局在空间上更趋于功能分区明确,出现大量的出口加工区、软件园、物流园区等。城市空间迅速向外扩张,形成以产业功能为主导的新城区。

2.先进生产力布局的实践逻辑:从“空间选择”到“系统治理”

21世纪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信息、绿色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生产力的内在属性,生产力内涵向新质生产力跃升,布局逻辑进入区域经济学的治理范式,追求系统性目标。

整体核心原则为创新驱动与生态优先原则,布局的核心指向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空间配置应有利于知识创造、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宏观层面为系统协调与韧性安全原则,目标从单一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多元平衡。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布局必须考量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推动形成“多点多极”的战略纵深;中观层面为网络化协同与功能互补原则,强调在更大范围内构建高效联通的基础设施网络和统一大市场,推动城市群、经济带内部及之间的功能互补与协同发展,从“行政区经济”转向“区域共同体经济”;微观层面为数字化与智慧治理原则,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布局需适应数字经济的网络化、分布式特征。同时,多级政府倾向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的精准性、科学性。

宏观形态上,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群与区域协同发展带将空间格局从点—轴升级为网络化,如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城市群,内部通过高速交通与信息网络紧密连接,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带等更强调流域系统性协同;中观形态上,城市群成为创新走廊与特色功能平台,主要城市群内部及彼此间形成以高速交通廊道为载体、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的科技创新走廊。各类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新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承担改革开放、创新策源等特色功能;微观形态上,城市内的产城融合与智慧园区,产业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更注重融合,打造功能复合、职住平衡、环境宜居的产业社区。园区发展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成为创新生态的培育器和区域治理的智慧节点。

综上所述,生产力布局的演进是从计划指令下的静态均衡,到市场驱动下的效率极化,再迈向治理引导下的创新协同与韧性平衡。其空间形态相应地从分散块状,经过点—轴集聚,演变为多中心网络化。这一历程深刻反映了发展理念、技术经济范式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迁。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生产力布局原则

受区位论、空间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影响,生产布局学在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政策精准性、城乡关系演化等问题上日渐式微。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的构建十分必要,关键在于吸收和升华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成果,并将发展路径理论化。生产力自下而上的演化路径概括了区域经济的演化路径,特别是区域间以生产力的转化来实现协调发展。同时,现实中生产力阶段性特征及多级主体也在逐渐完善现代化生产关系的变革空间。

生产力本质是产业转变成产业体系中生产方式的更新,是长期积累的演化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特征(夏添等,2018),其理论包括区域发展差距的收敛、区域优势的发挥、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这反映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多尺度、自发性、动态化和人口导向四个方面,即多尺度主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自发性的动态协调。生产力演化路径的各个阶段都对应着区域相应尺度。

一是央地间区域协调的动态调控。当下四大版块间差距相对一致,省域尺度的差距绝对收敛较为显著,但省内、城市群内发展差距出现相对扩张

的趋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反映出区域协调发展的细化特征和区域政策精准化的客观要求,需要分区域对待。但中央政府多采用基于地区特征的政策,易出现政策叠加、冲突的情况,引发政策依赖性和失效情况。因此,中央政府打破传统的“中央—省—市”行政等级及行政区范围约束,以现实差距为依据构建“中央—区域”“中央—市”等多样化政策等级,重构政策的主体、范围和内容,如将西部大开发纳入湖北、湖南部分地区。

二是区域主体间协调发展的动态调控。一方面,区域发展目标从缩小区域差距转为发挥区域优势,推动大区域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的自发规律。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是内生禀赋(要素优势),基于要素流动重组的生产优势,供需有效匹配是生产循环的前提。因此,区域间需以新供给和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导向,相互嵌入构建生产体系、消费市场及政策平台。另一方面,区域内政府转型下人口的动态调控。区域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超过其他要素,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实现人力资本在流动性和发展空间上优化,在共同富裕的语境下还需要侧重个体发展权利的保障。因此,政府转型更倾向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性和发展包容性的政府(李晓飞,2019),即介于发展、服务政府间、因事制宜的包容性政府。同时,交通设施的建设使得人地关系已经不依附于特定地域,而以“流”形成地域间交互关系,人力资本流动性加强,更易实现劳动力、土地的优化配置。

三是各级主体间特征的连贯性衍生出区域整体特征。地方政府纠正劳动力和土地的转型会强化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区域间经济活动嵌套则重组区域要素禀赋,实现要素、产业优化配置;央地政府间则以整体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地区产业深度转型为导向的产业转移和重组。生产力的区域特征为协调发展下的生产力再布局,区域协调从优先发展到发展共享的转变,影响了区域生产力布局导向。传统区域协调发展更注重经济差距的缩小,生产力布局以资源优势 and 地区发展的政治意义为主。产业发展主要为培育主导产业,区域间难以避免产业同质化竞争等弊端,虽然政策实施难度不大,但缺乏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前期生产力布局的弊端,新区域协调发展应考虑到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多方面问题,并以区域为主体进行利益分配、补

偿制度设计和生产力转换。因此,区域生产力再布局是生产分工下的价值链分工与生产水平提升,以构建完整产业体系和区域产业生态链为导向。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学需要吸收现代化实践成果,将发展路径理论化。区域协调发展涵盖差距收敛、优势发挥、要素流动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多尺度、自发性、动态化和人口导向。其具体路径包括:央地间打破行政等级约束,以现实差距构建多样化政策层级;区域主体间以新供给与新需求动态平衡为导向,相互嵌入构建生产体系与市场平台;区域内政府向包容性政府转型,增强人力资本流动性,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各级主体特征连贯性衍生区域整体特征,新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考虑多因素,以区域为主体进行利益分配与补偿制度设计,最终以价值链分工与产业生态链构建为导向实现生产力再布局。

五、结论与展望:构建韧性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范式

本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系统剖析了生产力跃迁、生产关系转型、理论范式演进与政策体系变革之间的互动逻辑,揭示了一条从“计划均衡”到“创新协同”的中国区域发展道路,最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韧性、协调、高质量的区域发展新范式。

(一)研究结论

随着生产力的质态跃迁,生产力布局逐渐转向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差异化布局。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差异化布局的制度保障,通过建立统一的规则、标准和监管来破除地方保护、行政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差异化布局则是基于比较优势、功能定位和发展阶段的精准分工,其目标是构建一个能级有序、功能互补、安全联动的国土空间体系。布局路径可细化为东部策源、中部承载、西部备份。

东部地区依托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世界级城市群和创新高地,承担创新策源、产业升级、高端服务和全球链接的核心功能,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孵化器和增长极。中部地区发挥地理中心、综合成本、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的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转化应用,打造先进制造核心区、现代综合交

通枢纽和粮食生产基地,支撑宏观经济大盘。西部地区在保障生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和边疆稳定的基础上,依托清洁能源、战略腹地等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成为国家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战略备份空间,增强国家发展的整体韧性。这一布局方向,标志着从过去“梯度转移”的效率优先,转向“功能互补、安全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旨在形成“全国一盘棋”下的最优整体竞争力。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求建立“激励创新、包容风险”的制度环境,进而重塑激励与约束机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知识创造和数据应用,生产关系改革必须构建有效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微观层面要推动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明确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评价和人才激励机制;中观层面则要发展多层次区域市场,以科技金融和保险分散、化解创新风险,同时深化改革地方官员考核机制,降低短期经济增速权重,增加创新、绿色、民生等长期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考核;宏观层面则要破除行政壁垒,重构地方激励,通过跨区域GDP分计、税收分享、生态补偿等利益联结机制,将地方政府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正和合作”。治理层面则需探索设立跨行政区的实体化协调机构,赋予其在规划、标准、项目审批上的实质权力,实现经济区与行政区的适度分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演进,正在推动中国区域发展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差异化布局”新范式。东部策源创新、中部承载产业、西部战略备份的功能互补格局,旨在构建安全韧性的国土空间体系。实现此目标,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建立激励创新、包容风险的治理环境,从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激发整体竞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未来议题

中国区域经济以生产力为脉络,逐步实现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新空间探索和新治理模式。基于区域现实特征和理论特质的分析,本文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先进生产力做进一步展望。

其一,韧性成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区域质量的新标尺。当前,中国区域政策面临三重结构性压力: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要求政策必须优先维

护整体稳定;二是多重转型任务叠加,包括要素创新、绿色转型与土地财政退坡,政策需在复杂目标间艰难平衡;三是市场与人口空间流动,导致区域生产力格局存在波动与转移的可能(刘元春等,2020)。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与外部冲击动态调整政策,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与周期性波动。其调控主要体现在两大维度:一是以财政改革防范风险,针对中西部地区财力短缺与债务扩张的矛盾,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优化地方财政金融体系,阻断风险在区域与产业链间的传导,稳定营商环境;二是以定向扶持增强动能,综合运用利率调整、购房信贷松绑、就业与民生补贴等政策工具,对冲下行压力并稳定社会预期。此外,央地财政关系的系统性重构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为优化政府行为激励,中国通过设立计划单列市构建“央—市”二级财政管理通道,规避了财权逐级下放可能出现的效率损耗。此后,又进一步探索省域副中心等准行政区划模式,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与事权财力相匹配。

其二,多中心城市群成为区域的核心发展单元。“十四五”规划明确了“5+5+9”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十五五”规划强调通过城市群建设和城市更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协调、产业集聚和生态优化。城市群成为承载区域政策、体现治理效能的基本单元,是现代治理、产业演进与要素集聚的必然结果。对外,能够适应“双循环”与外部压力,推动政策下沉、差异化管理与跨区域协调,有效破解都市圈建设中的行政壁垒与跨界治理难题;对内,以集聚与分工为动力,承载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内部协调提升产业布局质量,从而系统性优化生产力空间配置。同时,当前中国城镇体系呈现“大城市强联系、小城市弱链接”的特征,城市群发展仍受行政等级制约,内部中心城市多以直辖市、省会为主。城市群多中心化成为扭转这一局面的必然选择,需要对城市功能做分类定位和疏解迁移,完善城市间交通网络与公共服务,降低人口流动约束,还应培育边界节点,加强城市群交界地带的发展联动,从而提升网络的多中心性与整体韧性。

其三,城市群规模和边界的动态化是未来发展的特征之一。城市群无法覆盖人口流动的全部空间,也没有囊括所有城市和城镇化地区。同一城市会同时受到不同城市群的辐射,这反映出经济活动

外溢带来的深刻变革,正在导致城市群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结构走向复杂。因此,国土规划应避免“大而全”,转向“小而精”和“因时而变”。政府干预应作为辅助性、基础性的协调工具,以“负面清单”管理为生产关系变革提供制度支撑与弹性空间。定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及时修正规划方案,完善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以“负面清单”管理让市场力量在城市群演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城市群边界的动态化也体现在城乡空间属性的转变,城镇化由空间扩张转为制度优化,显现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包容性空间制度上表现为以经济分工为主的“三生空间”转变为侧重经济社会互补交融、综合分工的“三区三线”,纠正了人口、土地错配的政策根源,以人口流动实现生产力升级。从都市圈的发展视角来看,大部分大、中城市的主要人口仍生活在县域和农村,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在县域出现交叉和交融。县域的空间分工重叠使得县城成为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间、城市群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

注释

①在区位论中,距离和运费是决定空间利用类型的主导因素。

参考文献

- [1]安虎森,荆克迪.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平衡充分发展理论: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25(3):179-187.
- [2]白秀秀,任保平.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J].经济评论,2007(1):124-130.
- [3]孙久文.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新特征与新任务[J].人民论坛,2025(10):36-39.
- [4]朱富强.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拓展的战略模式[J].社会科学研究,2020(1):77-85.
- [5]王得鼎,孙久文,周宇.工业生产布局概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11.
- [6]李松龄.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与统一[J].中州学刊,2026(4):39-47.
- [7]蔡之兵.我国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J].学术论坛,2026,49(2):1-11+157.
- [8]蔡之兵.从区域战略到区域政策: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与思路[J].学术研究,2023(9):104-110.
- [9]高国力.以“19+2城市群”为战略支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EB/OL].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24-08-19 [2026-06-02].<https://www.ndrc.gov.cn/>

wsdwhfz/202408/t20240819_1392448.html.

- [10]蔡之兵.靶向优化还是自主进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的甄别与方向[J].人文杂志,2021(5):22-32.
- [11]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J].管理世界,2021,37(12):40-58.
- [12]夏添,曾智鹏,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滥觞、发展与转型:中外学科范式比较的视角[J].江海学刊,2025(2):113-120+255-256.
- [13]谢地,钟玲玲,贺城.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J].广东社会科学,2026(1):41-55.
- [14]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展望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201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43.
- [15]刘再兴.生产布局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49.
- [16]马涛.“十四五”时期重大生产力布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19.
- [17]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J].管理世界,2020,36(2):182-194+226.
- [18]夏添,孙久文,林文贵.中国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发展述评:兼论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方向[J].经济学家,2018(8):94-104.
- [19]李晓飞.户籍分割、资源错配与地方包容型政府的置换式治理[J].公共管理学报,2019,16(1):16-28+169-170.
- [20]刘元春,刘晓光,闫衍.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复苏:2021—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2,42(1):13-34.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Policies within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Peng Fangmei Zhou Jianhua Xia Tian

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leap in productive forces has driven a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qualitative transi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from being driven by traditional factors to being led by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rgues for the profound shift in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from administrative dominance to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logic behind productive force distribution has evolved from the “endowment theory,” which pursued static equilibrium and local efficiency, to the “capacity theory,” emphasizing innovation, security, and collaboration; correspondingly, spatial patterns have shifted from “point-axis agglomeration” to a “multi-center networked structure”.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China's regional policy framework has undergone a paradigm shift from “growth management” to “development governance”, with its core objective being to establish a differentiated layout within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creating a complementary functional pattern where the eastern region drives innovation, the central region supports industries, and the western region serves as a strategic backup.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key to fu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lies in breaking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fostering a governance environment that incentivizes innovation and embraces risk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resilient and coordinated new paradigm for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ductivity Layout; Chinese-Style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责任编辑:彦 伦)

【区域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的“内卷式”竞争及其制度根源*

张翔 冀保峰

摘要:“内卷式”竞争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溯源“内卷”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框架下考察“内卷式”竞争及其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地方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跨区域的协调,地方政府在有限市场需求规模下追求区域利益后导致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这为“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以供给侧优先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降低辖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支持产业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形成“重生产轻消费”的供给侧优先发展策略。发展型的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企业投资和生产,经济增量发展转变为区域间的存量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对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从改善供需弱化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入手,加快对地方政府激励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高效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职能重心由供给侧干预向需求侧管理转变。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区域竞争;产能过剩;供给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39-12 **收稿日期:**202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25FJLB050);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研究重大项目“国家智造战略产创融合的应用与研究型高端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2025SJGLX010Y)。

作者简介:张翔,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浙江省高能级科创平台体制机制创新软科学实验室研究员(杭州 311121)。

冀保峰,男,河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工学博士(洛阳 471023)。

一、引言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在我国多个行业持续蔓延,具体表现为价格机制失灵、同质化竞争、市场无序扩张等现象,这反映出国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发展空间受限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系统性问题。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首次在官方层面提及防止“内卷式”竞争;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202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五五”规划的会议,再次提及“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可见,地方政府与“内卷式”竞争存在密切联系——在缺乏有效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是引发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

“内卷式”竞争反映当前中国经济深陷供给主导的老旧增长模式,无法摆脱靠补贴推动产业扩张

的困境,在供给过剩的状态下停滞、重复、折腾及就地打转的现象。它描述当代社会竞争加剧、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揭示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即从“做大蛋糕”到“争夺有限蛋糕”的转变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努力与社会整体进步之间的断裂。“内卷式”竞争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内卷式”竞争具有典型的资源内耗性。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竞争参与者将大量有限的资源投向低水平、同质化的生产之中,资本与劳动力被过度集中于低效领域,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种竞争模式导致经济系统整体效能不升反降,有限的资源被空耗,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创新活动受到抑制。二是“内卷式”竞争具有典型的社会空转性。参与“内卷式”竞争将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和资源,但整体产出效率和效益并未相应提升,甚至下降。低水平重复与创新窒息,引发经济系统锁定与恶性循环,陷入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停滞状态。因此,“内卷式”竞争抑制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内卷式”竞争耗费宝贵的人力资本和降低创新活力,但其根源却不在微观经济主体,而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环境。如若企业恶意压低价格,以远低于成本价倾销商品、抢占市场份额,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就会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法律规范约束。同时,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如果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正常发挥调节作用,长期以远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商品对企业而言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逻辑,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下不存在长期“内卷式”竞争,但为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会普遍存在“内卷式”竞争?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看,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的行为导致产能持续扩张和过剩。刘志彪等(2025)就曾明确指出,当前中国发展中出现了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各级政府却一直鼓励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和维持制造业的比重,而对服务业的诸多领域仍保持严格管控,这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导致供给过剩的行业普遍存在“内卷式”竞争。在供强需弱的经济环境里,“内卷

式”竞争的资源内耗性和社会空转性是由于在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仍继续影响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供给导致的。然而,为什么即便是在供强需弱的经济环境,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将重心放在供给侧,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扩张产能和增加供给,而不是用于扩大消费和需求,以解决经济供需失衡?为此,本文将从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系统梳理已有的“内卷式”竞争相关研究进展,剖析“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其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概念内涵与文献综述

(一)“内卷式”竞争概念的讨论与定义

“内卷”泛指一种没有意义的过度竞争。“内卷式”竞争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卷是与发展相对应的概念(黄宗智,2002),被视为努力的“通货膨胀”。内卷是经济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的现象。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是内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也是内卷。“内卷式”竞争是围绕特定市场空间的低质竞争、重复竞争,具有鲜明的内耗性和残酷性。“内卷式”竞争是竞争的一种异化形态,其超出了竞争的合理界限,演化为过度的内部竞争状态(邹晓蔓等,2025),表现为同质化价格战、创新动力衰退与资源错配加剧的恶性循环(赖淑君,2025);“内卷式”竞争可以被视为一种“多人囚徒困境”,国内供给规模增长过快,长期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市场规模增长有限,最终使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困境(王海燕,2025)。

“内卷”并非当下一个新概念,只是“内卷”一词近年来才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共鸣和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针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内卷”概念就被黄宗智(2000)等学者引入并进行系统研究,“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最初用以形容中国农业发展有增长无进步特征。后来被拓展到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刘世定,2004)。广义上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为内卷。就经济领域而

言,“内卷式”竞争是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内卷式”竞争是在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特定产业中获取收益并使特定产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精细化只是“内卷式”竞争中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在国民经济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生存,展开手段越来越复杂细微、程度不断加剧、结果不断恶化的竞争(王海燕等,2025)。上游行政性垄断与下游过度竞争的失衡格局,叠加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技术依赖与市场锁定,共同构成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空间(刘衍峰等,2025)。“内卷式”竞争是资源被无休止的价格战、营销内耗与低水平重复损耗,宝贵的人力资本被用于职场内斗、低效竞争、应试技巧,而非实质性价值的创造上。供强需弱的宏观环境导致低价供给与低价需求相互强化,使得宏观经济运行陷入“低价竞争—商品低质—消费降级”的恶性循环,偏离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欧阳日辉等,2025)。“内卷式”竞争是在经济下行和全球化倒退双重压力下的适应性反应,兼具市场机制缺陷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总之,“内卷式”竞争是地方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市场失灵,尤其是价格调节供需平衡机制的失灵,其根源在于国家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内卷外溢到经济领域。

“内卷式”竞争造成当财富红利消失、发展空间收缩、原有激励相容无法维持。在缺乏新增长点的情况下,个体或组织只能通过争夺有限资源来维持生存或获得微薄收益,进入竞争加剧但收益停滞的非效率状态,这时上升通道收窄,资源向既有优势群体集中。为获取同样的收益,需要投入远超以往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零和博弈现象。本质是企业有限市场空间内的过度挤压(卢晓雯,2021),社会价值观单一迫使个体挤入有限的赛道,无法根据自身特质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个体为自保或微薄优势而加倍努力,结果却推高了竞争门槛,导致所有人处境更差,陷入囚徒困境。当竞争沦为零和博弈,信任与协作减少,恶性竞争、资源封锁、相互损耗就会成为常态。经济制度与社会激励机制未能适应新环境,反而强化了人力资本的内耗,微观主体努力无法转化为系统性的整体进步,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内卷式”竞争不仅已经存在于传统行业,而且已蔓延到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例如,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产业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但也面临着“内卷式”竞争加剧的问题。近年来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价格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降至3%—4%的水平,燃油车的利润率则更低。当前汽车行业的困境反映了“内卷式”竞争的同质化和低效低水平的问题所在,虽然中国汽车行业产能扩张迅速,但汽车需求增长的幅度远低于产能扩张的速度,车企为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内卷式”竞争则是其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下的理性选择(见表1)。传统观念认为“内卷式”竞争通常存在于成熟产业,但由于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和经济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现象(李晓华,2025)。为了抓住新产业发展的机会,大量企业会在同一时间进入,从而扭曲投资,出现产能过度扩张、供大于求的情况。为缓解“内卷式”竞争压力,增加产品市场需求,部分企业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张鹏等,2025),“出海”成为当前企业获得生存空间的主要选择之一。然而,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卷式”竞争外溢到世界各国,又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除美国以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为由与中国打“贸易战”,欧盟也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保护本地区的产业。

表1 2023—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

年份	新能源产量	已建成新能源产能(估算)	产能利用率
2023	958.7万辆	约1300万辆	约70%
2024	1288.8万辆	约1800万辆	约70%
2025	1662.6万辆	约2400万辆	约68.7%

数据来源:新能源汽车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已建成新能源产能、产能利用率数据作者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产销快讯》及《2026年中国汽车整车市场占有率及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告》整理而来。

(二)“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影响

“内卷式”竞争的典型特征是同质化竞争显著和低价格竞争模式盛行。在以行政区为主体而非以经济区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中,地方政府以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是导致“内卷式”竞争

的重要原因(张杰等,2025)。内卷不是企业自发卷出来的,而是地方政府之间用税费优惠、地价返还、电价补贴、举债补贴、“抽屉协议”拼出来的,这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低价血战。行政区内的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利益密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利益主体特征明显。地方官员迫于晋升压力以及囿于任期和任职地资源有限,忽视所辖地区长远发展或者实际情况而倾向于选择易于达成的或上级强烈重视的目标以与其他地区展开竞争,引发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等一系列负面影响(马恩涛等,2024)。地方政府的“内卷”被认为是从源头上导致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孙晋,2025)。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产生一哄而上追热点、盲目补贴上项目等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卷式”竞争行为,被认为是“为增长而竞争”的延续(李雪松等,2025)。上游行政性垄断与下游过度竞争的失衡格局,叠加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技术依赖与市场锁定,共同构成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空间(刘衍峰等,2025)。

“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产出增加并不是劳动边际产出的增加,而是劳动工作时长或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带来的产出增加。“内卷式”竞争并不是非理性的过度竞争,而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下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导致的“合成谬误”。有学者把“内卷式”竞争视为非理性的过度竞争(陆雄杰,2026),然则这混淆了“内卷式”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如果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竞争,国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可整治这类行为,而非必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显然,“内卷式”竞争不是企业非理性的不正当竞争。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内卷式”竞争都是市场经济中理性的行为选择,但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的理性选择,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未必最优,存在“合成谬误”。这说明“内卷式”竞争并非微观经济主体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而是制度环境所造成的宏观效率损失。

“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问题。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体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够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但为何市场机制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失灵引发“内卷式”竞争?关于“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丰富

的讨论。黄宗智(2000)指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内卷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内卷式”竞争是劳动生产率边际递减的竞争。之所以会产生“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化不足或者至少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果(郭威等,2025),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和对重复项目投资的追逐,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经济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两个最核心特征:同质化竞争和低效竞争。同质化竞争主要通过价格战进行,而“非价格竞争”如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则进展缓慢,不是主要的竞争方式。这种低效低水平竞争则不是一种良性竞争,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其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要求,这导致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潮涌现象”(李晓华,2025)。已有的研究对“内卷式”竞争的概念内涵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但缺少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究“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制度根源。简单将“内卷式”竞争归结为企业恶性竞争或过度竞争,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因此,区别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产生“内卷式”竞争的区域环境之中,从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结合国民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地方政府供给侧优先的区域竞争探究“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

三、地方政府在“内卷式”竞争中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增加产能的政治激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视角看,“内卷式”竞争是当前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反映的是当前国民经济的竞争从价值创造异化为存量资源争夺乃至价值抵消。“内卷式”竞争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创新活力、生产效率与消费潜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产业竞争,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起飞,但同时也导致大量的产业同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自20世纪80年代财政分权改革以来,中

央与地方政府间逐步确立的财政分权体制,通过赋权与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开展竞争(周飞舟,2009)。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制度创新,长期扮演着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着辖区内土地、矿产、金融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配置,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对于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会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降低企业供给成本,帮助企业重复投资和扩大产能,促进整体市场产能的急剧扩张。

传统发展模式依赖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与以本地生产税收为主的财税分成机制(周黎安,2007)。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量化供给侧指标为核心的政治晋升竞争,使得地方官员有强烈动机在任期内最大化本行政区的经济表现。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绩最大化展开政绩竞争,从而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往往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发展指标挂钩,形成“政治锦标赛”模式(蔡之兵,2026)。这促使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基建、提供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方式争夺有限资源和项目,各地政策高度同质化,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为增长而竞争”的横向内耗(周黎安,2004)。

为实现特定的国家战略目的,中央政府通常会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央政府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以后,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定发展的重点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例如,2024年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前瞻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新赛道。此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市都先后将这些未来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集中区域内有限资源投向未来产业,争创未来产业发展高地。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确立发展的重点产业,并展开区域竞争,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产业竞争将会集中投入到重点发展的产业,有可能加速这些受到重点支持的产业实现技术突破,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另一

方面,当这些受到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产能扩张速度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就会形成“内卷式”竞争,即所有地区都是未来产业发展高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未来产业发展高地”。

(二)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内卷式”竞争及其经济影响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是行政化配置资源干扰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微观市场主体“内卷式”竞争背后是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扰乱价格调节供需平衡机制导致的存量内卷。在赶超型发展战略下,形成了中央政府明确产业方向、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深度参与产业发展模式(蔡之兵,2025)。“内卷式”竞争虽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出来,但并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以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不顺畅的表现,是地方政府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产业政策过度干预经济、扭曲资源配置的制度性结果。地方政府主导区域间招商引资的逐底式竞争催生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各地产业布局高度同质化,企业在有限市场空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竞争,无法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地方政府主导区域间的“内卷式”竞争也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地方政府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形成以行政权力为主导、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封闭型经济系统,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孙久文等,2020)。在“行政区经济”里,流域治理、基础设施联通、产业链协同、要素自由流动等需要跨行政区合作的事项,因区域利益纠葛和地方政府考核各自独立而推进缓慢。在以行政边界为壁垒和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下,区域间的“内卷式”竞争的性质是在既定体制框架下围绕区域经济竞争的深化。各地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区域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而是如何在行政边界内培育完整的或高端的产业链,这就导致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行政化配置资源的制度性产物。一般而言,有效的市场竞争并不产生“内卷”,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

“内卷式”竞争,是由于要素市场被扭曲,价格机制无法顺畅调节供需关系,并长期积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行政化方式配置生产要素仍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地方政府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来干预辖区内经济,是形成“内卷式”竞争的关键机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称为“制内市场”的经济体制(郑永年,2022),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优惠、税收返还、补贴和信贷干预等手段,降低企业成本,扭曲要素价格。这种政策洼地竞争导致企业投资决策不是基于市场效率,而是追逐政策红利。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计划经济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黄宗智,2009)。工业用地远低于市场价甚至零成本出让,有的还承诺后期税收返还,以吸引制造业项目。通过产业扶持资金等形式部分或全部返还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协调,引导本地银行为特定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国企为重点支持发展的企业融资提供隐性担保。

从经济寻租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也是租值耗散的过程。“内卷式”竞争是租值耗散在现实社会中最常见、最生动的表现形式,本应属于消费者或者生产者的经济价值在竞争过程中被无谓消耗。在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扩张停滞或规模收缩的情况下,为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企业不得不低价出售商品。“内卷式”竞争通常以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这会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和失业增加,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以往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遵循“由上到下”的产业规划模式,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辖区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开展招商引资与产业培育扶持。例如,当前部分西部欠发达地区不顾自身基础,跟风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在持续上升的经营压力面前,企业竞争加剧,也即所谓的“内卷式”竞争。一些企业通过“卷价格”实现“以价换量”,尽可能扩大需求、抢占市场份额,结果就出现了“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发展困局。“内卷式”竞争是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转向租值耗散,对地方政府的制度激励扭曲所导致竞争形态异化的过程。地方行政力量干预资

源配置,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生产要素无法依据价格信号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导致产能配置失衡,因为行政力量会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形式对关键核心生产要素进行配置。例如,地方政府对光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特定产业的战略扶持,产生产业政策信号的引导,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强烈投资冲动,快速形成过剩产能。此时,企业决策不仅基于市场价格信号,更多是对政策红利的追逐。例如,前期各地政府竞相补贴新能源汽车行业扩大产能,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库存高企直接引发价格混战,全行业利润率下滑甚至亏损。

(三)区域发展协同性不足引发“内卷式”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激烈的区域竞争,而区域竞争的动力来自地方官员升迁的政治激励。通过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尹振东等,2020)。长期以供给侧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与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集中在供给侧。为了获得快速晋升的机会,地方官员倾向于选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财政资金多用于补贴生产和扩大供给,而忽略了市场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扩大,进而出现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各个环节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补贴等政策支持,价格机制在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作用有限。各级地方政府对重点支持发展产业的倾斜性补贴诱发了全国层面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王文甫等,2014)。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的经济导致企业实际退出市场困难,企业获得地方政府“父爱主义”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行政性退出壁垒(白让让,201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需求侧的忽视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供需错配,消费刺激政策乏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长期存在,内需潜力长期难以激发释放。这种重供给轻需求的区域经济发展惯性,使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迟迟难以突破路径依赖,最终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

区域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与分工机制,也加剧

了“内卷式”竞争。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后,拥有了多种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其中,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政策是地方政府常用的区域竞争方式。近年来各地相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引导基金,地方政府以风险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区域经济竞争,将地方政府的“内卷式”竞争转化为区域经济的“内卷式”竞争。“以邻为壑”“互害式”产业政策竞赛对特定产业采取超常规奖补政策措施,对重点企业给予巨额补贴和优惠加剧企业跨区域政策套利。部分地区招商引资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可达40%,导致资源向能快速拉升官员业绩数据的领域倾斜(晏军锋,2025)。由于跟着政府产业政策投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红利,引起企业一哄而上,投入中央确立重点发展产业,造成重复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4.41%,低于80%健康线约5.6个百分点,且已连续第三年下行。表2列出了2025年中国代表性过剩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尽管经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

表2 2025年中国典型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

行业名称	产业利用率
水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1.6%(其中水泥行业约5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9.8%
光伏产业	约51%
动力电池及储能行业	约60%

资料来源:属于国民产业分类标准的行业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其他则由作者根据网络数据整理而来。

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下,如果中央确定重点产业目录,地方就会围绕中央确定的重点产业目录展开区域竞争,并为此提供土地、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更容易获得中央部委审批、银行贷款,同时也体现地方对中央战略的贯彻实施能力。此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陷入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囚徒困境:如果作为区域竞争对手或“对标”区域的另一个地方大力发展了重点产业,而本地却无所作为,那么当地官员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将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即便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地方政府也会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发展重点产业的号召,并根据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促进本地产能扩张,最终导致产

能过剩,而市场需求则不会进入过剩。地方政府没有政治激励去扩大辖区内的市场需求规模,一方面原因是需求侧指标不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二是地方政府扩大辖区内的市场规模容易被其他区域“搭便车”,而自身获益有限。因而相对供给而言,市场需求规模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资源,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引起“内卷式”竞争。

中央对地方的供给侧指标考核体系、财政分权结构、支持生产的产业政策导向等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刻塑造了区域的竞争逻辑。各地政府为追求区域经济增长和政策考核目标,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竞争的困境。地方政府拥有地区经济发展自主权且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加快辖区内产业扩张,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其实较为单一,一哄而上追逐政策热点扩张产能会导致区域之间出现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定位和长期技术积累,尤其是在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最终陷入价格战和补贴战。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之间激烈的产业竞争,围绕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展开“内卷式”竞争^①,不仅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问题,也加剧了市场经济结构失衡,供需错配和供强需弱并存,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之间的“内卷式”竞争行为不受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约束。政府官员在“政治锦标赛”竞争中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卷固定资产投资而不卷民生福利保障”“卷产业发展而不卷消费升级”“卷供给增加而不卷需求扩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限的市场需求是宝贵的瓶颈资源,而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相较于供给萎缩,恶化了企业生产环境,企业为了获得生存空间过度竞争,产生“内卷式”竞争行为。供强需弱的风险长期积聚引发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低水平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有地方政府补贴或支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红利,以“内卷式”竞争的方式获得生存空间,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不能将其“内卷式”竞争淘汰。在央地关系、土地财政依赖、官员考核体系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追求辖区内经济增长和财税收入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依然强烈,区域之间围绕供给侧各项指标展开“内卷式”竞争的体制性因

素影响会持续传导到市场,引发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和低价竞争。

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而地方政府行为并不受市场规律制约。地方产业政策干扰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当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时,投资决策就会偏离效率原则。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卷价格,而降价格主要依赖降成本,降成本则源于降薪、裁员、降研发。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政绩最大化,地方政府最优策略是重生产供给、轻消费需求,将有限的资源投向生产领域,可能会过度投资基础设施或补贴低效企业,挤占民生与社会发展资源,积累地方债务风险,长期反而削弱增长潜力。在中央政府确立主导产业后,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立的主导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例如,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地方政府跟风投资,但由于配套实施细则和区域协调分工机制不完善,导致产业重复投资和建设普遍存在。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的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球的60%、70%和80%以上。这说明在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立要发展的重点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通过各种手段争相降低各自辖区内该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和产能增加,但这些产业的市场规模有限,当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增长远大于总需求的增长,“内卷式”竞争则成了地方政府支持发展的企业的理性选择。

在缺乏明确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的情况下,通过产业政策促使企业保持必要的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区域经济竞争时的常用策略,即使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也要维持必要的产出规模增加。由于地方政府深度干预区域经济的供给侧,被地方政府分割的碎片化的区域供给叠加,形成全社会的市场总供给,但全社会的市场总需求相对稳定。每个区域都在极力争夺有限的市场总需求,尤其是在市场总需求扩张受限甚至萎缩的情况下,随着各地产能增加,市场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需关系的作用,部分企业为获得生存空间,以“卷价格”“卷成本”“卷销售”等形式开展“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

四、现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制度根源

(一)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供给侧优先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卷式”竞争与西方经典竞争形式存在本质区别。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突破市场竞争边界和底线的非合意竞争,给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予以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竞争偏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既不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曾经出现过的不正当竞争,也不是市场垄断,而仍是突破市场竞争边界和底线的非合意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带有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性特征,掺杂着市场竞争和地方政府竞争,而非纯粹的市场竞争行为。

在短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发展区域经济竞争的动力来自对地方官员激励的制度设计。发展区域经济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胡彬等,2021)。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告别供给不足的时代后,反而出现了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通常而言,在国家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倾向于扩大再生产,而对增强辖区内居民社会保障和消费能力缺乏有效的政治激励,形成“重生产轻消费”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长期运行会产生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简而言之,地方政府主导区域产业竞争的行为导致产能扩张大于市场需求扩张,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总供给必然超过总需求,而供强需弱的情况下,价格发挥调节供需的作用则表现为通缩加剧,微观上表现为低价竞争,之前受地方政府政策扶持而扩大产能的企业为生存而展开“内卷式”竞争的问题逐渐显现。

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其行动逻辑亦不遵从市场规律。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经济的行为是一种带有政治目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的非市场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执行的产业

政策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性质,政府根据不同阶段,锁定特定重点产业,集中资源优先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地方产业政策导致资源向少数重点领域集中,当新型举国体制支持下的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则产能快速扩张;若市场需求增长缓慢或停滞,则出现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受政策支持的企业只能被迫“内卷式”竞争。在钢铁、铝、半导体、造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领域,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类补贴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得以生存,供给过剩成为常态。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行为进行规范,但该条例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职责交与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平竞争审查力度不够,且该条例明确规定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文件不适用于该条例,导致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科技化,即将违反公平竞争的地方政策包装成为科技促进政策。例如,各地围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密集出台的“算力券”政策,不断加码算力补贴力度,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算力政策的“内卷”延伸到经济领域。

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生产规模与地方经济财政指标直接挂钩,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增加税收收入(黄宗智,2009)。以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为主的间接税长期占税收收入较大比重,是财政的重要支柱,而间接税与行政区内企业营业收入或生产规模直接挂钩。因此,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有强烈动机引导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由于提高税率和开设新税种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最直接、最自主的增加税收方式就是扩大税基,支持“短平快”的产能扩张项目,这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地方为了维持产业竞争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压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政府默许本地企业“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冯志轩,2025),虽然形成了低成本的区域竞争优势,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制约市场规模的扩大。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没有从需求侧直接扩大国家整体市场规模的激励,但很注重区域经济增长和基于生产规模的税收收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扩大市场需求受益的是整体,但成本却由地方政府承担。商品

市场是全国统一的,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扩大市场需求规模受益的是全局性的,其他区域很容易“搭便车”,而本辖区内受益有限,因此,缺乏扩大本辖区内市场需求规模的激励。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各地政府以生产为导向,围绕着技术、创新与生产展开区域经济竞争。以新能源汽车“内卷式”竞争为例,为抢占新能源汽车赛道,各地政府不顾区域比较优势,都将新能源汽车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且对新能源汽车生产环节过度侧重,加码新能源汽车产能扩张,但并不关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对地方政府而言,本地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增加是其职责范围内需要支持的,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则是其职责之外的事项。例如,2026年央视曝光江西宜春为吸引哪吒汽车,大搞政策洼地,国企投近3亿元代建厂房,每卖出一辆在宜春产的哪吒汽车再奖励2万元,总投入约14.2亿元。面对新能源行业持续扩张的产能和有限的市场需求,哪吒汽车长期低价销售,亏损经营。这种只负责扩张产能不顾市场需求的地方政府行为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当所有地方政府都只负责促进新能源汽车产能扩张而不顾新能源汽车需求能否赶上产能扩张时,新能源汽车的总供给持续超过总需求,“内卷式”竞争则是新能源汽车企业为获得生存空间必然的选择。

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激励是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下,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地方自主性而忽视了中央顶层布局的统筹性,地方政府对扩大市场需求规模的激励不足,但对扩大辖区供给规模却有很强的政治激励。地方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用地倾斜等政策诱导企业扎堆新能源汽车、光伏、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等热门产业,压缩技术迭代周期虽然加速了科技进步速度,却也导致各区域产业同质化和产能过剩,为“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创造了必然条件。

(二)经济形势变化加剧“内卷式”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深度干预供给侧经济指标已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情况,但为何近年来“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并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中央重要的经济议题?在国民经济增速下行期,市场需求有限,随着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但近年来“内卷式”

竞争问题突出,可以说是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等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持续发酵的结果。“内卷式”竞争增量发展受限转为存量竞争过程中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表现,也是国民经济循环存在堵点卡点的具体表现。由于总需求不足,供给侧的企业面临“蛋糕”做不大的困境。为了生存,企业只能在存量市场中通过极致压缩成本、过度营销甚至恶性竞争来抢夺有限的市场,而非通过提升品质和服务来创造新需求。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内卷式”竞争产生的重要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卷式”竞争和产能过剩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反映的是同一个经济问题,即市场需求规模的有限性。

相较于产能的快速扩张,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停滞甚至收缩,致使有限的市场需求规模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为了既定的市场需求而竞争,则形成了“内卷式”竞争。近年来,国民经济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低迷或负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位运行、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整体经济长期面临通缩风险,这意味着全国的市场需求停滞或收缩。在宏观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而言,市场需求是极其重要且有限的瓶颈资源,短期内很难通过微观市场主体自身努力实现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因此,受到瓶颈资源的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被迫开展“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不是近期出现的,但其剧烈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放缓时期开始显现出来。“内卷式”竞争是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要素投入回报边际递减后,过度依赖制造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存量竞争加剧的典型表现。当通过开拓新市场、创新新技术来获取增量收益变得困难且缓慢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便会将重心转向对现有市场份额和资源的激烈争夺。当前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等加剧“内卷式”竞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有效需求不足长期持续存在。

虽然国民经济环境变化使“内卷式”竞争问题变得突出,但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并非导致“内卷式”竞争的根源,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只

是催化了已有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并在近年来伴随着通缩问题日益凸显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国民经济运行环境深刻的变化是“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催化剂,区域经济陷入供给主导的增长模式无法摆脱靠过剩产能与补贴推动产业扩张。产能过剩、激烈竞争导致价格持续下跌,形成“内卷”的恶性循环,全行业利润率被挤压。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采取“以价换量”的生存策略,加速经济内卷化。市场空间受限,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此时,降价一方面可以增加需求量,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降低供给量,从而缓解供强需弱的矛盾。但在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需平衡的过程中,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在发挥作用,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和寻求生存空间,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降低价格刺激销量是遵循市场逻辑的理性选择。

此外,由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不确定性增强,民众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能省则省成为主流消费思潮,消费降级是主动应对未来经济不确定的理性选择。因此,在叠加消费降级的背景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和价格,是顺应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理性选择。然而,微观企业和居民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和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的理性选择而言,宏观上却引发了经济收缩、通缩加剧和经济低迷等不良影响。因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不能仅就“内卷式”竞争本身入手,而是需找到导致“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试想如果经济上行,市场需求规模扩张、产品供不应求,居民部门预期未来收入会上涨,对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物价温和上涨并伴随着消费升级,则会打破“内卷式”竞争的经济环境。在此情况下对企业而言,价格和竞争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此时微观经济主体理性的选择应该是调涨产品价格,并扩大产品供给。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收缩并伴随着供给增加,则必然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在价格调整供需平衡的过程中,伴随产生为了企业生存和地方政府保就业的“内卷式”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卷式”竞争是宏观经济下行过程中各区域经济增量发展受限转为存量竞争的必然,其无发展的内在属性阻碍国家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矫正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结构,发挥价

格机制调节供需平衡的作用实现市场出清,地方政府不应强化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扰,而应增强民生保障,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地方政府围绕供给侧展开区域间的产业竞争而带来“内卷式”竞争的负面效应及其制度根源。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并非微观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过度竞争,而是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微观主体理性选择后的“合成谬误”。综合市场需求规模有限和“内卷”具有“过密化”的核心特征看,“内卷式”竞争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区域间产业竞争的衍生,体现的是增量发展受限转向存量竞争的经济收缩。在现有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经济是“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地方政府从区域利益出发,压低辖区内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成本,不顾整体市场需求停滞或收缩,推动辖区内产能扩张和供给增长,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偏好供给侧的经济指标,对需求侧的支持激励不足,而近年来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内卷式”竞争。

虽然行业自律限产短暂缓解了“内卷式”竞争的低水平重复内耗,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关键在于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激励,弥补市场需求规模不足的短板,激励地方政府扩大辖区内的市场需求规模,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经济促使整体层面产能扩张和市场供给增长远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现状。首先,要加快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减少区域之间围绕供给侧指标的过度竞争,严格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确立市场中性的竞争原则,出台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的措施,同时应避免地方政府以整治“内卷式”竞争为由过度扭曲市场机制导致越反对内卷,反而会越卷。其次,将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从“重生产”向“重消费”和“促民生”转变。传统的产业政策补贴生产者以扩大产能,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产业政策应转向补贴消费者,以此来扩大市场需求,跳出产品低价、产能过剩的陷阱。最后,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挥国有资本支撑共同富裕的

战略功能,提升劳动在国民收入份额中的占比,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改变供强需弱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要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经济的过度干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

注释

①202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各地招商引资行为不得任意而为,在政策优惠方面不得开展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

- [1]刘志彪,孙文婷.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 [2]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2(4):149-176+191-192.
- [3]邹晓蔓,张成鹏,涂圣伟.产业“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内在特征与治理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6):56-63.
- [4]赖淑君.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演化逻辑、生成机制与突围路径[J].企业经济,2025,44(9):102-111.
- [5]王海燕,张占斌.“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改革,2025(3):11-21.
- [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美)黄宗智中华书局,2000.
- [7]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6-110.
- [8]王海燕,张占斌.“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改革,2025(3):11-21.
- [9]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J].经济学家,2025(5):88-97.
- [10]欧阳日辉,刘璇.数字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发生机制、潜在风险与破解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25(3):3-19.
- [11]卢晓雯.多维视角下的内卷化:研究现状及概念梳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6):130-136.
- [12]李晓华.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4):50-54+235.
- [13]张鹏,胡蝶.整治“内卷式”竞争:理论、事实与对策建议[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1):54-59.
- [14]张杰,任元明.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主要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2):50-61.
- [15]马恩涛,李鑫,姜超.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偏差:基于纵向分权与横向竞争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24(1):149-174+187-194.

- [16]孙晋.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及破解之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2):68-72.
- [17]李雪松,高辛睿.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39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5(4):183-195.
- [18]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J].经济学家,2025(5):88-97.
- [19]陆雄杰.“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理论导刊,2026(2):127-135.
- [2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1]郭威,李泽浩.“内卷式”竞争:内涵、成因与治理[J].理论探索,2025(4):95-102.
- [22]李晓华.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4):50-54+235.
- [23]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24(3):54-77+244.
- [24]蔡之兵.加快形成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闭环:内在机理与系统路径[J].经济学家,2026(1):89-98.
-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6]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 [27]蔡之兵.竞争过度还是竞争不足:“反内卷”的认知误区、操作难点和政策建议[J].河北学刊,2025,45(6):12-20.
- [28]孙久文,张翱.论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的演变[J].区域经济评论,2020(6):25-29.
- [29]郑永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 [30]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J].开放时代,2009(4):75-82.
- [31]尹振东,聂辉华.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20,19(2):411-432.
- [32]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 [33]白让让.市场引导、政府干预失灵与“双低企业”空转运营[J].经济学动态,2017(7):44-57.
- [34]晏军锋,李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与治理路径[J].广东经济,2025(17):16-20.
- [35]尹振东,聂辉华.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20,19(2):411-432.
- [36]胡彬,余子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J].财经研究,2021,47(6):139-153.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nd its Institutional Roots

Zhang Ao Ji Baofeng

Abstrac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ind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tracing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involution”, this analysis examine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d its economic impac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Due to a lack of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overinvestment and excess capacity emerge as rational decisions made by local governments pursuing regional interests amid limited market demand. This creat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Under a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prioritizes the supply side, local governments utiliz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al costs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s, supporting excessive investment and capacity expansion, thereby forming a supply-side priority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pro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Developmental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e deeply in th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s; consequently, incremental economic growth has shifted toward cutthroat competition over existing market share among regions, further intensify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response, a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must begin by impro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operating environment where supply is strong but demand is weak. It requires accelerat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to realign 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establishing a robust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building efficient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division-of-labor mechanisms. Furthermore, it is essential to guide the shift in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supply-side intervention to demand-side management.

Key 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Regional Competition; Overcapacity; Institu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正 漪)

【区域高质量发展】

促进沿边沿海地区联动发展的“双弓弦”空间格局初探*

周贤能 滕祥河 文传浩

摘要:统筹沿边沿海地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的重要支撑。文章在回溯沿边沿海地区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现实条件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沿边地区和沿海地区为双弓、以胡焕庸线为共同弦的“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构想,并阐明“双弓协同、张力调控、强弓蓄势”的运行机制。“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该格局的提出基于三重逻辑:历史层面体现为从均衡发展 to 协调发展、从经济布局到开发保护、从屯垦戍边到生态戍边的演进脉络;现实层面源于沿边沿海地区主体功能分工的深化和双向协同赋能的需要,以及沿边沿海双轴联动发展的时代要求;理论层面遵循空间结构的轴带发展逻辑、主体功能的分类管控逻辑以及生态安全格局的系统保护逻辑。以“双弓弦”空间格局促进沿边沿海地区联动发展,需要筑牢空间骨架、深化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共治、推动双向开放、促进要素融通。

关键词:沿边地区;沿海地区;“双弓弦”;区域联动发展;胡焕庸线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51-13 **收稿日期:**2026-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态环境大数据主权安全与智慧化法律保护机制研究”(22BFX130)。

作者简介:周贤能,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昆明 650500)。

滕祥河,男,云南大学工商管理及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昆明 650500)。

文传浩,男,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 65050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我国是陆海兼备国家,在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格局中强调陆海统筹的联动发展,尤其强调沿海与沿边地区整体性治理与协调发展(周平,2025)。我国沿海地区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①,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0%,承载了多重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在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方面形成

了引领优势,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孙久文等,2021)。与此同时,沿边地区涉及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9个省(区),包括抵边地级行政区45个^②,与蒙古、俄罗斯、缅甸、老挝、越南等14国接壤,边境线达2.2万公里。这些地区是服务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支撑沿边开发开放、推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的重要区域,也是维护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着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空间结构关系,将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有助于推动实现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加强国土空间的合理利用和保护。

然而,沿边地区绿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仍存在协调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供需互动不足,亟须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区域空间发展格局,构建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协同联动的发展机制,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是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区域空间发展格局是国家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的重要战略议题(孙久文,2022)。我国区域经济学界持续探索适合国情的空间发展模式,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体系。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依据中国县级单元的人口疏密状况,较早提出“瑗瑗—腾冲线”(即胡焕庸线)以揭示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的高度不均衡性。此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秩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便成为学术界的探索焦点。陈栋生(1985)率先提出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划分理论和发展思路。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从增长节点和开发轴线之间的关系解释生产力空间组织。陆大道(1986)提出点轴系统理论和“T”型空间开发模式,主张国家应优先发展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二者构成“T”字形结构。随后,点轴开发思想进一步向多轴联动和网络化方向拓展。刘再兴(1993)在三大地带的基础上提出以沿海核心区为依托,推动长江、黄河轴线开发和边疆经济带发展。在此基础上,学术界还相继提出双核结构模式、网络开发模式和多种轴线开发模式。双核结构指由区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组合形成的空间结构模式,两个城市通过交通干线连接,形成互补协同的发展关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陆玉麒,2002)。网络开发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达到较高度下的空间结构,由点、线、面构成网络化系统,强调不同等级城市通过多元流动所形成的复杂协同关系(魏后凯,1988)。在轴线区域开发模式的探讨中,学界涌现出诸如“π”字形模式论、“H”字形模式论、“弗”字形模式论、“目”字形模式论以及菱形模式论等多种理论构想(魏后凯,1990;吴传清等,2007)。此外,周一星(1995)提出“都市连绵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核心区;宁吉喆(2001)针对西部开发提出“点轴带动、重点突破”空间布局构想。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战略体系的提出,学界对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开发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区域高质量发展,从新发展理念与创新驱动(蔡昉,2013)、发展战略转型与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刘志彪,2018)以及效率变革与动力转换(杨开忠等,2022)等角度探讨区域高质量发展。二是关注系统性、功能协同的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强调通过城市群空间协同(方创琳等,2021)、区域优势互补(张可云等,2023)、分工与协调(陆铭等,2023)、国土空间治理和管制(林坚等,2024)等提升空间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三是探讨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布局,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贺灿飞等,2022)、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曾刚和王丰龙,2018)等区域重大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樊杰,2024)的区域协同作用。四是侧重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空间规划与区域开发,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转化为空间管控实践,探索基于“三区三线”的国土空间优化(樊杰等,2021)、“三区四带”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傅伯杰等,2024)以及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林坚等,2023)。上述研究均不同程度涉及沿边、沿海地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与布局优化议题,同时不少学者针对两类区域开展了针对性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关注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口岸经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兴边富民等(郭树华等,2021;肖金成等,2024);另一部分研究则主要围绕沿海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开放型经济、海岸带开发保护、产业集聚和创新引领等(孙久文等,2021;赵璐等,2014)。也有研究尝试将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杨敏等(2018)提出沿边与沿海双轴联动推进均衡发展。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不同阶段中国特定尺度的区域空间发展格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为沿边沿海地区空间格局优化与科学规划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其一,既有研究对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探讨主要聚焦区域经济布局的优化,较少关注国土空间生态布局,需要深化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统一的区域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其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群空间协同与经济轴带联动,对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功能协同和联动发展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其

三,当前关于沿边地区的研究多围绕开发开放、口岸经济和边境贸易展开,对沿边地区生态空间、生态资源和生态安全功能的关注相对不足,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区域空间发展的基本现状和沿边沿海地区协调发展需要,提出区域空间发展“双弓弦”格局构想,即以沿边地区和沿海地区为弓背,以胡焕庸线为共同弦。该格局立足区域功能分工和优势互补,从因地制宜的视角探讨沿边地区“面上保护、点上开发”与沿海地区“面上开发、点上保护”的联动发展路径。由此形成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双弓弦”区域空间发展模式,进而解析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要空间关系。

二、“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基本构想

基于对既有国土空间开发理论的继承与深化,结合我国沿边沿海地区协调发展、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区域经济布局优化的现实需求,本文立足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内在关联,依据沿边与沿海地区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功能上的互补关系,探索构建统筹东西、联动陆海、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双弓弦”区域空间发展格局(图1)。

1.“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内涵定义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由沿边地区、沿海地区

和胡焕庸线共同构成。其中,沿边地区涵盖荒漠、高原、山地等典型脆弱生态系统,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担着开发开放、资源保障、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等多重发展功能。沿边地区自东北、北部边疆经西北延伸至西南边境地区,既是维护陆地生态安全和国土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推动边疆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口岸经济提升和区域开放合作的重要经济空间。沿海地区承载着产业链、创新链和全球市场联动功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自东北沿海连贯至东南沿海,形成支撑高水平开放、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的弓形经济带。从空间结构看,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分别构成“双弓弦”格局的两条弓背,胡焕庸线则构成连接两者的共同弦。该共同弦不仅刻画了我国人口、资源、生态和经济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其毗邻的“美丽中国中脊带”更是实现全国东西区域联动发展的传递带、新旧发展动能的转换带,以及内需型经济发展的核心承载区域(王心源等,2021)。位于“双弓弦”内部的中部地区,是连接沿海与沿边、贯通东部与西部的重要传导腹地 and 枢纽空间。依托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综合交通通道以及中部城市群,中部地区能够承接沿海地区产业、技术和资本要素的梯度转移,促进沿边地区资源、产品和开放通道优势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东西经济协作中发挥产业承接、要素集散、市场组织和结构转换等作用。

2.“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主要架构

“双弓弦”格局立足于沿海与沿边地区在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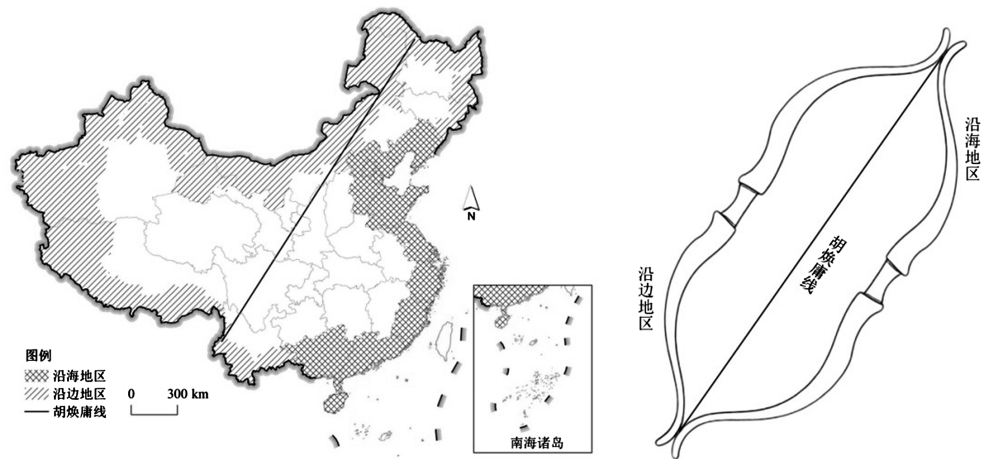


图1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注:沿边地区为45个抵边地级行政区,沿海地区为12个沿海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差异,推动二者基于比较优势实现协同互补与分工合作。在功能定位上,东部弓体侧重承载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功能,同时发挥生态建设的协同作用;西部弓体则以筑牢战略安全与生态屏障为核心使命,同步推进绿色发展、兴边富民与沿边开放,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双弓各有所重、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东西联动、功能耦合的空间架构。

第一,沿海地区构成东部弓体,是国民经济的战略重心。我国区域经济呈现沿海地区向内地沿江沿线地区梯度扩散,基本形成沿海、沿江经济带的发展模式,沿海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轴线(陆大道,2001)。沿海地区承载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功能与外向型经济的核心地位,是区域发展格局中最具战略意义的空间单元,构成了弓箭型经济布局的弓背(古恒宇等,2025)。在“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中,沿海地区构成东部弓体,其厚度、韧度和强度共同构筑了国家经济发展主轴的战略功能,使其成为参与全球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中,东部弓体的厚度体现为沿海地区在产业体系、创新要素与城市能级等方面的深厚积累;韧度表现为其依托完善的产业链条、多元市场结构和陆海联动机制所形成的系统韧性,能够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保障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强度则代表沿海地区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核心控制力与创新引领力,是拉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第二,沿边地区构成西部弓体,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战略屏障。部分沿边及毗邻生态功能区位于长江、黄河、珠江等重要流域的源头区、上游区或生态涵养区,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中的重点区域(Cheng et al.,2024)。与此同时,沿边地区还是承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战略任务的发展前沿,是承接东部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承载区,也是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推动沿边开发开放的关键枢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4月召开的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并提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沿边地区多位于西部地区,大保护是基础和前提,必须更加注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沿边

地区呈弓形分布,在空间形态上契合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与沿边开放开发格局,在功能定位上承载着维护生态安全、保障边疆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与深化对外开放的多重战略使命,构成了“双弓弦”格局中的西部弓体。西部弓体的厚度、韧度与强度决定其多重战略效能,厚度体现为生态系统规模、资源禀赋基础和特色产业体系的丰富程度;韧度表现为生态系统稳定性、产业结构多元性和应对外部风险的适应能力;强度则反映其在安全保障、生态维护、经济发展和沿边开放中的综合支撑能力。

第三,胡焕庸线构成“双弓弦”格局的共同弓弦,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分界线。该线自东北至西南,直观划分了东南部人口经济密集区与西北部生态屏障区、能源资源开发区、边境开放前沿区和特色产业承载区,构成国家战略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纵向轴线。胡焕庸线及其毗邻中脊带恰处于沿边沿海两大功能板块的交接地带,标志着人口经济集聚区与生态屏障区的过渡边界,也标志着高强度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空间临界。在“双弓弦”格局下,该共同弓弦发挥连接东西、传导要素、转换动能和功能互补的重要作用。东部弓体侧重发挥国家经济增长、开放引领和产业集聚功能,形成“面上开发、点上保护”的空间组织模式;西部弓体则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为基础,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并统筹边疆稳定、资源保障、沿边开放和特色产业发展等多重功能。由此,胡焕庸线及其毗邻中脊带不仅连接了东西两侧区域,也促进了两类弓体之间的功能互补和协同联动,在遵循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3.“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运行机制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运行机制体现为“双弓协同、张力调控、强弓蓄势”,通过功能互补、相互支撑、联动发展和政策协同,实现沿边沿海区域协调联动发展。一是双弓协同,强化轴带协同与功能互补。应推动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协同建设、联动发展,形成整体合力,避免东西弓体功能失衡和发展脱节。准确把握东西弓体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推动全方位协同发展。政策层面,制定和完善支持边海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促进沿海与沿边地区的横向协作,通过横向府际援助和合作、现代化基础设施联通、跨区域生态补偿等推动边海联动融合;市

场层面,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边海的要素优势互补和产业链畅通循环;产业层面,加强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产业的联动发展,推动东部产业沿梯度向西部有序转移,构建产业链条互补和协同发展的格局;开放层面,建立沿边重点地区与沿海城市的对口联系机制,交流借鉴开放经验,探索沿边沿海协同开发开放模式。此外,加强双弓轴带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横向经济轴带的战略衔接,构建多层次区域协同网络。

二是张力调控,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力度。依据区域生态承载力和经济发展需求,科学调控东西部弓体之间的系统张力,适时调整开发强度与生态保护力度,既避免过度开发引致的弓体紧绷与生态超载,也防止发展动能不足造成的弓体松弛与增长乏力,从而在动态调适中促进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开发保护关系的持续平衡和结构稳定。东部弓体应重点防止高强度开发对生态空间的过度挤压,引导经济活动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方向转型;西部弓体应重点防止保护约束与发展能力之间失衡,在守住生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合理释放节点空间的发展潜力。通过建立差异化国土空间管控体系,实施分区分类、强弱有序、动静结合的调控策略,在宏观层面统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关系,在空间层面形成全域协同的格局,推动东西部弓体保持梯度有序、松紧适度。

三是强弓蓄势,筑牢发展根基和激发内生动力。一方面,要持续增强弓体的基础承载能力。西部弓体应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基础,在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资源富集区和交通节点推进适度开发,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口岸物流、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和绿色加工等产业,推动生态资源、区位优势 and 开放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增强沿边地区发展能力。东部弓体在提升世界级城市群创新策源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和开放带动功能的同时,强化海岸带、河口湿地、近岸海域、重要海湾和生态敏感区保护,严格控制高强度开发对生态空间的挤占,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港口岸线集约利用和陆海污染协同治理,提升沿海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重点强化弓背的结构性支撑,通过提升沿海地区的发展韧性、增强沿边地区的屏障功能和发展能力,使东西两大弓背在空间上更加

厚实、在功能上更加强韧,形成双弓联动、错位支撑的区域空间格局。

4.“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立足于我国陆海统筹、东西协同的空间禀赋,紧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发展与安全统筹的时代要求,对优化国土空间治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具有多维度、深层次的战略价值。

第一,有利于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布局。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6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的思路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因此,通过统筹沿边沿海两大空间单元,一方面增强沿海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与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强化沿边地区的生态安全与边疆稳定功能,有助于推动沿边地区融入区域协调发展大局。

第二,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加强沿边沿海地区之间的协同配合与相互促进。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沿边沿海地区作为多重区域战略的实施载体,构建沿边沿海地区双弓联动的空间格局能够实现系统性的功能整合与战略协同。沿海沿边联动,有助于区域战略在政策、空间和功能等方面有效叠加,将沿海与沿边的“战略势能”转化为国家区域发展的“整体动能”。沿边沿海区域战略叠加有助于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弥合地区间“战略分割”、促进地区间发展机会更加均衡,提升区域整体发展能力。

第三,有利于筑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空间基础,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关系,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沿边地区作为国家地理疆域的边缘与交汇地带,是保障地缘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的重要空间载体和战略前沿。将沿边与沿海联系起来,有助于统筹经济发展优势区域与国家安全屏障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推动发展空间与安全空

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推动沿边地区绿色发展,不仅有助于防范化解生态安全风险、增强生态系统韧性,也能够通过生态产品供给、资源保障、边境产业发展和开放通道建设,提升沿边地区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因此,“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有利于从国家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整体上塑造一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国土空间体系。

第四,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格局。我国正探索以生态文明理念为遵循、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目标、以绿色低碳发展为路径的国土空间治理道路。沿边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大多被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屏障区。“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通过系统优化国土空间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为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保障。从空间功能看,建设沿边生态安全屏障有利于系统整合沿边生态区域,构建起连续、完整的生态防护体系,筑牢国家生态安全的空间底线;从实施路径看,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和绿色发展协作机制,推动形成沿边沿海区域协同的绿色发展模式,从宏观尺度上实现国土空间的绿色低碳发展。

三、“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沿边与沿海地区空间开发模式与功能定位历经长期演进,逐步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功能互补、协同共进的空间发展态势。沿海与沿边的空间发展演进脉络为“双弓弦”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系统梳理这一实践历程,有助于深刻把握其历史演进特征。

1. 从均衡发展 to 协调发展的历史探索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长期演进与空间结构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平衡发展,到向东倾斜的不平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魏后凯,2019)。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以重工业优先和战略安全为导向,国家实施“内陆优先”布局,特别是通过“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形成了大批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后,战略重心转向“沿海优先”,依托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沿海地区率先崛起,成为国家增长极;进

入21世纪,国家逐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等战略,沿海地区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先行区,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多梯度的空间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部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不断深化区域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合作。这一阶段沿海经济带区域空间发展经历了由“点”到“轴”的演进过程,在交通与产业带发展推动下延展为轴线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轴线。沿边地区多为民族地区和生态地区,受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制约,其发展显著落后于沿海地区,呈现出“海强边弱、东快西慢”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格局。自1992年逐步实施沿边开放政策以来,发展环境逐步改善,并在西部大开发和兴边富民行动下逐步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当前,沿边地区已承载开放通道、安全屏障、生态涵养与富民稳边等多重功能,其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更成为其肩负的重要使命。“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契合了国家区域经济布局 and 生态安全格局的历史进程,是区域发展从单一轴带扩张,到沿边沿海轴带互动,实现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和结构优化的深化发展。

2. 从经济布局到开发保护的生态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空间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从侧重经济增长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逐步转向强调生态功能等多重目标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孙久文等,2021)。在以据点式开发为主、点线结合开发模式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效,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然而,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一度偏重经济增长,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不协调问题逐渐显现。21世纪后,中国国土开发道路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2010年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环境承载力、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潜力等因素,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在微观层面通过“三区三线”推进国土空间精细化治理,分类精准施策,促进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同时,我国不断完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以“三北”防护林工程等奠基为始,以西部大开发和“两屏三带”等战略格局为

表1 中国沿海、沿边地区空间发展格局的历史演进

发展阶段	时间节点	沿海地区	沿边地区
区域均衡发展阶段	1949—1952年	恢复国民经济和沿海地区原有工业生产能力	巩固边疆政权,恢复农牧业与改善基础民生
	1953—1963年	统筹沿海与内地工业布局,在利用沿海原有工业基础的同时,将新增重点项目更多布局内地	加强边疆交通、农牧业、基础产业,增加国家投资与政策支持
	1964—1978年	开展“三线”建设,部分沿海工业与国防项目向中西部迁建	以国防边防、边境交通与农牧业发展为主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	1979—1980年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陆续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	部分边境地区逐步恢复边贸和口岸往来,沿边开放总体处于局部探索阶段
	1984年	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城市	出台地方政策鼓励边境贸易发展,逐步规范边民互市与小额贸易;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沿边开放做准备
	1985—1988年	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	
	1990年	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	沿海开放继续深化,对外开放开始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拓展	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设立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
区域协调发展探索阶段	1996—2000年	发挥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000年正式启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兴边富民行动
	2001年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扩大兴边富民行动试点范围,加强沿边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
	2005—2006年	“十一五”规划提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加快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协调推进
	2007—2012年	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快沿海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党的十七大提出“提升沿边开放”;党的十八大提出“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
区域协调发展纵深推进阶段	2013年	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2014—2015年	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运行	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
	2016—2019年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推进沿边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2020—2023年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启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序推进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推进沿边开放平台和国际通道建设
	2024年以来	沿海城市群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已有文献和政策文件整理得到。

注:本表仅梳理与沿海、沿边地区发展相关的政策与举措,且部分政策的空间覆盖范围与本文界定的沿海、沿边研究范围不完全重合。

纲,持续纵深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从国家尺度构建了生态安全格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国土空间布局从以经济开发为主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转变,生态文明理念逐步融入国土空间布局,构建起了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沿边地区是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三区四带”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中的多个重点区域(陈伟,2024)。长期以来,我国持续筑牢沿

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在空间上构建了“双弓弦”格局中坚实而富有韧性的弓形生态屏障带,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战略资源保障,与沿海经济带形成功能互补,成为支撑国家区域空间格局优化的重要功能单元。

3.从屯垦戍边到生态戍边的发展演进

自古以来,屯垦戍边就是维护国家边疆稳定、推进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我国十分重视筑牢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促进边疆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戍边成为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巩固边防的迫切需求,国家在西部及北部沿边地区大规模推行“屯垦戍边”政策。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稳定边疆、保障粮食供给、促进区域开发以及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为沿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后,沿边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衰退等生态问题愈发受到重视,边境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亟待修复强化。国家在持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开始注重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进入新时代,沿边地区戍边的经济基础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与城市经济,治边方略由屯垦戍边向建城戍边转型(方盛举,2023)。与此同时,沿边地区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以生态保护与戍边固边协同推进为特征的“生态戍边”,正在成为边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形态。生态戍边进一步提升了沿边地区的生态涵养、生态修复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使其在沿边沿海地区功能分工中由传统边防空间拓展为兼具生态供给、安全支撑和绿色发展功能的重要战略空间,从而为“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历史依据。

综上,从区域经济布局看,沿海地区由开放先行区、增长极发展为高水平开放门户和现代化经济引擎;沿边地区则由发展末梢转向生态屏障、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民族团结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沿阵地。从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看,沿海地区在高强度开发基础上逐步转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和重点生态空间保护;沿边地区则经历了从“屯垦戍边”到“生态戍边”的转型,形成现代化边疆生态治理模式。从胡焕庸线两侧关系看,我国区域空间发展正由东西非均衡格局转向提质增效、功能互补和协调联动格局。由此,“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是对沿边沿海地区空间演进规律的凝练,也是新时代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安全支撑的重要探索。

四、“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的重要阶段。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在功能分工、

资源禀赋、开放定位上呈现出鲜明的互补性。然而,现实中发展差距、生态约束、协同不足等问题依然并存,迫切需要以整体性空间框架加以统筹协调。因此,“双弓弦”发展格局具有现实必要性与时代依据。

1.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要求强化沿边地区的生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持续向纵深拓展,以四大板块区域为基础,以重点带区战略为骨架,统筹各大板块和带区发展,基本形成了以点线面为主的区域经济布局,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魏后凯等,2020)。截至2024年,沿海地区自北向南,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分别达到11.54万亿元、33.17万亿元、14.79万亿元,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同年,中国共有27座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城市)的GDP突破1万亿元,全部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主要围绕沿海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布局。其中,沿海经济带拥有17座万亿级城市,呈现出弓形轴带布局。然而,沿海经济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其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带动能力仍面临多重约束。一是生态承载力日益紧张,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需要在宏观尺度上依托沿边生态安全屏障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资源保障和绿色发展支撑;二是沿海产业与沿边产业之间的价值链衔接和协同分工仍不充分,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产业联动格局,亟须将沿海与沿边纳入更加紧密的区域协作网络;三是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效能有待提升,沿海地区在技术扩散、创新共享等领域对沿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因此,在整体性视域下,沿海地区发展还应加强和沿边地区的有机结合和联动发展,提升二者在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维护等方面的相互支撑与协同共进。

2.沿边地区绿色发展要求沿海经济轴带的要素赋能

沿边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推动绿色发展、兴边富民和沿边开放的重要空间载体。该区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荒漠、高原、河谷等多样生态系统,蕴含丰富的生态资源、清洁能

源资源、特色农牧资源、文旅资源和口岸通道资源,具备发展生态农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食品加工和跨境生态合作的基础条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沿边地区应立足人地协调策略,以绿色发展为导向,通过统筹谋划开发保护重点与秩序,从而形成集约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郭树华等,2021)。在生态安全功能上,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区体系、生态保护红线、重大生态工程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复合结构生态空间,发挥着缓冲生态风险、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水平等预防和保障功能,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稳定、水资源供应、新能源建设等有着重大影响。在地缘格局方面,该区域与十多个国家接壤,多元的地缘特征为开展跨境生态合作、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独特优势,使其在构建周边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然而,在发挥这些系统功能的同时,沿边绿色发展仍面临多元挑战。一方面,生态资源资产化、产品市场化和产业链延伸能力不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另一方面,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面临自身地缘环境复杂、生态本底脆弱、全域共治低效、多重安全风险交织及基础设施薄弱等多重系统性挑战,亟须沿海地区在技术、资金与制度创新上提供有效支撑,共同构建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协同机制。

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求沿边沿海双轴协同联动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较大,必须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协调并进的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以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从全国的区域经济布局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看,胡焕庸线基本上勾画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空间基础,东南侧的沿海地区是区域经济布局中最具成长性的轴线,西北侧的边疆地区生态地位更为突出,两侧形成了具有功能互补性的空间结构。沿海地区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为引领,依托其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和开放优势,持续提升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成为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沿边地区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导向,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逐步构建起以生态保护为核心、边疆安全为底线、特

色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我国正加快构建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区域协同机制。沿海地区通过产业转移、技术协作和制度创新,辐射带动沿边地区发展;沿边地区则通过生态产品供给、能源资源保障和开放通道建设,反哺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需求。这种基于功能分工、政策协同与要素流动的良性互动格局,不仅提升了国家空间治理的整体效能,也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因此,构建“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将有效满足经济社会现代化对空间效率、空间分工与空间协调的需求,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明确其战略定位,推动形成重要动力源、新的经济增长极、生态安全屏障等功能区相互支撑、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一格局的构建,不仅有助于提升地区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和效率,也为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支撑。

综合来看,我国沿边沿海地区已形成一定的功能互补格局,但二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和相互支撑仍需强化。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需要沿边地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资源保障和绿色发展支撑;沿边地区绿色发展也需要沿海地区在资本、技术、人才、市场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持续赋能。因此,仅对沿边地区或沿海地区进行局部优化,难以适应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从系统层面推动二者功能耦合与战略协同。

五、“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不仅是基于历史演进与现实需求提出的战略构想,更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学理支撑。这一格局是对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主体功能区理论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的融合运用与创新拓展,遵循点轴联动、空间演化的区域发展一般规律,以及经济与生态功能互补、发展与安全统筹协同的系统思维,共同构成“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的理论依据。

1. 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的轴带发展逻辑

学界对空间结构的类型及其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了诸如增长极理论、点轴系统论及“T”型空间布局、双核结构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中,点轴理论在中国的国土开发与区域规划中得到了充分应用与深化,其揭示了区域经济

从“点”状集聚,沿着交通干线、能源通道、信息网络等线状基础设施构成的“轴”线延伸,最终形成“点—轴”集聚带的演进规律(陆大道,2001)。“轴”不仅是连接“点”的通道,其本身也成为产业与人口的集中带,对两侧区域产生强大的空间吸引力与凝聚力,从而将单一的增长极提升为一条充满活力的发展走廊。“T”型空间战略,即以沿海地区为纵轴、长江流域为横轴,构建了全国层面的宏观发展骨架,便是点—轴系统理论在国家尺度上的成功实践。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空间结构理论需要进一步深化从而指导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一方面,既有理论主要关注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对国土空间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考量需要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在统筹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平衡开发与保护关系等方面缺乏系统性解决方案。在继承和发展已有空间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双弓弦”格局通过“点、轴、网”系统优化国土空间组织模式,将沿边地区和沿海地区联系起来,并依托胡焕庸线这一“弦轴”实现东西功能的系统链接,形成“双弓协同、一弦联动”的空间架构。

2.主体功能区理论的分类管控逻辑

主体功能区理论强调,不同国土空间因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强度、发展潜力和生态功能重要性不同,应在宏观尺度上进行功能识别、分类管控和差异化利用,避免各地区陷入同质化开发(樊杰,2024)。其核心在于依据区域主体功能确定开发强度、发展方向和保护责任,推动形成开发有序、保护有效、功能互补的国土空间格局。从理论内涵看,主体功能区理论强调以功能适宜性引导空间开发秩序,由经济发展空间、生态安全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战略保障空间等共同构成国土空间复合系统。“双弓弦”格局是主体功能区理论在沿边沿海地区的具体应用,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承担不同主体功能,形成功能互补的空间分工。沿海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程度高、产业基础雄厚、开放平台密集,适宜承担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功能,但也需要在高强度开发中强化集约利用和重点生态空间保护。沿边地区多处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边疆地区和资源富集区,生态敏感性和战略安全功能突出,适宜承担生态安全屏障、资源保障、边疆稳定和绿色转化功能,并在保护优先基础上推进重点口岸、边境城市和特色产业节点适度开发。

因此,“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以主体功能区理论为支撑,立足沿海沿边区域资源环境本底、开发适宜条件与国家战略定位构建差异化空间组织模式;通过共同弓弦连接经济发展空间与生态安全空间,促进二者相互支撑、功能互补和整体优化,从而实现分类管控、开发保护协调和国土空间优势互补。

3.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的系统保护逻辑

生态安全格局强调通过识别和保护对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与服务功能持续性具有关键作用的生态要素,构建一个功能完善、结构稳定的生态空间网络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并支撑可持续发展(彭建等,2017)。具体指由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提供可持续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空间要素所构成的空间格局,包括以点、线、网模式形成基本生态骨架(马世发等,2021)。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降低生态风险,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的抗干扰与恢复能力。生态安全屏障是维持区域内、外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复合体系,并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屏蔽和保护作用(傅伯杰等,2024)。根据不同区域生态功能定位,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防风固沙、草原修复和荒漠化治理等不同的特征与功能。在生态文明和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已成为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空间实践,也是实施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与差异化管控的关键路径,旨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生态安全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底线约束与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维度,要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进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沿边地区构建“点、线、网”相结合的弓形沿边生态轴带,发挥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键功能,能保障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和功能持续,支撑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双弓弦”格局融合了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的核心要义,强调在国土空间结构优化中不仅注重经济效率,更将生态系统完整性、服务功能持续性与空间韧性作为根本前提,推动形成“生态引领、轴带联动、区域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综上所述,“双弓弦”空间发展格局植根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主体功能区理论和生态安全格局理论,这些理论为沿边沿海地区联动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双弓弦”格局进一步以轴

带发展、协同联动和系统保护为原则,将生态维度嵌入区域空间结构,推动国土空间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统一;立足主体功能分工,促进沿海经济优势与沿边生态资源优势双向赋能;突出生态安全的底线约束和基础支撑作用,统筹发展和安全、保护与开发的动态平衡,从而为新时代沿边沿海地区优势互补和联动发展提供理论导则。

六、以“双弓弦”发展格局促进沿边沿海地区联动发展的实践路径

立足“双弓弦”空间格局“双弓协同、张力调控、强弓蓄势”的运行机制,紧扣沿海地区、沿边地区的功能定位,要从空间联通、产业协同、生态共治、开放联动、要素融通五大维度,构建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安全与发展协同的沿边沿海联动发展体系。

1. 筑牢空间骨架,构建互联互通的综合通道体系

以胡焕庸线为空间分异基准,打通沿边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空间联结,夯实“双弓弦”格局硬件支撑。一是完善沿边沿海联动交通网络。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核心打通横向动脉,依托中老铁路、中欧班列、沿边跨境公路铁路,有机串联沿海港口群、内陆枢纽城市与沿边口岸,打造“港口—腹地—口岸”铁海联运、一体化公铁联运通道,带动沿边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间贸易联系。同时,提质改造沿边沿海国道等骨干通道,强化沿海城市群、产业带与沿边开放节点的高效衔接,发展适配沿边地区的低空经济,破解地域广袤导致的冰山成本问题。二是布局数据要素流通网络。建设跨区域数据中心集群与信息共享平台,打通沿海与沿边政务、物流、通关、生态监测数据壁垒,实现要素流动可视化、监管协同化;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推动东部算力需求与西部绿电资源对接,以数字通道赋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三是优化国土空间管控衔接。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沿海地区聚焦优化开发,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与产业承载能力;沿边地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管控,形成“开发与保护梯度有序、沿边沿海功能互补”的国土空间格局。

2. 深化产业协同,打造沿边沿海互补产业链条

遵循主体功能分工的协同发展逻辑,推动沿海地区产业优势与沿边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构建错位

发展、联动增值的产业体系。一是实施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沿海地区聚焦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营销、现代服务业,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绿色制造型产业向沿边地区有序转移,共建“飞地园区”“跨境产业合作区”,实行税收分成、产值共享、利益共享机制;沿边地区依托生态资源、口岸优势,发展特色农林产品精深加工、清洁能源、跨境物流、民族文化旅游等产业,打造“东部研发+沿边制造”“东部市场+沿边产品”协同模式。二是培育生态经济融合业态。沿边地区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沿海地区提供技术、资本、市场支持,共建绿色产业链;推动沿海现代服务业与沿边生态经济、口岸经济协同,发展跨境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跨境电商,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三是推动口岸经济提质增效。依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保税仓储、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贸易服务,与沿海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联动,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提升沿边产业附加值与竞争力。

3. 强化生态共治,夯实沿边地区生态安全屏障功能

立足生态安全格局的系统保护逻辑,以沿边生态功能区为核心,构建沿边沿海生态共保、共治、共享机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底线。一是加快筑牢沿边生态屏障体系。聚焦东北森林草原、西北荒漠绿洲、青藏高原边境生态区、西南山地与喀斯特生态区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强化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提升沿边经济带弓体的厚度与韧度;建立沿边生态监测预警体系,运用大数据、遥感技术实现生态风险实时防控。二是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沿海与沿边地区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资金补偿、产业协作、人才支援、技术帮扶等方式,让沿海地区共享沿边生态服务价值,沿边地区获得生态保护长效资金;探索区域碳汇交易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沿边生态碳汇价值转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双赢。三是推进跨境生态协同治理。沿边地区加强与周边国家在跨境保护区建设、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共建跨境生态安全屏障;沿海地区输出生态治理技术与经验,助力沿边地区提升跨境生态共治能力,以生态合作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4.推动双向开放,形成陆海统筹开放联动格局

依托沿海开放高地与沿边开放前沿优势,构建双向开放、联动发展的开放体系,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新发展格局。一是开放平台协同联动。推动沿海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与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结对共建,共享开放政策、监管模式、招商资源;沿边口岸对接沿海港口,推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便利化措施,打造“沿海港口+沿边口岸”联动开放模式。二是深化跨境产业与贸易合作。沿边地区依托“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对接周边国家市场,发展跨境电商、边境互市贸易、服务贸易;沿海地区发挥国际市场链接优势,与沿边地区共建海外营销网络、跨境物流体系,推动沿边特色产品通过沿海港口走向全球,实现“沿边开放+沿海开放”优势叠加。三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沿边地区对标沿海地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简化跨境投资、贸易审批流程,扩大金融、物流等领域开放;沿海地区助力沿边地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沿海沿边协同联动、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

5.促进要素融通,激活沿边沿海发展内生动力

打破区域要素流动壁垒,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在沿边沿海顺畅流动、优化配置,为“双弓弦”格局注入活力。一是推动人才双向交流赋能。建立沿海与沿边人才挂职、培训、柔性引才机制,东部选派科技、管理、规划人才支援沿边,沿边选派干部、技术人才到沿海学习;推行跨区域职称互认、社保接续,配套人才激励政策,吸引人才向沿边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口岸建设领域集聚。二是推动科技成果跨区转化。沿海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与沿边地区共建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推动新能源、生态修复、现代农业等技术向沿边转移;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共享机制,鼓励沿海企业以技术入股、合作研发等方式,助力沿边产业绿色升级。三是推动金融协同精准支持。引导东部资本投向沿边生态项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鼓励东部金融机构在沿边设立分支机构,创新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绿色金融产品,破解沿边融资难题。

注释

①本文沿海地区范围参考孙久文等(2021)的研究进行界定,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江苏省、

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等12个省级行政区。②本文沿边地区范围参考肖金成等(2024)的研究进行界定,以抵边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共包括45个抵边地级行政区,其中地级市25个、地区8个、自治州9个、盟3个。

参考文献

- [1] Cheng Y, Xu Z, Liu 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global border regions [J]. Science, 2024, 384 (6702): 1309.
- [2] 周平.边疆治理:一种中国式治理类型的凸显[J].学术探索,2025(10):1-12.
- [3] 孙久文,蒋治.中国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J].地理学报,2021,76(2):277-294.
- [4] 孙久文.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
- [5]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J].地理学报,1935(2):33-74.
- [6] 陈栋生.(二)我国工业地区布局的现状与调整方向[J].工业技术经济,1985(2):19-24.
- [7] 陆大道.二〇〇〇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J].地理科学,1986(2):110-118.
- [8] 刘再兴.九十年代中国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的协调发展[J].江汉论坛,1993(2):20-25.
- [9] 陆玉麒.区域双核结构模式的形成机理[J].地理学报,2002(1):85-95.
- [10] 魏后凯.区域开发理论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1988(1):16-19.
- [11] 魏后凯.我国宏观区域发展理论评价[J].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0(1):76-80+83.
- [12] 吴传清,孙智君,许军.点轴系统理论及其拓展与应用:一个文献述评[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2):30-36.
- [13]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14] 宁吉喆.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和政策[J].中国投资,2001(9):13-14.
- [15]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
- [16] 刘志彪.理解高质量发展:基本特征、支撑要素与当前重点问题[J].学术月刊,2018,50(7):39-45+59.
- [17] 杨开忠,范博凯,董亚宁.空间品质、创新活力与中国城市生产率[J].经济管理,2022,44(1):47-64.
- [18] 方创琳,张国友,薛德升.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J].地理学报,2021,76(12):2898-2908.
- [19] 张可云,冯晟,席强敏.东西部协作政策效应评估: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12):61-79.
- [20] 陆铭,向宽虎,李鹏飞,等.分工与协调: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理论与新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23(8):5-22.

- [21]林坚,张瑜.从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兼析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下的国土空间治理趋向[J].中国土地科学,2024,38(1):1-8.
- [22]贺灿飞,任卓然,王文字.“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J].地理学报,2022,77(6):1339-1358.
- [23]曾刚,王丰龙.长三角区域城市一体化发展能力评价及其提升策略[J].改革,2018(12):103-111.
- [24]樊杰.“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的经济地理学讨论[J].经济地理,2024,44(8):1-7.
- [25]樊杰,周侃.以“三区三线”深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理论思考与路径探索[J].中国土地科学,2021,35(9):1-9.
- [26]傅伯杰,刘焱序,赵文武,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优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39(11):1882-1893.
- [27]林坚,高远,赵晔.空间开发权视角下的国土空间治理探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6):1393-1402.
- [28]郭树华,杨泽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时代我国沿边区域开放空间格局优化升级战略研究[J].财贸研究,2021,32(12):29-36.
- [29]肖金成,马燕坤.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4,38(4):19-26.
- [30]赵璐,赵作权,王伟.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变化[J].经济地理,2014,34(2):14-18+27.
- [31]杨敏,杨筱明.知遇历史:陆海双轴的国家政略新均衡态势:“一带一路”蕴含的深度互构与新发展主义[J].思想战线,2018,44(2):162-172.
- [32]王心源,郭华东,骆磊,等.从“胡焕庸线”到“美丽中国中脊带”:科学认知的突破与发展方式的改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9):1058-1065.
- [33]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和“T”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J].地理学报,2001(2):127-135.
- [34]古恒宇,张亮,于瀚辰.高技能人才分布格局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J].地理学报,2025,80(6):1465-1481.
- [35]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 [36]陈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10):89-101+184-185.
- [37]方盛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建城戍边方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2):1-10.
- [38]魏后凯,年猛,李玢.“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0(5):5-22.
- [39]彭建,赵会娟,刘焱序,等.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7,36(3):407-419.
- [40]马世发,劳春华,江海燕.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理论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模拟: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生态学报,2021,41(9):3441-3448.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Double-Bow-and-String” Spatial Pattern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s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Zhou Xianneng Teng Xianghe Wen Chuanhao

Abstract: Achieving coordinated territo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across China’s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constitutes a critical pillar for building the nation’s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Drawing upo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underpinning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ouble-Bow-and-Str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the borderland and coastal areas constituting the two bows and the Hu Huanyong Line serving as their shared string. It further elucidat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characterized by “dual-bow synergy, tension regulation, and bow-strength accumulation.” This spatial pattern facilitate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mplifies the synergy of overlapping regional strategies, integrate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mperatives, and advanc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rationale for this pattern rests upon three interrelated logics. Historically, it reflects 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from balanced development to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rom purely economic layout to integrated development-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from military-agricultural colonization to ecologically oriented border governance. In practical terms, it arises from the deepening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of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the imperative for reciprocal synergistic empowerment, and the contemporary demand for dual-axi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se two belts. Theoretically, it is grounded in the axis-corridor development logic of spatial structure, the category-based governance logic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 and the systemic conservation logic of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s. Operationalizing the “Double-Bow-and-String” pattern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borderland and coastal regions requires consolidating the spatial framework, deepening industrial synergy, reinforcing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dvancing two-way opening-up, and facilitating the unimpeded flow of production factors.

Key Words: Border Regions; Coastal Regions; “Double-Bow-and-Str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Hu Huanyong Line
(责任编辑:文 锐)

【东西部协作研究专题】

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战略意义与 推进路径*

席强敏 李甜

摘要: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政策工具,东西部协作正由阶段性攻坚任务向长期性制度安排深度转型。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联动发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揭示了东西部协作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使命赓续、从阶段性攻坚到常态化帮扶的制度转型、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的发展要求等阶段特征,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结对梯度失衡、产业衔接不紧、市场机制偏弱、激励机制不足等现实挑战,并从重塑空间格局、提升产业层级、畅通市场机制、完善制度供给四个维度提出了实践路径。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必须深刻把握其内在逻辑,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破解突出矛盾,推动东西部协作模式从任务驱动向实效驱动迭代升级,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展现更大作为。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64-07 **收稿日期:**2026-06-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演化机制与调控策略研究”(25&ZD122)。

作者简介:席强敏,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李甜,女,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北京 10087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东西部协作正由阶段性攻坚任务向长期性制度安排深度转型。实践证明,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缩小地区差距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创了中国式横向资源转移与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新范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帮扶方式”。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

发座谈会上进一步要求“完善东西部协作机制,深化对口支援、定点帮扶”。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明确“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这一系列重大部署,为东西部协作的持续深化提供了根本遵循。202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为新起点上如何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方向。

“十五五”时期,如何深刻把握常态化帮扶的内在规律,主动适应形势任务的新变化,着力破解协作进程中的突出矛盾,推动东西部协作从“单向输血”向“双向赋能”迭代升级,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课题。

一、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战略意义

历经三十年实践探索,东西部协作已从针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任务,升级为“十五五”时期支撑区域协调、要素融通、市场统一、共同富裕的常态化治理工具。系统把握其内在逻辑,深刻认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价值,对常态化做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工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1.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

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孙久文等,2023;董雪兵,2026)。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差异显著,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从而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创新资源;西部地区则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东西部协作正是立足这一基本国情,通过制度性安排将东部的优势与西部的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生产力布局,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张可云等,2023;张可云,2024)。

从实践来看,东西部协作以结对关系为纽带,以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为主要内容,有效促进了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一批共建产业园区在西部落地生根,一条完整产业链在东西部之间延伸、拓展,一批农村劳动力通过劳务协作实现稳定就业——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有力印证了东西部协作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十五五”时期,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主体功能区制度的不断完善,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将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2.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是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重要抓手

区域联动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实现合作共赢(徐丽珊,2024)。东西部协作从最初的单

向帮扶、资金援助,逐步发展为双向互动、优势互补,再到如今的产业协同、市场共建,这一演进过程是区域联动发展机制持续创新的生动写照,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合作从“输血”到“造血”、从“帮扶”到“协作”的深刻转变。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东、中、西、东北地区产业协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进一步明确了东西部协作在区域联动发展中的制度功能。当前,东西部协作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在组织层面,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协作格局;在内容层面,从传统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拓展为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的协同发力,可预期、可持续的协作生态正在逐步形成;在方式层面,从行政推动为主转向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从“点对点”帮扶转向“面对面”合作,特别是“飞地经济”“反向飞地”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席强敏等,2025),东西部协作的内涵和外延持续丰富。这些机制创新,为深化区域联动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也为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联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3.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有效路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席强敏和冯晟,2025)。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阻隔和地方保护等因素,我国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制约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东西部协作以结对关系为桥梁,以合作协议为载体,以利益联结为纽带,有效促进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联通、规则衔接和要素流动,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通道。

深化东西部协作,本质是以制度化协作打通要素、商品、服务跨区域循环堵点,将东西部互补优势转化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竞争优势(张可云等,2023)。一方面,东西部协作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共拓销售市场、共享物流网络,打破了地理空间对市场范围的限制,推动西部特色产品进入东部广阔市场,促进东部优质资源向西部梯度转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供需匹配和产销对接。另一方面,东西部协作通过对接营商环境标准、衔接公共服务政策、联通基础设施网络,逐步消减了区域之

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累了区域合作经验。“十五五”时期,随着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速度加快,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将在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4.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孙久文等,2023;贾若祥,2023)。东西部地区存在发展差距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东西部协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和改善当地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王小林等,2022),通过先富帮后富、东部带西部,助力西部地区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中持续贡献力量。面向现代化新征程,区域差距仍是制约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唯有常态化深化东西部协作,不断缩小东西发展鸿沟,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红利,方能稳步迈向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二、东西部协作的阶段特征与发展要求

自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启动以来,其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治理模式随时代发展持续演进,始终紧扣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不同使命任务,呈现出差异化的阶段特征。准确把握其历史方位、制度内涵与发展趋势,是常态化做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工作的基本前提。

1.演进过程: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使命赓续

从东西部协作的发展历程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6—2011年的扶贫协作阶段。1996年,中央确定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区域帮扶进程。这一时期,东西部协作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

核心目标,以财政转移支付、干部人才派驻、基础设施援建为主要手段,重点将“先富带后富”的稳定结对关系建立起来,形成了“输血式”帮扶的基本格局。第二阶段是2012—2020年的脱贫攻坚阶段。中央调整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优化帮扶布局(梁琴,2022)。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东西部扶贫协作实现了由“柔性倡导”到“刚性制度”的重要战略转向。这一阶段,协作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帮扶力度持续加大,东西部协作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关键支撑。第三阶段是2021—2025年的过渡期阶段。2021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东西部扶贫协作”正式更名为“东西部协作”,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东西部协作的工作重心从“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协作内容从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向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全面拓展。

2026年,东西部协作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使命任务进一步聚焦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扶贫协作”到“东西部协作”的名称之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任务之变,从过渡期到常态化的阶段之变,东西部协作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治理模式随时代发展持续演进,但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始终如一。

2.制度转型:从阶段性攻坚到常态化帮扶的深刻变革

东西部协作的制度转型,本质上是从“运动式”攻坚向“制度化”治理的深刻变革。脱贫攻坚期间,东西部协作实行严格的考核评估和限期达标机制,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和任务属性。各级帮扶主体围绕脱贫摘帽这一核心目标,集中资源、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打攻坚战,形成了高效有力的组织动员体系。这一制度安排在短期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也存在协作内容相对单一、市场机制发挥不足、内生动力培育不够等局限。

进入过渡期后,东西部协作的制度逻辑发生显著变化。“十五五”时期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城镇化进程放缓叠加人口总量

下降、破解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困境、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需要新思路等新挑战(李晨等,2026)。这些挑战在东西部协作领域集中表现为一系列转变要求。一是目标导向从“限期达标”转向“持续巩固”,考核重点从脱贫人口数量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际成效;二是时间维度从“阶段性任务”转向“长期性安排”,协作关系不再因脱贫摘帽而终止,而是建立稳定持久的结对机制;三是动力机制从“行政推动”转向“市场主导”,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四是内容边界从“特惠性帮扶”转向“普惠性发展”,协作领域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拓展到全体农村居民,从农村拓展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这些转变既是对过渡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对常态化帮扶阶段制度需求的主动回应,为东西部协作的深度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3.发展要求: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的迭代升级

东西部协作的发展取向正经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范式转换。传统帮扶模式下,东部主要扮演“援助者”角色,通过资金注入、项目援建、人才派驻等方式支持西部发展;西部则主要作为“受援者”被动接受帮扶资源。这种定向输送方式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但也容易造成路径依赖,制约西部地区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互”系统阐释常态化的方向——“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六个“互”字,深刻揭示了常态化帮扶阶段东西部协作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其一,产业协作双向赋能。东部向西部梯度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西部向东部输出清洁能源、特色农产品、生态产品等,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其二,要素流动双向激活。东部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向西部流动,西部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市场潜力等要素向东部释放,实现要素配置的优化重组。其三,创新合作双向发力。共建“飞地经济”“反向飞地”等平台,推动东部创新资源与西部应用场景深度对接,形成“东部研发+西部制造”“东部市场+西部基地”等协作新模式。其四,民生福祉双向提升。协作成果从惠及西部脱贫群众拓展到促进东部参与企业发展和当地居民就业,形

成互利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其五,人文交流双向互融。依托干部人才双向挂职、教育医疗组团帮扶等制度化通道,增进东西部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求区际要素流动从经济理性到文化认同的双重驱动(安晓明等,2025)。这意味着东西部协作不仅要实现产业与要素层面的互通,更要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等文化认同层面形成深层合力。

面向“十五五”,东西部协作必须更加注重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更加注重构建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更加注重拓展科技、金融、数字等新兴协作领域,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共同繁荣。

三、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关键挑战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协作机制、政策工具与治理体系仍面临深层次矛盾。东西部地区相对差距虽整体保持缩小态势,但缩小速度明显放缓,呈现小幅反弹趋势(李晨等,2025)。西部地区投资难以延续高速增长、出口贸易遭遇压力、产业体系竞争力有待提高等现实挑战依然严峻。系统梳理当前东西部协作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难题,是精准施策、提质增效的前提和基础。

1.结对梯度失衡:“穷帮穷、富帮富”削弱协作效能

现行对口支援总体上遵循经济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逻辑,但从各层次结对关系上看,仍在一定范围内呈现“穷帮穷、富帮富”的特征。在省级层面,东中部经济相对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西部经济相对发达省市,而东中部经济相对落后省市却对口支援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省市。以对口支援西藏为例,拉萨和日喀则作为西藏相对发达的地区,由北京、江苏、上海和山东四省市支援;而阿里地区作为重度欠发达地区,却由同样面临转型发展任务的河北和陕西支援。在地级市层面,类似特征同样突出,如山东对口支援西藏中,青岛对口支援桑珠孜、淄博对口支援昂仁,由于各支援省市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导致不同受援地实际获得的支援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同时,承担支援任务的省市之间缺乏实质性协同,“多帮一”的结对格局难以实现“1+1>2”的加成效应。这种梯度失衡的结构性

矛盾,不仅造成帮扶资源的错配浪费,更削弱了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效能,亟待通过优化结对关系来破解。

2.产业衔接不紧:“重扶持、轻发展”制约内生发展

随着帮扶目标从脱贫摘帽转向共同富裕,协作任务从阶段性攻坚转向长效化治理,传统路径依赖与新型发展需求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吴丰华等,2025)。从协作资金的分布来看,协作资金中用于产业发展项目的资金占比相对较高,但缺乏对标杆性协作项目的系统谋划和创新突破。一些协作项目未能真正激发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外部帮扶资源与本地要素的深度融合不足。产业扶贫是“重点聚焦人”的政策,为脱贫攻坚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乡村产业振兴则是“重点聚焦地区”的政策,两者在政策逻辑与战略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席强敏等,2023),这一差异在实践中表现为产业扶贫项目与乡村产业振兴需求之间的衔接不畅。从协作资金的流向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资金倾向于对重点帮扶县倾斜。这导致脱贫攻坚期间实施的大量产业扶持项目,特别是东部为帮助西部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而实施的项目,普遍存在产业链条偏短、本地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协作双方在产业协作领域仍较多停留在传统的、初级的加工制造业或种植业领域,较少涉及高附加值、高级业态的产业协作,产业的投资效益和业态层级需要进一步提升。部分协作项目未能真正激活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外部帮扶资源与本地要素的深度融合不足。这种“重扶持、轻发展”的倾向,制约了产业协作从“输血”向“造血”的有效转化。

3.市场机制偏弱:缺乏完备的退出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在政策执行中,自发性的要素流动和市场机制发育不足,导致协作双方协调发展的纵深性不够。脱贫攻坚期间,东部省份向西部结对帮扶省份投入了大量帮扶资金,在产业协作领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项目和资产,这些项目的后续衔接和管理问题仍需要持续关注。一方面,结对帮扶关系调整后,已在西部落地的项目和企业面临与新结对关系衔接的难题,包括与新的协作组织领导小组重新建立联系、现有产业项目经营融入新协作框架等问题;另一方面,已完成协作使命、不再继续协作的关系中,已建成产业项目的后续发展和经营状况同样需要

持续关注。市场机制发育滞后带来的退出机制缺失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协作效能纵深推进的重要瓶颈。

4.激励机制不足:利益分配与考核机制驱动乏力

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是制约深度协作的关键症结。东西部结对省份间的利益联结较为松散,缺乏高层次、可操作的制度化安排,跨省合作双方在税收分成、统计核算、数据共享等关键环节缺乏稳定保障。行政指令惯性过强,工作推进较为依赖对方自觉或临时性协调,影响了深度合作的意愿。相比省内市县间较为成熟的利益分配机制,省份间利益分配机制涉及省级行政区层面的统计分算与税收分成,面临较高的协商成本,需要中央和省级层面的统筹支持。与此同时,现行考核评估机制驱动力不足,考核指标体系仍偏重短期,更关注资金投入量、项目数量、人员派遣规模等易量化指标,对于产业协作可持续性、受援地区产业链完整度以及技术进步、管理模式优化等“软性”成果关注不够,需要推动考核评估从重视“发展完成度”到“长期贡献度”的跃升。此外,考核评估中还需协调好“帮”与“被帮”、“多帮一”和“一帮多”的复杂关系,更精准地评估西部地区的“主体责任”履行情况,针对不同帮扶关系构建差异化的评估体系。利益联结松散与考核短期化相互叠加,导致协作双方“重签约、轻履约”“重开工、轻运营”,影响了协作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四、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推进路径

“优化结对关系,深化结对帮扶”是东西部协作政策的发展方向。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东西部协作亟须确定更优的结对关系,构建梯次有序的结对清单,优化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的空间格局,更好地发挥施援县对受援县的帮扶效应,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1.重塑空间格局:构建优势互补、梯次有序的协作体系

优化东西部协作政策空间布局,构建全方位覆盖的新格局和梯次有序的结对清单。一是完善省际结对关系,优化县际结对清单。充分考虑地区间发展差距、资源禀赋、产业互补性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按照精准匹配的理念,确保“最落后的地

区由最发达的地区支援”,提高协作帮扶的精准性、互补性和有效性。通过对结对关系的重新调整,逐步形成“富帮穷、次富帮次穷”的对口支援基本工作格局。但需警惕结对双方间过大的发展差距可能导致产业梯度落差过大,从而无法有效发挥产业协同效应并引导受援地区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因此在优化结对关系时,还应综合考量产业互补性、地理距离等其他因素。二是遵循市场原则优化配对关系。基于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的考虑,在已有省份结对关系的基础上,鼓励省内各地市自主遴选帮扶对象,省政府做好平台搭建、加强协调与审批监督工作,以实现帮扶中的“东西互利”。三是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协作帮扶。政策和资金支持应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针对其特殊性制定个性化帮扶举措,确保政策方案接地气、能执行、出效果。通过空间格局的系统性重塑,推动协作资源从“撒胡椒面”向“精准滴灌”转变,提升结对帮扶效能。

2.提升产业层级:打造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协作业态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核心领域,是增强受援地区造血功能的关键。一是升级协作产业的业态层级,谋划一批高级优质的产业园区标杆项目。以西部省(区、市)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为重点,承接东部省市相关产业梯度转移,谋划设立一批标志性的东西部协作产业园区项目。围绕受援地重点产业,进一步引导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企业入驻,深度融入受援地重点产业分工,实现从项目支援到产业体系构建的升级,提升结对帮扶的系统性。二是以跨区域合作园区为突破口,将单向的帮扶支援拓宽为双向的互利协作。跨区域合作园区建设有利于统一部署跨区域的产业协作体系,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合作共赢。在合作园区建设中,围绕产业协同、科创联动、生态共建等内容,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核心抓手,以畅通产研衔接为主攻方向,以新兴技术为有力辅助,以绿色发展为基本遵循,推动合作园区成为结对省份合作共赢的载体。三是加强特色农业、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等多领域产业合作。鼓励东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到西部参与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基地建设;鼓励结对省区重点企业共建平台、应用推广中心,加速工业互联网技术产品创新;依托结对省区旅游资源,强化双方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建设。通过产业层级的跃升,推动

东西部协作从“项目搬运”向“产业共建”、从“要素嫁接”向“创新协同”转型。

3.畅通市场机制:构建数字赋能、要素畅通的协作格局

要素流动是东西部协作政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一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催化远程协作。鼓励结对省区依托合作产业园共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常态化开展产业发展线上帮扶,实现协作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抢抓“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机遇,探索培育数据算力迁移、数据渲染等新兴产业。融合“数字+”建设,鼓励东部地区信创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子公司或与西部地区企业合作,鼓励结对省区本土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双向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代表性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二是推动东部创新成果在西部地区的匹配转化,构建“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的新格局。探索推进技术创新的对口帮扶,鼓励跨区域合作园区采取“先发地区技术—后发地区生产”模式,通过异地研发分支机构建设、跨区域技术转让等方式,引导创新成果向西部受援地区转移转化。探索柔性引才模式,采用挂职兼职、项目合作、“周末工程师”等方式,让各类外部人才直接参与具体技术研发,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与施援地的“智力资源共享”。通过建立高级别协调平台、健全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联合编制技术发展规划等措施,保障技术创新对口帮扶持续高效推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关键作用,使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进而实现西部地区资源、劳动力等优势与东部地区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的高效嫁接。

4.完善制度供给:建立收益共享、考核互认的协作机制

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要保障对口帮扶机制的高效运行,需要对口支援由指令推动转向自愿推动,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多方主体的利益相一致,形成内生性的持久动力机制。一是创新利益分配机制,破解统计核算难题。由双方省区政府积极磋商,面向由施援地推荐落地的企业或项目,实施财税分成、统计分算“双管齐下”利益共享机制,打通制约跨省合作园区发展的行政壁垒。二是制定激励相容的考核评估制度,激发内生动力。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东西部协作考核评估制度,处理好“中央政府—支援方—受援方”的三方关系。持续优化

考核指标和办法,定期从严对各地政府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估,将考核重点由东部投入强度转向东西协作效能,建立“基础性指标+发展性指标”的双层架构,促进东西部协作实效的稳步提升。同时,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关激励措施,给予积极开展对口帮扶的先行省市以资金和政策支持,形成“胡萝卜+大棒”的激励—惩罚机制。在中央制定的总体政策框架下,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性和创造空间,激励地方开展对口合作的方式方法创新,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考核互认”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 [1]安晓明,张可云,刘夏.人文经济学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J].改革,2025(10):56-66.
- [2]董雪兵.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N].人民日报,2026-02-24.
- [3]贾若祥.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N].经济参考报,2023-04-11.
- [4]李晨,张可云.中国东西经济差距变迁的总体趋势、驱动机制及政策建议[J].河北学刊,2025,45(5):142-151.
- [5]李晨,张可云.“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与建议[J].广东社会科学,2026(1):56-65.
- [6]李强.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7]梁琴.由点到网: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J].公共行政评论,2022,15(2):133-153+199.
- [8]孙久文,史文杰.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3(2):5-11.
- [9]孙久文,王邹,蒋治.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区域协调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3):1-10.
- [10]王小林,谢妮芸.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J].探索与争鸣,2022(3):148-159+180.
- [11]吴丰华,王寿彭,张雨.东西部协作的历史演进、绩效评估与长效机制构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5(1):5-16.
- [12]席强敏,冯晟.全方位高质量推进东中西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N].河南日报,2025-02-28.
- [13]席强敏,张颖,张可云.产业扶贫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关系辨析与衔接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7(2):55-65.
- [14]徐丽珊.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4,40(6):102-110.
- [15]张可云,冯晟,席强敏.东西部协作政策效应评估: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12):61-79.
- [16]张可云.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成效与发展趋势[J].人民论坛,2024(3):40-44.
- [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Z].2021.
- [18]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Z].2021.
-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Z].2026.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on Path of Normalizing East-West Collaboration

Xi Qiangmin Li Tian

Abstract: As a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tool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a phased key task to a long-term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Normalizing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acilitating interconnec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the continuation of its mission from phased campaigns to normalized as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shifting from one-way assistance to mutual empowerment. It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such as imbalances in pairing gradients, loose industrial connections, weak market mechanisms, and inadequate incentive mechanisms.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practical paths from four dimensions: reshaping spatial patterns, upgrading industrial levels, smoothing market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To normalize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grasp its inherent logic, actively adapt to new changes in situations and tasks, focus on resolving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promote the iterative upgrading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models from task-driven to effectiveness-driven, and demonstrate greater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 Words: East-West Collaboration; Normalized Assistanc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江 夏)

【东西部协作研究专题】

东西部协作促进受援县共同富裕研究

——基于西南地区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

何雄浪 卢玲

摘要:东西部协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本文运用2000—2023年西南地区407个受援县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东西部协作政策显著提升受援县共同富裕水平,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处理(PSM-DID和安慰剂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帮扶时长超过8年的县域、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高的县域、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有效。机制检验表明,东西部协作可以通过改善政府财政自给度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共同富裕;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西部协作政策不仅对受援县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提升。

关键词:东西部协作;共同富裕;政府财政自给度;人力资本积累;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71-14 **收稿日期:**2026-04-13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 西昌市共同现代化研究院项目“凉山州文旅融合赋能共同富裕研究”(XCZD202606)。

作者简介:何雄浪,男,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225)。

卢玲,女,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吉利学院商学院讲师,通信作者(成都 61022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①。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及历史积淀等因素制约,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依然客观存在(安树伟等,2023),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瓶颈(欧健,2022)。为破解这一发展难题,更有效地缩小不同区域、不同主体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持续调整生产力布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相继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东西部协作^②政策正是从对口支援政策逐步演进而来,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政策安排。选择西南地区县域层面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基于其独特的典型性与复杂性。西南地区作为东西部协作政策的主要受援区域,密集交织着上海结对云南、浙江结对四川等深层次跨区域协作网络,既是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战场,也是观察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的重要窗口。从全国范围的财政援助资金看,仅2022年施援省份拨付财政援助资金约230.89亿元^③,东西部之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直接弥补受援县财政收入和公共服务的短板。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从2000年的不足2000元飞跃至2024年的2万元左右。尽管东西部协作

力度投入大且成果丰富,但西南地区仍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约束,也仍存在着政策依赖与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的困境(汪为,2025),因此深入探究东西部协作对西南地区受援县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特色区域治理政策,东西部协作是弥合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199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的通知》,开启东部地方政府大规模对口扶贫协作的进程(王禹瀚,2022)。2020年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之后,2021年开启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新阶段。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④。从演进脉络看,协作的目标由解决温饱与绝对贫困,升级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协作模式由早期的“政治性馈赠”转向“政治性复合”的伙伴联盟与网络化协作(吴光芸等,2026;梁琴,2022),其核心在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动员优势,通过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补齐市场失灵,破解受援县长期存在的物质资本匮乏与人力资本短缺难题,从而在制度层面筑牢受援区域通往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丁忠毅等,2023;徐丽珊,2024)。经过多年的探索,协作帮扶模式有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协作、医疗协作、人才协作、生态帮扶等多种(温士贤,2024;贾男等,2025),经历以“输血式”协作为主,聚焦于人才、劳务、产业、消费和教育等方面的帮扶协作,到东西部县域范围内的结对关系下沉,逐步向“造血式”转变,形成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协作大格局(徐丽珊,2024),实现从单向扶贫向共同富裕协同的范式跃迁。

现有文献对共同富裕和东西部协作的研究较多,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三支:一是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有研究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厘清人民性、共享性、发展性和安全性四大维度的设计标准(蒋永穆等,2022),也有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大维度开发三级指标模型(陈丽君

等,2021),还有基于人民幸福感,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纳入评价框架,并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万广华等,2023)。二是东西部协作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驱动机制。张可云等(2023)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政策显著促进结对县间的要素流动,促进受援县产业结构优化,增强结对县间产业结构互补性,有效缩小受援县与其省会城市的发展鸿沟。李磊等(2025)认为三峡工程中的对口支援政策显著推动受援助地区的经济增长,通过“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深度结合,优化了受援地区的产业结构,降低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此外,在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投入能显著增强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亢延锟等,2023;温涛等,2024)。对西南地区而言,借力“数智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以时间上的压缩形式和幅度上的跨越形式,促进数据要素集聚融通与各生产要素协同配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吴韬等,2023)。三是共同富裕的空间演变及收敛特征的刻画。有研究构建包含富裕和共享程度的24项指标发现,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陈钰芬等,2023)。徐振宇等(2024)采用宏观与微观匹配数据分析发现,尽管省际与区域间共同富裕指数呈收敛趋势,但省级富裕性指数与共享性指数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且南北差距呈现扩大态势。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仍存在有待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其一,尽管学界对共同富裕和东西部协作分别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东西部协作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李磊等(2025)的研究。其二,虽然关注空间演变特征及空间溢出的研究也较多,但大多从省域或者地市级层面展开研究,缺乏从县域层面研究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如陈钰芬等(2023)、徐振宇等(2024)从省域层面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及空间关联特征、收敛进行了分析,覃成林等(2017)从全国285个地级市层面研究先富地区通过其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李加林等(2025)则从浙江省各地级市层面研究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及演变趋势。由此,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是拓展

考察西南地区407个县域样本,实证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受援县共同富裕效应的研究,并从政府财政自给度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揭示政策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二是考虑到受援县帮扶时长、区域内发展的均衡程度和人口规模存在差异,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较短和较长帮扶时长、基尼系数高和低、人口规模大和小的县域进行异质性分析,这可为制定差异化的东西部协作政策以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现实依据;三是探讨东西部协作政策促进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东西部协作受援县域的空间矩阵,分析东西部协作政策对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识别政策在经济地理维度的虹吸风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东西部协作作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其本质是通过行政性的资源分配与市场化的要素流动,对欠发达地区的成长路径进行空间重构。这一进程旨在打破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造成的锁定效应,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并最终通过增长极的扩散效应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一)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

东西部协作作为实现先富带后富的重要制度安排,其目标是通过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受援县提升富裕水平并优化分配共享。东西部协作通过横向资源注入与空间再分配,对受援县共同富裕水平产生直接效应。一方面,协作政策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与跨区域资本流动提升受援县的富裕水平。西部受援县普遍面临由于地理阻隔和历史积淀导致的资本匮乏,难以跨越低水平发展的陷阱。施援地资本、技术与管理等现代要素的空间逆梯度流动(张可云等,2023),打破了受援县内源性资本积累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园区共建与产业对口帮扶,东部先进要素与西部受援县的土地、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实现空间深度耦合(曾水英等,2019),这不仅重塑了受援县的生产函数,更显著提高了其资本—劳动比。生产率的提升在微观层面表征为高效产业项目的落地,从而释放出大量非农就业岗位,直接带动受援地居民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改善,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协作机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空间溢出效应强化了共同富裕的“共享”属性。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是打破马太效应,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普惠与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协作资金与“组团式”医疗、教育帮扶直接作用于受援县的民生薄弱环节,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了当地公共服务的最低水位线(温涛等,2024),有效缓解了因病、因学致贫的阶层固化风险,强化了社会保障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功能。同时,跨区域的市场对接与制度协同缓解了受援地的资源错配,使得多维度的技术溢出、经营理念逐步转化为受援县的内生增长动能(汪为,2025)。这种由“输血”向“造血”的演化,不仅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与协调性,更让发展成果广泛惠及基层群体,在富裕的基础上更具共享性。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东西部协作能够显著提升受援县共同富裕水平。

(二)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

东西部协作不仅通过直接的资源转移支付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变受援地的生产条件与制度环境,激发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下,这种跨区域协作机制主要通过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与提升人力资本两个机制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东西部协作对受援县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如下:

1.政府财政自给度的改善机制

东西部协作通过优化受援县的政府财政自主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深层的制度保障与持续的财力支撑。长期以来,西部受援县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税基薄弱,普遍面临高支出责任、低财政自给的困境,面临着财政收入规模小与民生支出压力大的矛盾,这种较低的财政自主度严重制约地方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提供均衡公共服务方面的统筹能力。首先,东西部协作通过横向转移支付与资源注入,缓解受援地的财政挤出压力。东西部协作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投资,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生产的物质资本稀缺问题(伍文中,2012),增加政府财政的支配资金,改善政府财政自主度。同时,对口支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显著降低纵向财政失衡,横向财政失衡程度也有所缓解(孙开等,2023)。其次,协作机制通过税源植入与产业反哺实现受援地财

政自给能力的内生增长。区别于传统的单向捐赠,东西部协作更侧重于通过园区共建、产业链迁移等方式,将东部成熟的经营模式与高附加值环节嵌入受援地。当产业聚集效应显现后,当地工业增加值与商业税收随之增长,使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从依赖上级补助向依赖常态化税源转型。这种由产业发展带动的税源培植,使得受援地政府的自有收入增速能够覆盖协作项目的维护成本,进而从根源上提高财政自给度。最后,财政自给度的提升强化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环节调节共同富裕的主动权。这种财政自主权的提升,使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能力去开展普惠性民生工程,通过完善托底性保障与公共基础设施,在二次分配环节有效缩小群体与城乡差距(张可云等,2023;徐明等,2018)。这种基于财政自给度改善的治理优化,确保共同富裕不仅是总量上的增长,更是分配机制上的公平与可持续。

基于上述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a: 东西部协作通过改善政府财政自给度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2. 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Mankiw et al., 1992),也是受援县实现内生性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不仅能直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善教育环境和降低受教育成本,产生显著的人力资本形成效应(张彬斌等,2015)。在东西部协作框架下,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教育领域的投入资金增加带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协作资金通过建设学校、提供助学资助,降低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提高青少年入学率与平均受教育年限,从而提升当地人力资本的初始存量(亢延锟等,2023)。二是教育收益的外溢引致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东部教育资源的“组团式”帮扶,如领导干部双向挂职、教育帮扶等方式,优化受援地人力资本结构(王寿彭等,2025),提升受援地教育质量,这种质量的提升使得教育的回报率增高,诱发家庭自发性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三是吸引更多自由企业家。在市场机制下,企业家作为理性的投资主体,其流动决策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实际收益的持续追逐(何雄浪等,2022)。东西部协作初期虽依靠政策引导实现资本跨区域流动,但更通过提升受援县的技能劳动者供给,系统性地降低企业的人才

搜寻与技能培训成本。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受援县不仅具备成本优势,更具备与东部资本相匹配的技能支撑,这种人力资本收益率的边际提升,促使企业家从最初的响应帮扶政策转向锁定人才红利,诱发资本在受援地的扩张与长期留存。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提升劳动生产率,更为贫困群体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亢延锟等,2023;张彬斌等,2015)。这三种长期的人力资本形成,是受援县从“输血式”富裕转向“造血式”共富的逻辑支点。

基于上述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2b: 东西部协作通过促进受援县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三) 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外溢效应

东西部协作不仅通过行政力量实现精准对口,更作为一种打破行政壁垒的跨区域制度创新,在地理空间上产生复杂的关联效应。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下,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是实现生产效率趋同与共同富裕的前提(Romer, 1986)。东西部协作通过引导资本、人力资源及数字要素向受援县集中,其政策红利不仅作用于受援主体,更会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对周边区域的共同富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张桂文等,2023)。具体而言,东西部协作的空间影响存在“虹吸”与“扩散”的动态博弈。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Krugman, 1991),在协作初期,受援县作为政策红利与资源注入的增长极,其优化的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可能产生向心力,吸引周边非受援县的优质要素向中心汇聚,这种“虹吸效应”在短期内可能导致周边区域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相对滞后。然而,随着受援县造血能力的增强,基于共同富裕的制度导向,协作效应将逐渐由向心力转为离心力。在扩散效应阶段,受援县通过产业链延伸与技术示范,带动邻近地区实现产业联动发展,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同时,协作推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特征,受援县医疗、教育资源的提质增效能够辐射周边乡村,降低跨区域的福利落差(黄厅厅等,2023)。这种由点带面的扩散机制,能够有效缩小受援地与邻近地区的城乡差距与群体差距,在空间维度上拓宽共同富裕的覆盖面,进而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共享发展。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东西部协作对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三、实证设计

结合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评估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同时,构建空间溢出模型来分析东西部协作政策的溢出效应。

(一)实证模型设计

1.基准回归模型

东西部协作政策,从1996年东西扶贫协作机制全面建立以来,因协作结对时间不同,模型设定中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时间先后不同,所以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

$$Com_{i,t} = \alpha_0 + \alpha_1 policy_{i,t} + \sum_{s=1}^S \beta_s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Com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共同富裕指数, α_0 是常数项; $policy$ 是核心解释变量,代表东西部协作政策, $policy_{i,t}$ 表示*i*县在*t*年是否受到东西部协作政策援助,即当*i*县在*t*年实施东西部协作政策时取1,否则为0; α_1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若它为正且显著,则表示东西部协作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 $Control$ 为控制变量集, β_s 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μ_i 和 v_t 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

2.机制检验模型

为验证政府财政自给度和人力资本累积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机制检验操作建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识别解释变量与机制变量的因果关系,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M_{i,t} = \gamma_0 + \gamma_1 policy_{i,t} + \sum_{s=1}^S \alpha_s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Com_{i,t} = \gamma'_0 + \gamma'_1 policy_{i,t} + \eta M_{i,t} + \sum_{s=1}^S \alpha'_s Contro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M_{i,t}$ 表示本文中可能的机制变量,包括政府财政自给度(*chance*)和人力资本(*hum*),其余部分与式(1)一致,若系数 γ 、 η 显著,则说明机制成立。

3.空间计量模型

为检验东西部协作政策的协同溢出效应,研究设计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的空间双重差分杜宾模型(SDM):

$$Com_{i,t} = \tau_0 + \rho \sum_{j=1}^n w_{ij} \times Com_{j,t} + \tau_1 policy_{i,t} + \tau'_1 \sum_{j=1}^n w_{ij} \times policy_{j,t} + \sum_{s=1}^S \theta_s Control_{i,t} + \sum_{s=1}^S \theta'_s \left(\sum_{j=1}^n w_{ij} \times Control_{j,t} \righ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w_{ij} 是 $W=(w_{ij})_{n \times n}$ 空间权重矩阵中的指标元素,采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形式构造^⑤, ρ 代表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自相关系数, τ_1 、 τ'_1 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与空间交互项对应的系数, θ_s 、 θ'_s 分别表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与空间交互项对应的系数,其余变量选取与基准回归一致。本文重点分析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sum_{j=1}^n w_{ij} \times policy_{j,t}$,简记为 $W*policy$,该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东西部协作不仅会推动本地区共同富裕,同时也会对邻近地区产生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孙德尔等(2024)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时,从动态发展、普遍共享、长期持续三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杜敏哲等(2024)则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维度来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徐振宇等(2024)立足整体思维、多维思维、长线思维和底线思维,从富裕性、共享性与托底性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本文借鉴以上研究的思路,选取富裕度和共享度两个维度的指标,其中富裕度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支撑,共同富裕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生活质量的全面跃升,所以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三个维度构建;共享度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以本文聚焦城乡共享与群体共享两个维度,其中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数值反映全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是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点选取,直观量化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共采用16个指标构建共同富裕指数(见表1),最后将这16个指标标准化后利用熵值法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东西部协作政策(*policy*)

本文设置东西部协作政策的虚拟变量,样本县受援当年及往后赋值为1,否则为0。本文研究数据样本为2000—2023年,西南地区的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的县域,但由于

表1 共同富裕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富裕度	物质富裕	人均GDP	人均GDP(元/人)	+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
		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GDP(%)	+
		政府支出比率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GDP(%)	+
		居民储蓄率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GDP(%)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总人口(元/人)	+
	精神富裕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年末总人口(千册)	+
		每万人拥有文化机构数量	(影剧院+体育场馆数)/年末总人口(个)	+
	生态富裕	万元GDP废气中烟尘排放量	废气中烟尘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吨)	-
共享度	城乡共享	基尼系数	人均GDP基尼系数 ^⑥	-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群体共享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用户数/年末总户数(%)	+
		互联网普及率	宽带接入用户数/年末总户数(%)	+
		每万人在校中小学生数	普通中小学在校生数/年末总人口(人)	+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医院和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年末总人口(人)	+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年末总人口(床)	+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最早可获取2009年受援数据,2009年以前的协作起始点无法明确,所以剔除2009年受援的131个县,剩余407个县作为样本研究县。以2010年开始受援为起点,该县域受援的当年及往后的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记为0,共有实验组124个受援县,其余为对照组。

3.机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本文从政府财政自给度(*chance*)、人力资本水平(*hum*)两个方面选取具体指标分别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在政府财政自给度方面,借鉴赵聚军等(2025)的做法,本文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之比来衡量。该指标越大,代表政府财政自给度越大。在人力资本水平衡量方面,借鉴张彬斌等(2015)的做法,采用普通中小学在校生数作为代理变量,该指标越大,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最后对其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4.控制变量

为防止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从政府规模、人口密度、金融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四个方面选取相应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来回归。其中,政府规模(*gov*),本文选取政府支出来代表;人口密度(*density*),选取每平方千米的年末人口进行衡量;

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选取年末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来衡量;消费水平(*consume*),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表征。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2000—2023年西南地区云南省、贵州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的407个县级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东西部协作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扶贫开发年鉴》及各省市县的公开文件,国家贫困县数据来源于国家乡村振兴局。考虑到县级数据的可得性,部分县级数据的少量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为消除极端值对实证研究的影响,对县域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并对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另外,本文基于数据样本构建地理距离矩阵、邻接矩阵、经济地理矩阵。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和安慰剂检验进行内生性处理,并运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剔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Com</i>	9768	0.061	0.036	0.014	0.357
<i>chance</i>	9768	0.338	0.270	0.009	3.262
<i>hum</i>	9768	10.814	0.852	7.739	12.723
<i>policy</i>	9768	0.115	0.319	0	1
<i>gov</i>	9768	11.610	1.253	8.039	15.342
<i>density</i>	9768	5.279	1.360	0.878	10.651
<i>finance</i>	9768	9.192	1.413	3.797	14.769
<i>consume</i>	9768	1.052	1.463	0.027	25.302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除中心城市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按照帮扶时长、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类别对共同富裕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进行讨论。

(一)平行趋势检验

在选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直接效应检验前,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保证实验设计的有效性。本文将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的当年作为基准期第0期,展示政策实施之前10年以及实施后10年的检验结果,将早于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前10年的数据统一归纳到第-10期,将政策实施后第十年以后的数据统一归纳到第10期。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图1中垂直实线为95%置信区间,空心折线和圆点为估计值,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前,年份虚拟变量的置信区间均与0轴相交;但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后,从第6年往后虚拟变量的系数值显著为正,这表明,政策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共同富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没有显著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即支持平行趋势假设,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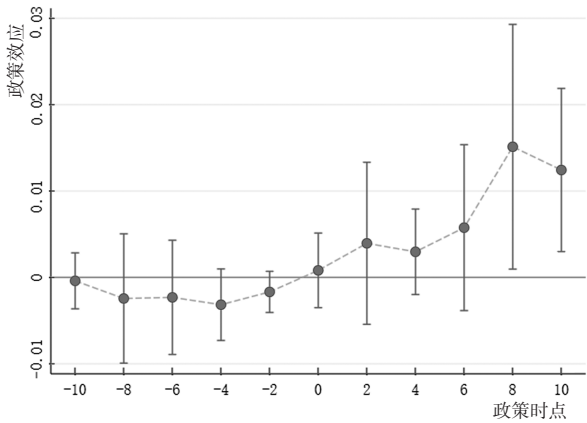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绘制。

(二)基准回归

为考察东西部协作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进行多期双重差分(DID)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1)和列(2)分别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列(3)同时固定年份及地区效应。这三种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policy*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1。这可能的原因是,东西部协作通过强有力的财政资源注入,弥补西部欠发达地区初期资本积累的不足。中央的纵向支持与东部结对省市的横向援助,直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亢延锬等,2023)。同时通过东西部协作,促进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也提升受援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共同富裕。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i>Com</i>)		
	(1)	(2)	(3)
<i>policy</i>	0.0069*** (17.5831)	0.0112*** (26.7427)	0.0068*** (17.2606)
<i>gov</i>	0.0032*** (9.4548)	0.0016*** (7.8783)	0.0038*** (11.0502)
<i>density</i>	-0.0102*** (-23.0843)	-0.0067*** (-10.6758)	-0.0079*** (-13.9499)
<i>finance</i>	0.0016*** (6.8205)	0.0077*** (35.9670)	0.0016*** (6.5286)
<i>consume</i>	0.0076*** (64.3933)	0.0101*** (85.8108)	0.0075*** (63.5953)
常数项	0.0498*** (12.1820)	-0.0041 (-1.1802)	0.0328*** (7.1179)
观测值	9768	9768	97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i>R</i> ²	0.8577	0.8211	0.858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三)内生性处理

为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以及安慰剂检验进行内生性处理。

1.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PSM方法通过匹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确保两组在匹配后的样本具有相似的特征分

布,从而减少选择偏差。本文将“是否受援县”作为外生变量,采用Logit模型为每个县域进行赋分,将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有相近得分的县域采用近邻匹配方式进行逐一匹配,再运用PSM-DID模型对东西部协作政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将对照组和实验组中倾向赋分偏向上下两级的县域样本进行剔除,以使实验样本满足共同支撑体假设,对剔除后剩余的县域样本单独进行回归。根据表4的结果,无论是匹配后的全样本基准回归还是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部分样本回归,两个回归系数分别都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备一定的可靠性。

表4 PSM-DID 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全样本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样本
	(1)	(2)
policy	0.0112*** (21.9200)	0.0039*** (8.5801)
gov	0.0016*** (6.3383)	0.0014*** (4.6434)
density	-0.0067*** (-7.1907)	-0.0175*** (-12.3700)
finance	0.0077*** (24.1534)	0.0060*** (14.6263)
consume	0.0101*** (27.9315)	0.0129*** (37.8940)
常数项	-0.0041 (-0.7264)	0.0644*** (8.3229)
观测值	9768	6640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R ²	0.8211	0.8478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2.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是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的重要手段,通过引入虚假的政策变量来检验结果是否受到其他未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目前主流的一种安慰剂检验方法,即独立重复实验。

通过随机选择部分县域作为虚假的处理组,构造虚假的政策变量,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按照真实的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数量,对全体样

本县域进行同等数量的随机抽取,得到虚假的的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系数估计值,为降低随机抽取的偶然性,在此重复500次随机抽取和检验的步骤,得到500个回归系数即其对应的P值并绘制成核密度图。结果如图2所示,图中水平的虚线表示10%统计水平值,垂直的虚线表示真实的的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估计系数,即本文基准回归部分得出的结果:0.0068。图2中500组随机抽样县域的虚假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服从正态分布,随机抽样得到的估计系数均值分布在0附近,且绝大多数P值大于0.1。本文真实的估计系数,即右侧垂直虚线所示0.0068,处于模拟分布的范围之外,属于极小概率事件。这表明本文基准回归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偶然捕捉到的随机特征,验证了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的可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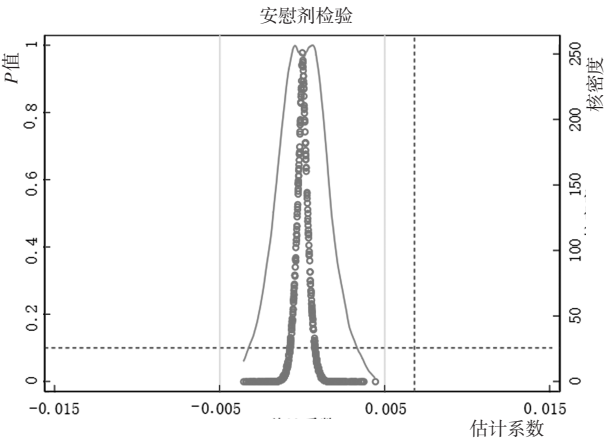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绘制。

(四)稳健性检验

接下来为进一步排除偶然误差和混淆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从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混淆政策干扰、剔除中心城市共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为节约篇幅,下文均只展示同时控制地区及年份固定效应且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共同富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它是基于16个指标合成的变量,或许存在指标的测度偏误以及熵值法潜在的权重赋值问题。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参考程名望等(2022)的做法,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即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比值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能够同时捕捉农村地区财富积累的绝对增长和城乡发展差距的相对缩小,兼顾富裕性和共享性,能够从侧面反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根据表5的列(1)回归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为排除其他政策对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参考邹璠等(2023)的做法,进一步构造国家级贫困县的虚拟变量。根据国务院2014年公布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名单,本文将这些县实施政策的虚拟变量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通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国家级贫困县是否实施的虚拟变量进行控制,表5的列(2)结果所示,在控制国家级贫困县变量后,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可靠性。

3.剔除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政策优势,可能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排除这种影响,本文剔除云南省的昆明市、贵州省的贵阳市、四川省的成都市、重庆市的所有县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市及其下辖的所有县。根据表5中列(3)回归结果,剔除中心城市后,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排除中心城市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替换被解释变量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剔除中心城市
	(1)	(2)	(3)
policy	0.0707*** (7.5596)	0.0064*** (15.8628)	0.0082*** (19.3301)
常数项	0.4950*** (4.5025)	0.0345*** (7.4659)	0.0455*** (8.3569)
观测值	9768	9768	768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6477	0.8583	0.8482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东西部协作政策施行的县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受到帮扶时长、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及人口规模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使得东西部协作政策在不同县域实施可能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因此,本文将对所有样本县域进行区分,以检验不同初始条件下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

1.帮扶时长的异质性

帮扶时长的长短对帮扶产生的效果不同,本文借鉴单德朋等(2025)的做法,根据受援持续时间将样本分为两组,即帮扶时长小于或等于8年为较短帮扶时长,帮扶时长超过8年为较长帮扶时长。根据表6中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较短帮扶时长的受援地区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后,回归系数不显著;而较长帮扶时长的受援地区的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的原因是实施帮扶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对共同富裕的推动效果不明显,而随着时帮扶时长的增加,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明显,这说明持续稳定的协作关系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

2.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异质性

基尼系数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本文借鉴匡小平等(2025)的做法,使用简易方法计算城市下辖县级行政区人均GDP基尼系数^⑦,并以2015年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为基础,将样本分为高和低两组进行分析,人均GDP基尼系数越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水平越高;反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越低的不平衡水平。根据表6中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在人均GDP基尼系数高的受援地区,也就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水平高的区域,在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而在人均GDP基尼系数低的地区,即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水平低的区域,回归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水平高的地区,区域内部存在较大的发展洼地。此时实施东西部协作政策,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帮扶资金和先进管理经验,能够迅速填补要素缺口,政策的边际效应更高,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明显。

3.人口规模异质性

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资

源相对丰裕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赵果庆等,2022),所以本文以2015年人口规模为基础,将样本分为大(人口规模20万人以上)和小(人口规模20万人及以下)两组进行分析。根据表6中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人口规模小的受援地区在东西部协作政策

实施后,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而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人口规模小的地区,实施东西部协作政策能更好地覆盖当地居民,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因此,东西部协作政策在人口规模小的县域实施更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帮扶时长		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		人口规模	
	小于或等于8年	超过8年	基尼系数高	基尼系数低	大	小
	(1)	(2)	(3)	(4)	(5)	(6)
policy	0.0004 (1.0513)	0.0159*** (27.9320)	0.0092*** (16.8214)	-0.0003 (-0.5539)	-0.0012*** (-3.1999)	0.0132*** (12.8887)
常数项	0.0323*** (8.0276)	0.0400*** (8.1239)	0.0141* (2.1146)	0.0793*** (14.2026)	0.0139*** (3.4927)	0.1684*** (14.4150)
观测值	8664	7896	5664	4104	7632	21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9003	0.8654	0.8564	0.8948	0.9182	0.7942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五、进一步讨论

在上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进一步讨论东西部协作政策促进受援县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从政府财政自给度和人力资本两个机制来分析,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讨论其空间溢出效应。

(一)机制检验

正如上文理论分析所述,东西部协作对受援县共同富裕的影响并非仅表现为直接的资源注入,更通过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以及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别考察政府财政自给度与人力资本在东西部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作用,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从政府财政自给度来看,表7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东西部协作对政府财政自给度的回归系数为0.0388,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2a。政府财政自给度改善,强化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托底性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自主权,从而在再分配端有效推

动共同富裕。从人力资本来看,表7中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东西部协作对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018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说H2b得到支持。协作政策通过加大教育基础设施投入,显著降低受援县家庭的受教育边际成本(张彬斌等,2015);同时,东部优质教育资源的“组团式”帮

表7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政府财政自给度	共同富裕	人力资本	共同富裕
	(1)	(2)	(3)	(4)
policy	0.0388*** (6.0044)	0.0065*** (16.6007)	0.0182** (2.3136)	0.0067*** (17.2167)
常数项	0.8983*** (11.8244)	0.0259*** (5.6223)	8.2683*** (89.3604)	0.0256*** (4.0733)
观测值	9768	9768	9768	97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1460	0.8603	0.2347	0.858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扶提升当地的教育产出质量,提高教育回报率。这种个体素质的系统性提升,不仅增强劳动者的初次分配获益能力,更通过破解贫困陷阱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也将吸引更多自由企业家的投资,共同为受援县实现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奠定基础。政府财政自给度的改善提供外部保障,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则提供内生动力,两者共同构成东西部协作驱动受援县走向共同富裕的机制逻辑。

(二)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运用 Moran's *I* 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并通过 LM 检验、LR 检验和 Wald 检验来确定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根据检测结果最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的空间杜宾模型,通过构建空间矩阵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1.莫兰指数

在进行空间双重差分法估计前,需要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只有在空间上有显著的相关性,才能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基于地理距离矩阵测度共同富裕指数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结果如图 3 所示, Moran's *I* 指数均为正,并震荡上升趋势,2023 年的 Moran's *I* 指数为 0.116,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县域间的共同富裕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共同富裕的空间非均衡性客观存在。因此在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中加入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滞后项,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法探讨东西部协作与共同富裕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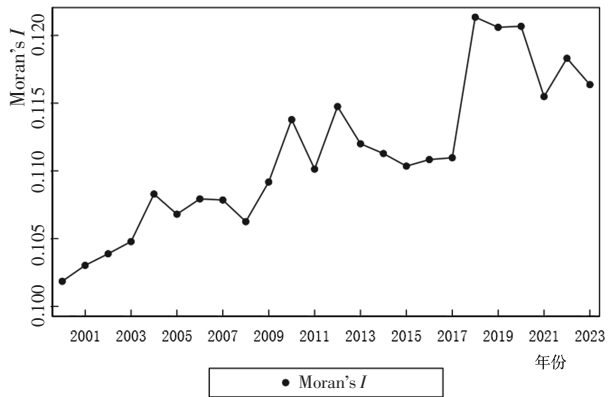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23 年共同富裕指数的 Moran's *I* 指数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绘制。

2.空间回归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前,本文通过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来确定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本文主要探究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对受援县域周边区域的协同溢出效应,为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在空间杜宾模型中,除地理距离矩阵外还引入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根据表 8 中列(1)、列(2)和列(3)汇报的结果,无论是地理距离矩阵、邻接矩阵中,空间自相关系数 ρ 都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这说明东西部协作政策实施产生的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

表8 空间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om)		
	地理距离矩阵	邻接矩阵	经济地理矩阵
	(1)	(2)	(3)
policy	0.0034*** (7.7338)	0.0007 (1.5355)	0.0086*** (22.3623)
W*policy	0.0271*** (8.9582)	0.0062*** (9.9340)	-0.0008 (-0.7457)
ρ	0.9449*** (85.4298)	0.4861*** (49.8286)	-0.0135 (-0.6376)
直接效应	0.0049*** (9.4110)	0.0016*** (3.3971)	0.0087*** (21.8358)
间接效应	0.5678*** (4.3414)	0.0118*** (14.4031)	-0.0008 (-0.8346)
总效应	0.5726*** (4.3699)	0.0134*** (16.4662)	0.0078*** (7.095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9768	9768	9768
R ²	0.6626	0.8162	0.8390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注:括号内数值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具体来看,在地理距离矩阵、邻接矩阵分析中,受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的估计系数都为正,且都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策具有较强的空间辐射力,受援县与紧邻的县域往往具有相似的自然禀赋或产业基础,协作政策通过基础设施互联、劳动力近距离流动等方式,实现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在经济地理矩阵分析中,直接效应、总效应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检验,但间接效应的估计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呈现出抑制特征,这表明在经济特征相似的县域之间,该政策可能导致资源抢夺,产生“虹吸效应”,即一个县域获得政策优惠后,吸引原本属于其他经济同类县的

资金、技术或人才,从而对周边产生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东西部协作政策不仅对受援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经济地理视角下的负向间接效应则警示我们,在推进协作过程中应关注要素流向,防止“虹吸效应”,防止要素在同类经济体间过度竞争。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的假说H3。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东西部协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政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研究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系统评估东西部协作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政策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处理(PSM-DID和安慰剂检验)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在进行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剔除中心城市的稳健性检验分析后结果依然可靠;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帮扶时长超过8年的县域、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高即基尼系数大的县域、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东西部协作政策更为有效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东西部协作通过改善政府财政自给度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来实现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的结果表明,东西部协作政策在地理上呈现显著的正向辐射带动效应;而经济地理视角下的负向间接效应则警示,在经济相似地区间、在推进协作过程中应关注要素流向,防止由于政策洼地效应对经济关联地区产生虹吸干扰。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东西部协作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长效帮扶机制,强化“造血式”扶持力度。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制定跨周期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确保协作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简单的资金“输血”进一步转向深层的产业“造血”,推广共建产业园区、“飞地经济”模式,允许受援县以土地、绿色资源入股,东部注入资本与管理,建立合理的税收与产值分担机制,提升受援县的财政自给度。通过改善政府财政自给度,增强地方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自主权与精准度,确保财政

收入的增长能够切实转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保障,从而在制度层面筑牢共同富裕的基石。

第二,精准识别异质性特征,实施差异化与分类指导策略。由于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水平高及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对政策红利更为敏感,未来协作应进一步下沉资源,实现精准协作。对于内部发展不平衡水平高的县域,发挥政策的平衡器功能,协作资金应优先向县域内的边缘地带和偏远乡村倾斜,重点投入微循环基础设施与普惠性民生项目,发挥政策的减震器功能。对于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水平低的地区,应警惕政策介入可能产生的“虹吸效应”或资源错配导致的结构性失衡,侧重于建立跨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协作机制。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县域,探索集约化、特色化的产业协作模式,避免资源分散。

第三,深化教育与人才协作,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纵深推进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通过东部院校、师带徒等知识外溢机制,就地培养带不走的本土专业队伍,破解贫困的代际传递陷阱;另一方面,依托施援地职业教育资源,在受援县定向联合组建“订单式”技术学院、开拓订单班,并搭建跨区域的数字化劳务精准对接平台,开展针对高附加值岗位的有组织化培训,直接提升西部劳动者的要素报酬。通过引才与育才并举,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吸引更多自由企业家的投资,为受援县实现可持续、共享性的富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微观基础。

第四,强化空间联动效应,构建“中心—外围”连片带动格局。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深化推进点面结合的空间协同模式,以受援县为核心节点,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享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将政策红利扩散至周边的非受援县,形成区域性的增长极。针对人口规模较小、资源承载力有限的县域,鼓励其通过跨区域产业园、“飞地经济”等方式,积极融入周边大中城市的经济循环,利用地理邻近带来的正向溢出,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②鉴于2020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文将统一使用“东西部协作”政策名称。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年鉴》编委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年鉴2023》,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版,225-252页。④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6-06-17).<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60617/b4e2757ab8d84c2a85a5e0976305fef5/c.html>。⑤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一般认为,两地距离越近相关性越高,即采用距离的倒数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表示为: $W=(w_{ij})_{n \times n}$, $w_{ij}=\begin{cases} 1/d_{i,j}, i \neq j \\ 0, \text{其他} \end{cases}$, $d_{i,j}$ 代表*i*、*j*两地间的距离。⑥本文借鉴匡小平和李超龙(2025)的方法,计算县域人均GDP基尼系数: $CIN=1-(2 \times \sum_{c=1}^{n-1} W_{ci}+1)/n$,其中 W_{ci} 表示*i*地区*t*年按人均GDP排序后,前*c*个县(区)人均GDP累计百分比。⑦计算方法同注释⑥。

参考文献

- [1]安树伟,李瑞鹏.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机理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4):109-120.
- [2]欧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制度基础、制约因素与实现机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16-26.
- [3]汪为.东西部协作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5(11):134-141.
- [4]王禹瀚.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机制:成就、经验与价值[J].管理世界,2022(6):71-84.
- [5]吴光芸,周芷馨.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反馈效应[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7):2-13.
- [6]梁琴.由点到网: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变迁[J].公共行政评论,2022(2):133-153.
- [7]丁忠毅,李梦婕.迈向共同富裕的跨域协作治理:东西部协作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经济问题探索,2023(1):60-72.
- [8]徐丽娜.共同富裕视域下东西部协作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实践路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4(6):102-110.
- [9]温士贤.东西部协作: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实践[J].开放时代,2024(6):13-26.
- [10]贾男,王赫.东西部对口支援政策实施能否降低脱贫农户返贫风险[J].中国农村经济,2025(1):72-93.
- [11]蒋永穆,豆小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理论逻辑与初步设计[J].东南学术,2022(1):36-44.
- [12]陈丽君,郁建兴,徐依娜.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治理研究,2021(4):5-16.
- [13]万广华,蓝菁,刘震.基于人民幸福感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J].经济科学,2023(2):5-25.
- [14]张可云,冯晟,席强敏.东西部协作政策效应评估:基于要素流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3(12):61-79.
- [15]李磊,刘博聪,王天宇.授人以鱼,授之以渔:对口支援与共同富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2):25-46.
- [16]亢延锬,侯嘉尖,陈斌开.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J].世界经济,2023(7):140-164.
- [17]温涛,向栩.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路径探索:人力资本的增长与平衡效应检验[J].改革,2024(5):95-111.
- [18]吴韬,钟启超.共同富裕目标下推进中国西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3(2):91-98.
- [19]陈钰芬,胡思慧.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6):90-104.
- [20]徐振宇,周智翔,孔新兵,等.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基于省级行政区与区域层面的探讨[J].统计研究,2024,41(3):4-17.
- [21]覃成林,杨霞.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0):44-61.
- [22]李加林,沈杏雯,田鹏,等.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评价、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5(3):32-43.
- [23]曾水英,范京京.对口支援与当代中国的平衡发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204-211.
- [24]伍文中.从对口支援到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文献综述及未来研究趋势[J].财经论丛,2012(1):34-39.
- [25]孙开,牛晓艳,张磊.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能够矫正财政失衡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23(10):80-93.
- [26]徐明,刘金山.省际对口支援如何影响受援地区经济绩效:兼论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趋同的多重中介效应[J].经济科学,2018(4):75-88.
- [27]Mankiw N G, Romer D, Weil D N.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2):407-437.
- [28]张彬斌,陈小利.“重点县”扶贫的人力资本形成效应[J].经济科学,2015(1):40-52.
- [29]王寿彭,吴丰华.东西部协作的经济韧性提振效应[J].财经科学,2025(11):134-148.
- [30]何雄浪,姚雨霜.人力资本流动、技术溢出与产业空间均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OTT分析框架的模型拓展经济学报[J].经济学报,2022(1):162-181.
- [31]Romer P M. Increasing returns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1002-1037.
- [32]张桂文,邓晶晶,张晓鹤.协调城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8):94-106.

- [33]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 [34] 黄厅厅,熊斌.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顶层设计、学理阐释与基层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23-134.
- [35]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36] 孙德尔,谷国锋.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5):162-176.
- [37] 杜敏哲,廖丽萍.低碳转型能否促进共同富裕?——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J].经济学动态,2024(4):33-48.
- [38] 赵聚军,王坤.政府人力成本与人口小县重组的最优规模:基于东北三省的可解释机器学习分析[J].政治学研究,2025(3):106-120.
- [39] 程名望,韩佳峻,杨未然.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J].财贸研究,2022(10):1-17.
- [40] 邹璠,周力.均衡视角下东西部协作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脱贫攻坚时期结对帮扶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77-90.
- [41] 单德朋,向洋,王超.东西部协作促进了受援县城乡融合发展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5(1):52-71.
- [42] 匡小平,李超龙.区域一体化何以影响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基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25(5):144-156.
- [43] 赵果庆,张欣玲.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软科学,2022(12):89-101.

Research on East-West Collaborati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ided Counti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Southwest China

He Xionglang Lu Ling

Abstract: East-West collaboration serves as a vital instrument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Grounded in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utilizes panel data from 407 aided counties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2000 to 2023, employing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odel, mechanism testing models,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policies on common prosper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ast-West collaboration policie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aided counties,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parallel trend tests, endogeneity treatments (PSM-DID and placebo tests), and robustness check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 policy's effectiveness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unties with a support duration exceeding eight years, counties with high levels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counties with smaller population sizes. Mechanism testing suggests that East-West collaboration facilitates common prosperity by improving government fiscal self-sufficiency and promo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policy not only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ided counties themselv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neighboring areas through spatial spillover channels.

Key Words: East-West Collabo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ment Fiscal Self-Sufficienc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责任编辑:柳 阳)

【区域经济韧性与安全专题】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时空格局演变及 驱动因素研究*

李鑫岩 任晓猛 史晋川

摘要: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加剧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并行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科学测度及其提升路径日益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演化韧性理论,构建涵盖外贸总额、外贸增长率、外贸产品结构和外贸地域结构的四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抵抗力、恢复力与重组力多个层面刻画对外贸易韧性的内涵。结合AHP与TOPSIS方法,测度2012—2023年中国31个省(区、市)对外贸易韧性综合指数,并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可夫链、泰尔指数和莫兰指数等方法,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差异来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整体呈阶段性先升后降态势,区域梯度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空间集聚与正相关特征显著,热点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极化趋势和路径依赖较为突出;泰尔指数分析表明,区域内差异变动不大但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扩大的主要来源。进一步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发现,区域创新演化能力是驱动对外贸易韧性提升的首要因素,服务性供给能力次之,制造性供给能力与消费需求能力共同构成重要支撑,信息基建能力发挥基础保障作用;各因素之间普遍存在增强型交互效应,其中信息化水平与其他因素的协同作用尤为突出。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外贸韧性提升及区域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地理;对外贸易韧性;时空格局;驱动因素;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85-17 **收稿日期:**2026-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营企业投资与高质量发展研究”(22JJD790071);

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研究”(2026C15004)。

作者简介:李鑫岩,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杭州 310058)。

任晓猛,男,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杭州 310058)。

史晋川,男,浙江大学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杭州 31005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从全球贸易网络边缘参与者向关键枢纽的结构性跃迁。货物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全球份额不足1%、位列第32位)提升至2024年的约6.1万亿美元

(全球份额超过12%、连续八年位列第1位),其中2001年加入WTO构成加速嵌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关键转折点。与此同时,外贸增长并非仅体现为规模扩张,更表现为供给结构的持续升级——出口结构由初级农产品与资源性产品主导,转向以高附加值制成品为核心;至2024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9.4%,电动汽车、工业机器人等技术密集型产

品成为新的增长动能。贸易伙伴由早期约50个国家和地区(高度集中于特定阵营),扩展至覆盖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与东盟、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贸易联系持续加深,市场多元化水平显著提升。值得强调的是,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供应链重组与外部冲击频发的背景下,外贸体系的关键约束已从做大规模转向增强韧性:即在冲击下保持稳定(抵抗)、在扰动后实现快速修复(恢复),并通过结构与网络的适应性调整形成持续竞争力(重组/演化),这也构成本文从省域尺度刻画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的现实出发点。

一系列外贸成就的取得,不仅源于持续的开放与改革,更深层的支撑来自中国对外贸易体系在多重冲击中逐步塑造的内生韧性。这种韧性来源于多重维度:其一,完备而纵深的产业体系构成韧性的供给底座,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构成的完备制造体系,2024年工业增加值完成40.5万亿元,为外贸提供了规模化、低成本且可快速切换的多样化供给能力;其二,政策工具与制度供给形成重要的稳定器,围绕稳外贸的系列政策(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国办发〔2022〕18号))通过稳定预期、畅通循环与强化要素保障,提升了对外需波动与外部约束的缓冲与调节能力;其三,重大冲击的压力测试反复验证了系统的抗压与恢复特征,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贸在2009年下降13.9%、2010年增长25.8%的先降后升中实现修复;2020年疫情冲击下亦率先实现全年进出口1.9%的正增长,显示出在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外贸体系的适应性调整能力正在成为高质量开放的关键基础。

四十余年的开放实践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长逻辑并非线性扩张,而是在危机与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复压力测试中,通过产业供给、制度调节与市场网络重构实现了从规模增长到质量跃迁的系统演进。由此引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研究命题:在冲击常态化与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究竟处于何种发展水平,呈现怎样的时空演化轨迹,其差异化格局由哪些结构性因素驱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从演化视角拓展国际贸易地理学对“空间集聚—路径依赖—适应性重组”的理论解释,也能为中国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完善分区施策、提升外贸系统抗冲击与再配置能力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韧性(Resilience,亦译为恢复力、弹性)通常被界定为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维持关键功能并实现恢复的能力(Holling C S, 1973; Rose A et al., 2002)。围绕韧性的理论谱系,既有研究大体形成三类视角:工程韧性以单一均衡为前提,强调冲击后的快速回归;生态韧性在多重均衡框架下关注系统跨越阈值后的状态转换;演化韧性则超越均衡范式,强调系统在非均衡条件下的适应性调整与路径重塑(Holling C S, 1996; Walker B et al., 2004; Simmie J et al., 2010; Martin R, 2012; 胡晓辉, 2012)。2008年金融危机后,韧性议题逐步由生态系统拓展至区域经济与空间发展研究,学者多基于GDP、就业等指标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与比较,并揭示冲击下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分化机制(Hassink R, 2010; Davies S, 2011; Wink R, 2014; Courvisanos J et al., 2016; Gong H et al., 2017; Fröhlich K et al., 2018; McCartney G et al., 2021)。在此基础上, Martin (2012)将区域经济韧性解析为“抵抗力—恢复力—重组力”的过程性能力,强调经济系统在冲击中抵御下行、在扰动后修复并通过组织与结构重构实现适应性演进;国内研究亦指出,经济系统韧性并不以回到某一稳态为核心目标,而更关注冲击后演化路径的再塑造与持续调整(孙久文等, 2017)。

在韧性研究由区域经济拓展至开放经济系统的脉络中,学界逐渐形成了对“对外(开放)韧性”的过程性理解:经济体在外部冲击下能够抵御冲击(抵抗)—修复回稳(恢复)—调整结构并实现适应性演进(重组),从而维持并优化对外经济活动的持续性与竞争力(Martin R, 2012; 贺灿飞等, 2019; 王文宇等, 2021; 宗会明等, 2021)。据此,本文将对外贸易韧性界定为:一国(地区)在外部冲击下维持贸易运行稳定、在冲击后实现修复并通过结构与网络再配置获得持续竞争力的过程性能力。现有国外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识别影响出口/贸易韧性的关键因素:一类强调政策与制度的作用,如出口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韧性的促进效应,凸显政策干预在降低风险暴露、稳定贸易表现中的重要性(Gnangno S K, 2022);另一类关注结构性与制度性条件,指出制度质量、经济多元化等非传统指标能够显著增强

出口韧性(Dingemans A, 2016)。也有研究从冲击类型出发揭示机制差异,例如在自然灾害情境下,基础设施完备度与应急响应能力通过影响物流与供给修复过程而成为贸易韧性的关键中介(Friedt F L, 2021);在双边关系维度上,文化相似性被证明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强化信任与预期稳定来提升贸易韧性(Céline C et al., 2018)。与此同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证据表明,贸易韧性存在显著主体异质性:企业规模、生产率与出口经验等因素会系统性影响冲击下的持续出口与恢复路径(Jaarsma M, 2017)。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从“制度—结构—冲击—主体”四个维度为贸易韧性提供了解释框架,也为本文在省域尺度上开展测度、时空刻画与驱动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对外贸韧性的测度大体形成两条路径:单一相对值法与综合多指标法。其一,单一相对值法通常以冲击前后(相对基准期)贸易表现的偏离程度刻画韧性,具体又可归纳为三类:以贺灿飞等(2019)为代表,采用出口增长率差值表征韧性,即以当年产品出口增长率与2008年同期同类产品出口增长率之差衡量冲击下的相对表现,该思路因简洁而被后续研究广泛沿用;以宗会明等(2021)为代表,将韧性界定为各省当月外贸额相对于新冠疫情冲击期同月外贸额的增长率,用以捕捉冲击后的恢复过程;以邓宗兵(2024)、许朝凯等(2023)为代表,引入HP滤波,通过实际外贸增长偏离潜在增长的程度衡量外贸系统的波动与修复能力。其二,综合多指标法则从系统观出发,强调韧性是多维能力的合成结果,典型如王瑛等(2022)从区域经济基础、交通设施、外贸发展与政府支持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省域外贸韧性进行综合评价。总体而言,单一相对值法在冲击识别与动态响应上具有直观优势,但难以揭示韧性背后的结构性来源;综合多指标法能够刻画系统能力的多维构成,却难免有因果倒置的问题,且对指标选取与权重设定更为敏感,这也为本文采用演化韧性框架构建多维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测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综合既有研究,对外贸易韧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围绕创新能力、全球价值链嵌入、产业多样化与数字化转型展开,并呈现出作用机制明确但方向可能依赖情境的总体特征。第一,区域创新能力被普遍视为提升外贸韧性的核心来源:创新通过提高企业

生产率、丰富出口品类并改善产品质量,从而增强区域抵抗冲击与恢复增长的能力(徐圆等, 2019; 朱小明等, 2019; 陈瑾等, 2019; 边丽娜等, 2023)。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提示政策与外部约束的条件性作用,例如出口退税可能在短期有助于抵御危机,但长期或抑制结构升级;贸易壁垒则可能在创新与出口韧性之间产生中介效应或调节效应(朱小明等, 2019; 边丽娜等, 2023)。第二,关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研究结论更强调“双刃剑”效应:嵌入全球价值链可能强化外部冲击传导、降低风险抵御能力,但也可能通过更强的订单网络与组织协调机制加快出口恢复,且这种效应与行业部门及嵌入方式有关(姜帅帅等, 2021; 马小淇, 2021);另有证据表明,价值链位置越高的产品受外部危机冲击程度更小、贸易竞争力更强(潘文卿等, 2014; 唐宜红等, 2018)。第三,产业多样化通常被认为能够通过分散风险、提升替代空间而增强韧性,但在相关多样化上存在分歧:一方面,相关多样化可能因冲击共振而削弱出口韧性(贺灿飞等, 2019);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信息互补与风险共担提升城市出口韧性(王文字等, 2021)。进一步地,贺灿飞等(2019)从时间维度指出相关多样化对韧性的作用具有阶段性:短期偏向增强抵抗力,中期增强恢复力,长期提升重组力,而阶段性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更多体现为短期效应。第四,数字化转型或数字经济被认为能够通过促进出口多样化与提升出口质量来增强出口韧性,但其作用受到企业特征与区域制度环境的影响,例如规模与产权属性可能调节数字化赋能效果;基础设施与市场化水平则通过优化要素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来强化数字经济对出口系统的支撑(魏昀妍等, 2023; 马建峰等, 2023)。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外贸韧性的驱动机制提供了多维解释框架,但仍需要在统一的韧性过程逻辑下,将“能力要素—空间分异—动态演化”加以联结与检验。

综上所述,现有对外贸易韧性研究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测度与机制解释,但仍存在若干有待深化之处。第一,在测度口径上,不少研究侧重以外贸额(出口额)的相对增长率刻画韧性,因而更接近对恢复或增长表现的观测,较少将外贸基本盘及其结构性缓冲纳入统一框架。事实上,韧性强调的是冲击下维持与修复的系统能力:外贸规模越大,需求黏

性与供给组织能力越强;产品结构与市场地域越多元,越能通过替代与迂回降低单一冲击的暴露度。因而,更具解释力的外贸韧性内涵应同时涵盖总量、增速、产品结构多元化与市场地域多元化等维度。第二,在概念边界上,部分研究将经济基础、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支持等支撑条件直接纳入韧性指标体系,容易将韧性本体(贸易系统的抵抗—恢复—重组表现)与韧性来源(能力与环境条件)混同,从而弱化了指标体系的可解释性与机制识别的清晰度。第三,在空间视角上,既有研究对外贸韧性地理过程的刻画仍相对不足,更多停留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差异比较,而较少系统揭示其空间集聚、路径依赖、重心迁移与区域分化等演化特征;然而外贸韧性的时空格局本身对于理解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结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在驱动机制上,现有文献常聚焦创新或数字化等单一维度,缺乏从区域综合能力出发的系统性解释框架,尚未充分联结供给能力、需求能力、基础设施能力与演化能力等多维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从演化韧性视角构建四维测度体系,并在省域尺度上结合多方法时空刻画与地理探测器分析,力图在“测度—格局—机制”的一致逻辑下对外贸韧性开展更完整的经验检验。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试图对中国省域对外贸易韧性的“测度—格局—机制”展开一体化解释,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边际贡献。第一,概念界定与测度框架的统一。立足演化韧性逻辑,构建由外贸总量(抵抗力基础)—外贸增长率(恢复力表现)—产品结构多元化与市场地域多元化(重组力关键)组成的四维评价体系,以更完整地刻画外贸系统在冲击下“稳得住、恢复快、调得动”的多维本质。第二,方法链条的综合互证。在测度环节采用主客观结合的AHP-TOPSIS算得省域韧性指数,并进一步综合核密度估计、空间Markov链与泰尔指数分解等空间方法,系统揭示韧性分布形态、状态转移、空间关联与差异来源,从而形成对时空演化的多角度互证。第三,驱动机制的系统识别与交互检验。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基于“区域供给能力(制造/服务)—区域需求能力—区域基础设施能力—区域演化能力(创新)”的综合视角,识别各因素的解释力及其交互增强效应,从而分区施策与韧性提升路径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经验证据。

三、中国各省份对外贸易韧性测度

本章立足演化韧性视角,面向2012—2023年中国31个省(区、市)构建省域对外贸易韧性四维评价体系,并采用AHP—TOPSIS方法测算综合韧性指数,为后续时空演化刻画与驱动机制识别提供一致的量化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2—2023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为样本开展省域对外贸易韧性分析。为保证统计口径一致,未纳入港澳台地区。区域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常用分区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四大板块(分别为10个、12个、6个和3个^①)。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及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等权威统计平台。

(二)理论依据与指标体系构建

从演化韧性视角看,对外贸易韧性并非仅等同于冲击后的反弹速度,而是开放型贸易系统在外部扰动下维持关键功能、实现动态修复并通过结构调整获得持续适应的综合能力。对外贸易系统作为典型的开放复杂系统,其韧性可归纳为三个相互衔接的过程性能力:抵抗力(冲击来临时稳住基本盘、降低下行幅度)、恢复力(冲击后回稳并重回增长轨迹)、重组力(通过结构与网络的调整实现替代与再配置,进而获得适应性演化)(Martin R, 2012)。据此,本文的指标体系构建遵循三项原则:一是过程一致性,指标需分别对应“抵抗—恢复—重组”的关键环节;二是可比性与可得性,在省域尺度与年度序列上保持统计口径一致;三是结构性解释力,既刻画结果表现,也反映韧性赖以生成的结构缓冲与替代空间,避免仅用单一增长指标造成表观韧性偏误。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省域对外贸易韧性划分为四个可观测维度,并与抵抗力、恢复力与重组力建立对应关系。

第一,外贸总量维度用于表征贸易系统的抵抗力基础与缓冲效应。外贸总额越大,意味着贸易主体规模更大、供需联系更密集、供需黏性越大、配套与分工体系更完备,从而在冲击下具备更强的承载能力与吸收波动的余度。相较于仅关注增速的测

度方式,纳入总量维度有助于避免对小规模地区“波动大—反弹快”所带来的韧性高估,更贴近抵抗力所强调的稳住基本盘(Dingemans A, 2016; 王瑛等, 2022)。

第二,外贸增长率维度用于刻画冲击后的恢复力表现。增长率能够直观反映贸易活动在受到扰动后回稳的速度与幅度,是现有研究中较为常用的韧性表征方式(贺灿飞等, 2019; 宗会明等, 2021)。但需要指出,增速指标主要捕捉结果状态,容易受到基数与短期波动影响,因此必须与总量和结构维度结合,才能在过程逻辑上完整呈现恢复而非仅是反弹。

第三,外贸产品结构维度对应贸易系统的重组力(结构替代能力)。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多样化结构能够通过“替代—重组”机制降低单一品类冲击对系统的破坏,并为资源重新组合提供更大搜索空间(Simmie J et al., 2010; 徐圆等, 2020)。就外贸而言,出口产品越分散,越能在特定品类受阻时实现品类替代与链条再配置,从而提高冲击下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与中长期演化潜力(贺灿飞等, 2019)。因此,产品结构多元化不仅是外贸竞争力的体现,更是重组力的重要来源。

第四,外贸地域结构维度对应贸易系统的重组力(市场迂回能力)。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会放大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与区域性危机的传导效应,使冲击呈现集中暴露;而伙伴结构越多元,越能通过市场迂回与订单重定向分散风险,在冲击下保持贸易流的连续性并支持恢复过程(Carrère C et al., 2018; 王文字等, 2021)。因此,市场地域多元化刻画的是贸易网络层面的再配置空间,是开放系统韧性区别于封闭系统的重要方面。

综上,本文以外贸总量(抵抗力基础)—外贸增长率(恢复力表现)—产品结构多元化与市场地域多元化(重组力关键)构建四维评价体系,使指标选择与演化韧性的过程逻辑保持一致:总量维度反映冲击来时稳不稳,增速维度反映冲击过后回得快不快,结构维度反映能否通过替代与再配置实现适应性调整。该体系既吸收既有研究对恢复能力的关注,也将规模基础与结构性缓冲纳入同一框架,从而更系统地刻画省域对外贸易在冲击情境下的内生韧性。

在外贸结构测度中,本文引入集中度指标,以量

化外贸市场结构与产品结构的多元化程度,具体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HHI是衡量结构集中度的经典综合指标,其思想是对集合内各构成要素的份额进行平方并求和,从而对大份额主体赋予更高权重,以刻画结构是否由少数要素主导。一般而言,HHI值越大表示集中度越高、结构越趋单一;HHI值越小则表示分散度越高、结构越趋多元。其计算公式如下:

$$H = \sum_{i=1}^n P_i^2 \quad (1)$$

式(1)中, n 为市场主体数量, P_i 为该主体占总体比例,该指数越大则市场越集中,为1时表示只有一个市场主体;该指数越小则表示市场越均衡,集中度越低。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HHI指数衡量产品结构集中度,主要侧重于评估贸易系统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横向风险分散与缓冲能力。适度的产品多样化(较低的HHI)能够有效避免单一产业受创导致的系统性休克。然而,演化经济学视阈下的贸易韧性不仅包含横向的缓冲吸收,还包含纵向的不可替代性与演化重组能力(即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与结构升级)。本文在评价体系中侧重前者的状态测度,而将后者(结构升级的驱动力)纳入后续驱动因素模型中的区域创新能力维度进行机制检验。

对外贸易韧性具体的指标(见表1、图1)包含以下几部分:对外贸易市场结构包括中国各省份贸易所涉及的地区,具体包括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共计6个大洲;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包括中国各省份贸易所涉及的产品,具体包括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第二类植物产品,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第五类矿产品,第六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七类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等共计22类中国海关所统计出口产品类别;对外贸易总额为中国各省份在当年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为了反映本地区所主导的对外贸易情况,本文统计口径为“按照收发货人注册地”,金额以美元计价;对外贸易增长率为中国各省份在当年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相对于前一年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长率。

为了平衡测度模型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本研究使用AHP法和TOPSIS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各省份对外贸易韧性进行测度。其中AHP法通过专家打分,分别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增长率、进口增长率、出口市场HHI、进口市场HHI、出口产品HHI、进口产品HHI进行专家相对重要性打分,经研讨后,专家打分比例为:1:1:3:3:5:5:5:5。

表1 对外贸易韧性指标体系

对外贸易韧性指标构建				
一级指标	韧性维度	二级指标	衡量方法	性质
外贸韧性	抵抗力	外贸总额	出口总额(年) 进口总额(年)	+ +
	恢复力	外贸增长率	出口增长率(年) 进口增长率(年)	+ +
	重组力	外贸市场结构 外贸产品结构	出口市场HHI(年) 进口市场HHI(年) 出口产品HHI(年) 进口产品HHI(年)	— — —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3)》、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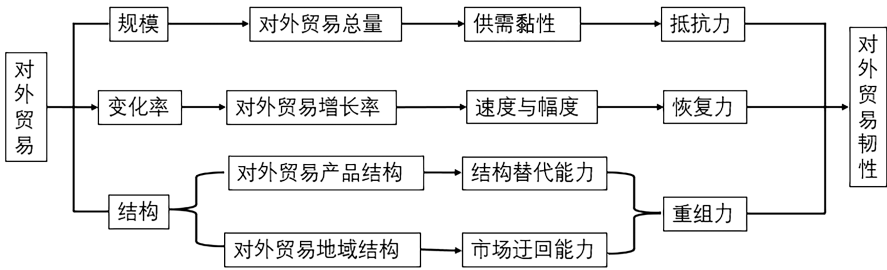


图1 对外贸易韧性指标构建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对外贸易韧性指标测算方法

本节主要对对外贸易韧性的测算方法进行介绍,主要为AHP法和TOPSIS法。

1.AHP法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结构化的决策支持技术,它借助层次结构模型融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势。该方法通过将复杂决策问题拆解为包含多个层次要素的系统框架,运用数学原理对主观判断进行量化处理,显著降低了多目标、多准则及非结构化决策场景的复杂性。

2.TOPSIS法

优劣解距离法(TOPSIS)作为多属性决策分析中的经典模型,其核心算法逻辑为通过空间向量映射实现方案的排序与优化。该模型通过构建多维评价体系,运用几何测度原理量化备选方案与理想状态的距离远近。

3.具体做法

在具体测算中,需要依据指标性质对原始数据进行同向化与标准化处理。其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为正向指标,市场HHI和产品HHI为负向指标。随后将AHP专家判断形成的相对重要性比例归一化,得到各指标权重,并构建加权标准化矩阵。TOPSIS法分别确定正、负理想解,计算各省份与两类理想解之间的欧氏距离,以相对贴进度作为对外贸易韧性综合指数。贴进度越大,表明该地区越接近总量稳定、增长恢复和结构多元的理想状态。AHP与TOPSIS相结合,既体现了演化韧性不同维度的重要性差异,也可通过省域样本与理想状态的相对距离实现综合排序,降低单一指标测度可能产生的偏差。

(四)对外贸易韧性时空特征测算方法

对外贸易韧性数值的变动趋势变现为数值增

减、数值集散和数值转移,空间演变表现为空间聚集、空间移动和区域间差异。针对这些特征,分别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 Markov 链、Theil 指数、Moran 指数等方法进行辨识与分析。

1. 核密度估计

Kernel 密度估计借助不同时期核密度分布曲线在位置、形态、极化程度等维度的差异,进而展现研究对象在数值方面的变化规律。本研究利用 Kernel 密度中的高斯核函数分析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并判断是否存在极化趋势。核密度估计的计算公式如下:

$$f(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_i - \bar{x}}{h}\right) \quad (2)$$

$$K(x) = \frac{1}{\sqrt{2\pi}} \exp\left(-\frac{x^2}{2}\right) \quad (3)$$

式中: $f(x)$ 为密度函数; $K(x)$ 为概率密度; N 表示观测值的个数; h 为带宽。

2. 空间 Markov 链

本研究使用不加入滞后项和加入滞后项的空间马尔可夫链矩阵,分析中国各省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的数值转移规律。具体公式如下:

$$P\{X_t = j | X_{t-1} = i_{t-1}, X_{t-2} = i_{t-2}, \dots, X_0 = i_0\} \\ = P\{X_n = j | X_{n-1} = i\} = P_y, (i, j \in M) \quad (4)$$

$$P_y = \frac{n_y}{n_j} \quad (5)$$

3. Theil 指数分解

Theil 指数分解可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的变化趋势与数值大小情况。国内开放布局的空间均衡度(即差异大小)深刻影响着国家整体的外贸系统脆弱性。极端集聚的空间布局容易放大大局部冲击的风险,而趋于均衡的空间格局则能提供战略纵深。具体公式如下:

$$T = \frac{1}{k} \sum_{q=1}^k \left(\frac{S_q}{\bar{S}} \times \ln \frac{S_q}{\bar{S}} \right) \quad (6)$$

$$T_p = \frac{1}{k_p} \sum_{q=1}^{k_p} \left(\frac{S_p}{\bar{S}_p} \times \ln \frac{S_p}{\bar{S}_p} \right) \quad (7)$$

$$T = T_w + T_b = \sum_{p=1}^4 \left(\frac{k_p}{k} \times \frac{S_p}{\bar{S}} \times T_p \right) + \sum_{p=1}^4 \left(\frac{k_p}{k} \times \frac{\bar{S}_p}{\bar{S}} \times \ln \frac{\bar{S}_p}{\bar{S}} \right) \quad (8)$$

式(6)中, T 为总体差异泰尔指数, T 的大小处

于 $[0, 1]$, T 越小,说明总体差异越小。 q 代表具体的省份, k 表示总体的省份数量, S_q 表示省份 q 的对外贸易韧性水平, $\bar{S}$ 表示平均值。式(7)中 T_p 表示区域 p 的总体差异泰尔指数, k_p 表示区域 p 的省份数量, S_p 表示区域 p 省份 q 的对外贸易韧性水平, $\bar{S}_p$ 表示区域 p 的对外贸易韧性平均值。式(8)中,对外贸易韧性的总体泰尔指数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泰尔指数 T_w 和区域间差异泰尔指数 T_b , S_p 表示区域内省份的对外贸易韧性之和, $\bar{S}$ 则表示全国所有省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之和。

4. Moran's I 指数

全局莫兰指数主要用来研究对象整体上是否存在相关性。具体公式如下:

$$I_i = \frac{\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sum_{i=1}^n \sum_{j=1}^n W_{ij}} \times \frac{n}{\sum_{i=1}^n (x_i - \bar{x})^2} \quad (9)$$

式(9)中, I_i 为全局莫兰指数,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n 为主体数量, x_i 和 x_j 分别为主体 i 和 j 的水平, $\bar{x}$ 表示整体平均水平。

局部莫兰指数研究对象在局部的相关和集聚特征,具体公式如下:

$$JL_i = \frac{n(x_i - \bar{x}) \sum_{j=1}^n (x_j - \bar{x})}{\sum_{i=1}^n (x_i - \bar{x})^2} \quad (10)$$

式(10)中, JL_i 代表局部莫兰指数,其余与上式相同。

四、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变动趋势与空间演变特征

在上一章测度结果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从数值变动与空间演变两个层面刻画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动态特征:前者聚焦韧性水平的增减、集散与转移,后者关注空间集聚、空间移动及区域差异。

(一)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变动趋势

本节聚焦对外贸易韧性的数值变动趋势,从时间序列与分布演化两个角度考察其增减变化、集散特征与水平转移,并结合核密度估计与 Markov 链等方法,对省域韧性水平的动态演进规律进行刻画与解释。

1.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先升后降,且东部>中部>东北>西部

全国层面,2012—2023年对外贸易韧性指数呈现先升后降的阶段性轨迹。由2012年的0.2386上升至2020年的0.3181(阶段峰值),随后持续回落至2023年的0.2321(阶段低值)(见表2)。相较2012年,2023年指数下降约2.72%,表明样本期末全国外贸韧性较期初并未实现净改善;而2023年相对2020年降幅达27.03%,说明冲击后韧性修复存在明显不足。结合宏观环境,这一先升后降轨迹与重

大外部事件高度契合。2016—2020年韧性的逆势上扬,主要源于中美经贸摩擦初期的抢出口效应、加速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风险对冲,以及疫情初期中国率先复工展现的补偿性供给优势。然而,2020年后韧性的大幅回落,则揭示了外部冲击向结构性重构演变的深层压力。这不仅受制于疫情后全球外需收缩,更核心的原因是大国博弈从关税战向供应链排斥演进,欧美推进的“友岸外包”等战略引发产业链局部外迁,对中国外贸网络造成了实质性的中长期挤压。

表2 2012—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水平变动情况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全国	0.2386	0.2541	0.2588	0.2271	0.2842	0.2561	0.2975	0.2832	0.3181	0.2517	0.2863	0.2321
西部	0.1955	0.2069	0.2290	0.1755	0.2206	0.1940	0.2274	0.2109	0.2375	0.1802	0.2154	0.1525
中部	0.1969	0.2239	0.2137	0.1649	0.2458	0.1982	0.2509	0.2416	0.2882	0.1879	0.2156	0.1589
东北	0.1924	0.2049	0.1971	0.1619	0.2267	0.1960	0.2521	0.2155	0.2405	0.1809	0.2184	0.1705
东部	0.3291	0.3436	0.3400	0.3459	0.4014	0.3836	0.4233	0.4152	0.4559	0.3971	0.4342	0.389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区域层面,四大板块呈现稳定的梯度格局(东部>中部>东北>西部):2012—2023年东部指数由0.3291升至0.3899(+18.47%),而中部、西部、东北分别由0.1969、0.1955、0.1924降至0.1589、0.1525、0.1705(增幅分别为-19.30%、-21.99%、-11.38%)。总体上,中部、西部与东北的演进路径与全国一致,均在2020年前后达到阶段高点后回落至2023年低位;东部在2020年后虽有波动回落,但2023年仍高于2012年,体现出更强的缓冲—调整能力。结构性变化上,中部在2020年后降幅更大,至2023年,已与西部接近并被西部反超;东北与西部则呈现阶段性“此消彼长”,2015年前东北低于西部,2015年后东北反超西部,西部则长期处于四大区域末位。

进一步看,全国外贸韧性的阶段性变化是抵抗力、恢复力与重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2012—2020年,贸易规模扩张、市场范围拓展和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外部冲击下稳住基本盘提供了缓冲。2020年以后,外需走弱、供应链调整和贸易摩擦长期化,使短期恢复压力逐步转化为结构调整压力,能否通过产品升级、市场转换与供应链重组形成新增长路径,成为区域分化的关键。东部地区凭借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开放平台和市场网络,具有更大的风险吸收与资源再配置空间;其他地区则较易受到外贸规模、开放通道及高附加值供给不足的约束。因

此,区域梯度不仅体现为既有外贸基础差异,也反映各地区适应冲击和重塑发展路径的能力差异。

2.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聚集态势逐渐强化,呈现出极化倾向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聚集程度逐年加深,极化趋势明显。从图2核密度分布的时序变化看,省域外贸韧性总体由相对分散的多峰形态逐步向少峰化、集中化演进,数值集聚持续增强。早期曲线波动较多、分布更宽,表明不同韧性水平的分层较明显;随时间推进,分布的主峰逐渐在低值区(约0.15~0.25)附近抬升并变尖、峰宽收窄,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聚集在较低韧性区间。与此同时,中高值区的起伏逐步减弱、高值尾部趋于平缓,显示高韧性省份的相对占比减少或优势收敛。总体呈现出“低值更集中—高值更稀疏”的非均衡格局,极化倾向有所强化。

3.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数值转移有路径依赖特征,且受邻域水平影响

由表3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可见,各类型向同一类型转移的概率(主对角线)整体偏高,表明省域外贸韧性存在显著的状态黏性与路径依赖。低水平维持概率为0.7200,高水平维持概率高达0.9833;且跨等级跃迁主要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如低→中等0.2800、中等→较高0.2857、较高→高0.2154),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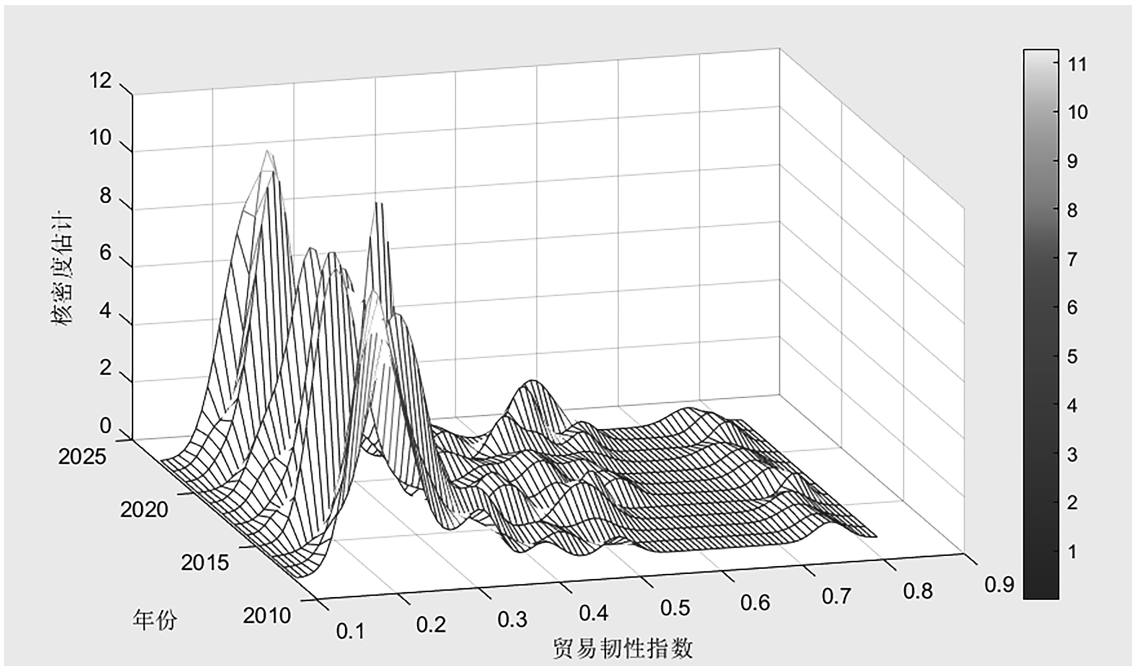


图2 2010—2025年核密度估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表3 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类型	$t/(t+1)$	低水平	中等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观测值
传统	无滞后	低水平	0.7200	0.2800	0.0000	0.0000	75
		中等水平	0.0143	0.7000	0.2857	0.0000	70
		较高水平	0.0000	0.0000	0.7846	0.2154	65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167	0.9833	60
空间	低水平	低水平	0.8077	0.1923	0.0000	0.0000	52
		中等水平	0.0000	0.8889	0.1111	0.0000	9
		较高水平	0.0000	0.0000	1.0000	0.0000	1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中等水平	低水平	0.6000	0.4000	0.0000	0.0000	20
		中等水平	0.0256	0.7179	0.2564	0.0000	39
		较高水平	0.0000	0.0000	0.9286	0.0714	14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3
	较高水平	低水平	0.0000	1.0000	0.0000	0.0000	3
		中等水平	0.0000	0.6111	0.3889	0.0000	18
		较高水平	0.0000	0.0000	0.7778	0.2222	36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13
	高水平	低水平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中等水平	0.0000	0.5000	0.5000	0.0000	4
		较高水平	0.0000	0.0000	0.6429	0.3571	14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227	0.9773	4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转移概率普遍较低(如中等→低 0.0143、高→较高 0.0167)。这意味着韧性演化更倾向于小步调整而

非跨越式跃迁,并呈现一定的“高位稳定—低位滞留”特征。

进一步从带滞后项(空间马尔科夫)结果看,转移概率会随空间背景(邻域韧性水平)而系统性改变,从而强化了上述路径依赖。具体而言:当处于低水平邻域时,低水平地区留在低水平的概率上升至0.8077(高于无条件的0.7200),表现出更强的低位锁定;当处于高水平邻域时,上行跃迁更容易发生,例如中等水平向较高水平转移概率提高至0.5000(高于无条件的0.2857),较高水平向高水平转移概率提高至0.3571(高于无条件的0.2154),显示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与此同时,高水平在高水平邻域中的维持概率仍保持在0.9773的高位,体现出高位稳定性与自我强化机制。

总体上,省域外贸韧性呈现“自身状态黏性+空间背景强化”的双重机制:低位地区更容易在低位邻域中延续滞留,高位地区更容易在高位邻域中保持稳定并带动周边上移,从而形成具有空间意义的演化路径。

(二)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空间演变特征

本节在数值变化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向对外贸韧性的空间演变,重点识别省域韧性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格局,以揭示区域差异的空间组织方式及其动态变化。

1.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整体空间聚集程度增强,冷点集聚阶段性加深

整体空间相关性由弱转强,并在中后期显著为正。表4显示,2012—2016年全球Moran's I接近0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早期省域外贸韧性空间依赖性较弱;自2017年起Moran's I转为显著正相

关(如2017年 $I=0.2279, p=0.0141$),此后多数年份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多次通过5%显著性检验(2019—2023年均显著为正,2020年 $I=0.2745, p=0.0048$;2022年 $I=0.2936, p=0.0039$)。

表4 2012—2023年整体Moran's I指数

年份	Moran's I	z值	p值
2012	0.0315	0.6683	0.5039
2013	-0.0138	0.2246	0.8223
2014	0.0541	0.9065	0.3647
2015	0.0882	1.1340	0.2568
2016	0.0804	1.0919	0.2749
2017	0.2279	2.4534	0.0141
2018	0.1227	1.4405	0.1497
2019	0.2106	2.2318	0.0256
2020	0.2745	2.8201	0.0048
2021	0.2412	2.4480	0.0144
2022	0.2936	2.8879	0.0039
2023	0.2240	2.2429	0.0249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空间分布呈现“沿海高一内陆低”的稳定梯度,并伴随集聚强化。从等级分布看,高韧性省份主要沿东部沿海经济带集聚,内陆尤其西北地区整体偏低,形成较稳定的空间梯度格局;结合全局Moran's I的上升与显著化,说明这种差异并非随机分布,而是逐步表现为更强的空间集聚与空间依赖。

2. 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总体差异与区域间差异上升,区域内差异总体相对平稳但分化加剧

表5显示,2012—2023年省域外贸韧性的总体差异(Theil)呈现明显的阶段性。2012—2015年由0.0966上升至0.1264,随后回落并在2020年降至0.0808(阶段低点),2021年后快速抬升,至2023年

表5 2012—2023年Theil指数分解

年份	总体差异	区域间差异	区域内差异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2012	0.0966	0.0326	0.0641	0.1198	0.0164	0.0252	0.0024
2013	0.0829	0.0285	0.0544	0.1072	0.0036	0.0219	0.0016
2014	0.0739	0.0233	0.0507	0.0948	0.0019	0.0290	0.0032
2015	0.1264	0.0613	0.0651	0.1156	0.0049	0.0236	0.0084
2016	0.0889	0.0389	0.0500	0.0927	0.0046	0.0204	0.0111
2017	0.1035	0.0553	0.0482	0.0876	0.0064	0.0156	0.0044
2018	0.0863	0.0409	0.0454	0.0819	0.0047	0.0234	0.0015
2019	0.0933	0.0496	0.0437	0.0794	0.0106	0.0147	0.0021
2020	0.0808	0.0443	0.0365	0.0654	0.0032	0.0189	0.0029
2021	0.1297	0.0741	0.0556	0.0896	0.0017	0.0348	0.0014
2022	0.0995	0.0595	0.0400	0.0743	0.0107	0.0067	0.0011
2023	0.1773	0.1023	0.0750	0.1114	0.0069	0.0534	0.001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升至0.1773(阶段高点)。整体而言,2020年后总体差异扩张更为显著,表明冲击后阶段省域韧性的分化在加速。

从结构分解看,区域间差异在2012—2020年大体在0.02—0.06的区间波动(如2020年为0.0443),但2021年后显著抬升,由0.0741(2021年)上升至0.1023(2023年)。同时,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相对重要性增强:2012年区域间差异约占总体差异的33.7%,到2020年已超过一半(约54.8%),2023年进一步升至约57.7%。这意味着近些年总体分化更多表现为板块之间差距的扩大,而非仅是板块内部的离散波动。

区域内差异(总体)在2012—2020年由0.0641下降至0.0365,随后回升至2023年的0.0750,呈现“先收敛—后扩张”的波动过程,但其相对贡献在2020年后有所下降(2023年约占42.3%)。分板块看,内部差异走势具有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持续收敛(0.0164→0.0069),而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明显扩大(0.0252→0.0534);东部地区内部差异长期处于相对高位且呈波动(2012年0.1198、2020年0.0654、2023年0.1114),东北地区内部差异总体较低并呈波动下降(如2016年0.0111降至2023年0.0011)。总体表明:2020年后“区域间拉开+西部内部分化加深”共同推动差异上行,中部则体现出相对收敛的内部整合过程。

结合上述Theil指数的演变趋势,从国家宏观战略安全的视角审视,这种空间差异的动态特征对评估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韧性具有深刻的预警意义。在极端理论情境下,若一国外贸高度集中于单一区域(如东部沿海),其面对外部系统性冲击(如地缘摩擦、海路受阻)的脆弱性将急剧放大;而东中西部相对均衡的空间格局则能依托“陆海内外联动”,为国家系统提供风险缓冲与战略纵深。

综合数值转移、空间相关与区域差异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省域对外贸易韧性呈现出“状态黏性—邻域强化—区域分化”的动态演化特征。传统Markov结果表明,各韧性等级具有较强的状态持续性,高水平地区尤其表现出明显的高位稳定,反映出既有产业基础、贸易网络与开放条件形成的路径依赖。空间Markov进一步显示,邻域环境会显著影响韧性状态转移:低水平邻域强化低位锁定,高水平邻域则有利于向上跃迁,说明省域

外贸韧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2017年以后全局Moran's I总体显著为正,与邻域效应相互印证;2020年以后Theil指数及区域间差异明显上升,则表明空间关联并未带来区域自动收敛,反而在不同发展基础和适应能力作用下表现为更显著的板块分化。由此可见,外贸韧性的空间演化既受到既有发展路径的约束,也受到邻近地区和区域网络的影响,而这些空间差异最终仍有赖地区内部供给、需求、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加以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区域能力视角识别省域外贸韧性空间分异的具体驱动来源及其交互机制。

五、中国对外贸易韧性驱动因素分析

在前述韧性测度与时空演变刻画的基础上,本章进一步识别其形成与分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基于区域能力视角构建解释变量体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检验各因素的解釋力及其交互作用,为分区施策与韧性提升路径提供依据。

(一)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基于空间分异理论,采用空间统计方法,探测并定量分析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的工具。该模型由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风险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这4个子模型组成,其中因子探测器是核心部分。模型如下:

$$q = 1 - \frac{\sum_{i=1}^m n_{D,i} \sigma_{D,i}^2}{n \sigma^2} \quad (11)$$

式(11)中, q 为影响因子对各省份对外贸易韧性空间分布的解釋力, n 为总的研究区单元数, $n_{D,i}$ 为因子 D 中第 i 分区的单元数, σ 为因变量的总标准差, $\sigma_{D,i}^2$ 为影响因子 D 中第 i 分区标准差, q 的大小表示空间分异程度的强弱, $q \in [0, 1]$,当 q 值越接近1时,则空间分异性越强,反之亦然。

交互作用探测器衡量双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釋力,若值越靠近1,则表示交互作用越明显,具体判断依据如表6所示。

(二)理论依据与变量选取

演化韧性理论指出,经济系统韧性并非由单一要素决定,而是多种结构性能力在长期演化中共同作用的结果(Martin R, 2012; Hassink R, 2010)。将该逻辑引入开放经济系统,可将对外贸易韧性理解

为：一国(地区)在外部冲击下维持贸易运行稳定、在冲击后实现修复并通过结构与网络再配置获得持续竞争力的过程性能力(贺灿飞等, 2019; Gnanngnon S K, 2022)。据此, 本文从能力来源而非韧性表现出发, 将驱动机制归纳为四类核心能力——供给能力、需求能力、基础支撑能力与演化能力, 并选取五个可量化变量作为代理指标(见表7)。为提升地区间可比性、弱化规模效应, 相关变量采用人均口径处理。

表6 交互作用结果划分

交互结果	解释力
非线性减弱	$q(x1 \cap x2) < \text{Min}[q(x1), q(x2)]$
单因子减弱	$\text{Min}[q(x1), q(x2)] < q(x1 \cap x2) < \text{Max}[q(x1), q(x2)]$
相互独立	$q(x1 \cap x2) = q(x1) + q(x2)$
双因子增强	$q(x1 \cap x2) > \text{Max}[q(x1), q(x2)]$
非线性增强	$q(x1 \cap x2) > q(x1) + q(x2)$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7 对外贸易韧性驱动因素

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素		
区域制造性供给能力	制造业水平	人均第二产业GDP
区域服务性供给能力	服务业水平	人均第三产业GDP
区域消费需求能力	消费水平	人均消费支出(元)
区域创新演化能力	创新水平	人均专利申请受理数(项)
区域信息基建能力	信息化水平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万个)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23)》、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等。

制造业水平(人均第二产业GDP)：供给能力的实体底座。制造业决定出口供给的产能组织、技术含量与交付稳定性, 是区域参与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关键支撑(潘文卿等, 2015; 唐宜红等, 2018)。制造业水平越高, 冲击下供给中断的概率越低、履约能力越强, 从而增强贸易系统的抵抗力, 并通过稳定生产—交付链条支撑后续的恢复。

服务业水平(人均第三产业GDP)：降低成本与提升协同的软支撑。生产性服务业通过物流、金融、信息与商务服务等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与履约效率, 对外贸活动形成关键支撑(马小淇, 2021; 王瑛等, 2022)。服务业越发达, 越能在冲击后通过金融与物流等要素保障缩短修复时间、

提升订单再组织效率, 从而作用于贸易系统的恢复力, 并强化跨链条再配置的重组力。

消费水平(人均消费支出)：需求侧稳定器与缓冲垫。内需基础更强的地区在外需收缩时更易通过需求转换与市场再平衡缓释冲击, 且能够以内需进口为筹码换取更大的出口空间, 进而提高贸易系统的稳定性(孙久文等, 2017; 徐圆等, 2019)。消费水平越高, 越能在外需下滑时提供内生缓冲并稳定企业现金流与产能利用, 从而同时提升贸易系统的抵抗力与冲击后的恢复力。

信息化水平(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基础支撑能力的网络底座。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缩短交易距离并促进贸易模式创新, 对贸易韧性具有间接而持续的影响(魏昀妍等, 2022; 马建峰等, 2023)。信息化水平越高, 越有利于冲击期的快速感知、在线协同与供应链可视化, 降低交易摩擦并提升替代路径的选择能力, 从而增强恢复力, 并通过提高市场与渠道的切换效率强化重组力。

创新水平(人均专利申请受理数)：演化能力的核心内生动力。创新能够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并增强主体适应性, 从而显著提升长期贸易韧性(陈瑾等, 2021; 边丽娜等, 2023)。创新水平越高, 越能通过产品升级与结构再配置实现“重组式恢复”, 从而对贸易系统的重组力贡献更为直接, 同时, 也会通过提升竞争优势改善冲击下的抵抗与后续恢复。

上述变量分别对应“供给—需求—基础设施—创新演化”四类能力来源, 能够在演化韧性框架下形成清晰的机制链条：供给与需求主要决定抵抗—恢复的基础条件, 信息化与服务能力强化冲击后的恢复—重组效率, 而创新能力决定长期的重组—演化上限(Martin, 2012; Hassink, 2010)。同时, 该体系避免将外贸规模或增速等韧性表现直接作为解释变量, 从而减少概念混淆与内生性争议, 提升机制识别的可解释性(贺灿飞等, 2019)。

(三)地理探测结果

在开展地理探测器分析前, 本文先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 以刻画变量与外贸韧性的线性关联, 随后将5个因子经K-means聚类离散化为5类后进行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见表8、表9)。总体上, 各因子与外贸韧性均呈显著正相关, 且因子探测的解释力排序与相关性排序一致, 说明结果具

有较好的稳健性。

创新水平:最核心的驱动因素,主要通过结构性升级与适应性重组提升韧性。表8显示,创新水平与外贸韧性的线性相关最强(Pearson=0.678,1%显著),其对韧性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亦居首位($q=0.445$)。这表明外贸韧性的地区差异,首先体现为创新能力差异的空间投影。这表明,中国外贸韧性的提升并非单纯依赖低端产品层面的横向多样化拓展,而是由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即纵向攀升)所主导的。正如同部分研究所指出的,极端情况下高度集中于高端设备出口的结构,由于其极强的全球价值链不可替代性,往往比低端产品的分散出口具有更强的中长期演化韧性。本文关于创新水平的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技术驱动对韧性的核心支撑作用,也构成了对前文结构韧性(HHI指数)的有益补充,即:中国对外贸易正在形成横向分散风险与纵向创新升级双轮驱动的韧性演化格局。交互探测进一步表明创新并非孤立起作用:创新与制造、服务、消费的交互 q 值分别达到0.5603、0.4784、0.5260(均明显高于单因子 q),说明创新更容易与供给与需求条件结合形成综合竞争力;尤其创新与信息化的交互 q 值高达0.6441,且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意味着数字连接与数据能力能显著放大创新对外贸韧性的转化效率。

服务业水平:解释力位居第二,更直接对应恢复速度与履约稳定性的提升。服务业水平与外贸韧性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0.532),因子探测解释力居第二($q=0.313$)(见表8)。相较制造业,服务业

对韧性的作用更集中于交易与组织环节:金融、物流、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融资与结算条件、提升履约与供应链组织效率,使企业在订单波动、物流扰动与信用收缩等冲击下更容易维持运转,并在冲击后更快修复贸易活动。交互结果显示,服务业与制造、消费、创新分别形成较强协同(制造 $\times$ 服务0.4286,服务 $\times$ 消费0.4377,服务 $\times$ 创新0.4784),说明服务体系越完善,越能把实体供给与需求缓冲转化为可实现的交付与恢复能力(见表9);同时,服务业与信息化交互 q 值达到0.555且为非线性增强,表明数字化平台、线上通关与供应链可视化等条件,会显著强化服务体系对恢复与调整的支撑作用。

制造业水平:处于第三梯队,更偏向抗冲击底盘与供给连续性。制造业水平与外贸韧性显著正相关(Pearson=0.456),解释力为 $q=0.247$ (见表8)。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制造业基础更强的地区,产能组织与配套体系更完整,面对外需波动或供应链扰动时更不易出现系统性断供,从而在冲击期更能稳住基本盘;同时,稳定的生产与交付能力也使其在冲击后更容易承接订单回流与替代需求,推动韧性修复。交互探测显示,制造业与创新(0.5603)和服务(0.4286)的协同显著强于制造业单独作用,表明制造能力需要与技术升级与服务体系共同作用,才能从规模供给进一步转化为高质量、可调整的韧性优势(见表9);制造业与信息化的交互 q 值为0.4471且呈非线性增强,说明数字化协同与供应链可视化能够放大制造体系在冲击下的调

表8 Pearson相关性及因子探测结果

	制造业水平	服务业水平	消费水平	创新水平	信息化水平
Pearson 指数	0.456***	0.532***	0.455***	0.678***	0.201***
Q statistic	0.247***	0.313***	0.238***	0.445***	0.1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表9 总体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制造业水平	服务业水平	消费水平	创新水平	信息化水平
制造业水平	0.2474	-	-	-	-
服务业水平	0.4286	0.3126	-	-	-
消费水平	0.3757	0.4377	0.2379	-	-
创新水平	0.5603	0.4784	0.5260	0.4455	-
信息化水平	0.4471*	0.5548*	0.3863*	0.6441*	0.109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注:*表示因子交互作用为非线性增强,无角标表示其他除自身外的两两交互为双因子增强。

度与替代能力。

消费水平:处于第三梯队,体现需求侧缓冲与稳定预期的韧性支撑。消费水平与外贸韧性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0.455),解释力为 $q=0.238$ (见表8),与制造业接近。这说明在外需收缩或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内需条件较好的地区更可能通过需求转化、预期稳定与现金流支撑,降低冲击对贸易活动的传导强度,进而改善恢复路径。交互结果显示,消费与服务(0.4377)、与创新(0.5260)均表现出较强协同,提示需求侧缓冲并非替代外贸,而是通过带动服务供给与促进产品升级,增强企业在冲击后进行市场与产品再配置的能力(见表9)。同时,消费与信息化交互 q 值为0.3863且为非线性增强,说明数字渠道、线上交易与数据驱动的市场匹配能提升需求侧缓冲向贸易恢复与调整的转化效率。

信息化水平:单因子解释力较弱,但在交互中呈现显著放大器与乘数效应。信息化水平与外贸韧性虽显著正相关,但相关强度与解释力相对较低(Pearson=0.201, $q=0.110$)(见表8),说明信息化对韧性的作用更多是间接的、依赖其他能力载体的。交互探测清晰揭示了这一点:信息化与创新(0.6441)、服务(0.5545)、制造(0.4471)、消费(0.3863)的交互均表现为非线性增强(见表9),即信息化并非独立拉动韧性,而是通过提升信息流通、协同调度与渠道切换效率,把创新升级、服务保障、制造履约与需求缓冲更有效地转化为冲击后的快速恢复与适应性调整。这一发现也为后文政策启示中“数字化作为协同放大器的组合施策”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依据。

综合因子与交互探测结果,省域外贸韧性呈现“创新主导—服务衔接—制造与需求支撑—信息化放大”的形成机制。创新决定产品升级和长期重组的上限;服务业通过物流、金融和商务协同,将创新与制造供给转化为履约和恢复能力;制造业与消费需求分别从供给连续性和需求缓冲两端稳住基本盘。信息化单因子的解释力虽然有限,却能改善信息传递、资源匹配与供应链调度效率,对其他能力产生非线性放大作用。这表明外贸韧性并非依靠单一要素提升,而是在多类区域能力协同作用中形成。

进一步与既有研究对照可以发现,本文结果既验证了部分已有结论,也拓展了对外贸韧性形成机制的解释。创新水平具有最高的空间分异解释力,

与既有研究关于创新促进生产率提升、产品升级和出口结构优化的结论一致;同时,创新与制造、服务、消费及信息化因素交互后解释力普遍提高,说明创新能力需要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和要素配置条件的共同支撑。制造业、服务业和消费水平虽单因子解释力低于创新,但相互作用普遍表现为双因子增强,表明外贸韧性来源于供给、服务与需求能力的协同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化水平单因子解释力仅为0.110,但与创新、服务、制造和消费的交互解释力分别升至0.6441、0.5548、0.4471和0.3863,说明其更可能发挥连接、匹配与协同的“放大器”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地理探测器反映的是空间分异解释力及因素交互关系,并不等同于严格因果效应,具体传导机制仍需更细尺度的数据和准自然实验进一步检验。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演化韧性视角,构建由外贸总量、外贸增长率、产品结构多元化与市场地域多元化组成的省域对外贸易韧性评价体系,测度并刻画2012—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数值演进、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全国韧性呈阶段性先升后降特征,省域韧性长期保持显著梯度格局,整体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核密度结果表明,韧性分布由相对分散转向集中化与少峰化,低值集聚增强、非均衡性上升,呈现一定极化倾向;马尔科夫转移显示韧性演化具有显著路径依赖与状态黏性,空间马尔科夫进一步表明邻域背景会强化“高位稳定—低位锁定”;全局Moran's I在2017年后总体显著为正,省域韧性空间依赖增强;泰尔指数分解表明总体差异在2020年后显著扩大,区域间差异上升更为突出;区域内差异总体波动有限,但呈现“中部收敛、西部内部分化扩大”等结构性差异;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显示:创新水平解释力最强($q=0.445$),其次为服务业水平($q=0.313$),制造业水平与消费水平居中($q=0.247$ 、 0.238),信息化水平相对较弱($q=0.110$);交互探测表明,各因素普遍呈双因子增强,且信息化与其他因素多为非线性增强,显示韧性更符合“多能力耦合”的协同生成机制。政策启示如下。

构建“分区协同、梯度提升”的韧性外贸格局。测度结果表明,省域韧性存在显著梯度(东部>中部

>东北>西部),且空间集聚性在2017年后达到显著水平、并长期维持较高强度(全局 Moran's I 在2017—2023年 p 值均低于0.05)。同时,2020年后区域间差异明显抬升(2021年0.0741→2023年0.1023),提示冲击后阶段分化加速。因此未来应致力于打破过度依赖单一沿海区域的系统脆弱性,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通过持续提升中西部内陆地区在全国外贸版图中的枢纽地位,构建多点支撑、东西互补、风险分散的国家级外贸空间防御与演化体系,以此全方位提升国家抵御极端外部冲击的综合韧性。

以创新能力为首要抓手,推动出口供给从“规模优势”向“技术—结构优势”转换。核密度结果显示,韧性分布聚集加深、波峰宽度收窄并呈显著极化,说明仅靠规模扩张难以改变结构性分化。地理探测器显示创新水平解释力最强($q=0.445$),显著高于其他因素。政策上应强化“科技—产业—贸易”联动:在宏观层面完善高技术产品与关键中间品的创新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机制;在微观层面面向外向型企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出口产品标准与认证支持,以创新驱动出口质量与结构升级,从源头增强抵抗力并提升冲击后的重组能力。

做强服务性供给,补齐外贸“恢复—重组”环节的能力短板。地理探测结果表明,服务业水平对外贸韧性的解释力为0.313,仅次于创新水平,且与制造、消费和创新等因素均表现出较强的双因子增强效应,与信息化水平的交互作用则呈现非线性增强。这说明,服务性供给不仅能够通过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环节提升贸易履约与资源配置效率,还能够强化制造供给、需求缓冲与创新能力对外贸韧性的转化。因此,应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水平,宏观层面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完善国际物流、贸易金融、信用保障等服务体系;微观层面强化外贸综合服务、供应链管理、跨境结算等能力,提升贸易活动的恢复与调整效率。

夯实制造性供给基础,以产业链协同提升外贸抵抗与重组能力。地理探测结果显示,制造业水平对外贸韧性具有显著解释力($q=0.247$),表明稳定的制造基础和配套能力是外贸体系抵御冲击、维持供给连续性的重要支撑。进一步看,制造业与创新、

服务等因素的交互解释力均明显高于制造业单因子,与信息化水平的交互作用也呈现非线性增强,说明制造能力只有与技术升级、生产性服务和数字化协同结合,才能更充分地转化为外贸韧性。因此,应在稳固制造业基本盘的基础上,加快制造业高端化和关键环节补链强链,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作与风险分担,并通过多元化采购、供应链备份和数字化管理提高生产与交付体系的灵活性,增强外部冲击下的供给稳定性和快速调整能力。

把信息化基础设施作为“协同放大器”,用数字化提升系统韧性。信息化水平虽为基础支撑因子($q=0.110$),但交互探测显示其与制造、服务、消费、创新等均呈增强关系,且与其他因子存在非线性增强特征,说明数字化对韧性具有显著“乘数效应”。同时,2017年后空间集聚显著增强提示韧性扩散更依赖跨区域连接与网络化组织。因此应将数字基建与数字贸易制度供给同步推进:宏观上完善跨境数据流通、数字贸易规则与公共数字平台;微观上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跨境电商与数字营销、供应链可视化与合规管理,通过数字化降低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将数字能力转化为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捕捉力与快速响应力,从而放大创新与服务能力对韧性的边际贡献。

从需求侧与多元化两端分散风险,形成“市场—产品”双重缓冲。地理探测结果表明,消费水平对外贸韧性的解释力为0.238,与制造业水平较为接近,说明较为稳定的需求条件能够在外需波动和不确定性上升时发挥缓冲作用。同时,消费水平与服务、创新等因素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表明需求侧支撑并非对外需的简单替代,而是能够通过稳定市场预期、促进产品升级和改善资源配置,为企业开展市场与产品调整提供更大空间。鉴于产品结构多元化和市场地域多元化本身也是本文衡量外贸重组力的重要维度,应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国内大市场对外贸企业的需求支撑作用,同时,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组合和市场布局,降低对单一产品、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市场和产品的双重多元化增强外部需求波动下的风险分散与适应性调整能力。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省域年度数据有利于揭示中长期空间格局,但可能平滑短期冲击下的快

速下降与恢复过程;*HHI* 主要反映产品和市场的横向多元化,尚不能充分刻画技术复杂度、全球价值链位置及贸易网络关系;地理探测器能够识别空间分异解释力与交互关系,但不等同于严格的因果效应。未来可进一步结合企业和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贸易网络数据及准自然实验方法,区分不同冲击类型与作用阶段,并检验创新、数字化和供应链重组影响外贸韧性的具体传导机制。

注释

①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甘肃、陕西、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古、宁夏、广西、重庆和青海;中部地区包括湖南、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和湖北;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河北、浙江、海南、广东、福建、江苏、天津、上海和北京。

参考文献

[1]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

[2]Rose A, Lim D .Business interruption losses from natural hazard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case of the northridge earthquake [J].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02, 4(1):1-14.

[3]Holling C S .Engineering resilience versus ecological resilience [J].Engineering Within Ecological Constraints, 1996.

[4]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Ecology&Society, 2004, 9 (2) :3438-3447.

[5]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 27-43.

[6]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ionary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12(1): 1-32.

[7]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promising concept to explain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economic adaptability?[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3(1):45-58.

[8]Davies S. Regional resilience in the 2008—2010 downturn: comparative evidenc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1, 4(3):369-382.

[9]Wink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policy experiences and issues in Europe [M]. Berlin: Springer, 2014.

[10]Courvisanos J, Jain A, Mardaneh K.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under crises: A study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J]. Regional Studies, 2016, 50(4): 629-643.

[11]Gong Huiwen, Hassink R. Creating resilient economies: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uncertain times [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7, 206-216.

[12]Fröhlich K, Hassink R. Regional resilience: A stretchedconcept?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8, 26(9): 1763-1778

[13]Mccartney Glenn, Pinto Jose, Liu Matthew. City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from COVID-19: The case of Macao[J]. Cities, 2021, 112.

[14]Gnangnon S K . Development aid and export resil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ference to aid for trade[J]. Economies, 2022, 10(7): 161.

[15]Dingemans A. Trying to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in Chile's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ing a way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rough pragmatic export development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6, 34(5): 643-669.

[16]Friedt F L. Natural disasters, aggregate trade resilience, and local disruptions: Evidence from Hurricane Katrina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1, 29(5): 1081-1120.

[17]Arrère C, Masood M. Cultural proximity: A source of trade flow resilience? [J]. The World Economy, 2018, 41(7): 1812-1832.

[18]Jaarsma M. What drives heterogeneity in the resilience of trade: Firm-specific versu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7, 96(1): 13-33.

[19]胡晓辉. 区域经济弹性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2, 34(8): 64-72.

[20]孙久文, 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经济地理, 2017, 37(10): 1-9.

[21]贺灿飞, 夏昕鸣, 黎明. 中国出口贸易韧性空间差异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0): 1558-1570.

[22]王文宇, 任卓然, 李伟, 等. 贸易壁垒、市场相关多样化与城市出口韧性[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3287-3301.

[23]宗会明, 张嘉敏, 刘绘敏. COVID-19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格局及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3349-3363.

[24]贺灿飞, 陈韬. 外部需求冲击、相关多样化与出口韧性[J]. 中国工业经济, 2019(7): 61-80.

[25]邓宗兵, 曹宇芙, 肖沁霖, 等. 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家精神与对外贸易韧性[J]. 经济经纬, 2024, 41(3): 68-81.

[26]许朝凯, 刘宏曼. 多元化风险、策略调整与出口韧性[J].

-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4):54-68.
- [27]王瑛,李舒婷.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6):127-136.
- [28]徐圆,张林玲.中国城市的经济韧性及由来:产业结构多样化视角[J].财贸经济,2019,40(7):110-126.
- [29]朱小明,宋华盛.目的国需求、企业创新能力与出口质量[J].世界经济研究,2019(7):13-28+134.
- [30]陈瑾,陈泽燕,钱祎,等.中国省份创新能力提升了出口韧性吗?——基于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25-37.
- [31]边丽娜,梅媛.贸易壁垒视角下区域创新对我国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3(7):129-132.
- [32]姜帅帅,刘慧.危机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双刃剑”效应[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1):1-17.
- [33]马小淇.危机冲击下服务业GVC参与程度对制造业出口韧性的影响[J].对外经贸,2021(5):36-39.
- [34]潘文卿,李跟强.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核算: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J].经济学报,2014,1(4):188-207.
- [35]唐宜红,张鹏杨,梅冬州.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J].世界经济,2018,41(11):49-73.
- [36]魏昀妍,岳文,韩剑.区域贸易协定与企业出口韧性[J].当代财经,2023(4):106-117.
- [37]马建峰,刘冰,李凯杰.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出口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价格月刊,2023(8):32-42.
- [38]徐圆,邓胡艳.多样化、创新能力与城市经济韧性[J].经济动态,2020(8):88-104.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Li Xinyan Ren Xiaomeng Shi Jinchu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ounting uncertainty in global trade and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and pathways to enhance i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s. Based on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vering total foreign trade volume, foreign trade growth rate, foreign trade produc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geograph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zing the essence of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sistance, recovery, and reorganization. Combining the AHP and TOPSIS methods,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comprehensive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indices for China's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12 to 2023. Furthermore,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patial Markov chains, the Theil index, and the Moran index are employed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vari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s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overall exhibited a phased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declining, with distinct regional gradients characterized by Eastern > Central > Northeastern > Western region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spatial agglomeration, with advantageous regions primari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polarization trends and path dependence were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nalysis using the Theil index revealed that while intra-regional difference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the primary source of the overall widening of disparities. Further analysis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revealed that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enhanced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followed by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Manufacturing supply capacity and consumer demand capacity together constitute important supporting factors, whil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apacity plays a foundational role. There are generally reinforcing interactive effects among these factors, with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with other factors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and formulating policies to address regional disparit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Geography; Foreign Trade Resilienc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Driving Factor; Geological Detector

(责任编辑:江 夏)

【区域经济韧性与安全专题】

农村数字化驱动农村经济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郭凯 张艳艳 李文洁

摘要:在农村地区推广数字化技术,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释放产业潜力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对农村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进一步揭示,农村数字化主要通过两条路径间接提升农村经济韧性:一是推动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二是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较为显著。通过农村数字化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在优势区域集聚,促进农民技能提升与就业创业能力,显著增强农村经济抵御内外部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农村数字化;农村经济韧性;农村人力资本;农业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102-09 收稿日期:2026-04-02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河南路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程”(2624004105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分层分类帮扶政策与农村低收入家庭发展韧性的适配机制和路径研究”(25BJY187)。

作者简介:郭凯,男,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44)。

张艳艳,女,山东女子学院讲师,通信作者(济南 250300)。

李文洁,女,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讲师(郑州 450044)。

一、引言

当前,我国农业与农村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升农村经济韧性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张宝生等,2025)。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的《2024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筑牢数字乡村发展底座”“推动乡村数字文化振兴”“健全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等任务。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进一步凸显了数字化建设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比数字经济的溢出作用

更加有效(张恒硕等,2024),因此,农村数字化有望在增强农村经济系统的扰动适应能力和转型重构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情形下,探讨如何将农村数字化转型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对于通过提升数字化水平增强农村经济韧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围绕农村数字化和农村经济韧性的关系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村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和影响因素分析。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农村经济韧性并非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概念。农村经济韧性的核心内涵包括“抵御外部冲击、适应环境变化以及推动转型发展”三方面(王韶华等,2025)。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经济韧性是一套包含经济资本、生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蔡雪玲等,2024)。在明晰内涵的基础上,有些学者探究了基本公共服务(李琳等,2025)、农村电商发展水平(闫广实,2024)、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杨头平等,2025)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二是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共识。一些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重要驱动力,通过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及性缓解农户融资压力,并借助新型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增强发展韧性(刘宪娟,2025)。数字乡村建设则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与电商服务体系,促进特色农业发展,从而系统提升农村经济体系抵御冲击、适应变化与实现转型的能力(苏飞等,2025)。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拉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由于精准农业技术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并依赖规模经济,资源禀赋较弱的农户难以平等享受技术红利,可能引发“马太效应”(平卫英等,2025)。此外,数字技术对低技能岗位形成替代压力,对农村青年群体的就业规模与职业稳定性产生冲击(周亚虹等,2025)。随着数字技术逐步替代传统农业中大量依赖人力的环节,农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下降,可能引发季节性失业及结构性就业矛盾。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现有学术研究尚未对此展开系统性分析。其次,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作用于农村经济韧性的机制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无法评估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最后,多数现有研究局限于理论探讨或微观案例分析,缺乏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系统分析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对现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第二,深入剖析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产生影响的机制,揭示其传导路径,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第三,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进行定量实证检验,并探讨区域异质性,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和针对性。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农村数字化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多维度

且复杂的。本文认为农村数字化不仅直接提升了农村经济韧性,而且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和农业产业集聚等途径,形成提升农村经济韧性的综合效应。

(一)农村数字化与农村经济韧性

农村数字化作为一项渗透性技术,通过数据、信息和技术赋能,增强了农村经济的抵抗力、适应力和转型力。农村数字化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表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强化农业生产韧性与经营稳定性。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实现精准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减少自然灾害和资源波动带来的产出损失,这直接提升了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成德宁等,2024),增强了农业本体的抗风险能力。数字化电商渠道减少了农产品销售的中间环节,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谷贱伤农”,增强了农产品销售的稳定性(张滢等,2025)。第二,夯实乡村微观主体发展保障。数字化有助于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使农户更便捷地获得信贷和保险服务,为农户在遭受冲击时维持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增强了微观主体的财务抵抗力。数字化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的学习渠道,促进知识溢出与农民技能提升,增强了农村人力资本适应力。同时,数字化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市场信息匹配,加速就业转移(周强等,2024)。第三,提升乡村产业链弹性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数字化工具能帮助农户和企业基于实时数据调整种植结构、生产计划和库存管理,使供应链更具弹性。在生态保护方面,数字化提升了农村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了乡村生态振兴的环境保护水平(赵梦宸,2025)。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能够吸引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向农村集聚,形成新的创新生态,这有助于发展绿色低碳农业,推动农村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H1:农村数字化水平直接提升农村经济韧性。

(二)农村数字化、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韧性

数字化技术通过创新农民技能培训模式,大幅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适应性。一方面,农村数字化设施打破了知识和技能传播的时空限制,推动传统农民向掌握数字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转变。数字化技术创建高度仿真的农业操作环境,使农民能够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实践操作训练,从而有效规避现实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与复杂

性。同时,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力,改进培训方法,并促进农业环境中的远程协作。数字化农技员可以提供24小时在线指导,解决传统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技术咨询响应时间大幅度缩短。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通过智能辅助决策提升农户经营管理水平。数字化技术通过帮助农户提高作物产量并实现田间即时监测,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与管理的精细化水平。拥有数字化知识的劳动者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可以在农村电商、智慧文旅、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不断创新,创造农业高附加值新业态,实现了收入增长并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农村数字化水平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村经济韧性。

(三)农村数字化、农业产业集聚与农村经济韧性

农村数字化转型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产业集聚这一特定的产业组织形态。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产业集聚通过创造大规模、同质化的技术需求,为数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与扩散提供了先决条件。数字化基础设施有效打破了地理隔阂,促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服务机构与农户在特定区域内形成地理邻近、业务关联的协同网络。这种集聚效应不仅显著降低了运输与信息沟通成本,而且通过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提升了区域整体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了农业系统应对市场波动的抵抗力。在集聚区内,数字化平台通过整合零散需求,实现了小农户与规模化市场的有效对接,化解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为集聚提供了组织基础。这一过程减少了集群内部的“数字鸿沟”,并通过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数字技术能够沿产业链快速渗透(孟维福等,2025)。当外部冲击发生时,这种基于集聚的、多元化的产业链体系能够通过内部资源重组与业务协同,维持基本功能并快速恢复,展现出强大的适应力与转型力。因此,农业产业集聚不仅有助于巩固粮食安全基础,更通过强化区域经济系统的内部关联性与灵活性,显著增强了农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与实现可持续转型的整体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H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集聚提升农村经济韧性。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农村数字化影响农村经济韧性模型,并对变量进行了测度和描述。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为验证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本研究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RER_{it} = \alpha_0 + \alpha_1 RD_{it} + \sum \alpha_n X_{n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ER_{it} 为农村经济韧性, RD_{it} 为农村数字化水平, X_{nit} 为控制变量, μ_i 和 ν_t 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前述假设,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会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业产业集聚等路径实现。为检验这些机制作用是否存在,本研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M_{it} = \lambda_0 + \lambda_1 RD_{it} + \sum \lambda_n X_{n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RER_{it} = \theta_0 + \theta_1 RD_{it} + \theta_2 M_{it} + \sum \theta_n X_{n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式(2)和式(3)中,中介变量分别为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产业集聚,其他变量定义与式(1)一致。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农村经济韧性的测度

农村经济韧性是指农村经济系统在应对内外部复杂冲击时所展现的抵御冲击、适应变化与实现转型的综合能力(苏飞等,2025)。基于韧性的核心内涵并参考已有研究(王佳等,2025),本文从抵抗力、适应力与转型力三个维度构建了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其进行综合测度,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其中,抵抗力侧重于衡量经济系统在冲击下维持结构稳定与缓冲风险的能力,其建设涵盖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以及应急储备与保障体系等方面。粮食产出作为最基础的应急物资,其产量直接决定了储备规模与应急响应的可持续性。同时,农村劳动力是应急能力的核心承载主体,灾后抢种补种、生产设施修复等关键恢复活动均直接依赖于农业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因此,农村经济抵抗

表1 农村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抵抗力	人均生产总值	生产总值/总人口	正
	粮食安全	人均粮食产量	正
	农村劳动力规模	乡村从业人员数/农村总人口	正
	农业基础设施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正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第一产业产值/GDP	正
适应力	森林覆盖率	农村森林面积/总面积	正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量/总排放量	正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正
	农村居民消费能力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正
	非农产业比重	第二、三产业产值/GDP	正
转型力	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	正
	农村发展投入	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正
	乡村医疗水平	村卫生室数	正
	农民创业活跃度	(农村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农村个体创业人数)/乡村从业人员	正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力建设是筑牢发展根基、确保经济系统在冲击中维持基本运转与稳定的首要屏障。

适应力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系统在面临冲击时,通过灵活调整其资源配置、行为策略与组织结构,以实现快速恢复与动态调整的能力。其核心在于经营模式的创新以及生产、生活条件的系统性改善。生产性服务业的壮大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有效降低了农村经济对传统农业的单一依赖,从而显著增强其在应对自然灾害等冲击时的恢复弹性。与此同时,森林覆盖率的增加与生活污水处理率的提升,不仅优化了乡村生态环境,也为可持续适应提供了基础条件。

转型力则是指引农村经济系统向更高效率、更具韧性和更可持续形态进行根本性结构变革的能力。这种结构性转变的根本驱动力来自农民创业活跃度、科技创新投入、农村医疗水平提高以及持续性的乡村资本注入。农民创业活跃度提升能够盘活乡村闲置要素,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并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农业科技创新是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直接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为转型奠定了技术基础。而掌握新知识、新技能与新视野的“新农人”是转型的具体实施者,他们与持续的资本投入共同构成了推动转型的核心要素,直接改变了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此外,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是维持并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必要条件,也是增强乡村居住吸引力与人才留存率的软环境保

障,为长效转型提供了人力支撑。

2. 农村数字化水平的测度

本文借鉴阿布都瓦力·艾百等(2024)与陈林生等(2025)的测度框架,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化基础设施、经营数字化、流通数字化与治理数字化四个维度的综合指标体系,用以测度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见表2)。《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数字乡村建设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关键行动领域。其中,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进程的物理承载与硬件基础,直接反映了数字资源的覆盖广度与投入强度(陈晓东等,2025)。经营数字化则为智慧农业的实践与农村新业态的孵化提供了具体的技术路径与发展范式。流通数字化通过创造新兴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激发了乡村市场的经济活力。治理数字化则深刻重塑了农村社会的运行机制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显著推进了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上述四个维度系统性对应了农村经济社会中生产、流通与公共服务等核心环节,并形成了一个从数据生成、数据价值化到数据赋能应用的完整闭环。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农村人力资本(UHR)以及农业产业集聚(AAI)。本文采用“各省份乡村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反映出我国各省乡村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农业产业集聚采用区位

表2 农村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数字化基础设施	互联网普及率	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农村人口数	正
	农业气象监测网络覆盖程度	环境与农业气象观测业务站点个数	正
经营数字化	农村电子商务销售额	基于网络订单销售的商品和服务总额	正
	农村数字化基地	淘宝村数量	正
	网络支付水平	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指数	正
	农村数字经验示范县建设规模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数量	正
流通数字化	农村投递线路	农村投递线路/公里	正
	已通邮的行政村占比	已通邮的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重	正
治理数字化	数字化人才队伍	农业技术人员	正
	信息技术应用投资	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	正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熵进行测算,具体公式为:某省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全国该产业总产值的比重,除以该省份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4.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财政涉农支出(*GAE*),以财政预算中用于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财政支出表示。这类支出能够直接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增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风险抵御能力;农村固定资产投资(*RIF*),采用各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具体额度作为衡量指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不仅能够夯实农村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还能有效激发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进而带动农村产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城镇化水平(*UL*),采用城镇人口占各省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农村新业态(*LEA*),采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量表示。农村新业态的培育与发展,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多元化的收入渠道,减少了对传统农产品的依赖,增强了农村经济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抗风险能力。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选取2011—2023年我国30个省份(剔除西藏、台湾及港澳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探讨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旅游业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为了降低变量间的共线性与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涉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对数化处理。表3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4显示了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列(1)系数为0.82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至列(5)是在列(1)基础上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农村经济韧性(<i>RER</i>)	390	0.325	0.113	0.796	0.113
农村数字化水平(<i>RD</i>)	390	0.209	0.106	0.686	0.032
农村人力资本(<i>UHR</i>)	390	7.810	0.620	10.065	5.848
农业产业集聚水平(<i>AAI</i>)	390	0.562	0.232	1.063	0.225
财政涉农支出(<i>GAE</i>)	390	6.234	0.584	7.283	4.519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i>RIF</i>)	390	5.328	1.112	6.874	0.742
城镇化水平(<i>UL</i>)	390	0.606	0.119	0.896	0.350
农村新业态 (<i>LEA</i>)	390	28.482	11.880	61.000	5.000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拟合强度增加。这表明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增强效应,假说1得到验证。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RD</i>	0.829*** (0.048)	0.844*** (0.050)	0.556*** (0.076)	0.578*** (0.074)	0.396*** (0.075)
<i>GAE</i>		0.030** (0.011)	0.059*** (0.014)	0.018 (0.015)	0.025* (0.015)
<i>UL</i>			0.252*** (0.049)	0.528*** (0.056)	0.494*** (0.061)
<i>RIF</i>				0.052*** (0.006)	0.057*** (0.007)
<i>LEA</i>					-0.012 (0.007)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153*** (0.011)	-0.013 (0.075)	-0.311** (0.098)	-0.467*** (0.092)	-0.430*** (0.096)
N	390	390	390	390	390
<i>R</i> ²	0.443	0.437	0.481	0.558	0.561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对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的双边缩尾处理、调整样本时间区间、剔除直辖市样本。另外,从时间层面考察,农村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将农村数字化滞后一期(*L**RD*)进行回归。表5的列(1)至列(4)结果显示,经过上述检验后,农村数字化水平的系数仍在1%显著性水平上保持正向显著,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国家2020年10月开始数字乡村试点,因此调整的样本区间设定为2011年至2020年。在四种稳健性检验下,农村数字化均能提高农村经济韧性,证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三)内生性检验

同时为了缓解因测度误差及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来排查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作为工具变量(*IV*)”。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直接反映了数字服务的普及程度,与农村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联,满足工具变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1% 双边缩尾	更改时间区间	剔除直辖市样本	自变量滞后一期
<i>RD</i>	0.469*** (0.075)	0.385*** (0.100)	0.425*** (0.082)	
<i>L</i> <i>RD</i>				0.656*** (0.04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cons	-0.372*** (0.093)	-0.474*** (0.137)	-0.319** (0.108)	-0.803*** (0.072)
N	390	300	338	360
<i>R</i> ²	0.590	0.542	0.562	0.637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量与内生变量相关的条件。另外,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更多受通信基础设施政策、网络覆盖工程等外部因素驱动,与当地经济韧性并无直接因果联系,符合外生性标准。表6显示了2SLS的回归结果,在第一阶段,工具变量对农村数字化水平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不可识别检验(*LM*)和弱工具变量检验(*Wald F*)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工具变量不可识别”和“弱工具变量”的情况。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后,农村数字化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

表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RD</i>		0.903*** (0.097)
<i>IV</i>	0.046*** (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cons	-0.959*** (0.045)	0.300** (0.123)
LM statistic	33.76*** (0.000)	
Wald F-statistic	130.12 (16.38)	
N	390	390
<i>R</i> ²	0.803	0.49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效应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结论依然稳健。

(四)机制检验

基于研究假设,本研究以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产业集聚为中介变量,用来检验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如表7所示。列(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打破了城乡知识资源流动的时空壁垒,为农村人力资本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依托线上教育平台和数字化技能培训课程,农村劳动力可开展常态化学习,了解现代化农业技术,逐步提升劳动力综合素养与专业技能水平。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农村数字化能够以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为作用路径来增强农村经济韧性,假说2得到验证。

表7列(2)回归结果显示,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农业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由单一依赖传统农业向多元化、高附加值产业体系转型,从而系统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与适应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由此可知,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通过促进农业产业集聚从而增强农村经济韧性,假说3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分析

第一,为研究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将全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①,结果如表8列(1)至列(4)所示。从回归结果

表7 机制分析

变量	(1)		(2)	
	<i>UHR</i>	<i>RER</i>	<i>AAI</i>	<i>RER</i>
<i>RD</i>	0.437*** (0.041)	0.185** (0.082)	0.315** (0.049)	0.363*** (0.077)
<i>UHR</i>		0.484*** (0.090)		
<i>AAI</i>				0.053** (0.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cons	0.099* (0.053)	-0.478*** (0.093)	-0.199 (0.660)	-0.427*** (0.097)
<i>N</i>	390	390	390	390
<i>R</i> ²	0.727	0.593	0.656	0.564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来看,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韧性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北地区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导致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因地理限制导致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尚不足以支撑农村经济恢复和转型能力的发挥。

第二,按照农业功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粮食产销平衡区,这些区域在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以及粮食生产规模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可能产生差异。结果如表8列(4)至列(6)所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的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显著,但

表8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粮食主产区	粮食主销区	粮食产销平衡区
<i>RD</i>	0.044*** (0.003)	0.036*** (0.004)	0.045*** (0.010)	-0.001 (0.012)	0.811*** (0.076)	0.656*** (0.081)	0.025 (0.0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057** (0.025)	0.090*** (0.029)	0.022 (0.055)	0.311*** (0.073)	0.166*** (0.019)	0.212*** (0.018)	0.147*** (0.032)
<i>N</i>	130	78	143	39	169	91	130
<i>R</i> ²	0.384	0.127	0.290	0.027	0.482	0.532	0.053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是在粮食产销平衡区却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数字化技术通常需要一定的规模门槛才能发挥成本效益。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省份农业经营模式较为分散,使得数字化投入的边际收益降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升农村经济抵御风险与自我恢复的能力,是筑牢农村发展根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本文基于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村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增强农村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发展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提升农村经济韧性:

第一,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补齐农村数字基建短板。一是统筹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全域升级,加大对农村5G网络、物联网基站、智能终端等硬件设施的投入,重点补齐偏远乡村、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短板,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田间地头、农户家庭延伸。二是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搭建综合性农村数字服务平台,整合农业生产指导、农产品流通、乡村治理等各类资源,降低农户与经营主体的数字使用门槛,让数字化红利覆盖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三是健全农村数字服务体系,培育农村数字服务主体,为农户提供数字技术咨询、操作指导等便民服务,破解农村“用数字难”的问题。

第二,构建“数字化+人力资本”培育体系,推动农村技能培训与人才激励落地。一是整合线上线下培训资源,搭建农村数字技能培训平台,面向农户、返乡创业者、乡村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针对性开展数字农业技术、电商运营、数字管理、直播带货等专项培训,精准匹配农村生产经营实际需求。二是畅通知识溢出渠道,依托数字化平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技能资源向乡村下沉,建立城乡数字技能帮扶机制,鼓励城市技术人才、高校毕业生深入乡

村开展技术指导,缩小城乡数字素养与技能差距。三是,完善农村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对参与数字技能培训、取得相关技能证书、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的人员给予补贴与扶持,激发农村劳动力提升数字技能的积极性,持续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发展韧性。

第三,以规模化、数字化为导向,培育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业产业集群。首先,政府应结合各地农业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规划集聚区域,杜绝同质化与盲目集聚。其次,推动数字技术在集聚区域的普及应用,赋能农业生产精准化、加工智能化、流通便捷化,提升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最后,完善集聚区域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企业与农户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紧密合作模式,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增强农户参与产业集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四,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优质要素向农村有序流动。一是完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破除社保等制度障碍,鼓励城镇人才、返乡创业者、高校毕业生扎根乡村,建立城镇技术人才对口帮扶农村机制,推动先进生产管理经验的向农村扩散。二是引导城镇社会资本投向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产业等领域,优化农村资本配置结构,为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三是依托城镇消费市场,推动农村特色产业与城镇消费需求精准对接,培育农村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城镇电商平台、商超渠道拓宽农产品销售路径。

第五,推进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一是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依托其较好的产业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与发展条件,进一步加大数字农业升级投入,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与农业生产、流通、销售深度融合,放大数字化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二是对于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聚焦粮食生产安全与农产品流通效率,搭建粮食数字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在粮食种植、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的应用,提升粮食生产效率与流通稳定性,强化粮食安全保障下的农村经济韧性。三是对于东北地区及非核心粮区,重点补齐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优先推进轻量化、低成本的数字化改造,聚焦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因地制宜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避免同质化建设,逐步缩小区域间数字化

赋能差距,推动农村经济韧性均衡提升。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含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含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含辽宁、吉林、黑龙江。

参考文献

[1]张宝生,孙嘉慧,王晓红,等.新质生产力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07-15.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50715.0950.004>.

[2]张恒硕,李绍萍,钱学胜.数字化发展、乡村建设与农村节能减排[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4,23(2):206-215.

[3]王韶华,李庆怡,张伟.绿色金融对农村经济韧性影响效应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5,41(14):139-144.

[4]蔡雪玲,庞智强.数字经济对农村韧性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4(3):61-68.

[5]李琳,韩继良,朱玉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了农村家庭发展韧性吗?[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2):62-75.

[6]闫广实.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4(11):101-104.

[7]杨头平,朱佳龙.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与农村产业融合:影响效应、机制分析与对策建议[J].农村经济,2025(5):126-136.

[8]刘宪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机制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问

题,2025(9):125-144.

[9]苏飞,吴宝锐,张平宇,等.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经济韧性耦合协调的时空演进及驱动机制[J].地理科学进展,2025,44(7):1434-1451.

[10]平卫英,王瑶华,张谊瑞.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居民增收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农业技术经济,2025(8):80-104.

[11]孟维福,王艳丽,张高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的研究[J].经济纵横,2025(7):76-89.

[12]周亚虹,萧莘玥,杨岚.乡村数字化转型、就业机会选择与农民增收[J].社会科学,2025(3):120-132.

[13]成德宁,黄诗琪.农村数字化能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4(2):38-51.

[14]张滢,李昭熠.数字化水平、农村电商平台建设与农村经济韧性[J].农业经济,2025(6):127-129.

[15]周强,李阳.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4):96-107.

[16]赵梦宸.数字化赋能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路径研究[J].农业经济,2025(12):58-60.

[17]王佳,李文星,平卫英.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对农业经济韧性影响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5,41(17):76-80.

[18]阿布都瓦力·艾百,米尔卡米力·多力昆,赵振男.农村数字化与粮食供应链韧性: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4):83-90.

[19]陈林生,胡雅文,胡若兰.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测度及演化趋势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5,41(23):97-101.

[20]陈晓东,周芷青,母宛灵.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J].区域经济评论,2025(6):97-108.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Driving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Guo Kai Zhang Yanyan Li Wenjie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rural areas holds significant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unleashing industrial potential.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digit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a conclusion that remains robust after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treatmen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rural digitalization indirectly enhances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primarily through two pathways: promoting rural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 and facilita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rural digitalization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major grain-consuming areas. By advancing rural digitalizatio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advantageous regions, and deepen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the ability of the rural economy to withst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isks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 Rural Digitalizati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Rural Human Capit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责任编辑:墨 衡)

【区域开放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特征 与政策展望

李沛霖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经历了五个阶段:1978—1991年的沿海试点、1992—2001年的梯度开放、2002—2012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市场、2013—2020年的制度型开放探索以及2021年以来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笔者基于历史进程材料和定量数据,按照五个阶段框架梳理区域开放的基本情况、主要成就、阶段性特征、演变动因和问题演进。研究发现,前四个阶段依次推动了开放通道形成、平台体系扩展、外向型产业体系构建和制度型开放探索;第五阶段则呈现出以制度型开放为主线、沿海门户与内陆枢纽及沿边支点协同发展的新特征,其背后受到国家战略牵引、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升级、平台制度供给和开放安全要求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与此同时,区域开放问题也具有阶段性演进特征:早期主要表现为政策优惠驱动下制度创新不足,中期主要表现为平台同质化和规模扩张快于能力升级,当前则集中表现为市场集中度偏高、双向投资失衡、东北地区和资源型地区开放动能不足、规制环境差距大、平台效能分化以及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基础不均衡。面向“十五五”时期,建议着眼“一个总体布局、五个战略方向、四大政策重点”优化区域开放格局,以制度型开放和区域协同为主线,推动中国区域开放从“流量扩张型”向“能力生成型”转变。

关键词:区域开放;改革开放;制度型开放;开放平台;政策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111-17 收稿日期:2026-05-26

作者简介:李沛霖,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3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也是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关键变量。区域开放是国家开放战略在区域层面的具体组织形态,是一个地区围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推进要素流动、产业嵌入、规则衔接、功能重塑和治理优化的系统过程。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区域开放主要承担扩大外部联系、集聚流动要素、带动外向型增长的功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区域开放更重要的使命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承担资源配置、制度供给、功能重构和治理优化的综合作用。梳理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各地区在中央领导下因地制宜探索开放的实践,对新阶段更好凝聚高水平对外开放合力意义重大。

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经历了五个阶段(见表1)。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的沿海试点,以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是1992—2001年的梯度开放,开放由沿海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延伸,开发区、保税区等平台加快布局。第三阶段是2002—2012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沿海地区依托外向型制造业、港口体系和外资企业网络,成为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载体。

第四阶段是2013—2020年的制度型开放探索,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长江经济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进,使区域开放从政策优惠和要素流动逐步转向规则测试、制度集成和平

台升级。第五阶段是2021年以来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开放重点进一步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沿海、内陆、沿边的功能分工更加清晰。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五个阶段的演进对比

维度	第一阶段 (1978—1991年)	第二阶段 (1992—2001年)	第三阶段 (2002—2012年)	第四阶段 (2013—2020年)	第五阶段 (2021年至今)
开放范式	要素流动型开放的沿海试点	梯度开放的空间扩展	全面外向型扩张	制度型探索的平台升级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
空间格局	沿海点状突破	沿海成带、沿江沿边起步	沿海板块主导	江海联动、内陆节点抬升	沿海门户、内陆枢纽、沿边支点协同
能力积累	打开通道、形成支点、确立方法	平台化推进、板块化展开	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制度创新取代政策优惠	制度型开放成为主线
转型瓶颈	政策趋同化、制度创新不足	政策洼地竞争可持续性问题的	规模扩张快于能力升级	制度创新成果扩散不充分	制度供给与能力需求差距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相关文献看,区域开放研究最初主要围绕贸易开放、外资流入和地区增长展开。国际经典研究强调贸易开放对收入提升和生产率改进的作用, Frankel 和 Romer (1999)、Sachs 和 Warner (1995) 从宏观层面讨论开放与增长的关系, Melitz (2003) 则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揭示贸易自由化通过资源再配置提升行业生产率的机制。国内研究长期关注外贸依存度、外资规模和区域开放度测算,强调开放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张远鹏等, 2021; 张学良等, 2024)。随着中国从开放型经济大国迈向开放型经济强国,研究重点逐渐从开放规模转向开放质量(李沛霖, 2021; 金瑞庭, 2023)。

近十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各地区开放能力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并结合内外部形势变化对区域开放格局提出建议,相关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一是用国家战略平衡各地开放差距的政策协调取向。以郭锐等(2016)、安树伟(2018)、魏后凯等(2020)以及李兰冰等(2020)的研究为代表。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指出,中国既有开放格局具有较强的沿海和向东偏向,区域开放格局需要在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的同时,提高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开放水平,形成沿海—内陆—沿边统筹、陆海联动和东西互济的空间结构。如魏后凯等(2020)提出,应以四大板块战略为基础、以重点带区战略为骨架,推动形成陆海统筹

以及沿海地区、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三线协调的全域开放格局。刘慧等(2015)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认为国际经济走廊、海上通道和跨境基础设施联通将改变传统以沿海地区为中心的开放空间结构,推动内陆地区形成开放型经济高地,并使沿边口岸和边境城市成为新的国土开发空间。安树伟(2018)从区域政策演变角度提出新时代区域经济格局应进一步转向面向全球的“沿海—内陆—沿边”全面开放新格局。郭锐等(2016)进一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开放划分为“向东开放主导”和“陆海统筹、东西双向开放”两个阶段,指出前一阶段强化了经济发展、人口集聚和基础设施网络的“东高西低”“东密西疏”格局,而后一阶段则有助于通过“一带一路”引导下的创新驱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入和“点—轴”式国土空间组织,缓解区域开放不平衡格局。在这一解释中,“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经济走廊、内陆开放高地和边境经济带不仅是交通或贸易安排,也是调整区域发展机会的重要政策工具。其潜在局限在于,开放范围扩大和通道覆盖增加并不必然转化为区域收入、产业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均衡。

二是集中资源打造城市开放节点的枢纽网络取向。以符正平(2018)、刘洪愧等(2019)、赵峥(2021)以及李佳洺等(2024)的研究为代表。该取向更强调开放活动的空间集聚和网络组织,认为开放资源不宜在各地区平均铺开,而应依托中心城市、城市群、港口与陆港、自由贸易平台以及战略通道形成若干高能级节点,再通过枢纽—通道—腹地联系构成多中心、网络化的开放体系。其理论依据

在于,开放活动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特征,交通成本下降也只有与产业集聚、物流组织和区域分工相结合,才能形成持续的开放效应。如李佳洺等(2024)从新发展格局下国土空间网络化组织出发,强调应通过“三横三纵”重大战略通道促进国内战略通道与对外通道融合,提升沿海城市群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从而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空间支撑。符正平(2018)从自由贸易港建设角度指出,新时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重点在于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带动能力更强的开放新高地。相较于第一种取向,该观点更重视市场效率和节点选择,反对把空间均衡简单理解为项目与平台的平均配置;但如果核心节点与腹地之间缺少产业和利益联系,开放收益仍可能集中于少数枢纽城市,出现“通道经济”与地方经济相脱节的问题。

三是依托规则与产业分工释放开放价值的产业链制度取向。以夏先良(2018)、江小涓(2019)、全毅等(2021)、王喆等(2021)、余丽平等(2022)以及张二震等(2023)的研究为代表。该取向认为,物理通道、口岸和开放平台只是区域开放的必要条件,开放格局能否实际促进发展,更取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及区域在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关研究主张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通过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差异化制度创新、衔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及强化跨区域产业关联,把贸易和投资流量转化为区域增加值、技术升级与产业发展能力。如全毅等(2021)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已推动形成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新一轮全面开放态势,但未来需要从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进一步转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和差异化探索。江小涓(2019)研判未来中国开放将进入以水平分工为主的全球化阶段,开放政策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与前两种取向相比,这一观点的分析重点由开放设施的空间分布转向开放收益的形成和分配机制,因而能够解释“开放程度较高但带动能力有限”等现象;不过,其对制度和价值链机制的强调,有时相对弱化了地理距离、节点层级与跨境通道差异的独立作用。

近五年来,随着各地实践的深入,制度型开放及其依托的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高水平开放平台的运作成为区域开放研究的重要方向(戴翔,

2019;江小涓等,2023;杨志浩等,2026;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兼顾了上述三种取向,既探索集聚—扩散理论在区域开放经济中的应用,也探索具体的制度型开放政策和全球价值链区位的影响。相关研究指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从降低关税和扩大要素流动,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拓展,形成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是高水平开放制度的标志(尹晨等,2023;胡再勇,2023)。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成为观察制度型开放政策成效的重要载体。已有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对地区外贸增长、投资便利化和营商环境改善具有积极作用(罗舟等,2021;王兵等,2023),但不同区域承接制度创新、复制推广经验和转化平台效能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聂新伟等,2022;王豪等,2025)。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区域开放的研究已经从单纯解释开放度差异转向解释开放空间结构如何在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通道、全球价值链分工、开放平台扩散和制度型开放推进中进行重塑。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区域开放格局正在由沿海地区单向引领向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协同开放转变,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由依托少数增长极的点状开放向通道化、网络化、平台化的开放空间体系转变。

面向新阶段新要求,下一步区域开放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解决目前研究的不足。第一,对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开放格局的阶段性变化已有较多叙述,但将历史演进与“十五五”时期政策展望相结合的研究仍不充分。第二,部分研究以贸易或外资单一维度衡量开放水平,对贸易、双向投资、制度环境和平台效能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相对不足。第三,关于“十四五”以来新兴市场扩张、外资金额承压、ODI稳步增长、跨境电商扩围和制度型开放深化等新特征的综合分析仍需加强。第四,区域开放风险研究仍有待拓展,尤其是部分沿边省份市场集中度过高、东北地区和资源型地区开放动能不足、规制环境不足制约平台效能等问题,需要置于“十五五”政策框架中加以回应。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

开放格局为研究对象,尝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五个阶段演进与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呈现鲜明的渐进式演进特征,先后经历了五个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在开放目标设定、空间组织模式与政策工具选择上各有侧重:改革开放初期以构建开放通道为核心任务,中期以拓展开放空间、深度嵌入全球市场为主要方向,2013年之后逐步向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发展转型。

(一)1978—1991年:沿海试点培育区域开放增长极

第一阶段是中国区域开放的战略启动阶段。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设立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闽南厦漳泉地区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海南建省并设立经济特区;1990年启动浦东开发开放。上述政策举措共同搭建起中国区域开放的初始制度框架。

该阶段,在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制中率先打通对外开放通道,构建了首批对外开放前沿支点,同时确立了“沿海先行、局部试验、梯度推进、以点带面”的开放空间路径,证明增长极等区域经济管理理论在区域开放经济中的适用性。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依托税收优惠、审批权限下放、土地政策倾斜与外资准入便利化等举措,率先承接国际资本、技术与产业转移,推动加工贸易、出口制造业与城市建设实现快速起步。截至1990年,深圳等城市已从边境城镇发展为开放型经济前沿阵地,验证了局部试点为全国改革开放积累可复制经验的可行性。

这一阶段的开放模式以要素流动型开放为主,吸引力主要源于特殊政策安排、低成本要素禀赋与先行地区的区位优势,开放的制度内涵与规则创新能力仍存在局限。随着优惠政策的逐步扩散,先行地区的政策红利呈现边际递减态势。总体而言,该阶段为后续梯度开放格局的形成奠定了空间起点与方法论基础。

(二)1992—2001年:梯度开放推动空间和平台扩展

第二阶段是中国区域开放的空间拓展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与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对外开放从沿海特区进一步向沿海经济带、沿江城市、沿边地区及内陆省会城市延伸。浦东开发开放带动长江沿岸城市加速融入开放体系,苏州工业园区等中外合作园区成为承接外资与借鉴国际制度经验的重要载体,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则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的空间。

该阶段确立了“平台化推进、板块化布局”的区域开放模式。其中,平台化推进以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与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制度化平台为载体,有效降低外资准入与外贸发展的制度成本,印证了集聚同样是中国式开放增效的主要空间形式;板块化布局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沿海经济板块为核心空间单元,形成具备规模效应与外向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区域。截至2002年3月,国务院累计批准设立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志着中国开放平台从点状试点加速转向体系化布局。

该阶段,推动区域开放空间格局从“少数前沿点位”拓展为“沿海成带、沿江沿边起步”的形态。珠三角依托港澳资本与制造业配套体系实现快速发展,长三角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形成外向型产业集群,环渤海地区依托天津、大连、青岛等港口城市保持较快发展势头,重庆、武汉、九江、芜湖等沿江城市及一批边境城市也逐步纳入开放版图。这一阶段的历史贡献在于将早期试点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平台体系,开放是推动优化主要城市群分工、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形成的重要促进力量。

(三)2002—2012年:全面融入全球市场并形成外向型产业体系

第三阶段是中国区域开放的全球融入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区域开放进入高速扩张期。沿海地区依托已建成的开发区体系、港口物流体系、外资企业网络与制造业集群,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2004年、2007年、201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突破1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开放型经济大国地位基本确立。

该阶段,沿海地区成为中国嵌入全球分工体系

的核心空间载体,对外贸易规模、利用外资规模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同步提升。珠三角、长三角与环渤海三大板块承担出口制造、外资承接、港口物流与产业配套的核心功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等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占比持续提升,证明了对不同地区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比较优势研判、产业功能定位总体契合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开放平台也从单一的开发区形态拓展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构成的多层次平台体系,为后续制度型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与组织基础。

与此同时,内陆地区尽管整体仍处于嵌入国际分工跟进阶段,但一批节点城市开始融入全国开放网络。2008年,惠普将笔记本电脑全球制造基地布局重庆,2011年,首条中欧班列“渝新欧”正式开行,标志着西部地区开始依托国际铁路物流通道直接对接欧洲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奠定了基础。

(四)2013—2020年:制度型开放探索推动平台功能升级

第四阶段是中国区域开放由规模扩张向制度型开放探索转型的关键时期。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标志着开放平台的核心功能开始从政策优惠、项目承载向规则测试、制度集成与负面清单管理转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孟广文等,2024;宋周莺等,2023);2014年,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新一批自贸试验区布局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2018年,海南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区域开放空间格局从沿海单轴拓展转向江海联动、内陆节点能级提升与沿边功能强化的多元形态(黎峰,2022)。

该阶段,一方面,开放平台加快从政策洼地向制度高地升级。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价值不再体现为优惠政策的叠加,而是聚焦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职能转变与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黄启才,2018;崔日明等,2021;余振,2026)。另一方面,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航空枢纽、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片区等平台载体形成功能嵌套,一些内陆地区依托不断顺畅的铁路、公路、水路及联运通道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政策优势,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找到了新的比较优势,培育起支撑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新动能(李浩,2026;张祥建,2019)。

该阶段,区域开放评价维度更加丰富。此前,中国主要以进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与平台数量衡量开放绩效,制度型开放探索启动后,评价重心逐步转向规则衔接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平台协同能力与营商环境质量。区域开放的评价标准从“平台是否设立”转向“平台制度效能是否充分释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五)2021年以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加快形成

第五阶段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协同阶段。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2022年RCEP生效,202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印发,2025年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2026年4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获批,标志着自贸试验区网络进一步形成“东中西、沿海内陆沿边”的格局。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阶段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扩大开放流量,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制度供给能力、规则衔接能力、平台组织能力和开放安全能力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在相邻的、具有同类禀赋地区中提升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从宏观视角看,“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开放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成效。

一是外贸规模保持韧性且新兴市场成为重要的增量来源。进入“十四五”时期,在国际经贸秩序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外贸仍保持较强韧性。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至57.3%,开放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从五大区域市场数据看(见表2),2021—2025年中国对东盟、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亚+俄罗斯五大市场的贸易格局出现明显变化:东盟市场规模最大,中亚+俄罗斯和非洲增速突出,欧洲市场高位平稳,拉丁美洲保持稳步增长。

区域层面,东部地区仍是拓展新兴市场和贸易新形态新模式的主引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等省(市)保持规模优势,其中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十五五”期间新兴市场外贸增量将超过

表2 2021—2025年五大区域市场货物贸易规模与增速变化

单位:亿美元

市场	2021年	2023年	2025年	2021—2025年增量	年均增速(%)	2025年份额(%)
东盟	8690.34	9114.72	10543.19	1852.85	4.95	32.45
欧洲(不含俄罗斯)	10209.04	9713.82	10202.00	-7.04	-0.02	31.40
拉丁美洲	4096.74	4485.82	4934.71	837.97	4.76	15.19
非洲	2509.02	2815.56	3477.26	967.02	8.49	10.70
中亚+俄罗斯	1963.46	3296.40	3335.64	1372.16	14.17	10.27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官网统计数据整理。

300亿美元,江苏、浙江对东盟及广东对拉丁美洲的市场开拓成效较为显著(见表3)。中部地区追赶势头明显,湖北、安徽、河南等省份在新兴市场贸易和跨境电商领域贡献上升。西部地区的新疆依托向西开放通道快速增长,在霍尔果斯、喀什等地的优势开放平台政策支持下,小型水电轮机、新能源代步工具制造等面向中亚的外向型产业加速集聚。在贸易新形态方面,跨境电商增长迅速,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7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69.7%。依托便利的出海区位和便捷清关服务,华

南、华东省份高度集聚跨境电商出口货源:广东货源出口占比达51.1%,首次突破五成;其次为浙江16.8%、福建8.1%、江苏4.3%、安徽2.5%,上述五省合计承载全国82.8%的跨境电商出口规模,新的增长曲线为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存和转型提供了难得空间。跨境电商进口消费市场则以东南沿海省(市)为核心,进口规模前五省(市)及对应占比依次为广东14.8%、江苏8.6%、浙江8.5%、上海6.8%、山东5.6%,五地进口总额合计占全国跨境电商进口总量的44.3%。

表3 2021—2025年省际新兴市场增量贡献

单位:亿美元

省份	东盟增量	非洲增量	拉丁美洲增量	合计增量	开放类型
浙江	375.22	204.18	194.54	773.94	多元均衡
江苏	363.34	139.79	82.25	585.38	产业链驱动
山东	288.20	133.30	71.64	493.14	规模支撑
广东	224.97	-8.56	153.34	369.75	龙头规模
广西	164.38	35.41	66.12	265.91	新通道枢纽
湖北	133.52	34.80	58.55	226.88	产业链驱动
安徽	81.24	25.35	66.47	173.05	制造业承接
新疆	82.13	45.20	12.86	140.18	新通道支点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官网统计数据整理。增量为2025年与2021年对相应市场进出口额之差;合计增量根据末四舍五入的原始数据计算,并在最终结果中统一保留两位小数。

二是开放主体从“引进来”进一步转向“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并重。一方面,吸引外资长期是区域开放的主要指标。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推动了出口加工、制造业升级和城市化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企业深度嵌入中国制造业体系,促进了技术、管理和市场网络扩散;进入第五阶段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承压,四大区域FDI强度逐步收敛(见图1),东部地区占比较高(见表4),但区域差距有所缩小,反映出中国区域开放格局正在由沿海地区单极集聚向更加协调、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向演进。另一方面,引资结构发生变化(见表5),新设外资企业数量仍保持活跃,外资进入方式更加小型化、专业化

表4 2024年四大板块投资开放与国际经营表现比较

板块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ODI流量(亿美元)	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亿美元)
东部地区	980.1	918.2	629.16
中部地区	65.9	114.4	216.17
西部地区	77.2	63.0	129.81
东北地区	39.3	-12.2	31.12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官网、万得(Wind)数据库、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整理。

注:ODI流量为净流量,负值表示当期撤资、减资等逆流量超过新增投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为地方公司口径,不含直接向商务部报送的中央企业,各项均由省级数据汇总,海南和西藏不包含在内。

和分散化,这说明在中国投资科研、中试、中间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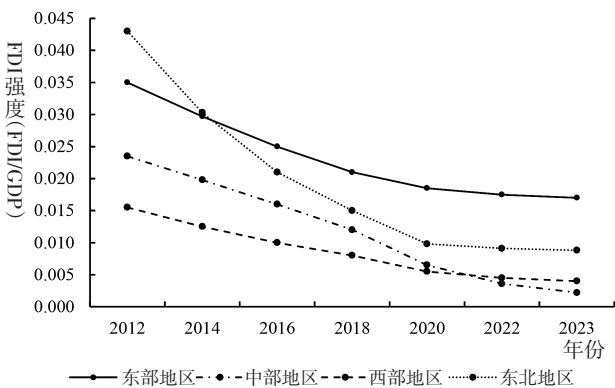


图1 2012—2023年四大板块FDI强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注：各板块FDI为区域内各省份FDI的平均值。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和时间序列预测（ARIMA/ETS）进行补齐。

小规模高价值产品具备更大盈利空间，中国消费市场的多元化也为更多长期深耕细分利基市场外资提供发展机会。从区域分布看，这类企业仍然更多落地在沿海沿江地区。

与此同时，对外投资成为中国区域开放的新维度。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ODI稳步增长并逐步接近FDI规模。区域ODI强度呈现由东部地区引领、其他地区稳步推进的发展格局，各区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对外投资路径（见图2）。东部地区形成“引进来”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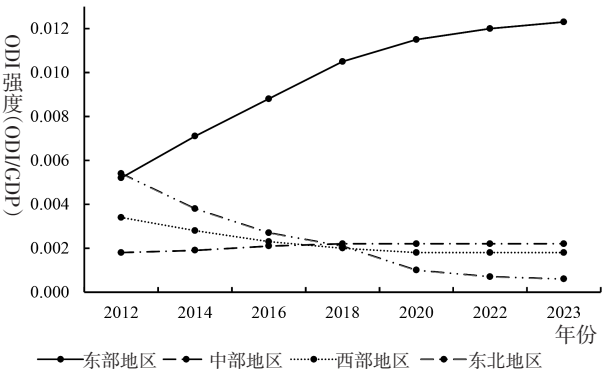


图2 2012—2023年四大板块ODI强度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注：各板块FDI为区域内各省份FDI的平均值。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和时间序列预测（ARIMA/ETS）进行补齐。

出去”双强格局（见表4），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具备较强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中部地区部分省份出现对外投资能力快速提升，河南、安徽等地的本土企业在装备制造、工程承包和产业链延伸型投资中

表5 2021—2025年全国吸引外资活跃度变化

年份	全国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家）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2021	47643	1735.03
2022	38497	1891.50
2023	53766	1632.30
2024	59080	1162.50
2025	70392	1046.76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商务数据中心官网统计数据整理。

表现活跃；西部地区依托自贸港、陆港和跨境通道形成局部突破。双向投资的发展意味着区域开放不再只是被动承接外部资本，而是主动配置全球市场、资源和产业链环节。

三是开放平台体系由政策载体进一步升级为制度载体。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2020—2024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GDP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45.69%和59.7%，对实体经济和外贸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6）。自贸试验区则承担制度创新、

表6 2020—2024年、2025年1—9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开放绩效指标变化情况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	进出口总额（万亿元）	实际使用外资（亿美元）
2020	11.6	6.7	611
2021	13.7	8.7	684
2022	14.0	10.3	432
2023	14.8	10.2	392
2024	16.9	10.7	272
2025（1—9月）	23.5	7.6	192.4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情况》整理。

注：2022年数据根据商务部和中国政府网公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22年度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补入；2020—2021年公开口径为“实际使用外资和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金额”，2022—2024年公开口径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趋势判断以平台绩效变化为主。

规则衔接和改革压力测试功能。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自贸试验区从单点突破扩展为覆盖东中西、沿海内陆沿边的试点网络。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提出，经过5年左右探索，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系统性改革成效和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2026年4月，内蒙古自贸试

验区获批,进一步强化了向北开放和沿边开放功能。

四是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开放评价尺度由“流量”转向“能力”。“十四五”时期,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标准化改革试点快速扩围。规则型、管理型和标准型开放差距有所收窄,规制环境质量成为影响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见图3)。基于市场化指数的测算显示,2023年东部地区规制型开放均值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在市场化水平、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制度供给能力上保持优势。制度型开放的重点由平台覆盖转向平台效能释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开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见表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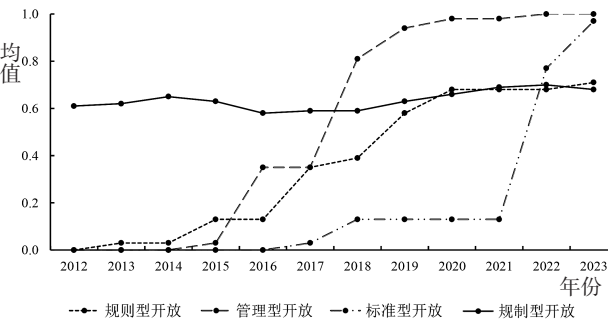


图3 2012—2023年全国制度型开放各维度均值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官网统计数据整理。

注:自贸试验区设立情况用于表征规则型开放,市场化指数等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用于表征规制型开放,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覆盖情况用于表征管理型开放,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情况用于表征标准型开放。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动因

从五个阶段演进历程来看,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是开放空间形态、平台载体功能、动力机制与评价标准的综合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受国家发展战略引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调发展要求与制度型开放能力建设等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中,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以开放通道构建与空间范围拓展为核心,动力源于打破封闭体制、吸引外资技术与释放沿海区位优势;第三阶段以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动力源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工贸易扩张与外向型制造业集聚;第四阶段以制度型开放探索为方向,

表7 2012年与2023年四大板块制度型开放四维比较

板块	年份	规则型	规制型	管理型	标准型	综合指数
东部地区	2012	0.00	0.80	0.00	0.00	0.28
	2023	1.00	0.80	1.00	1.00	0.93
中部地区	2012	0.00	0.61	0.00	0.00	0.21
	2023	0.67	0.72	1.00	1.00	0.82
西部地区	2012	0.00	0.45	0.00	0.00	0.16
	2023	0.50	0.57	1.00	0.92	0.71
东北地区	2012	0.00	0.65	0.00	0.00	0.23
	2023	0.67	0.64	1.00	1.00	0.79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官网统计数据整理。

注:制度型开放四大类型数据和算法与图3一致。各省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分组,分别计算2012年和2023年板块内省份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按既定权重加总形成各省每年的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数,即:制度型开放综合指数=0.25×规则型开放+0.35×规制型开放+0.20×管理型开放+0.20×标准型开放,进而对各省数据进行分组。

动力源于优惠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国际经贸规则变革与国内深化改革的内在需求;第五阶段以开放能力培育为重点,动力源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供应链韧性、统筹开放与安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空间组织由沿海点状突破转向多层次协同网络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空间组织模式呈现鲜明的沿海先行特征,开放布局率先在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与沿海经济开放区展开,随后向沿江、沿边地区与内陆省会城市梯度推进。第三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珠三角、长三角与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空间,沿海板块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第四阶段之后,区域开放的空间组织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欧班列开行与自贸试验区扩围等举措,推动内陆与沿边地区从开放的跟进嵌入者转向功能节点提升者。进入第五阶段,区域开放逐步形成“沿海门户—内陆枢纽—沿边支点”的立体布局。其中,沿海地区承担全球资源配置、规则探索与高端服务开放功能,内陆地区承担通道组织、物流整合与产业承接功能,沿边地区承担周边合作、口岸联通与开放安全保障的复合功能(孙久文等,2019)。

空间组织模式转型,首先源于国家战略重心从局部突破逐步转向区域协调与内外联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沿海先行战略,核心目标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打造开放窗口与制度试验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沿海地区凭借港口、产业链与外资网络优势进一步集聚开放资源;进入新时代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协同推进,推动内陆、沿边地区从开放边缘转向开放节点。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也为区域开放提出了构建多方向、多通道、多层次的高韧性网络体系要求。

(二) 平台载体由政策试验平台转向复合型制度平台

开放平台是中国区域开放的核心承载,平台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持续迭代升级。第一阶段以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为核心载体,主要解决开放突破口的选择问题。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新区与边境经济合作区实现较快扩围,平台功能转向承接外资、扩大出口、发展加工贸易与培育外向型产业集群,主要解决开放支撑体系构建问题。第四阶段、第五阶段,开放平台体系进入复合化、制度化发展阶段。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构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矩阵。开放平台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制度创新、规则对接、产业承载与跨区域协同能力的强弱。

开放平台载体升级的深层动因在于区域开放面临的核心问题发生了转变。早期开放平台主要解决“能否引进来”的问题,核心是通过政策优惠降低市场准入的制度门槛;规模扩张阶段,平台主要承担产业承载与外贸组织功能,核心是通过园区集聚外资、企业与基础设施;制度型开放阶段,单纯依托税收、土地与审批便利已难以形成持久竞争力,平台功能逐步转向规则测试、制度集成、营商环境优化与跨区域协同。在此背景下,开放平台从政策工具转型为制度工具,始终是培育区域开放能力的重要载体。

(三) 开放动力由政策优惠和规模扩张转向制度创新和能力生成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区域开放的核心动力源

于特殊政策安排、审批便利、税收优惠、土地供给与低成本要素禀赋。这一动力机制对于打破封闭体制、吸引资本和技术、打造开放前沿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第三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区域开放动力主要源于全球产业链分工、外向型制造业规模扩张与港口物流体系完善,中国依托要素流动与规模效率优势确立了开放型经济大国的地位。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地方优惠政策趋同与国际竞争焦点向规则体系转移,依托政策差异与要素成本形成的开放动力逐步衰减。第四阶段之后,制度创新逐步取代政策优惠,成为推动区域开放升级的核心动力。第五阶段的发展实践进一步表明,区域开放竞争已从政策优惠、平台数量与开放流量的竞争转向制度供给能力、规则衔接能力、枢纽组织能力、服务开放能力与风险防控能力的综合竞争。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区域开放正从“流量扩张型”向“能力生成型”转型。

动力机制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开放发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一方面,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弱化,地方间优惠政策趋同导致传统招商模式的边际效应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国际经贸竞争的重心逐步转向规则、标准、数据、绿色低碳与供应链控制力等领域,对区域开放的制度供给与专业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为区域开放提供了新的支撑,开放动力不再单纯依赖外部资本与订单输入,而是由国内市场潜力、产业链韧性与制度创新共同构成的综合能力驱动。

(四) 区域类型由“东强西弱”转向多节点支撑和类型分化

改革开放初期,“东强西弱”是中国区域开放差异的基本特征,东部地区具备显著领先优势,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开放基础相对薄弱。第三阶段之后,沿海板块的主导功能进一步强化,同时,内陆节点城市也开始逐步积累开放能力。第四阶段、第五阶段,随着自贸试验区扩围、跨境电商综试区全覆盖、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进,区域开放格局呈现多节点支撑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在跨境电商、对外投资与新兴市场贸易领域加快追赶,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成为新的增长节点;西部地区依托新疆、重庆、四川、陕西等地的开

放通道与平台实现局部突破;沿边地区在面向东盟、中亚、俄罗斯及周边市场的合作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联通功能。

多节点支撑格局催生了更为复杂的区域开放类型。沿海头部省份多为多元均衡型开放,具备市场布局广泛、制度环境优良、平台效能突出的特征;部分沿边省份属于区域导向型或通道依赖型开放,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度较高;东北地区与部分资源型地区则面临引资能力下降、对外投资能力不足与产业结构偏重等问题。

上述类型的分化既源于各地区初始区位、产业基础与市场网络的禀赋差异,也源于不同阶段政策工具与平台布局的累积效应。沿海地区长期集聚外资、港口、企业总部、服务业与制度试验资源,更易形成多元均衡的开放能力;中部地区依托产业转移、交通枢纽与跨境电商实现追赶发展,呈现节点提升型开放特征;西部地区与沿边地区依托通道、口岸与周边市场实现局部突破,但也更易出现市场集中与通道依赖问题;东北地区与部分资源型地区受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企业国际化能力制约,开放动能转换相对滞后。总体而言,中国区域开放格局的演变并非单向趋同过程,而是在统一开放框架下形成差异化功能分工的过程。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格局 面临问题的阶段性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面临的问题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早期阶段的核心问题为开放程度不足与制度创新能力薄弱,中期阶段的突出问题为平台同质化与规模扩张快于能力升级,当前阶段的问题则集中体现为制度供给与能力需求之间的不匹配。

(一)1978—1991年:政策优惠驱动下制度创新能力不足

第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打破封闭格局、搭建开放窗口,政策优惠与灵活措施的实施具有历史必要性。但该开放模式也存在内在局限:开放功能主要集聚于少数沿海点位,内陆与沿边地区开放参与度较低,在吸引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逐渐形成“马太效应”;开放动力主要依赖特殊政策与低成本要素,制度创新与规则供给能力不足。

随着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经验逐步复制推广,政策趋同化问题逐步显现。经济特区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税收、审批、土地与外资准入等政策层面的便利,当更多地区获得同类政策时,先行地区的政策红利便随之稀释。该阶段积累的矛盾为后续开放模式从政策优惠驱动向制度创新驱动转型埋下了伏笔。

(二)1992—2001年:平台快速扩围带来政策洼地竞争

第二阶段推动开放布局从沿海向沿江、沿边与内陆省会城市拓展,开放平台布局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引发了开发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部分地区将开放平台简单等同于招商引资与政策优惠工具,围绕税收让利、土地成本与审批便利开展项目竞争,地方政府间的优惠政策竞争实质上导致了企业和产业在区域间的同质化竞争,干扰了市场对外向型产业空间布局的塑造,影响了经济产出效率。

该阶段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沿江、沿边与内陆地区尽管被纳入开放版图,但多数仍处于嵌入跟随位置。开放空间范围的拓展并未同步带动区域自身产业组织能力、通道组织能力与国际市场服务能力的充分提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开放和产业专业人才的缺失或流失,背后则是工作岗位报酬、城市居住环境、消费市场等软环境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拉大。

(三)2002—2012年:规模扩张快于开放能力升级

第三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沿海地区依托加工贸易、外资企业与港口体系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较强的出口能力,但由于处在红利快速释放期,部分地区长期处于中低端制造、代工生产与低附加值环节,对外需、外资与全球订单的依赖度较高,自我改革创新、开拓国际空间的意愿和能力不足。

该阶段同时加剧了区域开放的发展差距。沿海地区凭借产业链、港口与外资集聚优势持续保持领先,内陆与沿边地区虽开始参与开放进程,但整体仍以承接产业转移、服务沿海出口与发展边境贸易为主,独立组织国际市场与集聚高端要素的能力不足。从背后原因看,该阶段出口市场主要通过海陆出口,内陆和部分沿边地区开放仍主要通过长距离陆运转海运,或为沿海地区做配套的模式,受制

于交通通道和联运不畅,低货值产品运输成本高、不经济,但该阶段内陆地区劳动力、资源、城镇化水平、园区建设质量能够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此外,开发区、保税区等平台的功能趋同问题逐步显现,部分平台在产业选择、招商方向与运行机制上缺乏差异化特色,部分省份对开发区等开放平台的定位缺乏科学研判。

(四)2013—2020年:制度型探索外溢不足和平台协同不够

第四阶段开启了制度型开放探索,但制度创新成果的扩散与复制推广机制仍不健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平台扩围后,部分改革成果仅局限于平台内部,未能有效外溢至所在城市与同类平台。制度创新多体现为单项便利化措施的增加,系统集成性改革相对不足,特别是类似江苏对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打通从研发、生产、流通到使用的全周期堵点,使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能够以产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整体设计实施的不多。

与此同时,内陆与沿边地区的制度型开放仍处于起步跟进阶段。与沿海地区相比,尽管平台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国家也为自贸试验区不同开放平台和政策区分别制订实施方案,设定了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政策支持方向,但受制于营商环境、生产性服务业、通关协同与跨境规则适配方面的短板,多依托交通枢纽和通道地位设立的各开放平台片区

难以快速成长,发展过程中很多形成了对超大项目、外资龙头企业的依赖,外贸韧性和开放水平没有同步提升。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比如有的自贸试验区片区嵌套在国家级新区、行政区、开发区之上,创新性的政策举措难以落地,项目的招商引资仍离不开要素和特殊税费政策的支持;有的在落地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过多,定位和功能方向多变,影响市场预期,难以聚力建链成群。

(五)2021年以来:高水平开放阶段的能力短板集中显现

第五阶段的问题已从一般意义上的“开放不足”演变为开放质量、结构韧性、制度环境和能力转化之间的不匹配。

一是部分省份外贸市场集中度偏高,开放韧性不足。“十四五”时期,新兴市场扩张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但也使部分省份对单一区域市场的依赖更加突出。2025年,黑龙江对中亚+俄罗斯市场的进出口占其五大市场合计的比重高达84.20%,市场集中度指数为0.72;广西对东盟市场的依赖度接近70%,市场集中度指数在0.52左右。相比之下,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头部省份在东盟、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俄罗斯等市场均有布局,外贸韧性更强(见表8)。

市场集中度偏高本身并不必然是问题,因为沿边地区天然具有面向周边市场的区位优势。但如

表8 2025年部分省份新兴市场集中度比较

省份	五大市场合计(亿美元)	主导市场	主导市场占比(%)	HHI
广东	5406.89	东盟	39.64	0.31
浙江	4356.18	欧洲	33.02	0.24
广西	862.01	东盟	69.62	0.52
四川	718.54	东盟	42.19	0.33
黑龙江	398.05	中亚+俄罗斯	84.20	0.72
新疆	620.87	中亚+俄罗斯	67.56	0.49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总署官网统计数据整理。

注:五大市场包括东盟、欧洲(不含俄罗斯)、拉丁美洲、非洲、中亚+俄罗斯;主导市场占比为该市场贸易额占本省五大市场贸易总额的比重,HHI为五大市场份额平方和。

果贸易增长主要依赖通道流量和边境口岸,而本地产业配套、产品结构、服务贸易和制度支撑不足,一旦外部地缘环境、汇率、通关政策或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开放经济容易受到冲击。

二是双向投资出现一定程度的区域不均衡,东北地区 and 资源型地区开放动能不足。吸引外资和

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仍然高度集中(见图4)。2024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比重较高,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占比较低。对外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凭借企业总部、产业链控制力和国际化服务体系保持领先,中部地区部分省份虽有突破,但东北地区ODI规模明显偏低。2023年,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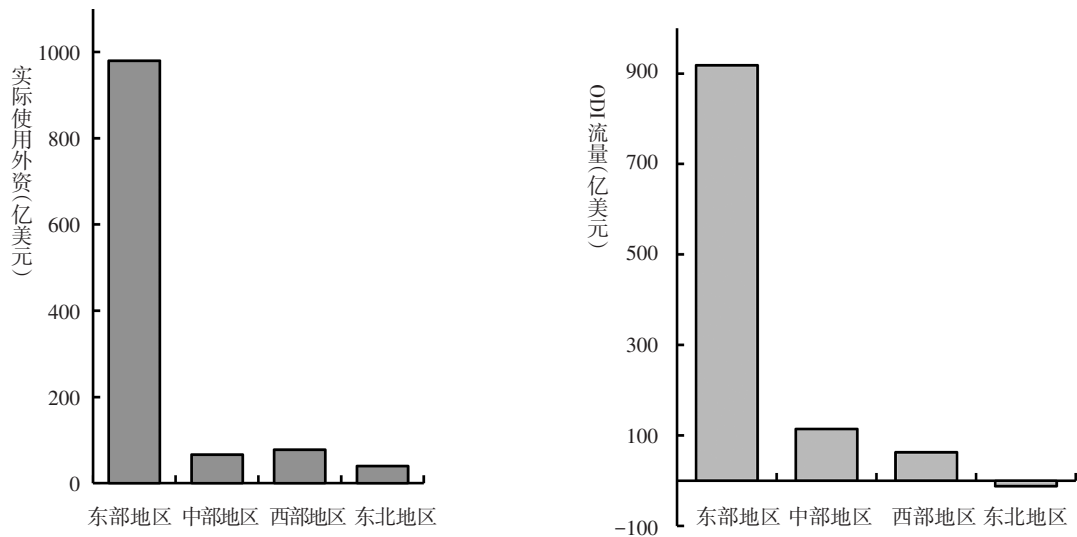


图4 2024年四大板块双向投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官网、万得(Wind)数据库、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数据整理。

地区 ODI 总规模仅为 6.37 亿美元,远低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相比 2012 年明显萎缩,深层原因则在于产业结构偏重、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市场化水平偏低和开放型服务体系薄弱。若无法通过产业升级和制度环境改善补足短板,仅增加开放平台或招商活动,难以扭转开放动能不足的趋势。

三是规制环境质量差距成为制度型开放的深层分化来源。规制(Regulation)也称管制、监管,是政府依托法定权限,针对行业微观经营行为实施的行业监管约束,用于矫正垄断、环保、安全等市场失灵问题;区别于经贸规则、行政管理、技术指标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举措,规制的核心是政府事中、事后对行业的监管与管控,聚焦特定领域市场行为约束,如生态环境部门对化工类企业设定排污许可、污染物排放限值,超标即限产、处罚。相对于对外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内部行政管理、技术上的标准等,规制是较容易受地方政府塑造,又能较大程度影响市场对地方的预期,进而形成营商环境区域差异的制度型开放领域。许可与准入政策透明、执法统一、容错合理、无过度管控的地区更容易受开放型企业欢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已经拥有自贸试验区片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但部分地方随意执法、多头监管、壁垒多的情况仍然较为普遍,企业感受到的制度便利、通关效率、政府服务、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化环境改善仍不充分。

四是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高标准规则对接基础不均衡。中国区域开放长期以货物贸易和制造

业开放为基础,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高标准规则对接起步相对较晚。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在知识密集型服务、数字贸易、金融开放和专业服务方面基础较强,多数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仍以货物贸易、边境贸易和通道物流为主。“十五五”时期,国际经贸竞争重心将更多延伸至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绿色低碳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和专业资格互认等“边境后”领域。如果区域制度创新能力不足,内陆和沿边地区即使拥有通道和平台,也难以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

五、“十五五”时期中国区域开放的总体布局、主要方向与政策重点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窗口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开放的演进逻辑与现实矛盾,建议“十五五”时期区域开放格局的优化着眼于“一个总体布局、五个主要方向、四大政策重点”的整体框架系统推进。

(一)总体布局:从规模扩张转向制度能力与区域协同

新阶段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需立足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重大战略形成的设施基础与制度积累,以“‘双核’引领、‘多支’支撑、‘四梁’贯通、

‘八柱’外联”的H型空间骨架为核心(见图5),推动“六廊六路”与区域重大战略廊道深度衔接,支撑跨境基础设施链向物流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层级跃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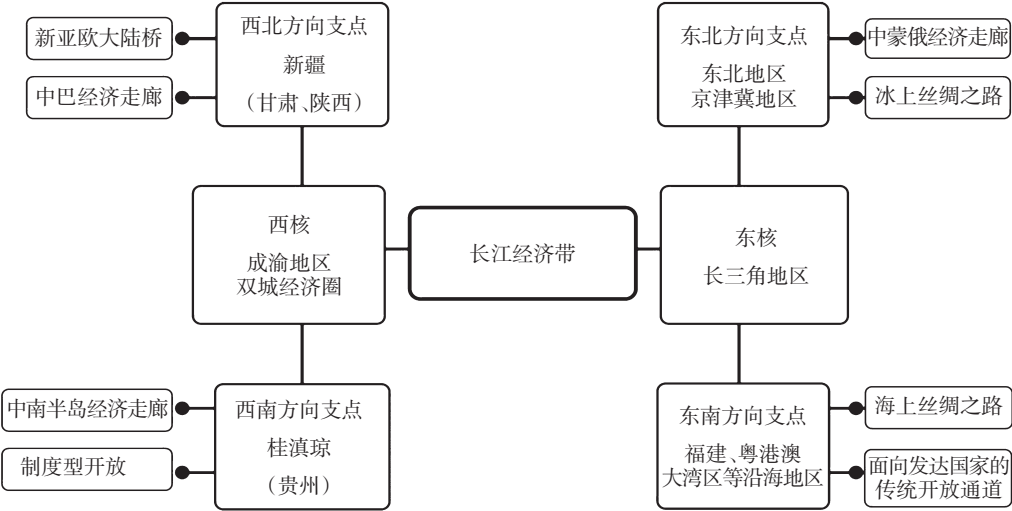


图5 区域开放“H”型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路深化国际贸易与高端服务合作,同时,依托长江经济带产业廊道辐射带动内陆地区开放能级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西部陆海联动的关键节点,向北可衔接新疆、中亚与欧洲陆路通道,向南可联动云南、广西对接东盟与印度洋市场。两大核心区域通过长江经济带强化产业转移、物流组织、跨境电商、金融结算与技术标准领域的协作,可有效增强东中西区域开放的联动性。

2. 以“多支”完善沿海沿边沿江开放支撑体系

新疆重点服务中亚、西亚与欧洲陆路经贸合作,强化能源、矿产、农产品、装备制造与口岸加工产业支撑。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聚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依托侨商网络优势拓展数字贸易与服务贸易空间。广西、云南面向东盟市场,重点发展农产品贸易、轻工、电子信息、跨境旅游与边境产业园。内蒙古及东北沿边地区面向俄罗斯远东、东北亚与冰上丝绸之路,深化能源、粮食、木材、装备与寒地产业合作。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城市群等区域结合自身禀赋,分别承担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港口集散与国际合作等功能。对于中小口岸与边境城市,应依据货物结构、流向特征与产业基础分级分类建设,避免资源平均投放。

3. 以“四梁”贯通国内主要开放通道

沿海经济带聚焦港航服务、国际贸易、绿色航

1. 以“双核”强化国内开放主轴带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入海口,兼具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先进制造集聚、数字金融赋能与航运服务枢纽等综合优势,应重点面向海上丝绸之

运与高端服务业升级,巩固其对外开放的先导地位。长江经济带发挥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能力与内陆集散优势,推动长三角、长江中游与成渝三大城市群开放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对接东盟与印度洋方向,拓展冷链物流、粮食贸易、汽车整车、电子信息与跨境电商等业态。向西开放大通道依托新疆与西北腹地,保障中欧班列、中亚班列运行与能源资源回运。四大通道协同建设,可将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各类开放平台联结为相互支撑的国内开放网络。

4. 以“八柱”衔接四大国际合作方向

围绕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大对外开放方向,各布局两条跨境联通通道,共同构建多元协同的国际循环空间支撑体系。西北方向以新疆为核心支点,联动新亚欧大陆桥与中巴经济走廊,依托向西开放大通道与中欧班列网络,服务中亚、西亚及欧洲方向的产业与经贸合作。西南方向以桂滇琼等地区为支点,衔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与制度型开放通道,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面向东盟、印度洋的产业、物流与贸易合作。东北方向以东北地区为支点,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与冰上丝绸之路,服务东北亚区域合作及能源、粮食、木材等资源通道建设。东南方向以福建、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为支点,联通海上丝绸之路与面向发达国家的

开放通道,提升海运服务、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功能。

通过四大方向、八条通道的系统衔接,可将国内沿海、沿江、沿边与内陆枢纽纳入统一开放布局,增强不同通道、口岸与市场之间的备份能力与协同能力,降低对单一口岸、单一线路与单一市场的依赖,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空间布局的稳定性与辐射带动能力。

(二)主要方向:从规模扩张转向制度能力与区域协同

从历史演进规律与现实约束条件出发,“十五五”时期中国区域开放要在深化制度型开放、培育多元化市场、空间协同增效、平台提质升级与新业态培育之间形成清晰的战略导向,重点体现为五大方向。

1. 制度型开放成为区域开放的核心主线

“十五五”时期,制度型开放将突破自贸试验区等特定平台的试点范畴,向全国性制度供给与区域差异化落地纵深推进。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上海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复制推广、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与内蒙古自贸试验区设立,共同标志着制度型开放正从沿海单点试验向沿海、内陆、沿边协同推进转变。未来区域开放优化的方向在于制度创新的首创性、集成性与转化效率。沿海地区持续承担高标准规则对接与制度输出功能,内陆地区重点强化通道规则、物流规则、供应链金融与枢纽运营制度创新,沿边地区围绕跨境贸易、边民互市、周边合作与安全监管探索可复制的制度安排。

2. 市场多元化与供应链韧性成为外贸布局的核心导向

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市场多元化与供应链韧性成为区域外贸布局的核心导向。东盟、拉丁美洲、非洲、中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仍是中国外贸增量的重要承载空间,但区域外贸布局应统筹毗邻国家精耕与多元市场开拓。对于沿边省份而言,面向周边市场的区位优势需进一步转化为商品结构升级、服务贸易拓展与产业配套能力提升的动力。未来外贸增长将更多依托新业态培育与高附加值产品供给,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贸易、数字营销与供应链服务将助力内陆企业直接对接国际市场;高技术中间品、成套装备、新能源产品、绿色低碳产品与专业服务将成为区域

外贸质量升级的重要抓手。

3. 开放空间格局向全域协同与功能分工转型

“十五五”时期,中国区域开放空间格局将由梯度扩散模式向全域协同、功能分工模式转型。沿海地区仍是高水平开放门户,功能将进一步聚集国际航运、总部经济、服务贸易、金融开放、规则探索与全球资源配置。内陆地区的发展重点是提升枢纽组织能力,推动陆港、航空港、综合保税区与产业园区深度联动,提升港产城融合创新能力,强化“一单制”等制度创新,将通道流量转化为本地产业增量。沿边地区的核心任务是构建跨境合作平台、周边市场服务网络与安全可控的制度接口,要着眼次区域把握自身在跨境产业链中的优势,比如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中亚地区城市化率相近,需求层次相仿,市场腹地自然叠加,应该深耕向西开放跨境产业链中大件运输成本高、中亚市场售后响应时间要求快的产业,有重点地进行招商引资,并根据不同开放平台的政策供给培育若干个现代化开放产业集群。

4. 开放平台竞争向首创性、集成式制度供给载体升级

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服务贸易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各类开放平台,将进入由“规模扩围”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需在剥离社会职能、轻装上阵的基础上,聚焦推动传统招商平台升级为产业链整合与创新赋能平台,并优化省域开发区功能和主导产业布局。自贸试验区需从单项便利化措施探索转向系统集成改革,为推动更多专业人才集聚提供更大激励,因地制宜推动各地摆脱要素和政策依赖,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入研究攻关,探索出以独特制度吸引力为主要手段的招商方式和发展模式。综合保税区需拓展特殊监管、维修再制造、保税研发与离岸贸易等功能,跨境电商综试区需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平台生态与国际物流支撑能力。通过推动各类平台分层定位、分工协作,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合力。

5. 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成为开放的新增长极

“十五五”时期,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将成为拓展区域开放增量的重要领域。在数字贸易方面,要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数字平台监管、电

子单证、跨境支付、数字身份认证与网络安全构建配套制度体系,因地制宜把握“数三样”(游戏、影视等数字货物贸易,词元出海等数字技术贸易和数据贸易,远程医疗等数字服务贸易)带来的新机遇。在服务贸易方面,要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与服务外包提质扩容,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在绿色贸易方面,要主动适配碳足迹、绿色供应链、环境标准与低碳认证规则,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合规能力。

(三)政策重点:聚焦阶段性短板,提升区域开放综合能力

基于上述主要方向,“十五五”时期区域开放政策需向提升开放韧性、补齐制度短板、优化双向投资、升级平台效能与强化区域协同转变。具体可围绕四大领域构建政策体系。

1. 增强外贸市场韧性,推动沿边开放由通道流量型向产业能力型升级

一是建立省级外贸市场集中度监测预警机制。针对黑龙江、广西、云南、新疆等单一市场依赖度较高的省份,将市场集中度、主导市场占比、出口品类集中度与核心企业集中度纳入区域外贸风险评估框架;对市场集中度持续偏高的地区设置预警阈值,配套制订替代市场拓展方案,防范外部环境波动引发的系统性冲击。二是支持沿边省份在巩固周边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拓展多元市场。黑龙江在深化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同时,拓展东北亚、欧洲及国内跨区域供应链合作空间;广西、云南深耕东盟市场的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与跨境电商布局南亚、中东、非洲与拉丁美洲市场;新疆立足中亚市场基础,提升面向欧洲、西亚的中转组织能力与国内西部地区市场的辐射能力。三是推动边境贸易由“通道过境”向“产业落地”升级。沿边地区需突破货物过境与口岸通关的单一功能定位,依托口岸布局加工制造、冷链物流、检验检测、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落地加工与国际供应链服务等业态;支持具备条件的口岸城市建设面向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园区与综合服务平台,推动贸易流量向本地就业、税收与产业增值转化。

2. 优化双向投资布局,补齐东北地区及资源型地区的开放动能短板

一是夯实东北地区及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的产业与制度基础。对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

内蒙古等地区,提升外资吸引力不应单纯依赖招商活动,而需以产业升级与制度环境优化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聚焦先进装备、现代农业、绿色能源、冰雪文旅、生物医药、数字服务与资源深加工等优势领域,编制清晰的外资产业图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用地用能保障,优化人才服务与法治化营商环境。二是构建面向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服务支撑体系。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多数制造业企业具备产品供给能力,但普遍存在海外市场信息不足、专业服务支撑薄弱、合规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推动商务、发改、金融、贸促机构、行业协会与专业服务机构协同搭建企业国际化服务平台,提供目标国政策、税务、劳工、环保、知识产权与贸易救济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传统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支持中部地区将对外投资优势转化为产业链延伸能力。河南、安徽、湖北等对外投资增长较快的省份,应引导龙头企业围绕海外仓布局、零部件配套、售后服务、境外加工与国际承包工程开展全球布局,防范对外投资异化为单纯产能外移。对符合发展方向的企业,可通过政策性金融、出口信用保险与跨境人民币结算降低国际化经营风险。四是推动资源型地区引资模式由资源驱动向产业升级驱动转型。如支持山西、内蒙古等地区围绕能源革命、绿色低碳、现代煤化工、新能源装备与稀土新材料构建开放型产业链,引资政策应更加注重技术、标准、管理与绿色转型能力的引入,避免片面追求投资规模。通过外资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新兴产业的培育,提升资源型地区开放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3. 强化制度型开放与平台协同,提升规制环境质量与平台运行效能

一是将规制环境质量作为制度型开放成效的核心评价维度。对各类开放平台的绩效评价,不应仅关注新增市场主体、进出口额与招商项目数量,还需纳入政务服务效率、监管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市场准入公平性、数据跨境合规与企业获得感等指标。构建更有代表性的区域制度型开放评价体系,将规则型、规制型、管理型与标准型开放纳入统一评估框架。二是推进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分类复制推广。不同地区制度基础与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不宜采用同质化模式。沿海地区可重点

复制推广数字贸易、服务贸易、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与政府采购等高标准规则;内陆地区可重点复制推广多式联运、铁路提单、供应链金融、保税研发与通关便利化制度;沿边地区可重点复制推广边民互市、跨境物流、检验检测认证合作与周边国家服务平台制度。三是强化开放平台的区域协同机制。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区域需建立跨平台协同联动机制,形成自贸试验区负责规则创新、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产业承载、综保区负责特殊监管、跨境电商综试区负责数字出海、陆港空港负责物流组织的分工协作格局,减少重复建设与低水平竞争。

4. 拓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绿色贸易空间,健全政策评估机制

一是打造多层次区域服务贸易增长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可以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文化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专业服务与服务外包构建开放新优势。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可依托高校资源、软件园、航空港与综合保税区发展数字服务出口,降低对传统货物贸易的依赖。二是加快跨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制度建设。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教育、医疗、文化、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支持具备条件的自贸试验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开展专业资格互认、跨境支付便利、数据合规流动、远程服务交付与国际仲裁服务试点。郑州、武汉、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南宁、昆明等节点城市,需完善海外仓服务、数字营销、跨境支付、电子单证与国际物流信息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三是提升绿色贸易规则适配能力。地方政府需引导企业建立碳足迹核算、绿色认证、ESG信息披露与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针对新能源、装备制造、化工、钢铁、纺织等重点行业,提供绿色标准咨询与国际市场合规服务,防范绿色规则形成新的贸易壁垒。四是建立“十五五”区域开放政策评估机制。建议从外贸市场多元化、双向投资均衡性、制度环境质量、平台效能、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能力与开放安全等维度设置监测指标,定期评估区域开放政策实施效果。对成效显著的地区及时总结经验,对平台效能不足、市场集中度过高、制度环境改善缓慢的地区

实施分类督导。

参考文献

- [1] Frankel J A, Romer D H.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3): 379-399.
- [2] Sachs J D, Warner A M.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1): 1-118.
- [3]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4] 张远鹏, 卢晓菲. 开放型经济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述评[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6): 77-83.
- [5] 张学良, 王耀辉, 韩慧敏. 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趋势与展望[J]. 财经研究, 2024, 50(12): 4-18.
- [6] 李沛霖. 基于多维定量测度的我国区域开放格局研究[J]. 中国物价, 2021(12): 15-19.
- [7] 金瑞庭, 张文涛. 区域开放指标体系构建和布局优化路径[J]. 开放导报, 2023(6): 27-34.
- [8] 郭锐, 王亚飞, 陈东. “双向开放”战略实施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影响[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1): 51-58.
- [9] 安树伟.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与格局重塑[J]. 人文杂志, 2018(6): 1-10.
- [10] 魏后凯, 年猛, 李功.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5-22.
- [11] 李兰冰, 刘秉镰.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展望[J]. 管理世界, 2020(5): 36-51.
- [12] 符正平. 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模式[J]. 区域经济评论, 2018(2): 1-4.
- [13] 刘洪愧, 刘霞辉.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 理论基础、历史实践与可行路径[J]. 改革, 2019(1): 30-42.
- [14] 赵峥. 东北地区构建对外开放新前沿的路径与对策[J]. 科技导报, 2021(4): 79-83.
- [15] 李佳谔, 王姣娥. 建立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内通外联网络国土空间格局[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4): 702-713.
- [16] 夏先良. 构建区域全面开放发展新格局[J]. 国家治理, 2018(20): 20-40.
- [17] 江小涓. 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 赋能增长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9(12): 1-16.
- [18] 全毅, 张婷玉.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升级方向与发展路径[J]. 经济学家, 2021(10): 100-109.
- [19] 王喆, 和军. “双循环”视角下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5): 47-56.
- [20] 余丽丽, 彭水军. 全面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价值链互动视角[J]. 世界经济, 2022(1): 3-29.
- [21] 张二震, 戴翔, 张雨.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高水平开放与

- 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77-188.
- [22]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国际贸易,2019(3):4-12.
- [23]江小涓,孟丽君,魏必.以高水平分工和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资源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23,58(8):15-31.
- [24]杨志浩,史丹.标准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环境效应:基于中外标准协调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26(4):18-34.
- [25]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思路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2):125-135+148.
- [26]尹晨,檀榕基,周思力.中国规制制度型开放的路径探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5(6):152-161.
- [27]胡再勇.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重构[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3,40(5):1-18.
- [28]罗舟,胡尊国.中国自贸试验区政策试点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法的验证[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1,42(2):67-72.
- [29]王兵,刘志彪,孔令池.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的测度、评估与区域分异[J].经济地理,2023,43(4):1-9.
- [30]聂新伟,薛钦源.中国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测度评价及政策优化[J].区域经济评论,2022(4):101-111.
- [31]王豪,张帆,杨多多,等.创新扩散视角下的中国自贸试验区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制度建设[J].区域经济评论,2025(1):73-81.
- [32]孟广文,王苒,王淑芳.“一带一路”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24(5):147-160.
- [33]宋周莺,刘卫东.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J].经济地理,2023,43(3):15-22.
- [34]黎峰.对外开放空间重塑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当代经济研究,2022(10):88-100.
- [35]黄启才.自贸试验区设立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8(4):85-96.
- [36]崔日明,陈永胜,李丹.自贸试验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力机制与空间带动效应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1(11):1-20.
- [37]余振,李雪,伍晓芳.自贸试验区对县域市场活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与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6(4):3-16+135.
- [38]李浩,徐鸣晨,单雅雯.物流纽带与出口增长:中欧班列对中国锂电池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商论,2026,35(7):48-51.
- [39]张祥建,李永盛,赵晓雷.中欧班列对内陆地区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11):97-111.
- [40]孙久文,蒋治.沿边地区对外开放70年的回顾与展望[J].经济地理,2019,39(11):1-8.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Prospects of China's Regional Opening-up Patter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Peilin

Abstract: Since the launch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regional opening-up pattern has undergone five broad stages: coastal experimentation from 1978 to 1991, gradual spatial expansion from 1992 to 2001, full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markets from 2002 to 2012,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exploration from 2013 to 2020, and high-level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with regional coordination since 2021. Drawing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is paper reorganizes China's regional opening-up experience within a five-stag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urther explain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its staged evoluti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rst four stages respectively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opening-up channels, the expansion of open platform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system,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The latest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s the main orientation, stronger coordination among coastal gateways, inland hubs, and border-area nodes, and new structural changes in emerging-market trade, cross-border e-commerce, two-way investment, nat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pilot free trade zones. These changes are jointly driven by national strategic guidance, shifts in the global division of industry,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platform-based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the need to balance opening-up with security. The main problems have also evolved by stage: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policy-preference-driven opening-up in the early period, platform homogenization and scale expansion outpacing capability upgrading in the middle period, and, in the current stage, excessive market concentration, imbalances in two-way investment, weak opening-up momentum in Northeast China and resource-based regions, regulatory environment gaps, differentiated platform effectiveness, and uneven foundations for services and digital trade.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should integrate strategic directions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ake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as the main line,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opening-up from flow expansion to capacity building.

Key Words: Regional Opening-up; Reform and Opening-up;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Open Platforms; Policy Outlook

(责任编辑:元小满)

【区域开放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重塑出口空间格局：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研究*

蒋晟 穆恩怡 贺灿飞

摘要:出口空间格局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推动规模增长的同时,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讨论。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经济对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既缺乏对出口区位和出口市场的系统讨论,也缺乏对制造业企业、外贸公司等多种贸易主体空间选择差异的深入理解。空间共聚视角可揭示不同贸易主体在出口区位和市场维度的趋同(或趋异)特征,有助于系统理解在数字经济冲击下不同贸易主体的空间偏好变化趋势。为此,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出口空间上的共聚特征。定量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削弱了两者在市场和区位层面的共聚程度;定性研究发现,空间共聚的削弱为多机制叠加的结果。在市场层面,数字经济降低了制造企业与客户的信息成本,同时催生大量中小客户,为外贸公司创造新机遇,导致两者市场偏好分化;在区位层面,数字经济强化了制造企业对数字基础设施与高技能人才的依赖,却削弱了外贸公司对本地制造业集群的依赖,从而使区位偏好呈现差异。

关键词:出口空间格局;数字经济;空间共聚分析;中国

中图分类号:F4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128-14 **收稿日期:**2026-03-2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技术关联、经济复杂度与区域新路径创造”(4217116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9批面上资助(2026M790764);国家高端智库课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后基金项目(ZKBSH202604)。

作者简介:蒋晟,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博士(北京 100084)。

穆恩怡,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 100038)。

贺灿飞,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成为跨区域连接的重要纽带。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型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并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国的产业地理格局。在此背景下,相关学者围绕出口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揭示了我国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规律(顾伟男等,2024;贺灿飞等,

2023;朱向东等,2025)。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逐渐兴起,并显著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马斌等,2025)。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出口规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出口贸易的重要增量。然而,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的背景下,出口空间格局将如何演变及演变背后的影响机制,仍是当前研究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佟家栋等,2025;钟腾龙等,2025)。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经济对出口企业(主要

是制造业企业)区位的影响,存在两类代表性观点。一类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将弱化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态势。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强化产业要素(尤其是知识、信息要素)的流动性,进而削弱地理集聚的重要性(段巍等,2025;吴志军等,2025;徐杰等,2024)。然而,另一类研究则认为,数字经济将强化企业对创新要素(如先进技术、高技能人才)的偏好,进而强化企业向相关要素富集区域的集聚倾向(程钦良等,2024;张英浩等,2022;朱彬等,2024)。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出口空间格局包含区位与市场两个维度,分别反映了出口企业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空间选择逻辑,两者互相关联、彼此影响(郭琪等,2018;毛熙彦等,2019;宋周莺等,2017)。因此,只关注区位变化,难以全面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其二,制造业企业仅反映直接出口的贸易模式,无法反映间接出口(通过外贸公司出口)的空间演化态势(包群等,2023;铁瑛等,2021)。与制造业企业不同,外贸公司不具备生产能力,而是作为商品跨境流通的中介,承担着报关、物流、营销等分销服务职能。尽管两者都从事贸易活动,但两者处于不同贸易功能环节,其区位选择和市场进入逻辑并不完全相同(Ellis,2001)。

空间共聚指不同产业或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共同集聚程度,反映了不同主体空间偏好的相似性(杜群阳等,2015)。在出口活动中,这一概念可拓展至区位和市场两个维度。区位共聚可衡量外贸公司和制造业企业是否在同一地区集中,反映两者选址偏好的相似性;市场共聚则衡量两类主体是否倾向于向相同市场出口,反映两者市场偏好的相似性。相较于关注单一主体的空间集聚,理解不同主体的空间共聚更能直接揭示不同类型出口活动的空间趋同或分化,进而为数字经济对于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提供一种关系性分析视角。综上,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策略,探讨数字经济对两类主体出口空间共聚的影响。首先,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特征,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的影响。其次,围绕定量分析结果,对浙江、广东等地的外贸公司机构和制造企业开展深度访谈,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削弱了外贸公司与

制造业企业之间出口空间共聚,这一结果可能源于客群结构变化、企业要素偏好等多方面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出口空间格局包含市场与区位两个维度,其演变是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历史路径和全球生产网络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作为出口活动中的两类核心主体,两者空间共聚则反映了不同出口活动在市场 and 区位两个空间维度上的分化或趋同态势,是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重要特征。

(一)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

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出口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进行解释(李伟等,2017)。新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产品同质化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解释了区域要素禀赋对于出口区位的影响。具体而言,区域间的贸易动因源自贸易双方在不同要素层面的比较优势,因此企业倾向于分布在生产产品所需要素充裕的地区,从而实现更低的要素获取成本(陈韬等,2020)。新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冰山成本(即贸易成本)假设,不仅揭示了出口区位格局的形成机制,也阐释了出口市场格局的演化逻辑。在区位层面,由于垄断竞争市场,企业倾向于集聚在人口较多的区域(市场更大),以获得规模经济;在市场层面,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距离较低的市场将获得更大的出口规模(欧阳晓等,2023)。

在全球化浪潮下,经济地理学者基于“全球—地方互动”的空间组织逻辑,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演化视角与关系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对出口空间格局形成机制的解释(蒋晟等,2025)。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历史路径依赖,并提出“关联性”概念,认为出口产品或目标市场与区域既有产品或市场的关联性越强,其在本地区域存续或进入新市场的概率就越高(周沂等,2019;郭琪等,2018)。这一观点揭示了出口空间格局的渐进演化特征:一方面,在市场层面,出口往往由先发市场向地理、文化或制度环境相近的市场扩散;另一方面,在区位层面,受到集聚外部性的影响,出口呈现“马太效应”,既有的出口集聚区域会进一步强化其集聚优势。与此

同时,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则从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出发,强调其在生产组织、资源配置与创新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认为出口空间格局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本地要素条件与目标市场特征的影响,还深受跨国企业、客户、政府等一系列微观主体的影响(蒋丽,2023;刘清等,2020;王文宇等,2022)。

(二)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

出口包括直接出口与间接出口两种模式。直接出口指制造业企业直接与海外客户交易。由于省去中间环节,制造业企业可获得更高利润,但也须承担更大风险。间接出口指通过外贸公司等中间商完成出口活动。在此过程中,外贸公司通过提供货运代理、仓储、营销推广等一系列分销服务,帮助制造业企业出口,但也需要与制造业企业分享出口利润(蒋晟等,2025)。因此,能力较强的制造业企业倾向于直接出口;反之,能力较弱的制造业企业则更依赖外贸公司进行出口(Felbermayr et al., 2011; Ahn et al., 2011)。

空间共聚指不同产业或不同类型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共同集聚程度(O'Sullivan et al., 2018)。现有文献多从区位维度界定空间共聚,主要关注各类主体是否在同一地区形成共同集聚(陈露等,2024;王玲等,2023)。然而,出口活动同时涉及区位与市场两个空间指向:前者关乎出口主体的区位布局,后者关乎出口商品的目的地选择。由此,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可进一步拓展为两类主体在特定区位或特定出口市场中的共同集聚程度,分别反映二者在区位与市场选择上的相似性。

既有研究表明,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和区位选择上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共性源于两者均参与出口活动,因而均受运输、报关、法律合规、汇率波动、违约风险及市场开拓等贸易成本的约束(Ellis, 2001)。在市场维度上,两类主体通常更倾向于进入需求规模较大、制度环境稳定、违约风险较低且贸易距离相对较近的出口市场,例如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Ahn et al., 2011)。这类市场有助于降低交易不确定性,摊薄市场开拓成本。在区位维度上,两类主体也均倾向于布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开放程度较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完善和营商制度更健全的地区,以降低信息搜寻、客户匹配、报关物流等跨境交易成本(郑小碧

等,2023)。

然而,由于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处于不同贸易功能环节,两者的成本结构和空间选择逻辑并不完全相同。制造业企业直接承担生产职能,其成本不仅包括贸易成本,还涵盖厂房设备、劳动力、原材料、产能配置、工艺调整与质量控制等生产性成本,因而其市场进入通常与生产组织、产品适配和产能安排紧密相关,对市场不确定性等因素所导致的贸易成本变化更为敏感(Bernard et al., 2015)。相比之下,外贸公司由于不具备生产功能,因此除承担贸易成本外,主要承担产品采购、质量检测、渠道维护、客户匹配、物流协调和售后服务等分销服务成本(Ellis, 2005)。尽管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通过供货价格部分内嵌于外贸公司的分销成本之中,但外贸公司的成本结构整体上更偏向交易与服务环节,整体成本相对较低,调整弹性更强,可通过更换供应商、调整商品组合与客户渠道来应对市场变化(Felbermayr et al., 2011; Feenstra et al., 2004)。两者成本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差异化的市场与区位选择偏好。市场层面,外贸公司由于多元化的渠道结构,更具灵活性,更易进入距离远、风险高或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企业则因其生产层面的高额固定成本,更倾向于进入需求稳定、风险较低的成熟市场(Wang et al., 2018)。区位层面,制造业企业选址更强调生产成本控制,易受劳动力、土地、能源供给以及上下游产业配套的影响;外贸公司的布局则更依赖仓储物流、法律、销售等服务性资源。

(三)数字经济对空间共聚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力量,深刻改变了出口活动的组织方式与空间结构。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对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类趋势:一是以阿里巴巴、亚马逊等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兴起,改变了出口方与进口方之间的信息匹配、交易协调与市场进入方式(Elia et al., 2021);二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重塑了出口主体对信息、物流、人才、技术与服务等关键要素的依赖偏好(仇怡等,2025;耿勇等,2024)。而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格局变化,也受到上述两类变化的影响(见图1)。

第一,电子商务平台可能通过去中介化与再中介化两种机制,影响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共聚水平。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降低了出口方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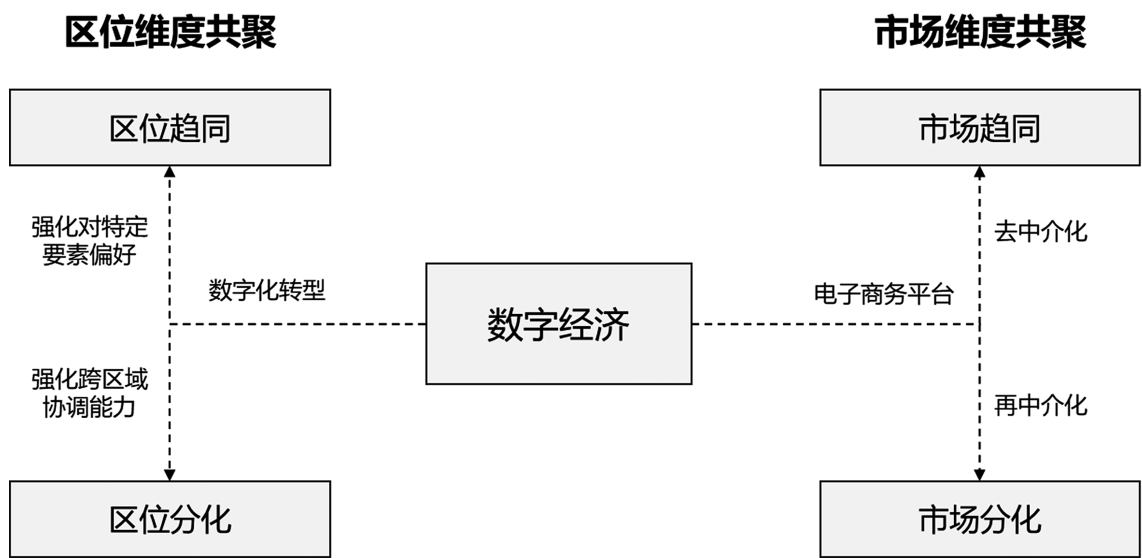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经济的潜在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进口方之间的信息搜寻成本，弱化了制造业企业直接进入海外市场的成本约束(Gu, 2024)。对于原本缺乏海外客户网络和市场信息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平台化交易提高了其直接触达海外买方的可能性，使其能够进入过去主要依赖外贸公司才能进入的出口市场。由此，制造业企业可能逐渐占据部分原本由外贸公司承担的市场份额，推动两类主体在出口市场选择上趋同。另一方面，电子商务平台也可能催生新的交易成本。具体而言，线上交易虽然降低了信息壁垒，但也弱化了面对面交流、现场质检等传统交易保障机制，导致买方对线上渠道产生不信任感(Sen et al., 2003)。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普及，大量中小型海外买方进入跨境交易过程，这些主体往往缺乏稳定的采购经验，难以独立完成对产品的筛选、质检、物流等一系列环节(Gilboa et al., 2019; Gopal et al., 2003)。在此情形下，外贸公司凭借其在产品营销、渠道维护、物流协调、合规处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能力实现再中介化，进而吸纳大量新兴海外买家，与制造业企业的客群结构形成差异。而这种客群分化可能进一步拉大两类主体的市场偏好，降低市场维度的共聚水平。

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改变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要素偏好，影响两类主体在区位维度上的共聚关系。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两类主体的跨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使制造业企业与外贸公司均能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获取要素支撑，从而降低对本地要素的依赖，削弱区位层面的趋同性

(王如玉等, 2018)。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可能强化空间约束。随着生产与销售活动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两类主体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高技能人才、数据服务、平台资源和专业服务体系等新型要素的依赖不断增强(李宇等, 2025)。这些要素通常集聚于数字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而导致两类主体共同向数字化要素富集地区集中，强化两者的区位共聚水平。

三、研究设计

基于理论讨论，从定量与定性两方面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对于两类主体空间共聚的影响。研究思路为：第一，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测度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与区位层面的共聚水平，并通过计量模型验证两者的空间共聚是否受数字经济的影响。第二，基于定量分析结果，选择相关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进行访谈，从而进一步挖掘背后机制。

(一) 定量分析

1. 数据来源

定量分析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展开。该数据包含了出口主体的名称、所在城市、出口国家和出口产品信息。在测度之前，本文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关键信息缺失的观察样本；产品代码统一至SITC四位数；借鉴过往文献做法的做法，将名称中包含“进出口”“贸易”

“出口”“进口”“外贸”“商贸”“边贸”和“经贸”的出口主体识别为外贸公司,其余主体为制造业企业(Ahn et al.,2011)。

2.基于 Wasserstein 距离的共聚分析

借鉴过往文献的空间共聚分析方法,本文测度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与区位层面的共聚指数(Billings et al.,2016)。具体而言,在 SITC 四位数产品层面,将外贸公司和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家首都的地理坐标与所在城市的地理坐标分别用于表征其市场分布与区位分布,并以两类主体在对应市场(或区位)中的出口额占比作为分布概率。然后,计算两类主体在市场和区位维度的概率分布之间的 Wasserstein 距离,用以衡量两者的市场与区位层面的相似性。Wasserstein 距离的计算公式如下:

$$W_p[\mu(x)_p, v(y)_p] := [\inf_{(\gamma(x,y)_p \in \Gamma(\mu, v))} \int d(x,y)^p \gamma(x,y)_p dx dy]^{1/p} (p \geq 1) \quad (1)$$

W_p 是产品 p 中制造企业的市场或区位概率分布 $\mu(x)_p$ 与外贸公司的市场或区位概率分布 $v(y)_p$ 之间的 Wasserstein 距离, $\Gamma(\mu, \nu)$ 为定义在 $R \times R$ 的联合分

布集合,该集合中的联合分布以 $\mu(x)_p$ 和 $v(y)_p$ 分别作为其边缘分布。

考虑到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市场或区位分布可能受到宏观政策或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从而在 Wasserstein 距离上表现出伪共聚。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仅东部沿海地区获准开展进出口业务,因此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必然集中分布于此。为此,本文引入全国整体出口的市场/区位概率分布 $c(z)$ 作为基准分布,并分别计算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相对于该基准分布的 Wasserstein 距离。通过比较两类主体之间的 Wasserstein 距离,以及其各自与基准分布的 Wasserstein 距离差异,从而更精确地测度两者在市场和区位层面的共聚水平。具体思路如图 2 所示,若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市场或区位分布只受宏观因素影响,那么其与基准分布的 Wasserstein 距离为 0。若是两者在市场和区位层面趋向共聚,则两者的 Wasserstein 距离将小于两者与基准分布的 Wasserstein 距离之中的最大值;反之,若两者在市场和区位层面趋向分化,则两者 Wasserstein 距离将大于两者与基准分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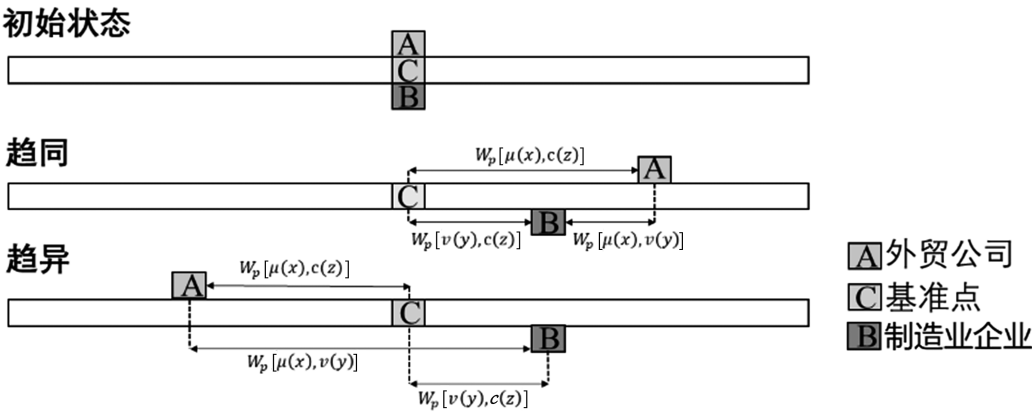


图2 共聚指数测度思路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Wasserstein 距离的最大值。

基于上述思路,两类主体在市场和区位层面共聚指数计算如下:

$$Coagg^{Market/Location} = \ln \frac{\max \{ W_p[\mu(x), c(z)], W_p[v(y), c(z)] \}}{W_p[\mu(x), v(y)]} \quad (2)$$

$Coagg^{Market}$ 和 $Coagg^{Location}$ 分别代表两类主体在市场和区位层面的共聚程度。若 $Coagg^{Market/Location}$ 大于

0,表明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和区位层面趋于共聚;反之,若该指数小于0,则表明两者的在市场和区位层面趋于离散。

3.计量分析

在共聚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是否强化(或削弱)两者在出口空间层面的差异性。模型设定如下:

$$Coagg_{i,t}^{Market/Location} = \alpha_0 + \alpha_1 Dig_{i,t} + \alpha_2 X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因变量 $Coagg_{i,t}^{Market/Location}$ 为 SITC 四位数产品中,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层面或区位层面的共聚指数。核心自变量 $Digi_{i,t}$ 为不同出口产品的数字经济暴露程度,其测度逻辑是:产品出口所在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当地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参与程度。例如,在数字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更有可能开展数字化转型,或积极参与跨境电商、直播销售等数字化销售模式。具体而言,由于 $Digi_{i,t}$ 的测度基于产品层面,其取值通过不同产品在各省的出口份额与该省数字经济专利量的加权平均数(取对数)来计算。数字经济专利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考虑到两类出口主体的空间共聚还可能受到产业自身发展以及国内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设置以下控制变量($X_{i,t}$):以产品出口规模控制产品所在行业的自身发展;国内因素方面,以产品在各省的出口份额为权重,分别计算省份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占比、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仓储服务业增加值、货运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的加权平均数;海外因素方面,以产品在各国的出口份额为权重,分别计算各国人均GDP和人口总量的加权平均(见表1)。同时,控制年份和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

(二)定性分析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影响可能呈现多因素复杂作用特征,难以通过定量分析直观展示,以及定量

分析的数据年份截止到2016年,可能存在数据滞后问题。因此,本文基于定量分析结果,通过对外贸公司和制造业企业的访谈分析,进一步剖析数字经济影响背后的复杂机制。确保访谈结果能够充分体现数字经济的影响,在浙江和广东两地选取了8家外贸公司和4家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案例(见表2),且访谈的外贸公司和企业均具备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建设等数字化实践经验,确保访谈结果能够充分体现数字经济的影响。由于访谈对象较多,访谈工作分批进行,时间分别为2022年10月、2023年7月以及2024年10月至11月,以线下访谈为主,少数受访对象通过线上方式进行。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定量分析结果

1.2000—2016年出口空间格局演变

以2008年为界,将研究期划分为2000—2008年和2009—2016年两个时段,分别计算我国对各国出口额的年均值。分析结果表明(见图3a),2000—2016年我国出口市场的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变,仍以亚洲、北美洲和欧洲市场为主。但相较于2008年以前,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出口占比有所上升,反映出我国出口市场持续拓展的态势。

同样地,按2000—2008年和2009—2016年两个时段,计算我国各区域出口额的年均值。分析结果表明(见图3b),2000—2016年我国出口区位格局同样未发生明显变化,东部地区仍是出口活动的核

表1 控制变量信息

指标名称	测度方法	控制因素类型	数据来源
Exp_value	出口产品规模(对数)	产业自身发展情况	海关企业数据
Domestic_GDPper	省份人均GDP(对数)的出口份额加权平均	国内经济发展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
Domestic_Manufacturing	省份工业增加值占GPD比重的加权平均	国内制造业基础	
Domestic_Sale	省份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GPD比重的加权平均	国内相关服务业基础	
Domestic_Fina	省份金融业增加值占GPD比重的加权平均		
Domestic_Warehousing	省份仓储服务业增加值占GPD比重的加权平均		
Domestic_Transportation	城市货运总量(对数)的出口份额加权平均	国内基础设施情况	
Domestic_Fix	省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数)的加权平均		
Domestic_Fiscal	省份财政支出与收入之比的加权平均	国内地方财政情况	
Overseas_GDPper	各国人均GDP(对数)的出口份额加权平均	海外市场经济发展情况	世界银行数据
Overseas_Population	各国人口总量(对数)的出口份额加权平均	海外市场需求规模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受访企业编号	类型	所在地	规模	行业	访谈对象
T-ZJ-1	外贸公司	浙江	小型	家具	销售经理
T-ZJ-2	外贸公司	浙江	大型	服装	总经理
T-GD-1	外贸公司	广东	小型	纺织	总经理
T-ZJ-3	外贸公司	浙江	中型	照明用品	销售经理
T-ZJ-4	外贸公司	浙江	中型	纺织服装	总经理
T-ZJ-5	外贸公司	浙江	小型	医疗器械	总经理
T-GD-2	外贸公司	广东	小型	环保制品	销售经理
T-GD-3	外贸公司	广东	小型	宠物用品	总经理
M-ZJ-1	制造业企业	浙江	中型	宠物用品	总经理
M-ZJ-2	制造业企业	浙江	小型	办公用品	总经理
M-ZJ-3	制造业企业	浙江	中型	厨房用品	销售经理
M-ZJ-4	制造业企业	浙江	中型	户外用品	总经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心集聚地。但相较于2008年以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出口占比有明显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口活动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外溢的态势。

2.两类主体的出口空间共聚水平

对空间共聚指数进行核密度分析(见图4)。可以明显发现,不论在市场层面还是区位层面,两类主体的共聚指数整体呈正向分布,反映了两类主体在市场 and 区位层面的偏好依然趋于相似。

进一步区分不同产品领域的共聚指数分布(见图5)可以看出,与初级产品(SITC0-4)相比,两类出口主体在工业制成品(SITC5-8)领域的共聚指数分布明显偏左,这一特征在出口市场层面尤为突出。相较于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受数字经济的影响较小。一方面,初级产品多为大宗商品,买

家多通过固定渠道采购,较少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购买;另一方面,其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行业内制造业企业或外贸公司自身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也较弱。这可能是导致在初级产品领域,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 in 市场和区位层面共聚程度较高的原因。

图6分析了2000—2016年两类主体共聚水平变化。对比2000—2008和2009—2016两个时间段的共聚指数的核密度分布发现,在2009—2016年,共聚指数的核密度分布呈现梯度向左偏移趋势,暗示了两者空间偏好的差异性在增强。与此同时,计算各年份共聚指数的中位数,也发现了相似趋势,尤其在2003—2010年,这一趋势尤其明显。考虑到2003—2008年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国内互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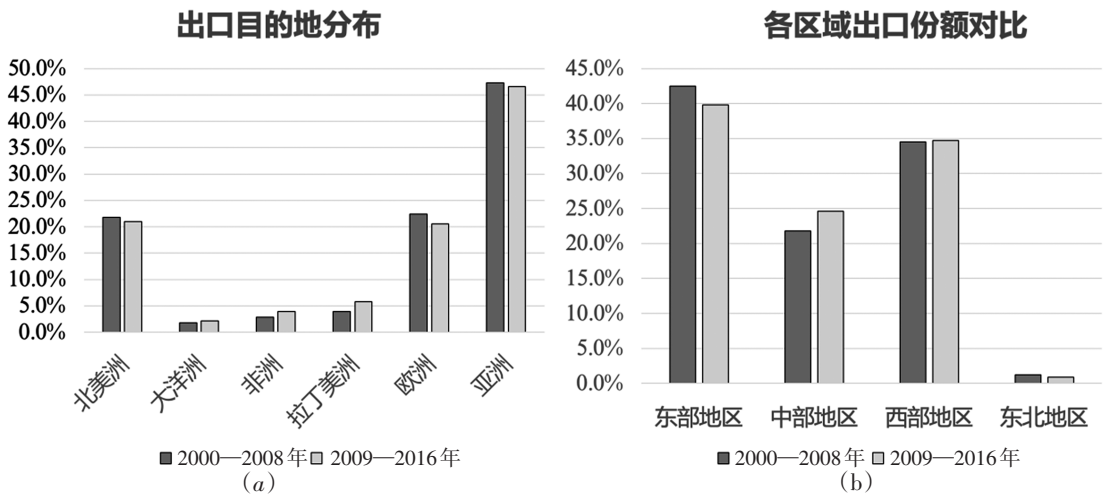


图3 2000—2008年、2009—2016年出口目的地分布及各区域出口份额对比

数据来源：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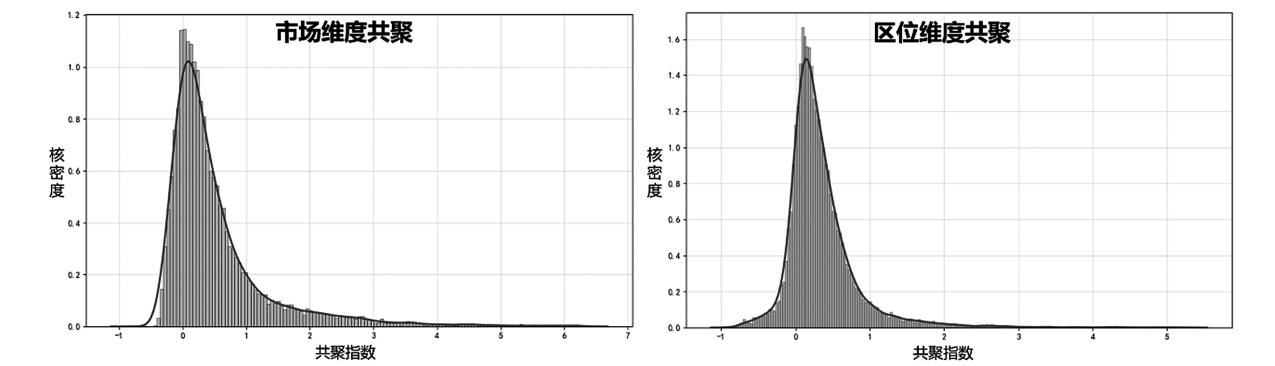


图4 出口空间共聚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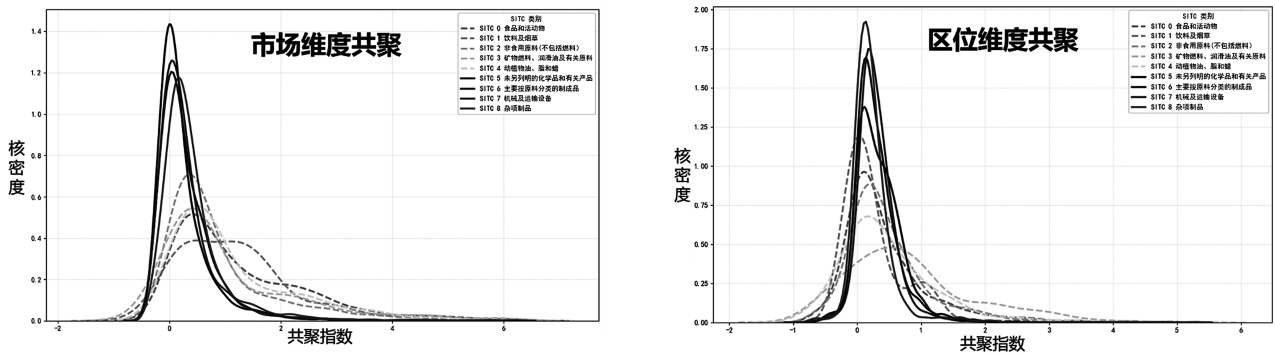


图5 分产品出口空间共聚指数的核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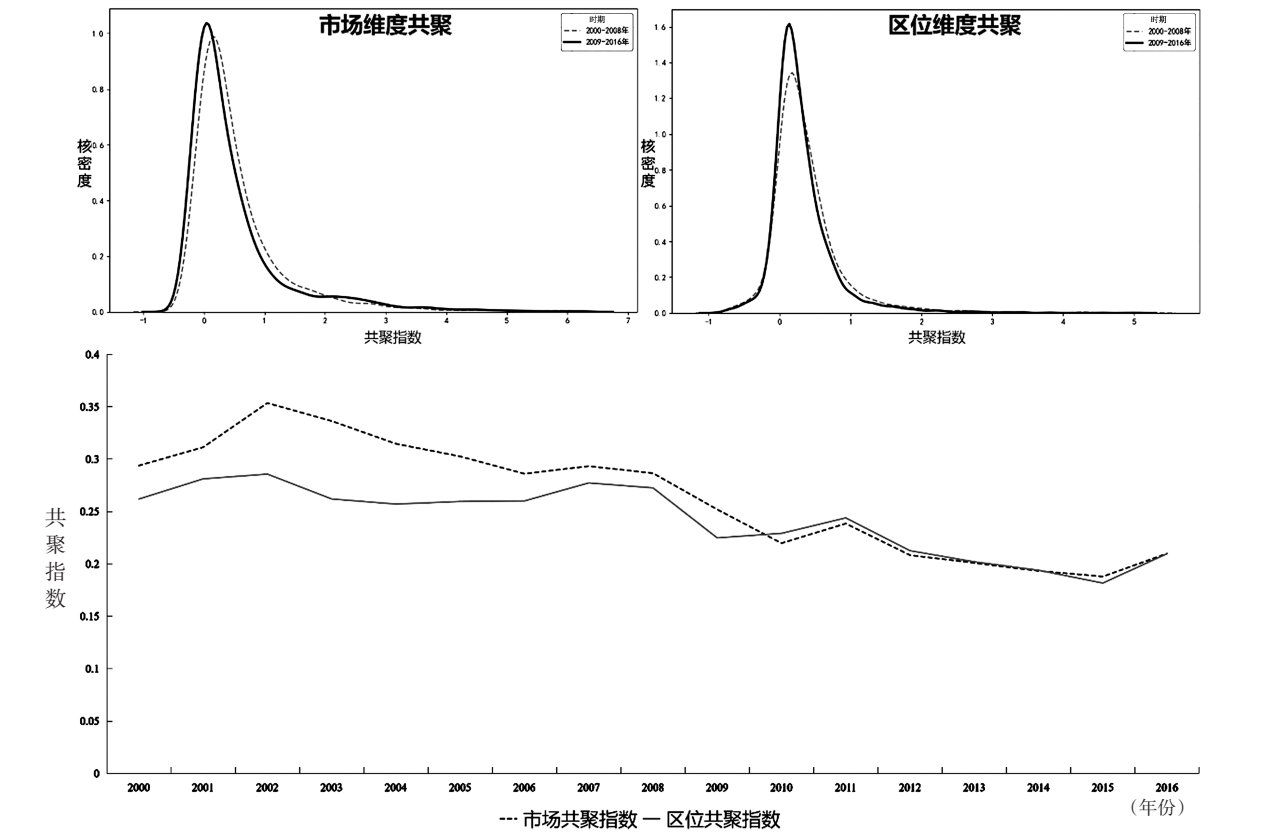


图6 2000—2016年出口空间共聚的核密度分布与中位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测算结果绘制。

网企业蓬勃发展时期,这一结果也暗示了数字经济可能也是削弱两者出口空间共聚的重要因素。

3.回归分析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识别数字经济与两类主体空间共聚之间的关联性。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和2分别反映数字经济与市场 and 区位维度共聚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发现,在模型1-2中,*Dig*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这也表明了数字经济与两类主体空间共聚水平的下降有显著关联,进一步支撑了本文对描述性分析结果的推测。

表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i>Coagg_Location</i>	16508	0.346	0.498	-0.925	0.240	5.326
<i>Coagg_Market</i>	16508	0.529	0.850	-0.765	0.267	6.316
<i>Dig</i>	16508	8.782	1.399	5.679	8.946	11.201
<i>Exp_value</i>	16508	18.744	2.773	9.952	19.228	23.740
<i>Domestic_GDPper</i>	16508	10.368	0.604	9.010	10.459	11.365
<i>Domestic_Manufacturing</i>	16508	0.411	0.043	0.254	0.418	0.485
<i>Domestic_Sale</i>	16508	0.099	0.011	0.071	0.099	0.127
<i>Domestic_Fina</i>	16508	0.056	0.019	0.027	0.054	0.121
<i>Domestic_Warehousing</i>	16508	0.052	0.011	0.036	0.049	0.086
<i>Domestic_Transportation</i>	16508	11.676	0.474	10.450	11.692	12.591
<i>Domestic_Fiscal</i>	16508	1.554	0.300	1.157	1.472	2.649
<i>Domestic_Fix</i>	16508	18.161	0.823	16.293	18.273	19.446
<i>Overseas_GDPper</i>	16508	9.923	0.598	7.761	10.061	10.796
<i>Overseas_Population</i>	16508	18.265	0.724	15.789	18.317	19.979

数据来源:见表1。

(二)定性分析结果

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共聚水平下降存在关联。为进一步探究其发生机制,本文对相关外贸公司和制造业企业进行了访谈。

1.市场层面:去中介化与再中介化叠加

如文献综述所述,在市场层面,数字经济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去中介化与再中介化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削弱了制造业企业与海外客户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去中介化,从而强化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的市场共聚倾向;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放大了客户(尤其是中小客户群体)对于线上渠道的不适成本,推动再中介化,从而削弱两者的市场共聚水平。

访谈结果表明,两种机制均发生作用,且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市场层面的分化。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获取海外客户的搜索成本。在21世纪初,我国刚刚加入WTO,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缺乏国际贸易经验,客户信息渠道有限,

因此普遍依赖外贸公司开展出口。然而,随着阿里巴巴等国内电商平台以及亚马逊、Google等国际电商平台的兴起,制造业企业逐渐获得了新的客户获取渠道,从而推动其向直接出口转变。

“我们刚做出口的时候,既不会外语,也不知道怎么出国找客户,而且广交会一年也就两次,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外贸公司找渠道”(M-ZJ-1)。

“我们在阿里国际站、谷歌开设自己的店铺网页,客户直接通过互联网平台就能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的业务员也会通过领英这类平台向潜在客户发送我们的产品信息”(M-ZJ-3)。

这一观点也获得外贸公司的侧面印证。

“2000年左右做贸易好做,只要你会外语,懂进出口的流程,很多企业抢着把货供给你;但现在不一样,大部分企业已经拥有自己的客户渠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他们反而成了竞争关系”(T-ZJ-5)。

其次,尽管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外贸公司的生存空间,但由此催生的大量中小型客户亦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传统贸易中,大型客户占据主导,其需求明确、交易频次较低且

表4 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

变量名	Coagg_Market	Coagg_Location
<i>Dig</i>	-0.050 [*] (0.029)	-0.232 ^{***} (0.019)
<i>Exp_value</i>	-0.046 ^{***} (0.010)	0.048 ^{***} (0.006)
<i>Domestic_GDPper</i>	-0.047 (0.087)	0.131 ^{**} (0.058)
<i>Domestic_Manufacturing</i>	-0.080 (0.521)	0.811 ^{**} (0.335)
<i>Domestic_Sale</i>	-1.990 (1.407)	1.693 [*] (0.946)
<i>Domestic_Fina</i>	0.627 (1.521)	2.538 ^{**} (1.047)
<i>Domestic_Warehousing</i>	-3.178 [*] (1.782)	3.130 ^{***} (1.078)
<i>Domestic_Transportation</i>	-0.067 (0.083)	0.051 (0.055)
<i>Domestic_Fiscal</i>	-0.125 [*] (0.069)	-0.134 ^{***} (0.043)
<i>Domestic_Fix</i>	0.018 (0.092)	0.154 ^{***} (0.059)
<i>Overseas_GDPper</i>	0.029 (0.021)	0.025 ^{**} (0.012)
<i>Overseas_Population</i>	-0.060 ^{***} (0.013)	0.000 (0.008)
<i>Constant</i>	4.126 ^{***} (1.527)	-4.104 ^{***} (1.002)
产品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6508	16508
<i>R</i> ²	0.622	0.503

数据来源:见表1。

注:*,**、***分别表示10%、5%、1%的统计显著性。括号中显示为稳健标准误。

订单规模较大,合作相对稳定。然而,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显著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进入门槛,使得大量中小型乃至个人客户能够直接参与跨境交易。与大型客户相比,中小客户往往缺乏专业的贸易经验,需求表达模糊,更倾向于一次性交易。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与此类客户合作的难度显著增加。大型客户订单集中、需求清晰,制造商只需按需生产即可,风险相对可控;而小客户订单规模零散,个性化需求突出,制造商不仅需要投入额外精力厘清需求,还需承担更高的生产与沟通成本,往往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我们一般接到这种小订单的咨询时,都不会过多关注,因为订单太小了,我们也不太清楚他们需要什么,贸然开工,成本很高”(M-ZJ-3)。

相较之下,外贸公司对小客户的包容性更高。一方面,其长期积累的海外贸易经验,使其具备更强的需求识别与转化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不直接承担生产职能,外贸公司无须担心小订单带来的投产风险。

“客户类型对我们影响不大。我们积累了很多营销经验,懂得这些小客户要什么。有时候他们自己没想清楚,我们就用话术帮他们‘想清楚’”(T-ZJ-1)。

“订单小没问题,我们可以全国找供应商,总有人会接单;就算厂家嫌订单小,我们把多个订单打包,他们也愿意接”(T-ZJ-2)。

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目标客群上逐渐分化,这一分化趋势进一步映射到市场选择上。制造业企业普遍集中于欧美等大客户主导的成熟市场。

“大家都想和发达国家做生意,他们有钱,守规矩,也好打交道”(M-ZJ-2)。

相较之下,外贸公司虽然同样偏好欧美市场,但在面对制造业企业竞争压力的同时,也看到了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中大量中小客户所带来的机遇,因此逐渐倾向于开拓这些新兴市场。

“我们也喜欢和发达国家做生意,但那里竞争太激烈了,所以现在很多时候非洲客户的问价,我们也接,反正都是生意”(T-ZJ-1)。

2. 区位层面:跨区域协调性与要素偏好性的差异化影响

在区域层面,数字经济也存在两类可能影响机制。一方面,数字化削弱了地理集聚的必要性,促使两类主体在区位上分化;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两类主体对于数字基础设施、高技能人才、数字技术等新型要素的需求进一步加强,从而强化了两者在区位层面的趋同。与上文类似,本研究通过访谈进一步验证两类机制。

访谈结果显示,两类机制均发挥作用,但其对于不同主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而两种机制的差异化效应叠加,推动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区位布局上的分化。

首先,数字化转型明显削弱了外贸公司对本地

产业集群的依赖,但未对制造业企业的集聚产生明显影响。对制造业企业来而言,尽管数字经济推动了生产端的跨区域组织能力,但这种强化主要限于企业内部。企业仍需要与供应链上下游保持紧密协同,并从外部获取信息。在这些环节中,地理邻近性仍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企业面对面互动所带来的紧密联系,使彼此建立信任,从而极大降低协调成本。而这种优势很难被数字化替代(俞国军等,2020)。例如,当企业临时转产时,所需的新零部件规格、数量及交付时间往往需要面对面沟通来确定。此外,地理邻近也使企业能够有效交换隐性知识,而这些隐性知识由于难以有效编码,同样不易受到数字化的冲击(周灿等,2018)。

“我们为什么不离开长三角,因为这里的产业链完善,我上午要一个零件,下午人家就能送到,这种快速响应的能力,别的地方不可能办到的”(M-ZJ-4)。

然而,对于外贸公司而言,由于其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而是依赖多元化的供货渠道以实现范围经济,因此并不需要与上下游保持高度协同。相反,其更依赖通过数据共享来拓展供应商网络。在数字化之前,产业集群的地理邻近性是外贸公司扩展供应商渠道的重要条件,因为邻近有助于实现与更多供应商的直接沟通与联系。但随着数据要素的引入,外贸公司能够在虚拟平台上完成供应商的搜索与沟通,从而显著削弱了其对本地区产业集群的依赖。因此不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仅通过数据层面的共享,就能够实现对供应商的协同。

“我们能自建数字化平台,把符合条件的供应商都纳入系统。这个过程很简单,只需要供应商能够操作我们的线上平台即可”(T-ZJ-4)。

其次,数字化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企业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和高技能人才的依赖,而对外贸公司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数字化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的改造,如部署传感器、工业机器人等。这一过程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度极高,同时需要大量具备编程与设备运维能力的专业人才。如果完全依靠企业自身投入,成本往往难以承受;相较之下,布局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人才高度集聚的区域,能够有效压缩转型成本。

“为了推动生产线的数字化转型,我们招了很多懂编程、懂设备的人才,这些人才都喜欢待在沿

海发达地区,不太愿意回到内陆”(M-ZJ-4)。

“数字化的成本很高,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而言,很多时候也是通过产业园区出面,才能与移动、电信这类运营商达成合作”(M-ZJ-3)。

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相比,外贸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为直播带货、线上店铺运维等创新性的虚拟服务。这种转型对高端数字化人才与基础设施的依赖度较低,更依赖其积累的贸易经验。例如,在销售相同产品时,若外贸公司对客户需求把握更精准,便更能通过针对性的直播内容设计增加销量。

“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其实就是建一个线上运维系统,招一些懂得互联网营销的人,整体投入不大”(T-GD-2)。

最终,在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外贸公司与制造业企业在区位层面趋于分化。制造业企业普遍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获得在产业链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技能人才层面的优势。

“其实在浙江,制造业的成本是很高的,但让我们一下子去别的地方设厂,不太现实”(M-ZJ-3)。

反之,外贸公司则对区位要求相对较低,并且展现出对新市场机遇的偏好。

“‘一带一路’是个好生意,我就挺想去义乌开个分公司或者办事处,那里有中欧班列,机会大”(T-GD-3)。

五、结论与讨论

数字经济是未来发展趋势,但其对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仍缺乏系统研究。为此,本文从制造业企业与外贸公司在出口市场与区位层面的共聚关系切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从而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包含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两个维度。

在影响效应方面,数字经济显著削弱了制造业企业与外贸公司在出口市场和区位层面的共聚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两类主体共聚水平的下降是多重机制叠加的结果。在市场层面,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制造业企业获取海外客户的信息壁垒,推动“去中介化”发生;另一方面,又放大了中小客户对线上渠道的不适应,催生了“再中介化”。两者共

同作用,使两类主体的目标客群趋于分化,进而削弱两者的市场共聚水平。在区位层面,数字经济并未显著削弱制造业企业的地理集聚倾向,反而强化了其对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高技能人才等新型要素的依赖;而外贸公司则通过数字化手段拓展供应商渠道,对本地产业集群的依赖度明显下降,且对新型要素的依赖并不显著。上述机制相互叠加,推动了两者在区位布局上的分化。

本文结论对于理解新时期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研究发现表明,数字经济背景下出口空间格局呈现出分散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学界关于通信和交通技术发展引致“时空压缩”的预判相契合。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本文在机制层面的分析揭示了这一趋势背后的复杂性:既包含供给侧要素结构与偏好的变化,也体现了需求侧客户群体的分异,不同因素之间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空间格局的分化。

从现实层面看,研究结论同样具有政策启示意义。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 with 内部环境均在深刻重塑。一方面,以美西方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动与我国“脱钩”,如何把握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机遇,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促进中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联动发展,亟待深入研究探索。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数字贸易、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立足全球地缘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外部需求波动加剧、国内区域产业梯度重构的现实背景,建议从数字贸易生态培育、区域外贸梯度布局、跨境风险防控、制度协同改革四个层面提出配套政策体系。

第一,全域培育数智化外贸支撑生态,依托数字工具稳定外贸基本盘。立足数字经济对制造企业、外贸中介差异化赋能特征,分层分类完善数字化扶持政策。针对制造业出口主体,加大工业互联网、智能产线、数字研发设备技改补贴力度,支持企业搭建海外数字化直销渠道,降低海外客户信息获取成本,持续释放直接出口动能;针对外贸公司等中介贸易主体,完善海外仓数字化改造、跨境直播营销、中小订单综合服务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其对接零散海外中小采购商的再中介功能,形成制造直出、中介分销互补的多元出口结构。同步升级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综合服务能力,打通报关、结算、物流、退税全流程数字化链路,推动电子单证、数字资质跨境互认,降低全链条交易成本。

第二,优化东中西外贸梯度布局,构建区域外贸协同可持续发展格局。针对数字经济带来两类出口主体区位分化的客观规律,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产业外贸引导政策。东部沿海重点布局高端制造、数字研发、跨境平台总部,集聚高技能人才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承接高技术含量直接出口制造环节;中西部、沿边地区依托物流通道、土地用工成本优势,布局配套加工基地与区域性外贸分销节点,引导东部外贸中介机构在中西部设立分支,弱化外贸企业对东部本地产业集群的区位依赖。建立跨区域的外贸利益共享机制,完善飞地加工、异地出口产值税收分算规则,破除地方招商引资内卷式竞争,引导东部成熟产业链、外贸服务资源有序向内陆梯度转移。统筹推进产业集群与外贸服务配套协同建设,东部强化研发制造一体化载体,中西部完善仓储、质检、跨境分销配套,形成“东部研发直出、中西部配套分销”的区域外贸分工体系。

第三,健全全链条跨境风险防控体系,提升外贸主体抗外部冲击能力。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频发,叠加线上跨境交易合规隐患增多,需构建分层分类风险缓冲机制。一是完善出口信用保险扩面提质政策,扩大中小外贸企业、新兴市场业务承保范围;二是搭建全国统一的跨境合规数字预警平台,整合各国贸易壁垒、认证标准、关税政策动态数据;三是完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针对受外部限制冲击较大的制造产业与中小外贸服务商,提供技改、市场开拓扶持。

第四,推进跨区域外贸制度协同改革,破除要素跨区域流动体制障碍。推行外贸经营资质、质检结果、职业技能跨省市互认机制,消除地方隐性市场壁垒。完善土地、能耗、数据要素跨区域统筹调配机制,简化异地经营“一照多址”审批流程。同步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分级分类管理,以制度协同弱化数字经济带来的区位分化效应,统筹外贸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Ahn J, Khandelwal A K, Wei S J. The role of

-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 73-85.
- [2] Bernard A B, Grazi M, Tomasi C. Intermediar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roducts and destin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4): 916-920.
- [3] Billings S B, Johnson E B. Agglomeration within an urban area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6, 91: 13-25.
- [4] Elia S, Giuffrida M, Mariani M M, et al. Resources and digital export: An RBV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apabilitie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32: 158-169.
- [5] Ellis P. Adaptive strategies of trading companie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1, 10(2): 235-259.
- [6] Ellis P D. The traders' dilemma: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superior performance in mediated exchange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4(4): 375-396.
- [7]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Intermediaries in entrepot trade: Hong Kong re-exports of Chinese goods [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2004, 13(1): 3-35.
- [8] Felbermayr G, Jung B. Trade intermedi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porter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9(4): 634-648.
- [9] Gilboa S, Seger-Guttmann T, Mimran O. The unique role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in small businesses' customer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19, 51: 152-164.
- [10] Gopal R D, Ramesh R, Whinston A B. Microproducts in a digital economy: Trading small, gaining lar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3, 8(2): 9-30.
- [11] Gu G Y. Technology and disintermediation in online marketplace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24, 70(11): 7868-7891.
- [12] O'sullivan A, Strange W C. The emergence of coagglomer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18(2): 293-317.
- [13] Sen R, King R C. Revisit the debate on intermediation, disintermediation and reintermediation due to e-commerce [J]. Electronic Markets, 2003, 13(2): 153-162.
- [14] Wang Q, Gibson M J. Exporters in cross - section: Direct versus intermediated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26(1): 84-95.
- [15] 包群, 廖赛男. 国内生产网络与间接出口外溢: 基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证据 [J]. 管理世界, 2023, 39(8): 20-45.
- [16] 陈露, 刘修岩. 产业空间共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 兼议区域产业多样化集群建设路径 [J]. 经济研究, 2024, 59(4): 78-95.
- [17] 陈韬, 贺灿飞. 国际贸易地理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0): 1732-46.
- [18] 程钦良, 宋彦玲, 张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时空成本与制造业空间布局 [J]. 经济学动态, 2024(6): 64-80.
- [19] 仇怡, 宋娜, 黄丹. 长株潭都市圈数字化转型的区域协同创新效应 [J]. 经济地理, 2025, 45(10): 141-150.
- [20] 杜群阳, 郑小碧. 职业中间商空间嵌入与国际贸易模式演进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1): 65-77.
- [21] 段巍, 王兵, 韩婕. 数字经济重塑产业布局: 理论机制与中国实践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3): 46-57.
- [22] 耿勇, 向晓建, 徐飞. 数字化转型能否打破地理距离约束? ——来自企业供应链地理分布的证据 [J]. 经济管理, 2024, 46(3): 165-185.
- [23] 顾伟男, 范信言, 任亚文, 等. 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24, 43(8): 2194-214.
- [24] 郭琪, 朱晟君. 市场相似性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的空间演化路径 [J]. 地理研究, 2018, 37(7): 1377-90.
- [25] 贺灿飞, 郭佳宏, 谢玉欢. 基于认知邻近性的进口溢出效应对区域出口产业重构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2023, 78(6): 1323-38.
- [26] 蒋晟, 俞国军, 贺灿飞. 贸易中介研究进展及“全球-地方”互动的新分析视角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5, 34(2): 55-69.
- [27] 蒋丽.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珠三角地区汽车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3, 32(12): 118-28+54.
- [28] 李伟, 贺灿飞. 中国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J]. 经济地理, 2017, 37(3): 96-105.
- [29] 李宇, 王竣鹤. 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数字邻近”效应: 概念内涵、结构维度与量表开发 [J]. 中国软科学, 2025(2): 54-65.
- [30] 刘清, 杨永春, 蒋小荣.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 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0, 39(12): 2743-62.
- [31] 马斌, 何亚男. 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数字产品出口质量升级: 基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经验证据 [J]. 中国软科学, 2025(3): 214-24.
- [32] 毛熙彦, 贺灿飞. 区域发展的“全球-地方”互动机制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10): 1449-61.
- [33] 欧阳晓, 袁礼, 汤凌霄. 市场规模优势研究: 理论逻辑与前景展望 [J]. 财贸经济, 2023, 44(9): 91-107.

- [34]宋周莺,车姝韵,刘卫东.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格局与结构分析[J].地理研究,2017,36(12):2291-304.
- [35]铁瑛,刘逸群.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J].中国工业经济,2021(12):107-26.
- [36]佟家栋,杨鑫,马丁,等.数字产品出口如何助推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5(6):114-36.
- [37]王玲,李悦晴.城市群视域下我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双向共聚水平的测度及其空间特征[J].经济地理,2023,43(5):128-38.
- [38]王如玉,梁琦,李广乾.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J].管理世界,2018,34(2):13-21.
- [39]王文字,贺灿飞.关系经济地理学与贸易网络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22,41(3):461-76.
- [40]吴志军,舒晓杰,孔欣紫.数字经济驱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J].经济地理,2025,45(1):77-86.
- [41]徐杰,赵春江.数字经济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24(8):118-28.
- [42]俞国军,贺灿飞,朱晟君.产业集群韧性:技术创新、关系治理与市场多元化[J].地理研究,2020,39(6):1343-1356.
- [43]张英浩,汪明峰,刘婷婷.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与影响路径[J].地理研究,2022,41(7):1826-44.
- [44]郑小碧,钱家悦,张友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与城市出口规模:基于中国2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产经评论,2023,14(3):134-45.
- [45]钟腾龙,张晓涛,毕文静.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与货物出口贸易[J].经济学动态,2025(8):172-90.
- [46]周灿,曾刚.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产业集群研究进展与展望[J].经济地理,2018,38(1):11-19.
- [47]周沂,贺灿飞.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J].地理学报,2019,74(6):1097-111.
- [48]朱彬,关京武,尹旭.长三角地区智能设备制造业空间布局演化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4,44(10):117-25.
- [49]朱向东,朱晟君,陈伟.目的国贸易政策对中国绿色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25,45(3):246-55.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Reshapes Export Spatial Patterns: The Co-Agglomeration of Trading Companies and Manufacturing Firms

Jiang Sheng Mu Enyi He Canfei

Abstract: Export spatial patterns are a central topic in economic geography. Alth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er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its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exports remains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examine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export-oriented manufacturers, with limited attention to export markets or to differences among trade actors. From a spatial co-agglomera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mbin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reshapes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ng companies and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reduces their co-agglomeration in both export markets and locations.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divergence arises from multiple mechanisms: at the market level, digitalization lowers manufacturers' customer-search costs while creat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rading companie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yers; at the location level, it increases manufacturers' dependence 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skilled labor but weakens trading companies' reliance on local manufacturing clusters.

Key Words: Export Spatial Co-Agglomeration; Digital Economy; Trading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Firms; China

(责任编辑:江夏)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区域创新视域下社会过滤理论的发展方向探讨*

任建辉 杜中巧 刘维奇

摘要:社会过滤理论作为区域创新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深刻揭示了知识流动、要素配置与创新活动空间分异的内在机理,清晰阐释了区域创新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底层逻辑。然而,该理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诸多瓶颈,尚未实现充分的理论拓展与实践应用,整体处于研究价值被低估的“睡美人”状态。当前研究普遍存在概念界定模糊、内涵边界不清晰、测度指标体系不完善、量化方法缺乏统一性等问题。同时,因果识别机制不够严谨,实证研究多停留在相关性分析层面,且理论成果与地方政策实践衔接不足,难以有效转化为可操作的发展策略。文章在系统梳理社会过滤理论的学术溯源、核心内涵与演化脉络的基础上,从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实践应用三个层面重点剖析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发展短板,并从理论体系构建、量化方法创新、政策路径优化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的核心拓展路径,以期推动社会过滤理论朝着系统化、规范化、本土化方向全面发展,为破解我国区域创新发展失衡难题、优化区域创新空间布局、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的实践指引。

关键词:社会过滤;区域创新;集聚经济;知识溢出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142-11 **收稿日期:**2026-04-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过滤影响区域创新及成果转化的机制研究”(421011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过滤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21YJC790096)。

作者简介:任建辉,男,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太原 030006)。

杜中巧,女,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硕士生(太原 030006)。

刘维奇,男,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 030006)。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无论是对创造新的市场机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还是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熊彼特(1942)曾指出:“开展创新是历史进程中具有根本性作用的唯一功能”。那么,创新就一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既有文献普遍认为创新与区域经济表现相关,但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在任何情况下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实际经济成果

(Shearmur & Bonnet, 2011)。因此,学者们试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厘清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关于这类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主流路径。第一种是“线性模型”(Grossman & Helpman, 1993),该模型认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与发明创造,进而转化为创新,最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第二种研究可归为“区域创新系统”(Lundvall, 1992)或“学习型区域”(Morgan, 1997)研究范式。这些与演化经济学相关的研究范式(Dosi et al., 1988; Freeman, 1994),重点研究根植于特定地域、对创新形成起到促进或抑制作用的制度网络。而这些网络发挥创新催化剂作用的能力,又取决于每个地区的社会与

结构性条件的组合,即所谓的“社会过滤”(Social filter)(Rodríguez-Pose, 1999)。最后还有一大批学者主要聚焦于创新的扩散与同化(Jaffe, 1986; Audretsch & Feldman, 1996; Cantwell & Iammarino, 2003; Sonn & Storper, 2008)。这一知识溢出理论已被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广泛采用,研究方法涵盖定量与定性两类。因此,创新不再仅靠有形资本的组合来解释,还由无形资本的组合来解释(Landry et al., 2002)。简言之,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取决于区域本身的消化能力和过滤机制(Sterlacchini, 2008; Cornett, 2009)。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区域创新理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用于解释为何不同地区的创新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其着重强调创新主体间的互动结构,对创新得以生成、转化与根植所依赖的地方性社会、制度与文化条件的关注相对不足,忽视了创新得以发生和扩散所必需的地方性社会基础(Fitjar et al., 2015)。西班牙经济学家 Rodríguez-Pose 于 1999 年提出“社会过滤”,用于解释区域创新差异的根源。该理论认为,每个区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构成一个“社会过滤器”,决定了该地区吸收创新和将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能力。此后 Capello 等(2011)及其他学者将 Rodríguez-Pose 在社会过滤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贡献,称为“社会过滤理论”(Social filter theory)。社会过滤理论核心阐释的是创新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中间调节逻辑,是通过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认知等多重社会条件因素,筛选、阻滞或促进创新要素(知识、技术、人才等)在不同主体(个体、企业、区域)间流动与适配的“多维度调节机制”,最终影响区域创新绩效与发展差距(任建辉等, 2023)。尽管社会过滤理论对多样化区域创新格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社会过滤理论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其重要性未得到充分重视与探讨(Ren et al., 2025)。随着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地位的提升,有望重启社会过滤理论学术探索的新纪元,为区域创新理论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基于此,本文从理论溯源与核心内涵出发,通过梳理社会过滤理论的演化脉络,以及学者对“社会过滤”概念的不同阐释,回顾目前有关社会过滤理论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过滤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泛化、测度体系不完善、

因果识别不足、政策实践脱节等多重困境。最后从理论、方法与应用层面回应“社会过滤如何影响区域创新”及“如何科学构建社会过滤测度体系”这些核心争议,旨在唤醒该理论作为区域研究领域“睡美人”的潜在活力,以期为激发不同区域的创新潜力提供借鉴。

二、社会过滤理论的演化与核心内涵

区域创新差异一直是经济地理与创新经济学的重要问题,现有的经典理论主要从集聚效应、创新系统构建以及知识溢出这些角度进行解释,却难以回答“同等创新投入为何在不同区域产出成果悬殊”这一现实难题。而社会过滤理论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研究上的空白,通过引入区域社会、文化、制度等本土条件,搭建起创新要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释框架,其完整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值得系统梳理。

(一)理论溯源

区域创新以其经典产业集聚理论为逻辑起点,Marshall(1920)提出的马歇尔工业区理论奠定了区域创新的空间集聚基础;Boschma(2005)进一步从邻近性维度拓展了创新合作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视角逐步转向区域创新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模式,Camagni(1995)和 Breschi 等(2001)聚焦创新环境的塑造作用,Camagni 等(2013)和 Piazza 等(2019)则深入阐释了区域创新模式的异质性特征。同时,Cooke 等(1997)和 Asheim 等(2011)构建的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逐步成为区域创新研究的核心分析框架,Morgan(1997)和 Healy 等(2012)从学习型区域视角补充了区域创新的演化动力。然而,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仅有创新或者知识的积累是不够的,它们转化为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未被发现的因素(Audretsch et al., 2008)。Marques 和 Morgan(2021)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不是必然的,例如瑞典悖论(Fragkandreas, 2013)和欧洲悖论(Audretsch et al., 2008)。实际上,特定的地方社会结构、文化认知与制度环境,共同塑造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成熟度与演化路径。创新的“本地根植性”决定了创新并非自由流动的要素,而是受制于区域的社会条件。因此,区域创新的关键挑战不在于知识的简单引入,而在于区域是否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来对外部知识进行有效识别、解码并

内化为本地化的解决方案(Caragliu & Nijkamp, 2012)。

根据上述理论拓展可推断出,区域创新绩效的差异,根本上取决于该区域内生的知识吸收能力,以及其对外部知识进行筛选、转化与应用的社会性过滤机制(Sterlacchini, 2008)。在解读这一核心逻辑、探究区域创新成果转化异质性的过程中,相关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其中社会过滤理论历经多年发展,其核心文献在不同阶段所做的贡献持续推动该理论体系走向成熟(见表1)。首先,Rodríguez-Pose(1999)提出的“社会过滤”核心概念,为后续社会过滤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其次,Rodríguez-Pose 和 Crescenzi(2008)构建了经典实证分析框架,验证了社会过滤在研发投入向区域经济增长转化中的调节作用,通过核心结论推动理论完成从概念构建到实证检验的跨越。

Capello等(2011)将社会过滤与“地域资本”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且拓展了该理论在空间维度的应用范围;Capello 和 Lenzi(2018)则明确其区域创新理论分支的学术归属,明晰了理论的学科定位。覃成林等(2016)推动该理论引入中国,为本土化研究搭建基础;Xiong 等(2020)以中国区域为样本,实证探究其在区域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任建辉等(2024)翻译出版了社会过滤理论研究与应用的经典著作《欧盟的创新与区域增长》,助力理论在国内的传播;Ren 等(2025)对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完善了理论分析范式,有效提升了该理论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社会过滤理论从核心概念提出到国际学界的拓展延伸,再到我国本土化的深化应用,逐步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完整体系,也为后续的区域创新与过滤机制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表1 国内外社会过滤理论发展的代表性文献

作者	标题	出版源	核心贡献
Rodríguez-Pose(1999)	Innovation Prone and Innovation Aver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Europe	Growth and Change	首次提出“社会过滤”概念,是社会过滤理论的开创性文献
Rodríguez-Pose 和 Crescenzi(2008)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Genesis of Regional Growth in Europe	Regional Studies	构建经典实证模型,验证社会过滤对R&D投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提出“社会过滤条件比R&D投入更能预测经济增长”的重要结论
Capello等(2011)	Territor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growth: increasing returns in knowledge us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将社会过滤与“地域资本”概念结合,深化理论的空间维度
覃成林等(2016)	社会过滤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	系统梳理社会过滤脉络,首次将该理论引入中国
Capello 和 Lenzi(2018)	The dynamics of regional learning paradigms and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首次将社会过滤理论确定为区域创新理论的分支之一
Xiong 等(2020)	Can innovation really b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ocial filter in China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实证检验了社会过滤对中国区域创新转化的调节效应,拓展了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任建辉等(2023)	社会过滤理论:一个区域创新理论的述评	区域经济评论	完善社会过滤理论的分析范式,揭示双重过滤机制,推动理论体系化发展
任建辉等(2024)	欧盟的创新与区域增长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国内首部社会过滤理论译著,推动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
Ren 等(2025)	Social filter theory——A sleeping beaut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ies	Region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国内学者首次在国际期刊发表的社会过滤理论综述,系统梳理理论发展脉络,提出“睡美人”理论隐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理论支撑与多元研究视角。

(二)核心内涵

Rodríguez-Pose(1999)认为每个区域都存在一个独特的“社会过滤器”,由影响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创新性(Innovative)和保守性(Conservative)要素构成,用以描述本地经济社会条件对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过滤”作用。当创新性要素占优时,社会过滤弱、渗透性强,区域开放包容、善于技术学习,研发投入高效转化为创新;反之,保守性要素占优时,社会过滤强、渗透性弱,区域封闭保守、排斥变革,创新难以落地、知识溢出失效。并且进一步指出社会过滤条件是所有创新活动成功开展的前提,因为它们不但影响区域创新的产生,还影响创新转化的效率。根据社会过滤的强度,可以将区域划分为两种类型:创新厌恶区域(Innovation-averse region)和创新易发区域(Innovation-prone region)(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本地社会条件就好比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介质层”,这个“介质层”越薄,就意味着社会过滤越弱,对创新具有较强的“渗透性”,能够积极吸收外部知

识并向先进地区学习,从而高效地将创新投入转化为经济产出。反之,“介质层”较厚的地区的社会过滤较强,其社会、经济结构对外部创新构成屏障,导致当地企业与整体社会难以将技术知识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据此,一个地区社会对技术变革的吸收和排斥强度可划分为:完全渗透、部分渗透(部分过滤)和完全过滤。完全渗透是指社会壁垒、认知隔阂、制度阻碍等过滤机制完全失效,知识、技术、信息、创新要素可无阻碍自由流动、传播与吸收;部分渗透(部分过滤)是社会过滤机制部分发挥作用,创新和知识要素可实现有限度流动,部分内容被阻隔、筛选或改造,是现实中最普遍的状态;完全过滤是指社会过滤形成刚性阻隔,外部知识、技术、创新理念等要素无法进入主体和区域内部,双向交流基本停滞。此外,Rodríguez-Pose(1999)还举例说明,传统的工业衰退地区或萧条地区,以及边缘地区都表现出创新厌恶的社会过滤特征。

诺贝尔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2020)指出,“个人倾向于过滤掉与自己所持有的观念和成见相抵触的信息和想法”。即一个区域创新的成功并非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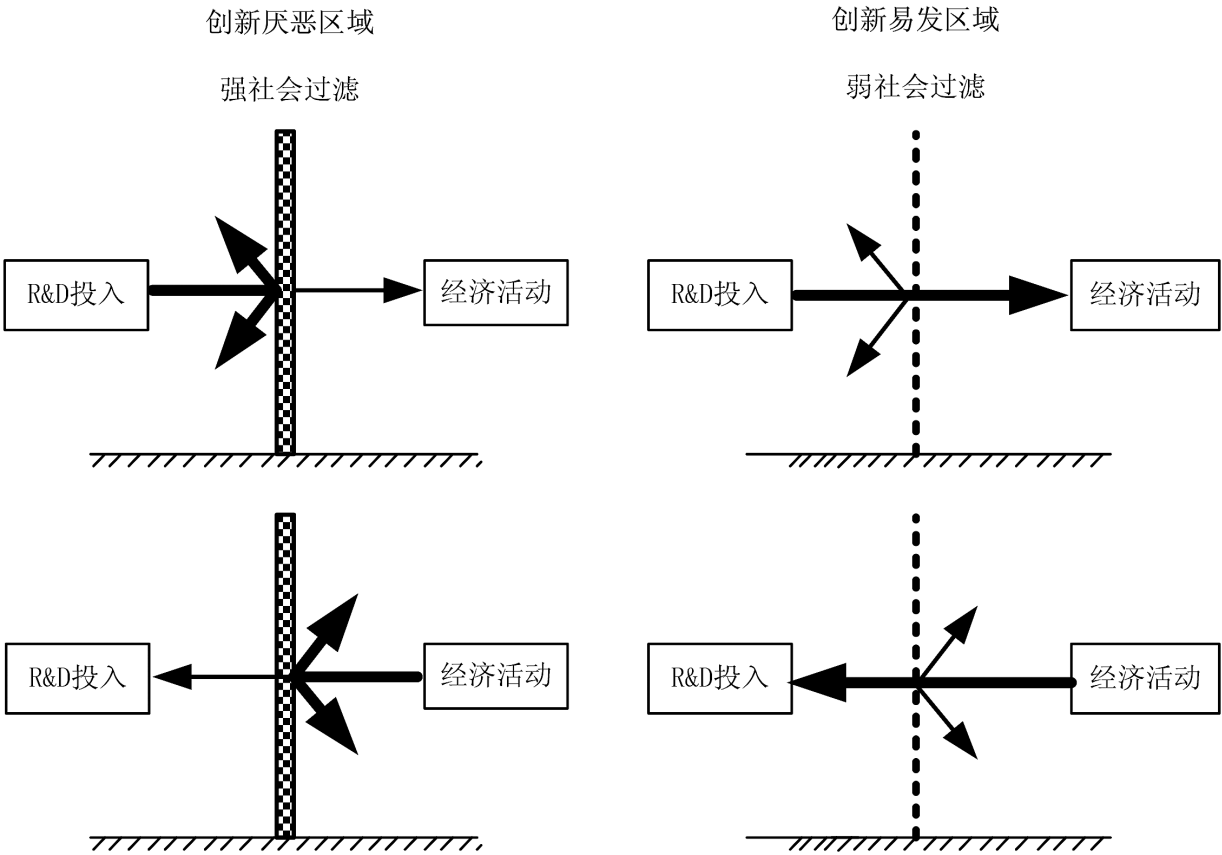


图1 创新易发区域与创新厌恶区域研发投入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Rodríguez-Pose,1999)。

纯取决于其拥有的物质数量和质量。最为关键的是,它还取决于认知要素的丰富程度,即个体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此外,Li等(2018)证实,子公司作为“监听站”会对外部知识进行接收、过滤并传递给母公司。这些个体和公司级别的认识和证据构成了社会过滤存在的微观基础。Ren等(2025)在Rodríguez-Pose(1999)基础上系统引入并深化社会

过滤理论,构建“区内过滤+区际过滤”双重过滤框架(见图2),分别对应于区域内研发和区域间知识溢出。区内过滤聚焦于分析本地社会过滤条件影响研发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区际过滤聚焦于社会过滤条件影响跨区域的知识溢出的程度和方向。总体而言,社会过滤理论为各国和各地创新地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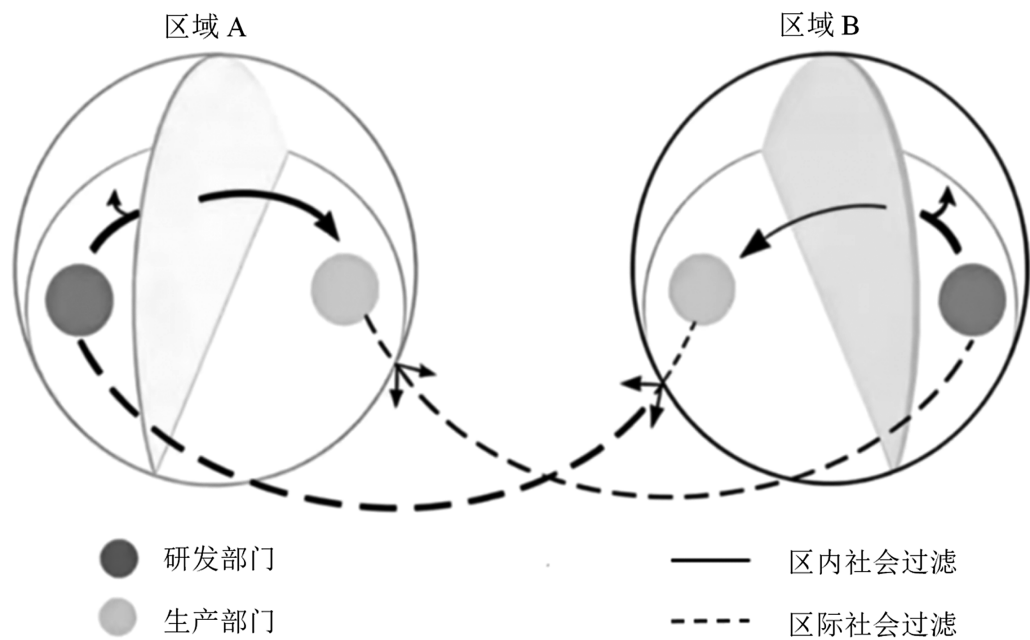


图2 “区内过滤+区际过滤”双重过滤框架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Ren et al.,2025)。

三、社会过滤理论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区域创新研究视角下,知识生产理论(Griliches, 1979)、区域创新系统(Cooke et al., 1997; Asheim et al., 2011)、学习型区域(Morgan, 1997)与社会过滤(Rodríguez-Pose, 1999)均是极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均致力于探寻区域创新得以发生的前置条件,并阐释创新活动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与之不同的是,社会过滤理论着重指出,区域的社会经济与制度条件会对研发投入和知识溢出产生“过滤作用”,即同时存在阻抗效应与渗透效应,并最终制约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由此可见,该理论为理解区域创新与转化能力的异质性,以及知识溢出的空间不对称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客观而言,社会过滤理论在理论体系的完善、测度指标与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方面,

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一)理论层面:概念泛化的困境

什么是社会过滤? 根据Rodríguez-Pose的构想,社会过滤是指一系列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对创新过程的选择性作用。它涉及社会接受的机制和过程,以及新技术和新思想的采用和传播,其“渗透性”直观反映了一个地区吸收外部创新并将其转化为内生经济动能的能力。但现有研究尚未就社会过滤的核心内涵给出充分界定,有时甚至被简单归结为一系列经济结构变量(Paci,2013)。例如,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人们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地方政府的政策可能促进或限制创新活动。这导致学界在具体描绘时产生了描述性分歧:学者们分别使用了社会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创新体系特征、社会制度(D'Agostino & Scarlato,2015)及社会过滤条件(Xiong et al.,2020)等不同术语来代指相近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过滤概念虽然本身具有较

强的理论抽象性,但并非旨在识别单一因素与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相反,它的理论关切在于探讨具有创新能力的区域是否能够通过一系列社会条件来解释创新的来源。这导致学界在对社会条件进行的实证刻画与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分析维度的差异。例如,Crescenzi和Rodríguez-Pose(2012)的研究侧重于社会经济结构维度,强调人力资本的构成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特征至关重要。认为只有当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集聚程度,再加上相对年轻化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比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动态相结合,才能形成一种推动人力资本持续积累和升级的强化机制;另有研究则聚焦于制度质量,如政府效能与监管水平(D'Agostino & Scarlato, 2015);还有学者将创业文化心理纳入考量(Beugelsdijk, 2007)。另外Peiró-Palomino(2019)指出,社会过滤本质上是由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条件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关键无形资产共同构成的一种中介机制。该机制深刻塑造着知识的生成、扩散过程,并最终决定着知识向实际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与方向。由上述学者的研究可概括得出,学者们想逐一纳入多维度的要素来拓展社会过滤的概念,但该做法也使得社会过滤的概念与“区域创新系统”“社会资本”等邻近理论的边界日趋模糊,可能导致其核心概念面临泛化的挑战(Boschma, 2005)。

(二)方法层面:测度体系与因果识别不足

社会过滤是多维度的综合体现,其内在的复杂性与要素间的相互交织,使其在测度和性质刻画上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从而制约了不同区域间的有效比较分析(Crescenzi, 2005)。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过滤的衡量指标仍存在争议。早期阶段提出可以通过人口结构、农业劳动力比例、长期失业率和教育水平等指标来衡量社会过滤,这些指标可视为社会过滤指标的原型(Rodríguez-Pose, 1999; Rodríguez-Pose & Crescenzi, 2008); Bilbao-Osorio和Rodríguez-Pose(2004)采用在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中引入社会经济因素的办法来反映社会过滤的作用;Crescenzi(2005)认为,尽管社会过滤内涵的动态复杂性及数据的稀缺性,使得实证上很难准确测度其大小,但人力资本的积累仍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另外学者们还将文化和制度因素纳入社会过滤指标体系。当主要关注社会的制度层面时,除人力资本这一核心指标外,还应将社会

排斥和制度效率纳入考量(D'Agostino & Scarlato, 2015)。例如D'Ingiullo和Evangelista(2020)指出制度在塑造企业的创新环境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从而影响其创新表现。

从现有研究构建的社会过滤指标看,该概念被构建为一个复合指标,但内部各要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其中部分要素对区域经济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则产生抑制作用(D'Ingiullo & Evangelista, 2020)。此外,各构成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甚至存在信息冗余或共线性。若将这些变量全部引入回归模型,将引发多重共线性困局。虽然主成分分析法是当前研究中较为通行的研究方法,但已有文献所呈现的指数结果存在显著异质性(Ren et al., 2025)。这主要源于研究对象、空间尺度与指标选取的不同。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对社会过滤构成指标的遴选,往往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与明确的解释框架,指标选择存在一定程度的笼统性与主观随意性。另有学者指出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需要通过一个完整的链式传导过程实现,该过程涵盖研发投入、知识产出与发明创造、创新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应用等多个阶段,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多阶段非线性转化。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上述转化链条中的某一孤立环节或局部关系,缺乏对整体传导机制的系统性检验与关键路径的因果识别,更难以全面揭示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增长的内在逻辑。例如,关于中国情境的实证发现了社会过滤的“负向调节”悖论,但对其中具体的传导障碍剖析有待深化(任建辉, 2021)。

(三)应用层面:政策工具供给与实践脱节

目前社会过滤的政策工具箱主要包括资本、硬件设施、显性人力资本等“有形”要素的激励工具,但阻碍创新与增长的关键往往是制度质量、社会信任、合作文化、心理开放性等“无形”的软性条件(D'Ingiullo & Evangelista, 2020)。改造“无形”的社会过滤条件是一项涉及制度变迁、行为规范重塑与文化培育的复杂社会工程,其过程缓慢、路径依赖性强,而且难以通过传统经济激励工具实现快速变革。尽管Rodríguez-Pose和Zhang(2019)明确指出“政府质量”和“反腐败”是关键的社会过滤维度,但如何通过可操作、可评估的政策手段系统性地提升一个地区的治理效能或社会资本,仍旧缺乏成熟、可复

制的方案。这种“工具失灵”使得政策制定者即便认识到问题所在,也常感到无从下手,导致政策浮于表面,难以触及影响创新转化的深层社会结构与制度根源。此外,一些边缘地区所经历的孤立往往导致文化和社会排斥,限制了他们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创新过程。这种排斥加剧了重点政策和投资的缺位,使这些地区在更广泛的国家发展议程中落于次要地位(Pappa et al., 2025)。因此,社会过滤理论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社会过滤的高度异质性与情境依赖性(Rodríguez-Pose & Crescenzi, 2008)。如今学界已经普遍达成共识:创新是一个根植于地域的过程,脱离具体空间的社会与制度条件,就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解读(Rodríguez-Pose & Crescenzi, 2008)。因此,影响创新过程的“地域根植性因素”,成为诸多理论的核心研究对象。进一步探究如何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对作为核心的地域根植性网络、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进行量化分析,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本地主体间的系统互动具有内在的独特性,因此难以在不同系统间进行衡量与比较。Rodríguez-Pose 和 Wilkie (2016)也指出驱动不同区域创新的关键社会过滤因素各不相同,然而政策实践却普遍存在简单化倾向,习惯推行标准化的最佳实践模板。譬如,迄今相关文献多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案例开展研究,该研究是否适用于东亚与非洲等发展中区域,仍有待进一步检验与拓展。

四、社会过滤理论的核心发展方向

为了推动社会过滤理论实现从一个有力的解释性框架演进为能在相关研究中提供基础理论与核心议题的分析体系,未来的研究议程必须在理论构建、方法创新与实证拓展三个维度上进行协同性突破。

首先,当前社会过滤的概念在相关文献中存在“文化过滤”“制度过滤”以及“制度扮演社会过滤功能”等多种表述,这种现象表现为不同研究将其测度指标锚定于差异较大的维度,包括社会经济结构(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 2013)、制度质量(D'Ingiullo & Evangelista, 2020)乃至区域集体心理特质。事实上,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均是社会过滤的构成维度和侧面。为避免概念泛化,

笔者认为可以统一用社会过滤来表征,只是在测度和叙述上做出区别,这样更有利于社会过滤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理论工作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整合结构性基础、制度性规则与认知性文化的多层次概念体系,并阐明各概念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例如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由多元无形资本交织构成的“介质层”,这为精炼社会过滤理论及其情境化重构提供了关键思路(任建辉, 2021)。

其次,鉴于社会过滤在影响区域创新与知识溢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测度体系不完善、因果识别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有必要对其经验研究的方法与模型进行系统性改进。现有实证分析大多停留于聚合层面的整体性检验,难以有效识别社会过滤对知识流动同时产生的“促进”与“抑制”效应。此外,从创新到经济增长的转化是一个包含多个阶段的非线性传导链条,而多数研究仅进行孤立、局部的环节分析,缺乏对完整传导过程的系统检验。在方法上,现有文献过度依赖常规多元回归模型,对变量间相互影响、样本选择偏差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尚不充分,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限制了对社会过滤真实作用机制的深入理解。对此亟须方法论的革新:一方面,需广泛采用能够识别复杂中介、调节效应与非线性的因果推断工具,例如通过考察企业吸收能力的微观差异来连接社会过滤条件与创新绩效(Crescenzi et al., 2016);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倡导混合研究设计,以深入的质性案例与过程追踪研究,揭示“制度障碍”的形成或“地方能动性”的发挥等无法捕获的深层社会过程(Kurikka et al., 2022),从而为理论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与机制性证据。

最后,在探讨区域创新政策时,核心的论点在于政策工具的供给与实践层面存在结构性脱节(Iammarino et al., 2019),这种脱节源于主流政策普遍忽视了地方特有的社会过滤机制(Huggins & Thompson, 2019)。针对这一问题,一种可行的解决思路是“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与整合观”(Iammarino, 2005)。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可通过对比宏观层面(国家创新系统)与微观层面(单个创新主体层面)开展中观层面的分析。这一中观层面聚焦“演化经济进程中产生本质变化的核心要素”,有助于阐释不同区域在新知识吸纳、传播与创

造层面呈现出的差异化特征。针对创新绩效的社会制度决定因素,采用微观—中观—宏观整合的研究方法,是回应区域经济异质性与路径依赖的有效手段——该异质性体现为“过往知识积累与学习所形成的本地结构规律”(Iammarino, 2005),而区域经济自身发展格局又会塑造并约束着新的增长机遇。该方法为识别一系列“外部知识学习与创新活动得以开展的外部条件”(Cooke et al., 1997)提供了灵活的理论工具,这些条件可在各类创新体系中被识别,且可作为创新战略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使某些行动比其他行动更易发生的条件”(Morgan, 2004),或“社会过滤”——即每个空间中“创新与保守要素的特殊组合,会推动或阻碍成功的创新体系发展”(Rodríguez-Pose, 1999)。在政策实践方面也需实现根本性转向:政策优化需推动硬实力投资与软环境支撑有机结合(Gianelle et al., 2020),政策方向要从直接改造地方文化转变为间接激活本土的内在机制(Huggins & Thompson, 2023),强化政策工具与区域实际经济状况的适配,避免简单套用标准化的最佳实践模板,使政策更加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与能力,进而增强政策与实践的有效衔接。

五、研究启示

社会过滤理论历时近30年的发展,已确立了其在区域创新与增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其根本性贡献在于它成功颠覆了“研发投入自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线性认识。良好的社会过滤不仅会激发内部创新活动的潜力,还会对外部知识形成强大吸引力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增长。可见社会过滤是各区域创新发展的关键内核和重要依托,知识溢出是区域创新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源泉,而社会过滤条件的好坏关乎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及利用效率。如前所述,有形要素禀赋(如基础设施、高楼大厦)只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和载体,社会环境要素对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和有效利用更为关键。社会过滤扮演着一种无形的“结界”,对内形成一种锁定,对外构成屏障,阻隔内外信息 and 知识的流动与交换。Rodríguez-Pose等(2025)研究发现,明星科学家的地理集聚形成了强劲的反馈循环,在驱动核心地区创新的同时,也加剧了空间不平等。成

功吸引明星科学家的地区能够形成生态系统优势,降低社会过滤强度,从而更高效地将知识生成转化为持续创新与经济增长。在知识与经济绩效之间,横亘着一个由区域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制度质量、人力资本禀赋与文化心理所共同构成的“社会过滤器”(Rodríguez-Pose, 1999)。这个过滤器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调节与转化系统,其渗透性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是“创新易发区域”还是“创新厌恶区域”,从而系统性地解释了全球范围内不平衡的区域创新图景(Crescenzi & Rodríguez-Pose, 2013)。

由此社会过滤理论要从“睡美人”蜕变为引领区域科学研究的关键理论依托,必须实现一场范式跃迁。这意味着,在理论上需将其从一个丰富的“描述性隐喻”,精密化为一个维度清晰、机制明确的中层分析框架,严格界定其结构、制度与认知维度及其互动关系。在方法上,必须推动从“验证关联”到“识别机制”的转向,广泛采用能剖析复杂因果路径的前沿工具,并大力倡导混合研究设计,通过质性深度案例连接宏微观证据,破解机制黑箱(Kurikka et al., 2022)。在政策分析视角下,主流地区创新政策倾向于聚焦资源富集地区,依赖标准化、自上而下的硬性干预,却普遍忽视了地方由文化、规范、身份认同等构成的“社会过滤”机制,造成政策供给与实践的结构性脱节。对此,有效的政策框架需实现三重转向:认知上承认地方文化黏性与路径依赖,设计上推动政策与地方情境适配,实施上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吸收能力,最终实现软硬因素的耦合,激活区域内生发展动力。

社会过滤理论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系统性转向,核心启示在于区域发展政策必须从单纯加大研发投入、建设产业园区与招商引资,转向优先改善区域社会经济条件、降低社会过滤强度。政策制定应遵循“先优化社会过滤条件、再配置创新资源”的逻辑,将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改善、人口结构与社会活力培育、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完善作为优先方向,从根本上提升区域对知识、技术、研发及外资溢出的吸收转化能力。同时,政策需重视空间差异,对创新友好的弱过滤区域进一步放大增长优势,对创新排斥的强过滤区域优先补齐社会条件短板,而非盲目布局创新项目;

在创新投入、外资引进与区域协调政策中,均需要适宜的社会基础,推动创新政策与教育、就业、治理、包容性社会政策协同发力,以此破解区域增长分化困境,实现创新资源向实际经济增长的高效转化。

参考文献

- [1]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Shearmur R, Bonnet N. Does lo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 to local development? A policy perspective [J].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 2011, 3(2): 249-270.
- [3] Grossman G M,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 [4] Lundvall B-A.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 [5] Morgan K.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J]. *Regional Studies*, 1997, 31 (5): 491-503.
- [6] Dosi G, Freeman C, Nelson R R, et al.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 [7] Freeman C. The economics of technical change: a critical surve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8(5): 463-514.
- [8] Rodríguez-Pose A. Innovation prone and innovation averse societie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Europe [J]. *Growth and Change*, 1999, 30: 75-105.
- [9] Jaffe A.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 and market shar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 984-1001.
- [10] Audretsch D B, Feldman M P.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3): 630-640.
- [11] Cantwell J, Iammarino 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uropean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12] Sonn J W, Storper M.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 analysis of US patent citations, 1975-1997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8, 40(5): 1020-1039.
- [13] Landry R, Amara N, Lamari M. Does social capital determine innovation? To what extent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2, 69 (7): 681-701.
- [14] Sterlacchini A. R&D,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uneven linkages among European regions [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 1096-1107.
- [15] Cornett A P. Aims and strategie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policy: a Danish perspective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9, 21 (4): 399-420.
- [16] Fitjar R D, Rodríguez-Pose A. Networking, context and firm-leve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regional filter in Norway [J]. *Geoforum*, 2015, 63: 25-35.
- [17] Capello R, Caragliu A, Nijkamp P. Territor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growth: increasing returns in knowledge use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1, 102(4): 385-405.
- [18] 任建辉, 赖琳琳. 社会过滤理论: 一个区域创新理论的述评 [J]. *区域经济评论*, 2023(3): 145-155.
- [19] Ren J, Lai L, Pei B, et al. Social filter theory—a sleeping beaut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ie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2025, 2(1): 2-11.
- [20]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M]. 朱志泰, 陈良璧,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21] 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61-74.
- [22] Camagni R P.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milieu and its relevance for public policies in European lagging region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95, 74(4): 317-340.
- [23] Breschi S, Lissoni F.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loc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ritical survey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1, 10(4): 975-1005.
- [24] Camagni R, Capello R. Regional innovation patterns and the EU regional policy reform: towards smart innovation policies [J]. *Growth and Change*, 2013, 44: 355-389.
- [25] Piazza M, Mazzola E, Abbate L, et al. Network position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 27 (9): 1857-1878.
- [26] Cooke P, Uranga M G, Etxebarria G.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 475-491.
- [27] Asheim B T, Smith H L, Oughton C.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ory, empirics and policy [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7): 875-891.
- [28] Healy A, Morgan K. Spaces of innovation: learning, proximity and the ecological turn [J]. *Regional Studies*, 2012, 46(8): 1041-1053.
- [29] Audretsch D B, Keilbach M. Resolving the knowledge paradox: knowledge-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J]. *Research Policy*, 2008, 37 (10): 1697-1705.
- [30] Marques P, Morgan K. Innovation without regional

- development?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innovation,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97(5):475-496.
- [31] Fragkandreas T. When innovation does not pay off: introducing the “European regional paradox”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3, 21(12):2078-2086.
- [32] Caragliu A, Nijkamp P. The impact of regional absorptive capacity on spat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e Cohen and Levinthal model revisited[J].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4(11):1363-1374.
- [33] Rodríguez-Pose A, Crescenzi 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illovers,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genesis of regional growth in Europe[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51-67.
- [34] Capello R, Lenzi C. The dynamics of regional learning paradigms and trajectories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8, 28(5):727-748.
- [35] 覃成林, 任建辉. 社会过滤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16(9):115-123.
- [36] Xiong A, Xia S, Ye Z P, et al. Can innovation really bring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social filter in China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20, 53:50-61.
- [37] 里卡尔多·克雷申齐, 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 欧盟的创新与区域增长 [M]. 任建辉, 等, 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4.
- [38] 乔尔·莫基尔. 增长的文化: 现代经济的起源 [M]. 胡思捷,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 [39] Li P, Bathelt H, Cantwell J. Location strategy in cluster network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967-989.
- [40] Griliches Z.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D to productivity growth [J].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1):92-116.
- [41] Paci R, Marrocu E. Knowledge assets and regional performance[J]. *Growth and Change*, 2013, 44:228-257.
- [42] D’Agostino G, Scarlato M. Innovation, social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talian reg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9):1514-1534.
- [43] Crescenzi R, Rodríguez-Pose A.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rritorial innovation dynamics of developed and emerg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2, 26:517-533.
- [44] Beugelsdijk S.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regional innovativenes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7, 17(2):187-210.
- [45] Peiró-Palomino J. The geography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9, 98(1):53-73.
- [46] Crescenzi R.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Enlarged Europe: the role of local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peripherality and education[J]. *Growth and Change*, 2005, 36(4):471-507.
- [47] Bilbao-Osorio B, Rodríguez-Pose A. From R&D to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U[J]. *Growth and Change*, 2004, 35:434-455.
- [48] D’Ingiullo D, Evangelista V.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taly[J].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12):1724-1736.
- [49] 任建辉. 创新、社会过滤与区域经济增长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
- [50] Rodríguez-Pose A, Zhang M.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19, 59:633-668.
- [51] Pappa G, Amato S, Lattanzi N. Innovation in peripheral areas: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2025, 12:92-105.
- [52] Rodríguez-Pose A, Wilkie C. Putting China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ascent of the Chinese knowledge econom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6, 9:479-497.
- [53] Crescenzi R, Rodríguez-Pose A. R&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n the U.S [J]. *Growth and Change*, 2013, 44:287-320.
- [54] Crescenzi R,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Regional strategic assets and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emerging countries’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6, 24:645-667.
- [55] Kurikka H, Kolehmainen J, Sotarauta M, et al. Regional opportunity spaces - observations from Nordic regions [J]. *Regional Studies*, 2022, 57(8):1440-1452.
- [56] Iammarino S, Rodríguez-Pose A, Storper M. Regional inequality in Europe: evidence,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273-298.
- [57] Huggins R, Thompson P.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ulture, psychology and agenc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19(1):121-146.
- [58] Iammarino S. An evolutionary integrated view of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concepts, measur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5, 13(4):497-519.
- [59] Morgan K.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geography: learning, proximity and territorial innovation system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4(1):3-21.
- [60] Gianelle C, Kyriakou D, McCann P, et al. Smart

- specialisation on the move: six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J]. *Regional Studies*, 2020, 54 (10):1323–1327.
- [61] Huggins R, Thompson P. Uneven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behavioural economic geography: addressing ‘levelling up’ policies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J]. *Regional Science Policy & Practice*, 2023, 15 (9) : 2274–2294.
- [62] Rodríguez-Pose A, Xiang L, Lee N. Finding stars: mapping 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s scientific elites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5, 51:1–38.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ocial Filte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Ren Jianhui Du Zhongqiao Liu Weiqi

Abstract: The social filter theory,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y system,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knowledge flow, factor allocation,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clearly elucidates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However, throughout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theory has consistently faced numerous bottlenecks, failing to achieve sufficient theoretical expans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has remained in a “sleeping beauty” state where its research value is underestimated. Current studies generally suffer from ambiguous concept definitions, unclear connotative boundaries, imperfect measurement indicator systems, and a lack of unified quantitative methods. Meanwhile, causal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s are not rigorous enough, empirical research mostly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sults are insufficiently connected with local policy practic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translate them into actio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cademic origins, core connotations, and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the social filter the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development shortcomings it faces from three aspects: concept defini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t further proposes targeted core expansion path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quantitative method innovation, and policy path optimiz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filter theory in a systematic, standardized, and localized direction. This research seeks to provide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cientific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the imbalance in China’s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spatial layou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facilitat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Filter; Regional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Knowledge Spillovers

(责任编辑:文 锐)

【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共识与展望

——第九届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综述*

池武城 李光辉 林一玲

摘要: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推动边疆地区从“末梢”向“前沿”转变的战略指引。2025年10月18日,第九届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在黑龙江黑河举行。来自国家部委、高端智库及高等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主题展开研讨并达成诸多共识。一是在战略开放层面,边疆治理应坚持“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打破传统过路通道的依赖,依托“硬软心”三维联通向跨国枢纽与产业经济转型;二是在动能机制层面,边疆经济亟须以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为核心引擎,创新跨区域协同机制,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三是在理论构建层面,必须立足本土实践以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基于上述共识,论坛展望了边疆发展的未来:新时代边疆地区将以新质生产力与制度型开放为两大抓手,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依托智库联盟的跨界协同,边疆研究将从分散探索迈向体系化重构。本次论坛的成果为深化周边合作、优化边疆治理及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

关键词:边疆经济;周边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061.5、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153-08 收稿日期:2026-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与边疆经济的重要论述研究”(25AZD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盟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与路径”(72441006);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创新项目“边疆经济学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26ZGBJY02);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部城乡融合发展研究院一般课题“边疆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青年发展型城市研究”(2025XB15)。

作者简介:池武城,男,广西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南宁 530004)。

李光辉,男,广西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南宁 530004)。

林一玲,女,广西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南宁 530004)。

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

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与对外开放前沿的交汇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背

景下,由广西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广西大学经济学院、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边疆经济合作专业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黑河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于2025年10月18日在黑龙江黑河召开。本次论坛以“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设有主旨报告、年度报告发布和高端对话等环节,汇聚了国家部委、高端智库及高等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成员从专业领域出发,共同围绕主旨报告、年度报告和高端对话的主题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本次论坛内容总结如下,首先,“贯彻新时代治边方略”为边疆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其次,在稳固治理基石之上,“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了边疆高水平开放的外部地缘空间;再次,为支撑建设具有边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成为驱动边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内生引擎;再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空间协同维度,为边疆链接国内外要素提供高效的网络支撑;最后,“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对上述特色的本土实践进行的规律性总结与学理升华。本文旨在全面总结本次论坛的思想精髓,剖析其中的核心共识与未来展望,以期服务国家沿边开放战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贯彻新时代治边方略,统筹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问题,确立并不断深化“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随着时代条件 and 实践要求的变化,这一重要思想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上持续拓展。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明确了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地位,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化边疆治理研究、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理论指引。

从空间属性和功能定位来看,边疆地区既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要地理交汇区,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支撑区域,以及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高质量发展大局。与会成员一致认为,必须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新时代治边方略,在“开放与安全”和“发展与治理”的辩证统一中确立边疆经济发展的新定位。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钱克明在致辞中阐述了落实新时代治边方略的实践逻辑。他指出,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落实新时代治边方略,必须将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更高效内部治理紧密结合。一方面,要统筹开放与治理,激活边疆发展新动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要筑牢安全发展基石,实现固边与富民的有机统一。该论述从战略层面有力回应了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明确了边疆经济绝非边缘经济,而是蕴含特殊动能的关键区域经济形态,其发展本身就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同时,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高元元进一步强调,边疆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前沿窗口,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区域问题,更是关乎国家全局的战略问题。

从学科构建和学理逻辑来看,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光辉通过系统梳理治边方略的历史与实践逻辑,深刻阐释了边疆治理与经济发展双向互动、协同共生的关系,并总结其“安全—发展—再安全”动态循环的特点,呼吁构建起边疆治理与边疆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实践框架。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明洪基于中国国情,从经济、政治、历史和制度四个维度入手分析了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情况及其特点。他认为边疆地区是国际关系与央地关系的交汇点,政治因素是影响边疆经济的首要变量,只有深入理解这四个维度的复杂互动,才能精准把握边疆经济区别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

在具体的治理模式与实践路径上,中国边疆展现出独特的制度优势与创新探索。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倪超军立足新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主张通过突出现代文化和制度的引导作

用来培育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市场意识与现代契约精神,并以此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的多主体协作的推动机制,从而以人的现代化支撑边疆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延边大学边疆(兴边富民)研究院执行院长安国山聚焦于图们江区域陆海联运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在分析区域内边境口岸与港口等基础设施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通道建设面临大部分设施落后与老化、通关速度缓慢与效率低下,以及受国际政治影响较大等现实问题,主张应充分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机,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摆脱传统思维,积极推动“大图们倡议”转型成为独立的国际组织,从而在复杂的国际利益关系中深化区域经贸合作。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在“贯彻新时代治边方略,统筹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议题上凝聚了高度共识。在宏观战略层面,边疆地区是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枢纽,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必须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效内部治理相统一;在学理认知层面,边疆经济具有政治、经济、历史与制度多维交汇的特殊属性,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在实践路径层面,边疆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多维度、多主体的协同演进,既依赖于现代市场意识培育下“人的现代化”,也亟须通过机制创新打破跨国物流通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瓶颈。以上共识构筑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安全与治理底座,也为边疆地区走向高水平开放、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明确了前提与方向。边疆治理现代化是高水平开放的基石,高水平对外开放则是检验边疆治理效能的关键。在筑牢安全与治理底座的基础之上,如何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打造边疆高水平开放新高地,成为本次论坛深化研讨的核心议题。

二、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边疆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周边是我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为在新形势下做好周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复杂环境下,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不断走向完善的中国方案。边疆地区的开放水平、与周边国家合作都深度关系到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纵深发展与实践成效。新时代边疆开放需要改变传统的经贸通道功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枢纽经济体系,并依据不同地缘方向的战略禀赋,实施差异化开放策略,最终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从地缘方向的全方位布局来看,边疆地区正在构建向北、向西、向南协同推进的差异化开放体系。在向北开放的战略布局中,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原副司长温韧指出,边疆地区应利用“一平台一中心”的战略抓手,精准破解海关监管战线长、人员力量弱、跨境信息不畅的痛点难点。在深化中亚合作的进程中,应以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为新支点,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建设口岸专用物流基地,推动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从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转型,从而开拓中亚合作的蓝海新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马友君聚焦黑龙江对俄通道建设与跨境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探讨了通过通道能级提升来带动跨境产业协同发展的具体逻辑。他建议,依托对俄通道,积极探索跨境产业协同发展路径,深化中俄双方在跨境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提升黑龙江在对俄经贸合作中的战略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向西开放层面,新疆财经大学丝路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何剑指出,新疆应充分发挥“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推动投资合作向产业链深度整合迈进,实现从商品输出向产业生态输出的升级。创新“产业园区+”模式,以技术共享、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化全产业链合作,将园区从单一生产功能转向产业、社区与服务相结合的综合体,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构建面向中亚的跨境产业链体系。在向南开放维度,南京海关总工程师胡克宏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对园区内加工制造增值超过30%的货物给予内销免税支持,并深度应用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以“三智”理念提升治理水平,推动中越德天瀑布、凭祥—谅山等跨境合作区向产业枢纽升级,为通道经济转向产业经济奠定基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跨境合作园区发展,实现从开放平台向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广西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章海源进一步指出,自贸试验区作

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通过优化规则体系,实现向高质量发展高地的战略提升目标。在广西的具体实践中,应着力推动崇左、南宁、钦州三个自贸片区的协同创新发展,整合崇左的沿边跨境优势、南宁的科技与现代服务业优势,以及钦州的产业集聚与港口优势,推进产业、招商与服务等领域的协同,探索崇左与南宁在强化科技支撑、延长产业链方向的联合创新,推动崇左与钦州在“海运互市+落地加工”方向的模式创新,不断深化建设面向东盟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从开放的多层次保障机制来看,空间联通、人文交流与安全底线构成了支撑边疆高水平开放的核心要素。在空间联通层面,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覃诚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空间经济关联的研究指出,应依托RCEP与上合组织等平台同步推进规则互认与项目协同,打造联通枢纽群并构建干线与支线相互支撑的集疏运体系,巩固中国在区域经济联系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在人文交流层面,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唐玉爽认为,人文交流的“心联通”机制是推动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文化同脉、习俗相近的天然优势有助于形成深层的文化认同,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与语言成本,引致共同的消费偏好,显著促进边疆地区的出口规模增长。在安全底线层面,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稳边与兴边有机结合,只有确保周边安全,才能实现真正的高水平开放与共同体建设。安全与发展并重、经贸与人文共进、实体与数字融合的开放格局,深刻诠释了新时代边疆打造国际化开放新高地的实践逻辑。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在“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议题上凝聚了高度共识。新时代的边疆开放亟须摆脱传统的过路经济依赖,全面向全方位、多层次的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型。在空间布局层面,无论是向北提升对俄通道能级、向西构建面向中亚的跨境产业生态,还是向南推进自贸区协同与跨境园区能级提升,边疆高水平开放均需依据地缘禀赋实施差异化战略,推动单向商品输出向产业链深度整合升级;在保障机制层面,边疆开放是一项立体的系统工程,应在守牢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制度的“软联通”、人文交

流的“心联通”。以上共识描绘出边疆全方位开放的宏大图景,也揭示了一个必然趋势,即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跨境枢纽与产业生态,仅靠传统要素驱动已难以为继,必须把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作为核心动力,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三、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培育边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边疆地区拓展了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但要将在外的地缘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持久的经济增长胜势,必须从根本上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在中国式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数字经济已成为边疆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与关键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有望达到49万亿元,约占GDP的35%,未来将创造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对于边疆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非地域性特征打破了传统工业文明时代的时空约束,使其正在从传统的地理末梢加速跃升为数字时代的开放前沿。边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应简单复制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型模式,而应立足地缘与资源禀赋,利用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与非地域性特征,对传统地缘经济进行全方位赋能。

针对我国广阔边疆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现实差异,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是破解数字鸿沟的创新思路。商务部亚洲司前商务参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任经济商务公使宋耀明指出,边疆已从传统的地理末梢跃升为数字时代的开放前沿,但目前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着连接鸿沟、数据鸿沟、人才鸿沟及规则鸿沟等难题,应重塑边疆作为全国算力网络“西翼枢纽”、跨境数字贸易“第一门户”及治理现代化“示范窗口”的战略角色,推动边疆口岸由“过货通道”向“数字口岸”升级,逐渐实现“通道经济”向“价值经济”的跨越。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副秘书长郑悠指出,南北边疆在数字赋能路径上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西南边疆依托RCEP制度红利和东盟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以跨境电商、直播经济为代表的“贸易导向型”数字化模式;而东北边疆受

制于重工业基础和特殊的地缘格局,更多依赖于口岸物流和资源型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呈现出“产业导向型”的转型特征。为此,她建议应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并建立“南北边疆数字经济交流平台”,由西南边疆向东北边疆输出成熟的跨境电商运营经验,同时由东北边疆分享资源型产业数字化转型与跨境物流协同的实践成果,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整合,共同破解边疆地区的数字化发展瓶颈,推动数据要素在全国边疆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增效。

在具体产业场景创新层面,与会专家主张通过数智化赋能特色资源来打造具有边疆辨识度的新质生产力集群。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张熙炅结合吉林省情提出,边疆地区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与应用场景,实施“特色资源+场景创新+政策破壁”的差异化策略。以吉林为例,系统阐述边疆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现形态:在工业领域,利用高纬度寒冷气候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寒地测试产业;在农业领域,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施黑土地智慧农业监测与精准作业;在安全领域,部署边境安防智能监测系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玉杰建议着力抓好“边贸产业”和“大旅游产业”两大抓手,通过将边贸资源落地加工再加工来带动本地形成资源深加工产业链群,依托陆海统筹与资源融通,将边疆地区的新质生产力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夯实数字底座、有效应对劳动力约束成为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俄博览会组委会中方专家、黑龙江省经济科技顾问委员会外贸专家崔世亮指出,必须加快补齐边疆数智基础设施短板,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对特色农产品、绿色食品及生态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抗风险能力。从劳动力经济学视角来看,数字化转型为破解边疆人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科秘书张东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边疆地区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外流严重的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化效率,还能有效调节人口老龄化对东北地区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升级来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秘书长李向荣则从改善民生的视角出发,认为数字基建是破解人口流失与空心村难题的破局

点,远程教育与远程医疗等场景化应用可以有效改善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聚焦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培育边疆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议题凝聚了高度共识。边疆地区正从传统的地理末梢加速向数字前沿跃升,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正视南北边疆在贸易导向和产业导向上的异质性,以跨区域协同机制精准破解数字鸿沟;在产业场景创新层面,数字赋能必须紧密结合边疆独特的资源禀赋,走“特色资源+场景创新”的差异化路径,将边贸、旅游及寒地资源等传统比较优势转化为具有边疆辨识度的新质生产力集群;在数字基础与社会效应层面,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是产业升级的硬件前提,更是从根本上化解边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外流等结构性矛盾,进而提升边疆民生福祉的关键所在。以上共识表明,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已成为重塑边疆发展逻辑的内生动力;而数字技术带来的要素跨区域流动红利,客观上也要求边疆经济打破物理与行政边界。如何依托这些新动能来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并创新区域协同机制,成为边疆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大循环的下一步战略焦点。

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新边疆区域协同机制

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向外开放,也需要向内融合。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是边疆地区的新使命。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打破地理和制度的藩篱,使边疆地区既做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又做国内大循环的纵深地,成为本届论坛深化探讨的新议题。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要直面边疆地区面临的深层结构性矛盾。西南民族大学国家安全与区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毅深刻指出,边疆现代化并非复制东部模式,而是要基于安全、发展与生态的三元平衡范式,培育高原特色产业,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同时,提升本土产业贡献率,并增强边疆发展的内生动能。辽宁大学俄罗斯蒙古研究中心负责人崔日明针对东北边疆现状作出补充,当前跨境物流通道不畅、边境产业支撑薄弱,导致贸易

成本居高不下,必须推动平台整合,并构建多区叠加的体制框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消除特殊政策落地难的瓶颈,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深度联通。

向内协同开放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需要自贸试验区深化制度创新,发挥其先行先试的核心作用。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张志明通过对比沿边自贸片区的实践经验指出,虽然广西等边疆地区通过“海—陆—腹”联动已成功将区位优势转化为战略链接点,但目前边疆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仍普遍面临系统性集成度不高、多层协同机制缺失等瓶颈,导致跨区域政策协同存在障碍。应借鉴既有经验,打造“互市贸易+保税展示+跨境结算”一体化平台,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来强化口岸与腹地的联动,并依托北向开放枢纽实现从“过货通道”向制度型开放高地的实质性跨越。从顶层设计来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玉杰提出,边疆地区应尝试打破传统的行政版图管理体制,按照“经济区”和“功能区”的要求进行跨区域统筹规划,创建高水平的海陆丝绸之路枢纽和国际化跨国公司链群基地,在制度层面彻底打破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的限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在具体的区域协同路径上,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联动成为关键抓手。黑河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翟立强针对跨境物流通道不畅、俄罗斯远东地区交通运力不足等瓶颈,建议应积极构建以“链长”为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保障机制,加强政策支持、扶持重点产业、深化对俄合作,推进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逐步提升中俄合作层次,不断扩大对俄沿边开放的战略能级。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孟月明建议,应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俄罗斯、蒙古国能源资源在东北三省就地加工的数量和深度,构建中俄木材及陆路粮食走廊等跨境产业链,在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内外联动的同时,切实发挥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等“五大安全”的作用。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创新边疆区域协同机制”凝聚了高度共识。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突破行政区划的地理与制度藩篱,按照“经济区”与“功能区”的逻辑进行跨区域协调规划,使边疆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战略枢纽;在制度型开放层面,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开放平台亟待跨越碎片化创新的瓶颈,通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区域政策协同与系统集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产业协同路径层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抓手在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联动,应推广飞地经济、口岸与腹地联动、跨境资源就地加工等创新机制,将边疆的地缘通道转化为坚实的产业基础。以上共识为边疆地区破解要素流动壁垒、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清晰的破题思路。同时,上述极具中国特色的边疆“双循环”发展实践,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现实土壤与逻辑起点。

五、立足边疆经济发展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

实践的发展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已成为科学解释中国边疆经济发展现状、有效指导未来实践的时代使命。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和繁重的改革任务,广西大学党委书记李国忠表示,边疆问题复杂多样,需要各界集思广益,共同参与。要以协同理念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打造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智库引擎,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打破学界、政界与产业界的壁垒,充分发挥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和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的平台作用,以建设边疆大数据库、开展联合攻关为抓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方案,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决策支持;要以创新精神深化理论研究,立足边疆开放发展的实际,深入剖析中国边疆治理的独特逻辑与实践规律,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为边疆发展提供学理支撑;要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夯实人才根基,共同培育投身边疆建设的时代新人,优化边疆学科布局和培养模式,激励更多青年人才关注边疆、投身边疆,为边疆事业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在理论建设方面,广西大学中国边疆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光辉通过系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提出应在理论层面确立治理与发展协同共生的辩证关系,主张将治理现代化视为发展的根本保障,并把高质量发展作为

治理的物质基础。他建议构建一个涵盖安全屏障、经济活力与民生改善的综合分析框架,统筹推进人防、物防、技防的深度融合,加快推动边疆特色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为解决边疆地区如何谋划、如何驱动、为谁发展、如何持续、如何保障等理论命题提供学理支撑。针对边疆经济运行中常见的波动性难题,广西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胡超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分析认为,边境贸易波动本质上是条块分割治理结构下发展与安全博弈的结果,侧重规则与安全的纵向治理部门与侧重绩效及增长的横向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目标差异,导致政策执行的摆动。据此,应构建纵向垂直治理与横向协同治理相结合的边贸治理新机制,破解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难题。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副秘书长巩润泽则从微观视角切入,指出创业作为边疆经济的重要形式,能够产生吸引资金集聚、促进人口回流的经济效应,通过发挥边疆家庭创业在资金与地租等方面的政策性红利优势,可以有效缓解边境空心化与劳动力流失问题,并进一步夯实边疆经济学的微观研究基础。

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还需强化“四梁八柱”。在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论坛期间同步召开了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第五次会议。会议总结了联盟前一阶段在合作机制、信息共享与联合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特别肯定了边疆经济学大数据平台建设与微观实地调查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同时,会议明确了下一阶段深化协同创新的重点方向与实施路径,标志着边疆经济研究正从分散探索走向体系化协作,为学科体系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辽宁大学俄罗斯蒙古研究中心负责人崔日明针对引人难、留人难的现实困境,建议设立“边境人才特区”,实施特殊的税收与户籍政策;创新飞地人才服务机制,允许人才工作在边疆、生活在内地,或者研发在飞地、转化在边疆,通过柔性引才解决边疆高端智库与产业人才匮乏的结构性矛盾。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倪超军认为,智库研究既要关注高端人才,更要关注边疆基础劳动力的现代性转型。应加强职业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培训,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劳动力短缺问题,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为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长远动能。此外,论坛期间发布的《2025中国边疆经济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4

年边疆九省区GDP总量达18.6万亿元,同比增长6.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05%,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报告新增了“边疆省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和“地方篇”板块,全面呈现了边疆经济发展的新图景。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高元元指出,应依托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和边疆经济学大数据库平台,加强政产学研协同,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将一线调研中发现的新情况及时转化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的高质量智库成果。

综上所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立足边疆经济发展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凝聚了高度共识。中国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需要超越传统西方经济学框架,深刻提炼中国边疆治理的独特逻辑。共识的核心在于,亟待构建统筹“治理与发展”的综合分析框架,从宏观的纵横协同治理机制到微观的边疆家庭创业效应,全面夯实边疆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学理基础;在研究方法与智库支撑层面,理论建构不能闭门造车,必须依托中国国际合作学会边疆经济合作专委会、边疆经济大学智库联盟与边疆经济学大数据库等平台,打破政产学研的体制壁垒,形成“数据共享—联合攻关—政策转化”的协同创新闭环;在要素与人才保障层面,人才是理论建构与边疆建设的根本,可以设立“边境人才特区”与“飞地柔性引智”等机制破解高端智力瓶颈,同时依托教育培训,加速基础劳动力向人才红利转型。以上共识标志着中国边疆经济研究正从分散的对策探讨走向体系化的理论构建,不仅是对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开放实践的学术凝练,更是在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为科学应对未来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时代考题,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六、结语与展望

第九届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立足百年变局与新时代治边方略的宏大时代交汇点,深刻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命题。与会专家学者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双重维度,系统阐释了边疆地区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坐标。论坛凝练出的核心共识是,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统筹推进治理现代

化为安全底座,以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外部空间,以聚焦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动能,以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协同网络,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起中国自主的边疆经济学知识体系,最终推动边疆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列共识深刻表明,边疆地区已经不是地理边缘,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衔接点,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的重要前沿。

基于上述共识,与会代表对边疆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展望。一方面,边疆地区亟待筑牢安全底座、厚植创新动能、拓展开放维度,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并重,探索跨境产业链协同与边疆国际经济合作带建设的新路径,加速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

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边疆经济研究将以此次论坛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政产学研协同机制,致力破解边疆研究数据匮乏难题,加快边疆经济学大数据库建设,推动研究范式向定量与实证深化。同时,积极推动政策解读向制度创新研究升级,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应对边疆人才流失、产业同质化等挑战提供精准的“智库方案”。

总之,时代呼唤理论,理论指引实践。未来,作为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年回顾参考案例,中国边疆经济开放发展论坛将以更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和更接地气的政策倡导、以推动边疆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使命,为绘就兴边富民、睦邻安邦的时代画卷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智力动能,以边疆繁荣的内生韧性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观照的中国边疆范式。

Consensus and Prospec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9th China Forum on Frontier Economic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Chi Wucheng Li Guanghui Lin Yili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hina's efforts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s become a strategic guideline for transforming border regions from "peripheries" into "frontiers." On October 18, 2025, the 9th China Forum on Frontier Economic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was held in Hei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More than one hundre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national ministries, leading think tank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gathered to discuss the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ies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reaching a series of important consensuses. First, at the level of strategic openness, Frontier governance must adhere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move beyond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transit-channel models, and promote transformation toward transnational hubs and industrial economies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connectivity framework of "infra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Second, at the level of driving mechanisms, Frontier economies urgently need to tak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as core engines, innovate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deeply integrate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strategic nodes in the dual circul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ird, at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an indigenous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of Frontier economics grounded in local practices. Based on these consensuses, the forum outlined future prospects for Frontier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order regions will leverag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s two key drivers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pattern featuring coordinated land-sea integration and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supported by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within think tank alliances, frontier studies will evolve from fragmented exploration to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The outcomes of this forum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deep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optimizing border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rontier economies.

Key Words: Frontier Econom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Neighboring Countrie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责任编辑:彦 伦)